

nothing to envy

세상에 부럼 없어라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 by barbara demick

"Provocative... offers extensive evidence of the author's deep knowledge of this country while keeping its sights firmly on individual stories and human details." — *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最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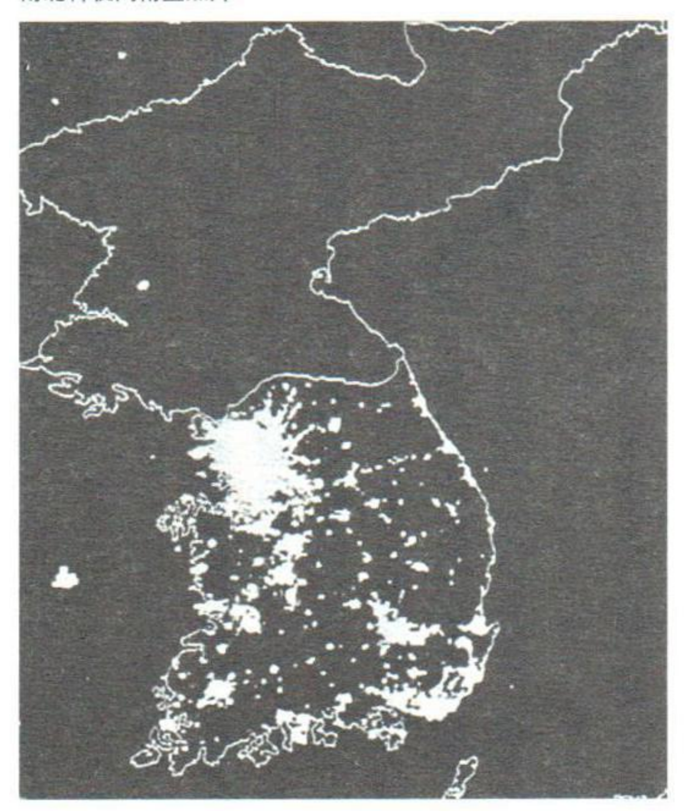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著　黃煜文——譯

winner of the bbc samuel johnson prize


north korea
0
英哩
100
0
公里
100
俄羅斯
圖們
延吉
穩城
會寧
從清津到茂山
——或會寧的
主要逃亡路線
茂山
中國
白頭山
圖們江
清津
鴨綠江
鏡城
吉州
金策
鴨綠江
丹東
新義州
北韓
從清津到平壤
的鐵路線
咸興
朝鮮灣
日本海
（東海）
元山
平壤
南浦
國境線與非軍事區
金剛山
開城
板門店
首爾
仁川
水原
黃海
南韓

南北韓夜間衛星照片



第一章

在黑暗中手牵着手

如果你观看远东地区的夜间卫星照片，会狐疑地发现其中有块缺乏亮点的黑色区域。这片黑色地带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这块神秘黑洞的两侧，南韩、日本与现在的中国闪烁着繁荣的亮点。从数百英里高空往下看，广告看板、车灯与街灯，以及连锁速食店的霓虹灯，看起来就像许多小白点，显示这些地区的民众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能源消费者。但在这片光点的中间有块与英格兰面积相当的黑色地带。一个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为什么看起来象海洋一样空洞，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北韩简直就像个无人地带。

北韩陷入黑暗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事。随着苏联解体，原以廉价燃油支撑老共党盟友的措施也跟着中断，于是北韩摇摇欲坠的无效经济开始崩溃。发电厂一件件地关闭。灯光熄灭。饥饿的人民偷偷刮取电线杆上的铜线以换取粮食。当夜幕低垂，地面上的景物蒙上一层灰雾，低矮的民房也被黑夜所吞噬。整个村子完全隐没在薄暮中。即使是用来展示的首都平壤，夜里走在大街上，也黑得看不到两旁的建筑。

看着什么都没有的北韩，令人联想到文明电力还无法抵达的非洲或东南亚偏远村落。然而北韩并非未开发国家，而是一个陷入停摆的已开发世界。你可以看到北韩曾经开发的证据，在任何一条北韩主要道路上看看再头上悬晃的东西，就可以知道少了什么，曾一度覆盖全国的电力网路只剩下电线的残骸。

中年以上的北韩人还清楚记得，过去他们拥有的电力（与粮食）远多于他们在南韩的亲美亲戚，然而现在他们夜里却只能呆在黑暗中，这种对比增添了屈辱的感受。一九九〇年代，美国曾表示愿意协助北韩解决能源需求问题，前提是北韩必须放弃核武计划。但后来布什政府指控北韩违反承诺，能源援助于是不了了之。北韩人不仅苦涩地埋怨黑暗，也责怪美国的禁令。他们无法在黑夜里阅读，也无法看电视。“没电视，我们无法产生文化”，一名壮硕的北韩保安人员语带指责的对我说。

但黑暗也有好处。特别是对于想偷偷与某人约会的青少年来说。

当大人们上床睡觉，在冬天时，有时会在七点这么早的时间就寝，正是溜出家门的大好良机。黑暗提供了北韩在有电时无法拥有的隐私与自由。在神奇的隐形斗篷掩护下，你可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父母、邻居或秘密警察的窥伺。

我遇过的许多北韩人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学着去喜欢黑暗，但其中有位少女与她的男朋友的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她十二岁时遇到临镇一名比她大三岁的男孩。她的家庭在北韩错综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里属于下层阶级，如果被人在公开场合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会影响男孩未来的前途，也会伤害女孩的名声。所以他们的约会只能在黑暗中不断散步。反正他们没别的事可做；在他们开始约会的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因为停电，所以餐厅或电影院都不开放。

他们通常在晚饭后见面。女孩告诉男朋友不要去敲门，怕被她的姐姐或弟弟问东问西，也怕邻居们好管闲事。女孩一家人拥挤的生活在一栋狭长的建筑物里，后方是由十二个家庭共同使用的外屋。民宅与街道隔着白墙，但这堵墙的高度只不过刚好能遮住视线。男孩在墙后头找了一处无人注意的地方，还好这时天色已暗。邻居洗碗与使用厕所的声响掩盖了他的脚步声。他会花几个钟头等她，也许两到三个小时。但这并不要紧。时间在北韩相当缓慢，而且也没有人戴表。

女孩一找到机会，就拜托家人出来跟他会和。走到屋外，女孩仔细往暗处里瞧，起初看不见他，但确定他一定在哪儿。她毋须花费心思化妆，反正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她只穿学校的制服：宝蓝色的裙子，长度足以遮住膝盖，白色短上衣与红领结，这些衣物的布料全是容易起皱的合成材料。她还太年轻，还不懂得注意自己的外表。

起初，他们沉默的走着，不久就开始低语，而在走出村子之后，他们放松心情，开始正常地对话。他们一直保持一条手臂的距离，直到确定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为止。

就在离镇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穿越灌木丛通往温泉胜地的道路。这个温泉胜地曾经非常知名：它的一百三十度泉水曾吸引满载一辆辆想治疗关节炎与糖尿病的中国游客的游览车前来，如今这座温泉已无人过问。入口处有个瓶颈足以照人的矩形池子，池旁围着一圈石墙。穿过温泉圣地的道路沿边生长着松鼠、鸡爪槭，以及女孩的最爱——银杏树，秋天时芥末黄的叶子纷纷落下，叶的形状是完美的东方扇子形。附近的丘陵的林木被继续柴火的民众砍伐殆尽，但温泉附近的树林实在太美丽，当地人心生憧憬，此地因此免于斧钺之灾。

不过，这出温泉地疏于管理。数目未予修剪、石椅碎裂、路面铺石像蛀牙似的东 西漏。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北韩几乎所有事物都已年久失修而不堪使用。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在夜里，一切的不完美都不是那么明显。污浊而长满杂草的温泉池子，在夜空映照下显出了光辉。

北韩的夜空值得一观。这里的夜景或许是东北亚最美丽的，在整个大陆上，它是唯一免于没烟、戈壁沙尘与一氧化碳污染的地方。过去，北韩工厂造成大量云雾，这种情况已补复见。现在已无任何人工照明与天上的繁星争雄。

这对小情侣整夜散步，他们走过的地方全散落着银杏叶。他们聊些什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同学、他们读过的书——无论什么话题，都能让他们兴致盎然。几年后，当我问女孩她人生中最快乐的回忆时，她告诉我这几个夜晚的事。

这种事不会显现在卫星照片上。无论在维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CIA）或在大学的东亚系，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来分析北韩。他们从未停下来想想，在这块黑洞中央，在这个阴郁黑暗的国度里，除了数百万人饿死于饥馑外，还有爱情的存在。

我遇到女孩时，她已经是个三十一岁的女人。美兰（本书使用的化名）六年前逃出北韩，现在在南韩生活。我为了撰写有关脱北者的文章，所以才向她提出采访的要求。

二零零四年，我担任《洛杉矶时报》驻首尔新闻处处长。我负责报道的范围涵盖整个朝鲜半岛。南韩的采访工作相当容易。南韩是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是个繁荣而偶有混乱的民主国家，而且拥有亚洲最具攻击性的记者群。南韩政府官员会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号码，而且不介意记者在非办公时间打电话给他。北韩则是另一个极端。北韩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仰赖朝鲜中央通讯社(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提供的连篇辱骂，该社有个诨名，叫“大辱骂者”（Great Vituperator），以为它总是以荒谬浮夸的言辞痛骂“帝国主义的美佬杂碎”。美国为协助南韩而参与韩战（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这场战争是冷战的第一场战火，至今美国仍在该国屯驻四万士兵。对北韩而言，这场战争仿佛从未结束，它对美国的恨意仍相当直接而鲜明。

美国公民罕能获准进入北韩，美国记者入境的可能性更低。二零零五年，当我终于获得签证造访平壤时，我与一名同事被引领沿着一条制式的参观路线游览，我们参观的主题是金正日以及他去世的父亲金日成的辉煌事迹。陪伴我们的是两名身穿深色西装的瘦削男子，两人都叫朴先生。北韩特地为外国访客拍了两名“看管者”，目的是让这两人彼此监视，以免他们遭到收买。两名看管者异口同声的复诵官方新闻媒体的夸大辞藻。（“感谢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他们对话时总是突兀而固定的插进这句话。）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总是将目光别开，我怀疑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是否真如自己所言那样敬爱他们的领袖？他们是否有充足的粮食可吃？他们下班回家从事什么活动？生活在世上最专制的政权底下是什么感觉？

显然，要在北韩京内得到答案是不可能的。我必须与离开北韩的人交谈，也就是那些脱北者。

二零零四年，美兰在位于首尔南方二十英里的水原，这是一座充满活力儿噪杂的城市。水原是三星电子总部与许多制造业群聚设厂的所在地，这些公司的产品是绝对大多数北韩人难以想象的——电脑荧幕、CD-ROM、数位电视、快闪记忆卡。（有一份经常饮用的数据指出，两韩的经济差异至少是统一时两德差距的四倍。）这座城市充满噪音与杂乱，各种颜色与声响不协调地凑合在一起。与绝大多数南韩城市一样，水原的建筑物是一群丑陋水泥箱子拼凑而成的，上面还装饰着各种俗不可耐的招牌。高层公寓从拥挤的闹区往外延伸数英里，街上到处可见 Dunkin Donuts、必胜客以及许多贩卖韩国仿冒品的商店。后街充斥着宾馆，招牌上写的不外乎情色魔铁与爱情小栈等用来宣传计时休息的文字。交通堵塞已

成常态，经常可见数千辆现代汽车——经济奇迹的另一项成果——在自宅与购物中心之间吃力的前进。由于水原经常塞车，所以我选择从首尔搭火车前往该地，大约三十分钟的车程，然后转搭计程车缓慢地朝水原少有的一处宁静地点移动，这是一间坐落在十八世纪古城对面的烤牛肋排餐厅。

起初我认不出美兰。她看起来完全不像印象中的北韩人。当时南韩约有六千名脱北者，从他们身上很容易看出与南韩社会格格不入的特征，例如裙子穿得极为破旧以及新衣服上未剪的标签，但美兰外表却与其他南韩人没什么两样。她穿着时髦的棕色毛衣配搭针织裤，并且给了我一种羞怯的印象（但就像其他人一样，这种印象证明是错的）。她的头发往后梳，整齐地以莱茵石发夹固定。她的外表无可挑剔，除了下巴涨了几颗痘子以及肚子些微隆起，她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一年前她嫁给南韩人，一名民间的军方雇员，他们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

在此之前我已与美兰约好共进午餐，藉此多了解一点北韩的学校制度。她在逃离北韩之前曾有几年时间在一座煤矿城镇担任幼稚园老师。现在她则在南韩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这是一场严肃的对话，有时还相当沉重。当她提到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五、六岁的孩子饿死时，我们望着桌上的菜肴难以下咽。她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而她只能教导他们身为北韩人是幸福的。金日成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韩分裂开始后开始统治，直到一九九四年去世为止。金日成死后被尊奉为神，他的儿子暨继承人金正日则是神的儿子，就像基督一样。美兰从此成为北韩洗脑体系的严厉批判者。

这个话题持续了一两个钟头，接下来我们转而谈论可能有些人认为不太重要的典型女孩话题。美兰的沉重与坦率使我鼓起勇气向她提出比较私人得问题。北韩年轻人有什么娱乐？她在北韩有过快乐的时光吗？她在北韩有男朋友吗？

“你的问题很有趣”，她说。“我前几天才梦到他。”

她形容这名男孩身材高大但手脚敏捷，蓬松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她逃出北韩后，惊喜地发现南韩有个叫柳俊相的青春偶像像极了她的前男友。（于是我使用俊相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他很聪明，就读平壤最好的大学，未来将成为一名科学家。而这也是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被人看见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关系会破坏他的前途。

北韩没有宾馆，男女之间不许随意发生亲密关系。不过，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打探他们的关系到达什么地步。

美兰笑了。

“我们交往了三年才牵手。之后又过了六年才接吻”，她说。“我做梦也没想过更进一步。离开北韩那年，我二十六岁，而且还是个老师，但我不知道怎么样才会怀孕。”

美兰承认自己经常想起初恋情人，而且对于自己离开的过程带着些许悔恨。

俊相曾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把自己的梦想与家里的秘密全告诉他。尽管如此，美兰还是对俊相隐瞒了她人生最大的秘密。她从未告诉他，她的家人正计划逃离北韩。不是她不相信他，而是在北韩这种国家，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如果俊相告诉别人，而别人又告诉别人…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到处都有人窃听。邻人告发邻人，朋友告发朋友。即使是情侣也可能彼此揭发。如果秘密警察知道他们的计划，她的家人将会被送到山上的劳改营里。

“我不能冒险”，她对我说。“我甚至连一句再见也没说。”

在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美兰与我经常聊起俊相。她是个幸福的已婚妇女，当我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已为人母，但每次谈到俊相，她讲话的速度就会加快，脸上泛着红晕。我觉得只要我提起这个话题，美兰总是心情不错，我想这是因为她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的缘故。

“他后来怎么了？”我问。

她耸耸肩。韩战已经结束五十年，南北韩民众仍无法适当交流。就这点来看，南北韩完全不同于东西德或其它类似处境的国家。南北韩之间不通电话，不通邮，当然也无法使用电子邮件。

美兰自己也有许多未解的疑问。他结婚了吗？他还想着她吗？他是否恨她不告而别？俊相是否会认为逃走的美兰是祖国的叛徒？

“无论如何，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但我实在无法得知他的想法”，美兰回答说。

美兰与俊相在十几岁时相遇。他们都住在清津的郊区，清津是朝鲜半岛东北部一座工业城市，距离俄国边境不远。

北韩地貌像极了东方水墨画。山川景致极为美丽，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非常类似，但就是少了色彩。从冷杉、杜松与云杉的墨绿色到花岗石山巅的乳灰色，这是一碟色调优先的调色盘。亚洲农村典型由数方稻田拼贴而成的蓊郁景象，只能在短暂数月的夏日雨季才能见着。秋季绿意转瞬即逝。除此之外，一年到头几乎所有景物都是黄色与褐色，其余颜色都被沥除殆尽。

你在南韩看见的喧嚣，在此全部存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招牌，汽车也很少。法律不允许民众拥有汽车，不过其实也没几个人买得起。就连牵引机也很罕见，只看到毛色蓬乱的耕牛拖犁耕田。民宅的样式简单，只求实用，颜色相当单调。韩战之前的房子所剩无几，绝大多数都是一九六〇年代与一九七〇年代以水泥与石灰兴建的，而且依照职业与阶层分配给民众。在城市，有所谓的“鸽笼”，也就是低矮公寓里单房单位。在乡村，民众一般居住在单层建筑物里，称为“口琴”，成排的单房住屋彼此紧挨，就像构成口琴气室里的小方格。有时候，门框与窗框会漆上蓝绿色，但绝大多数都刷上白色石灰或灰濛的颜色。

在《一九八四》（1984）一书中，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想象了一个未来主义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北韩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描绘金日成的图像时，北韩特别使用了鲜艳的海报色彩，并且呈现出社会主义写实的画风。伟大的领袖坐在长登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线：他就是太阳。

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宣传标语。韩文使用一种独特的由圆圈与线条构成的字母。各式红色文字以一种急迫的姿态从灰色景物中一跃而起。这些红色文字横行原野，盘踞于花岗石绝壁，像里程碑一般标记着主要道路，还舞动于火车站及气体公共建筑物的顶端。

金日成万岁！

金正日，二十一世纪的太阳！

自立自强！

坚持党的领导！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十几岁的美兰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标语。她的父亲是个卑微的矿工。他们家很穷，但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跟他们一样穷。由于外界所有的出版品、电影与广播都被禁止，所以美兰一直以为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生活得并不比他们好，而且绝大多数可能过得比他们还苦。美兰不止一次从收音机与电视里得知，南韩人在亲美傀儡朴正熙及其继承者全斗焕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也听说中国的修正共产主义不如金日成的纯正共产主义来得成功，而且数百万的中国人正在挨饿受苦。总之，美兰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出生在北韩，能得到领袖如父亲般的关爱照顾。

事实上，美兰成长的村子在一九七〇年代与八〇年代情况并不差。北韩的村落千篇一律，这座村子也不例外，它约有一千名居民，在中央计划的统筹管理下，每一座村落大小几乎相同，唯有位置取决于偶然。这座村子距离东海（日本海）只有六英里，当地人因此偶尔可以吃到心想的鱼蟹。村子刚好位在清津工业区的外围，不仅临近清津，而且拥有开阔的田地可以种植蔬菜。在北韩这样一个缺乏农耕地的国家，拥有这种地形是很幸运的。金日成有许多度假别墅，其中有一处就位于村子附近的温泉胜地。

美兰是最小的女儿，在她上面还有三个姊姊。一九七三年，当她出生之时，如同十九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珍.奥斯汀（Jane Austen）在《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提到一个拥有五名女儿的家庭所遭遇的困境，北韩也不例外。北韩与南韩都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必须由男子传承香火照顾年老的父母。美兰的父母最后终于摆脱了无子的悲剧，在美兰出生后三年生下一名男婴，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的小女儿将成为家中被遗忘的孩子。

根据美兰父亲的身份，美兰家被分配住进口琴屋的一个住房单位。入口直通着小厨房，厨房兼作为暖炉房。将木材与煤炭掺入炉床中，暖炉产生的火力可以用来烹饪，并且籍由一种名叫“温突”的位于地板下的设施来温暖住宅。厨房与主房之间隔着一扇拉门，全家人晚上谁在主房的炕席上，白天炕席则卷起收妥。男孩的诞生使这个家增为八人——五名子女、父母与祖母。于是美兰的父亲贿赂人民委员会的主任，让他们得到邻接的住房单位，并允许他们在两房毗连的墙壁上开一道门。

家庭空间比较宽广之后，就要对男女做出区隔。在吃饭时间，女性会挤在厨房边低矮的木桌旁，吃的是粗玉米粉，这种食物比米来的廉价而较无营养，是北韩人的主食。父亲与儿子两人坐一桌，吃的则是白米饭。

“我以为生活原是如此”，美兰的弟弟锡柱后来这么对我说。

姊姊们注意到了，却不声张，美兰却大哭并且抱怨不公平。

“为什么只有锡柱能穿新鞋？”她质问。“为什么妈妈只关心锡柱不关心我？”

他们会叫她闭嘴而且不理会她。

这不是她第一次反抗加诸于年轻女性的各种非难。在当时的北韩，女孩子不许骑脚踏车。这是一种社会污名——人们认为女孩骑脚踏车不堪入目而且有性暗示——朝鲜劳动党三令五申，想使其在技术上成为非法。美兰对这项规定视若无睹。她从十一岁起就骑着家里仅有的一辆二手日制脚踏车前往清津。只要能摆脱村子给她的压迫，任何地方她都愿意去。这段路对一个孩子来说相当辛苦，大约三小时的上坡路，只有一部分是柏油路面。男人们骑着脚踏车试图赶上她，咒骂她无耻。

“你这个荡妇”，他们对着她叫嚷。

有时候，一群青少年疾驰到路上想撞倒她。美兰会大声斥责他们，对方用什么话骂她，她就用同样的话回骂。最后，她学会不去理会这些人，继续踩着踏板前进。

对美兰来说，她的家乡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她喘息——电影院。

北韩每座城镇，无论多小，都有电影院，这是因为金正日深信电影是灌输群众忠党爱国不可缺的工具。一九七一年，金正日三十岁，他主掌党的宣传煽动部，负责国家的电影制播。他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论电影艺术》，书中阐述他的理论：“革命艺术与革命文学是启迪民众为革命任务奋斗的最有效方式。”

在金正日的指示下，位于平壤郊区的朝鲜电影制片厂扩充成占地一万平方英尺的片厂。该厂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每部电影的主题千篇一律：通往幸福的道路是自我牺牲压抑个人为全体谋福利。资本主义是纯粹的堕落。当我于二零零五

年参观制片厂时，我看到首尔典型街头的实物布景，两边都是破败的店面与陪酒酒吧。

无论电影是不是纯粹的宣传，美兰仍喜欢电影。在北韩小镇成长的她，说是电影迷也不为过。从她年纪大到足以独自上电影院开始，她就向母亲要钱买电影票。票价很低——只要朝鲜圆五角或几分钱，大概就跟一瓶汽水一样。美兰几乎每一场电影都看。有些电影对孩子来说是猥亵了点，例如一九八五年的电影《哦，我的爱》，片中音乐出现男女接吻的镜头。事实上，女主角羞怯地压低阳伞，因此观众完全看不到两人的嘴唇接触，但这已足以让这部电影被列为限制级。好莱坞电影当然不许在北韩播映，其他外国电影亦然，偶尔会例外放映俄国电影。美兰特别喜欢俄国电影，因为俄国电影比北韩电影少了点宣传而多了点浪漫。

一个正值做梦年纪的女孩，到电影院观赏银幕罗曼史，或许不可避免会在那里为自己找到真实的事物。

美兰与俊相相识于一九八六年，当时还有足够的电力放映电影。文化厅是镇上最宏伟的建筑物，兴建于一九三〇年代，也就是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时期，以当时流行的华丽风格建成。

两个高聪宽广的楼层足可以容纳一个夹层，戏院立面悬挂着巨大的金日成肖像。法令规定伟大领袖的所有肖像都必须与建筑物的立面切齐。文化厅可以作为电影院、戏院与演讲厅。在国定假日，例如金日成的生日，文化厅会举办比赛，选出最合乎伟大领袖典范的镇民。其余时间，戏院会播放电影，每隔几个星期平壤就会送来新的片子。

俊相对电影的热衷不亚于美兰。只要听说新电影上映，他会第一个冲去看。促成他们相遇的电影，片名叫《新政府的诞生》（Birth of a New Government）。这部电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满洲为背景，描述朝鲜共产党在年轻的金日成领导下组织起来，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反日得抵抗行动在北韩电影是个常见的主题，如同早期好莱坞电影的牛仔与印第安人。这部电影应该会吸引许多人前来观赏，因为担纲的女演员是当红的女明星。

俊相很早就到了戏院。他有两张票，一张是自己的，另一张则是给他的弟弟。他在外头来回踱步的时候，刚好看见美兰。

美兰站在涌向售票口的群众后面。北韩的电影观众多半年轻而粗鲁。这场电影的群众尤其粗暴。年纪较大的孩子往队伍前面挤，他们构成一道人墙，后头年纪较小的孩子无法接近售票口。俊相走进人群，想看清楚那女孩的长相。她正懊恼跺脚，看起来似乎要哭了。

北韩的美女应该是皮肤白皙，而且是越白越好，圆蛋脸，与微弓的嘴，但俊相眼前这名女孩显然不符合标准。她的脸型长而带着棱角，高鼻梁，颧骨轮廓明显。对俊相来说，她看起来就象外国人，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气质。她看着售票

口前面的乱象，眼神冒着愤怒。她不同于其他女孩的行事低调，例如笑得时候以手捂嘴。俊相从她身上感受到一股充满活力的不耐，仿佛她还没被北韩的生活所击倒。当下他就迷上了她。

十五岁的俊相早已感觉到自己对异性产生兴趣，这令他感到困扰，但他从未将目光集中在某个特定女孩身上——直到现在。他看过的电影已能让他跳脱真实的处境，想象在银幕上，自己与这名女孩首次相遇会是什么景象。他日后回忆时，会为这幅场景平添几许梦幻的艺术色彩，脑海中的美兰也将焕发着异样的光彩。

“真不敢相信小镇上会有这样的女孩”，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在人群外围饶了好几个圈，仔细地端详她，对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陷入常考。他是书生，不是战士。要他挤到售票口显然行不通。此时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电影就要开始，而他的弟弟还没到。如果他把额外这张票卖给她，她就必须坐在自己身边，因为这两张票是指定席。他又饶了一圈，思忖着该怎么向她提出邀请。

最后，他还是无法鼓起勇气向这名陌生女孩说话，只能沉默地走进电影院。当银幕出现电影女主角奔驰于雪地之上的影像时，俊相觉得自己错过了大好良机。饰演英勇反抗军战士的女主角留着一头男孩般的短发，纵马奔驰于满洲大草原，呐喊着革命口号。俊相忍不住想着戏院外的女孩。当电影终了，银幕开始播放演职员名单时，他立刻冲出去找她，但女孩已经离开。



逃難中的韓戰難民

第二章

带有污点的血统

十五岁的俊相是个瘦高用功的男孩。他小时候在数学课与科学课得到最高分。俊相的父亲似乎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子女充满期望，尤其是天资聪颖的长子。他的梦想是让俊相离开地方省份前往平壤深造。如果俊相晚于九点回家或功课落后，父亲会很快抽出预藏的棍子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他必须在高中保持名列前茅，在清津通过为期两星期的严酷考试，并且挤进人人称羡的学校，例如金日成大学。虽然俊相才刚念高一，却已面临生涯规划的第一道管卡，他没有时间约会，更甭说初尝禁果。他只能将青春期的蠢蠢欲动摆在一旁。

俊相试着回去脑中不该有的念头，在这个最不方便的时刻，他必须避免一切让他分心的事。但无论怎么努力，他就是无法忘记短发女孩跺脚的倩影。他对她一无所知。她叫什么名字？她是否如记忆中一样美丽？或者这只是记忆在跟他开玩笑？事实上他连如何打听她的芳名都不知道。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要觅得她的踪迹竟然出乎意料的容易。美兰是那种会吸引男孩目光的女孩，她的短发是很明显的特征。俊相光用描述的方式就能让一两位朋友认出她的身份。拳击课堂上有个男孩刚好就住在跟美兰家同一排的口琴屋，而且跟美兰家只隔了两户。俊相与这个男孩闲聊，向他打听消息，并且雇用他担任自己的私人侦探。邻里间低声谈论着有关美兰与她的姊姊们的蜚短流长。人们经常说谁比谁更漂亮。她们有着北韩人人称羡的高挑身材，而且也很有天分。大姊是歌手，另一个姊姊画画。她们全是运动健将，擅长排球与篮球。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这些女孩这么美丽伶俐，可惜她们的家庭背景太卑微了。

问题出在她们的父亲，一名憔悴寡言的男子，他跟邻居一起受雇在矿坑工作。他是一名木匠，负责修理用来支撑矿坑内部的木柱横梁。这座矿坑生产用来制作陶器的高岭土。外表看来平凡无奇的他，唯一特殊之处是他相当有自制力。当矿工们咕噜喝下让五脏六腑为之纠结的玉米酒与（如果他们买得起的话）烧酒（韩国米酒）时，美兰的父亲却滴酒不沾。他不想喝下会让他漏了口风而将过去的事情和盘托出的东西。

美兰的父亲太佑生于一九三二年，他出生的地点后来成为敌国南韩的领土。无论相隔多远，韩国人总是认为祖先出生的地方才是自己的故乡。太佑来自忠清南道，此处位于朝鲜半岛的另一面，濒临黄海。这是一个充满翠绿水田的恬静乡野，与严峻的清津相比，这里极为适合人居。他的村落位于瑞山市郊，这个小村子不过是一排坐落在棋盘水田隆起阡陌上的平房。回到一九四〇年代，一切物品都是用泥巴与稻草制成的，就连男孩在街上踢的球也不例外。稻米是村子的灵魂与生计来源。种稻是件辛苦的工作，从整地、育苗到插秧都必须胼手胝足才能完成。村里没有人是富有的，但太佑家比其他人家过得好一点。他们的茅草屋比人家大一些。太佑家有两千坪的土地，坪是韩国的面积单位，两千坪约合一点六英亩。他们靠一间小磨坊贴补家用，邻居会拿稻米与大麦过来磨粉。美兰祖父的地位甚至让他有能力娶两个老婆，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不过只有第一次婚姻

才有法律效力。太佑是第二任妻子的长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可爱的妹妹，经常跟着他在村子内外闲晃，当妹妹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女孩时，他开始感到苦恼，但他的朋友却雀跃不已。

太佑在朋友中年纪不是最长，却是天生的领袖。当男孩们玩起打仗有戏时，太佑总是担任将军。朋友称他是小拿破仑。他的儿时朋友，现在仍住在村子里的李正勋说："他的个性率直果断。命令坚定明确，大家都听他的。而且他很聪明。"

太佑上了小学，之后又进了中学，一直念书到十五岁为止，一般农家的儿子都是如此。学校教导的语言是日文。日本于一九一零年吞并韩国并且罢黜最后一任韩国皇帝之后，便循序渐进地压抑韩国文化强制推广日本文化。在占领初期，村里的老人被迫剪去留长的发辫，韩国男性传统上会在头顶绑发髻，然后带上黑帽。他们被要求改取日本姓名。日本人课征重税，强取豪夺半数以上的收成，宣称这是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必要之举。年轻男女被装进船运往日本从事战争生产，女孩则被迫卖淫，美其名曰"慰安妇"，其实是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稻农痛恨日本人，他们做什么事都要经过日本人同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这则消息花了几天的时间才传到村里。男孩们听到消息，马上跑到日本人驻守的营区，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日军仓促未能带走的个人物品。占领结束了。村民没有钱庆祝，但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彼此祝贺与欢呼。

"朝鲜万岁"，他们呐喊着。

韩国人相信他们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要收复自己的国家。

当日本天皇透过广播选读投降诏书时，在地球另一端的华府，两名年轻军官围绕着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地图讨论着朝鲜问题。华府没有人清楚这块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殖民地。直到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占领计划详细拟定之后，朝鲜问题才浮上台面。日本人统治朝鲜已有三十五年，一旦突然撤离将在此地形成危险的权力真空。美国担心苏联可能夺取朝鲜并以此为跳板掠取更大的战利品，也就是日本。尽管苏联是美国的二战盟友，但华府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却与日俱增。苏军于日本投降前的一周由北方入侵朝鲜，而且准备继续南进。美国为了安抚苏联，同意暂时将朝鲜北半部交由苏联托管。这两名军官想让美国保有韩国的首都首尔——其中一位是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后来当上美国国务卿。于是他们想了一个简便的方式分割半岛，他们随便在地图上沿着北韩三十八度线画了一条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与韩国的历史或地理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朝鲜半岛如同小巧的从中国延伸出来，它是个格局完整的地理区域，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北以鸭绿江与图门江和中国为界。没有任何自然分界可将半岛一分为二。在日据时代之前的一千三百年间，此地一直在朝鲜王朝的统治下形成统一国家，而这个王朝也是世界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在朝鲜王朝之前，曾有三个王国争夺半岛的领导

权。朝鲜半岛政治史的分裂，其界限的划分通常是南北向，东半部亲日，西半部亲中。南北分裂完全是外来的产物，它是在华府凭空想象而且没有任何韩国人参与下强加在韩国人身上。据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提纽斯（Edward Stettinius）无论如何都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附庸国。

韩国人对于自己象德国一样遭到分割感到愤怒。毕竟他们不是二次大战的发动者，而是受害者。当时的韩国人以一种自我否定的方式描述自己是“夹在一群鲸鱼之间的小虾米”，只能在超级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

美苏两强都不愿让步以促成一个独立的韩国出现。韩国人自己也分裂成十余个敌对拍戏，其中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地图上的临时界限很快成为既成事实。一九四八年，在七十岁的李承晚领导下，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成立，李承晚是一名脾气火爆的保守派人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金日成，一名由莫斯科当局支持的抗日斗士，在大韩民国建立后随即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北韩。这条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定的国界将形成长一百五十五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由刺丝蛇龙、战车陷阱、战壕、灌木丛、堤防、壕沟、火炮与地雷构成的灌木丛林。

南北双方都宣称自己才是合法的韩国政府，于是战争势不可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金日成的军队在苏联战车部队支援下，以狂风暴雨之势穿越边界。他们很快攻下首尔，然后往南席卷，南韩最后只剩下东南沿海城市釜山负隅顽抗。九月，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指挥下，四万美军大胆地于仁川发动两栖登陆，一举扭转共产党的胜局。除了美国与南韩，还有十五国部队假如联合国军队，其中包括英国、澳洲、加拿大、法国与荷兰。他们夺回首尔并且朝平壤与更北得地区挺进。然而，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时，中共却加入战局，使联合国的攻势遭遇挫败。两年多的战事带来的只是挫折与僵持。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议时，已有近三百万人死亡，整个半岛也被战火夷为平地。停战后的国界仍维持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即使以二十世纪含糊不清的战争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场徒劳而无人满意的战争。

共产党入侵时，太佑十八岁。他的父亲在战争爆发前去世，他成为母亲与妹妹们的重要支柱。南韩人对这场战争缺乏准备，只有六万五千名军队处于备战状态，大约仅是北韩军力的十分之一。南韩需要尽可能征兆体格强健的男子服役。有些稻农同情北韩，因为他们听到谣言说共产党会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民。日本战败之后，农民的经济处境并未获得改善，但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李正勋回忆说。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为何，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南韩军队的征召。

太佑最后升到了中士。他的部队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金化郡村子附近，也就是三八度线以北约二十五英里处。金化是美军取得一个名叫“铁三角”的绰号的其中一个点（平壤与铁原是另外两个点），这是一处战略谷地，四周围绕着花

岗岩山脉。韩战末期，金化发生了几场最激烈的战斗，中国试图将前线往南推进，希望藉此促成停战。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晚间，中国以三个师大约六万人的兵力向联合国与南韩部队发动突袭。晚间七点三十分左右，共军开始轰炸联合国部队；十点左右，共军发射照明弹，让士兵能看见“漫山遍野的数千名敌军”，一名美军士兵日后提到这起攻击时写到。四周响起了军号声，他们可以看见中国军队正朝他们冲杀过来。“我们感到难以置信，那幅景象宛如动作片里的场景”，一名南韩士兵日后表示。在此之前已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血水混杂了雨水，从山上流泻下来。”

当部队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时，被分配担任医务兵的太佑正用担架运送南韩士兵。此时距停战协定签订只剩两个星期，但太佑连同其他约五百名南韩首都师士兵却沦为战俘。

他身为南韩人的人生实际上已结束。美兰的父亲从来不提他在战俘营中发生了什么事。可以想见他所遭受的情况不会比共产党其他战俘好多少。许宰锡从战俘营里逃了出来，他在回忆录中写着，他们被关在肮脏的战俘营里，不准洗澡也不许刷牙。头发长满虱子，未受治疗的伤口爬满了蛆。他们一天只吃一餐米饭与盐水。

停战协定签订后，交换战俘时，共军释放了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三名囚犯，当中有七千八百六十二名是南韩人。数千乃至于数万名战俘未能返家，太佑是其中之一。根据许宰锡回忆录，他们在平壤车站上火车，以为要往南返乡，结果却往北来到紧挨着中国边境的煤矿山。在内政部建设单位的名义下，新战俘营设立在矿区旁边，采煤在北韩不只是肮脏，而且极度危险，因为矿场经常坍塌或失火。“战俘的生命不如一只苍蝇”，许宰锡写道。“每天我们走进矿坑时，我总是怕得发抖。就像一头走进屠宰场的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

一九五六年，北韩内阁发布一项命令，允许发放北韩公民证给南韩战俘。这意味着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但也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无法返乡。最糟的还是在煤矿坑，它的开采太草率，经常发生坍塌与火灾。太佑被派到茂山郡铁矿场，这是咸镜北道一处临近中国边境的多砂小镇。在矿场工作的之前全是南韩人，他们集中住在宿舍里。

住在宿舍的工人中有一名女性，十九岁，单身。以一名未婚女子来说，年纪算是相当大。她太瘦，算不上漂亮，但果断的举止带有一股吸引人的气质；她的性格与动作散发着活力。她急于结婚，原因只是为了摆脱同住的母亲与妹妹们。战后，可供婚配的男子非常少。宿舍管理人把她介绍给太佑。虽然太佑的身材不比她高，但他说话温柔。虽然太佑的外表被矿坑弄得脏污，但他扔保持着绅士气质。女孩怜惜这名寂寞的年轻人，于是他们在同年结婚。

太佑很快融入北韩生活。对他来说，要融入相当容易。韩国人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民族。他们的长相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平壤口音经常被嘲笑与釜山带有喉音

的方言颇为类似。战争造成的离散彻底混合了韩国人口。害怕遭受共党迫害，数万名韩国人从三十八度线以北逃往南方，其中包括地主、商人、基督教教士以及过去与日本合作的人士。少数同情共产党的民众往北前夕，其他无数对政治并无特定立场的民众只是或战或逃地流离于南北之间。

谁能认得出谁是北韩人谁是南韩人？婚后不久，太佑与新婚妻子被迁到另一处位于清津附近的矿区，他在那里完全没有认识的人。对任何人来说，没有理由怀疑他有不寻常的背景，但在北韩特殊的国情下，总是有人知情。

战后，金日成的首要之务是铲除异己。他从可能威胁他的领导权的高层人士下手。他罢免许多掌握武装部队的同志，这些人过去曾在中国东北领导反日斗争。他还下令逮捕在南韩创立共产党的成员。这些人在战时几位重要，但现在目的达到，他们也免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一九五〇年代，许多人在这个越来越类似古代中华帝国的北韩遭到整肃，金日成的领袖地位也变得不可动摇。

金日成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平民。一九五八年，他下令推动一套详密的计划，依照政治可靠度将北韩人分类，他野心勃勃地充足全国人口。当中国红卫兵在一九六〇年代与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走资派”连根拔除，并且造成邻人相互告发的混乱恐怖统治时，北韩人则是有条不紊地走向错误。每个人必须依据八项北京调查来加以分类。你的“成分”——这种等级制度的名称——要考虑你的父母、祖父母乃至于二代表亲的背景。忠诚调查依几个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有着鼓舞人心的名称）来进行。“党核心的密集领导”是第一阶段。在随后几个阶段中，例如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了解人民计划”，这些分类又再加以细分。

尽管套用了二十世纪社会工程的术语，这个过程其实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让韩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封建制度颇为类似，只是做了一些更新。过去，韩国人受制于几乎与印度种姓制度一样严谨的等级制度。贵族身穿白衣，头戴黑色马毛高帽，奴隶则脖子上套着木箍。昔日的阶级结构受中国哲学家孔子学说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人必须恪守社会等级的金字塔。金日成吸取儒家思想最不人道的元素，并将其与史达林（即斯大林）主义结合。在金字塔的顶端，由金日成及其家族取代皇帝的位置。往下则依序是五十一项分类，可以概括为三大阶级：核心阶级、动摇阶级与敌对阶级。

敌对阶级包括“妓生”（女性娱乐人员，如同日本的艺伎，他们可能对出手阔绰的顾客提供更多服务）、算命师与“巫堂”（萨满，在王朝时代也属于下层阶级）。另外还包括政治嫌疑犯，关于这点，在根据脱北者证词写成的北韩人权白皮书中有着明确定义：

> *出身富农、商人、实业家、地主或似有资产已被充公者的家庭；亲日与亲美分子；反动派官僚；投诚北韩者…佛教徒、天主教徒、遭开革的公务员、在韩战中协助南韩者。*

身位前南韩士兵，太佑的等级接近整座金字塔的底部，但不是最底部的位置，因为垫底的人（大约二十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终其一生要在以苏联古拉格为范本设立的劳改营中度过。北韩的下层阶级不许生活在作为橱窗的首都平壤，也不许居住在较适合人居的南方乡野，这里的土壤较肥沃，气候也较温暖。太佑做梦也不可能加入劳动党，只有成为劳动党党员才能享受轻松高薪的工作。

与太佑一样属于敌对阶级的民众遭到邻居的密切监视。北韩民众被组织成所谓的“人民班”——就字面意义来说是“人民团体”，由二十户左右的家庭组成，任务是彼此监视与管理邻里。“人民班”有一名推选的领导人，通常是一名中年妇女，由她向高层报告任何可疑的事物。对于下层北韩民众来说，改善身份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档案收藏在郭家安全保护部的各地办公室里，而且为了避免有人大胆篡改记录，又另藏一份于山峦起伏的两江道。这个阶级制度唯一的流动是往下。即使你属于核心阶级，但惟有统治家族与党干部的亲戚才属于这个阶级，你也可能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降级。但是一旦你属于敌对阶级，你终身都会是这个阶级。无论你最初有什么污点，这个污点会跟着你一辈子，永远不会消失。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

北韩人称这些人为“不纯”——“脏污的血统”或不纯份子。

美兰与四名手足的血液里将带着污点。她们必须预期自己的前途将于父亲一样受到限制。

小时候，美兰还不知这场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降临在她身上的灾难。她的父母觉得最好的做法是不要对孩子提起父亲的故乡在南韩的事。让她们承受自己不能上最好的学校或从事最好的职业的实情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妨碍她们用功读书、练习乐器或在运动上有杰出表现呢？

北韩人未被告知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所以美兰家的问题并未马上凸显出来，但孩子们却怀疑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他是个古怪而孤独的人，似乎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没有认识的亲戚。他不只是不谈论过去，而是什么都不提。他对问题回以单音节的答案；他把自己的声音压低到像是耳语。当太佑用双手工作、在房间四周修缮，或者是专注于一项能让他有藉口不说话的计划的时候，他看起来最愉快。

从太佑身上看不出昔日那名扮演将军大摇大摆的跋扈小男孩的踪影。所有该讲的话全由他的妻子代劳，而女儿们也从母亲遗传了高大的身材与运动神经。如果孩子需要管教，要向邻居埋怨，都由太佑的妻子出面。就算他自己有意见，也是隐忍不说。如果他们有幸能拿到报纸（报纸在北韩算是奢侈品），太佑会在家中唯一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下静静阅读。他对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或地方报纸《咸北新闻》提到金日成最近的伟大成就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他曾相

信过北韩政府吗？或者，他被说服了吗？

美兰经常对父亲的被动感到愤愤不平。日后她才晓得这是父亲的生存之道。他采取低姿态以避免不必要的注意。数千名南韩士兵试图融入北韩社会，但许多人却不幸犯了错误。美兰的母亲后来告诉她，她的父亲有四名好友在矿坑工作，全是南韩人，却因为细故而遭到处决，尸体还被扔在乱葬岗上。身为敌对阶级成员，人们不可能对你网开一面。提到金日成时语带讽刺，或是提到南韩时流露出乡愁，这些都会引火自焚。谈及韩战以及谁引发这场战争尤其是禁忌。在官方历史上（北韩也只有官方版的历史），侵略者是听命于美国的南韩，而不是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的北韩。"美帝命令傀儡政权李承晚发动韩战"，《劳动新闻》表示。记得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什么事的人（有哪个韩国人忘得了呢？），知道闭嘴才是明智之举。

当孩子们进入青少年时期，父亲的背景造成的阻碍逐渐明显。到了十五岁，义务教育结束，学生开始申请进入高中就读。无法进入高中的孩子就被分配到工作单位、工厂、煤矿坑等诸如此类的地方。但美兰的姊姊们相信自己 可以获准继续接受教育。她们聪明、漂亮、有运动细胞，而且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喜爱。如果她们不是那么有天分，那么否决她们可能会更容易些。

美兰的大姊美姬拥有女高音的优美歌喉。当她高唱韩国人喜爱的伤感民谣或金日成颂歌时，邻居们都会过来聆听。她爷经常参与公共活动的演出。歌唱才能在北韩极受重视，因为很少有人拥有立体声音响设备。美姬的美貌甚至让艺术家慕名前来为她画像。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她一定会获准进到表演艺术高中就读。当美姬遭拒绝时，她哭了好几天。她们的母亲肯定知道个中缘由，但她还是跑到学校去理论一番。校长很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她解释说，唯有"成分"较佳的学生才能获准就读。

美兰没有姊姊们的艺术或运动才能，但她的成绩优秀而且相貌出众。美兰十五岁时，有一群服装阴沉面容严肃的男女来到她的学校。这些人是劳动党中央第五部的成员，负责走遍全国寻找年轻女性担任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私人僚属。一旦被选上，女孩会被送到军事训练营接受训练，然后再分发到领袖位于全国各处的行馆服务。如果正式成为领袖的僚属，那么这些女孩将无法获准返家，但她们的家人可以获得巨额的补偿。这些女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没有人有确切答案，据说有些是担任秘书、侍女与演艺人员，还有谣传说是成为情妇。美兰是从朋友口中得知这些消息，朋友的表姊曾经雀屏中选。

"你知道，金正日与金日成也是男人，就像其他人一样"，美兰的朋友小声对她说。美兰会心的点头，但困窘的承认她对这档事完全不懂。北韩女孩到了她这个年纪还不晓得情妇是什么的，只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能服务领袖就是无上光荣。唯有最聪明与美丽的女孩才能获选。

招募员走进教室，全体学生都在桌前端正坐好，安静等候。一排排桌子，每

张桌子前坐着两名女孩。美兰身穿中学制服，脚上穿着帆布运动鞋。招募员鱼贯走入每一排走道，有时驻足仔细观看。当他们来到美兰桌旁，突然放慢脚步。

“你，起立”，一名招募员说道。他们示意美兰跟着他们到教师休息室。到了休息室，她发现已有四名女孩在那里等候。他们查看美兰的档案，对她打量了一番。五尺三寸（一百六十公分），美兰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几个女孩之一。他们一连问她好几个问题：成绩如何？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身体健康吗？有受过伤吗？美兰冷静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回答得还算得体。

美兰再也没有遇到这些人。她虽然不想被带离自己的家，但遭到拒绝总是不太好受。

此时，孩子们才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是问题所在。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父亲是来自南韩，因为他在北韩完全没有亲人，但他是在什么状况下来到北韩呢？他们猜想父亲一定是投诚的共产党员，英勇地追随金日成的部队来到北方。然后最后却是由美兰的弟弟让真相浮上台面。锡柱是个热切而额头经常泛着皱纹的年轻人，他苦读数月希望能考进师范学院。他几乎答对了每个问题。当他被告知未获录取时，他愤怒地质问考官，要对方给个解释。

真相是残酷的。孩子们一直被灌输北韩官方的历史。美国人是魔鬼的化身，南韩人是可悲的小跟班。他们看过国家遭美军轰炸后惨不忍睹的照片。他们读的文章提到美国与南韩的士兵是如何残忍轻蔑地将刺刀刺进无辜平民的身体。学校课本充满敌人如何烧死、碾死、刺死、射死与毒死人民的故事。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跟美国佬并肩作战的南韩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锡柱第一次让自己喝个烂醉。他离家出走，在朋友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朋友才劝他回家。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我想这点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朋友努力说服他。锡柱将这些话谨记在心。就像其他韩国男孩一样，特别是独子，锡柱知道他必须尊敬父亲。他回家，向父亲下跪请求原谅。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泣。

孩子们不仅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相，而且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邻里间早有传闻说他过去是南韩士兵，人民班也曾接获指示要对他们家特别注意。俊相几乎是在得知这名电影院前面的女孩姓名的同时，也听到了传言。他很清楚与美兰这种身份的女孩交往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俊相虽然不胆怯，却是个负责人的儿子，他也与其他北韩人一样恪守儒家的道德观念。他相信自己出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服侍他的父亲，因此为了实现父亲的野心，他必须进入平壤大学就读。他不仅必须拿到高分，在品行上爷必须毫无瑕疵。即使是一丁点差错都会让他毁于一旦，因为他们家的背景也有问题。

俊相的父母生于日本，到了二战末期，在日朝鲜人总计达到两百万之谱。这些人是韩国社会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到日本求学的菁英、被迫征召到日本进行战争生产的人，以及移民工人。有些人因此致富，但他们在日本毕竟是少数民族，

因此经常受到歧视。在日朝鲜人急欲返回祖国，但要回哪个祖国？韩国分裂之后，在日朝鲜人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南韩，另一派支持北韩。亲北韩派与一个名叫朝鲜总联（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的团体紧密联系。

对于这些民族主义者来说，北韩似乎比较像是真正的祖国，因为它跟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刀两断，反观李承晚的亲美政府却重用不少于日本合作的人士。此外，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北韩的经济似乎比南韩繁荣得多。北韩的宣传让人联想起这么一幅景象：脸颊红润的孩子在原野嬉戏，全新的农业设备拖曳着丰收的庄稼，在睿智的金日成领导下，北韩成为创造奇迹的新国家。今日，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出这类色彩明亮的海报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宣传把戏，但在当时，人们是深信不疑。

超过八万人被北韩的宣传所吸引，俊相的祖父母是其中之一。他的祖父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甚至因为左派信仰而在日本入监服刑。由于年老体衰，自觉无助于新国家的建设，于是他让自己的长子来到北韩。一九六二年，俊相的父亲搭乘渡轮横渡日本海，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终于抵达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他是一名工程师，因此受到重用，并且被派往清津附近的工厂工作。几年后，他遇到一名优雅的年轻女孩，她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跟着父母从日本来到北韩。俊相的父亲长相平凡无奇，斜肩而脸上长了麻子，但他很聪明而且有文化。他的家人说他长得象海盗，但说话象诗人。他以温和与坚持不断地向这名纤细的女子求婚，最后终于让她点头。

俊相的父母攒足了足够的金钱让她们过着比一般北韩人更好的生活。她们为自己争取来一间独栋的房子——这件奢侈品使她们拥有一块可以种植蔬果的园圃。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北韩人民还无法拥有自己的耕地。俊相家中有五个木制大衣柜，里面塞满高级的日制被褥与衣物。（北韩人跟过去传统的亚洲人一样，仍然在地上铺着一层草席睡在上面，白天的时候把草席卷起来收到柜子里）。北韩人喜欢用家中衣柜的数量来衡量富足的程度，五个衣柜表示这个家的确很有钱。俊相家业比邻居拥有更多的电器用品，电扇、电视机、缝纫机、八轨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有电冰箱。尤其冰箱在北韩算是罕有之物，大多数家庭都无法冷藏生鲜食品。

不过最不寻常的还是俊相居然养了一只宠物，一种被称为丰山犬的白色粗毛朝鲜狗，外表类似于狐狸犬。虽然乡间有些韩国人把狗当成农村动物来饲养，而且大部分拿来食用，例如韩国人会烹煮一道味道辛辣的炖狗肉，菜名叫补身汤，但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把狗当成家中的宠物。毕竟，谁负担的起每个月额外的饲养费呢？

事实上，这群从日本回归北韩的民众被称"北朝鲜人"（日本称北韩为北朝鲜，这些人因此被称为北朝鲜人），他们生活在与北韩人格格不入的世界里。这些人有着独特的口音，而且不与外人婚配。虽然以日本的生活标准衡量，他们还

谈不上富裕，但与一般北韩平民相比，他们足以过着富足的生活。北朝鲜人脚踩皮鞋身穿上好羊毛衣来到这个新国家，与此相对，北韩当地民众则是一双帆布鞋与一身破损不堪的聚酯衣物。北朝鲜人的亲戚定期从日本汇日圆过来，这些外币可以在特定的强势货币商店购买电器用品。有些人甚至从日本运汽车过来，只不过这些交通工具很快就因为没有备用零件而故障，最后只能捐给北韩政府。北朝鲜人返国数年后，他们在日本的亲戚也会固定带着金钱与礼物当成渡轮万景峰九十二号来北韩探望他们。这艘渡轮由北韩的朝鲜总联经营，北韩方面也非常欢迎这类航班，因为这么做可以让外汇源源不断地进入北韩。政府会对亲戚的汇款征收部分金额。北朝鲜人虽然富有，但他们在北韩的社会地位很低。即使他们放弃了在日本的优渥生活，宣誓效忠共产党，但他们还是被归类为敌对阶级。只要他们不是劳动党员，就算再有钱北韩政府也不信任。他们是极少数被允许与外界接触的北韩居民，光是这点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靠；北韩政府的力量来自于它有能力让它的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离。

这些来自日本的新移民很快就对北韩的一切感到幻灭。最早抵达北韩的移民写信回日本，警告其他人不要过来，但这些信件都遭到拦截与销毁。许多北朝鲜人，其中包括朝鲜总联的一些知名人士，最后在一九七〇年代遭到整肃。领导人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则被发配到劳改营。

俊相曾在偶然听到父母低声叹道这些事。他们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事前完全没有任何征兆。深夜，一辆卡车停在你家门口。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打包行李。俊相生活在恐怖之中，这种惧怕已经内化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他虽然无法言语，却总是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会知觉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俊相谨慎行事以避免他人的觊觎。他穿着日本制的厚羊毛袜，但大多数孩子连袜子都没得穿，于是他用长裤遮掩双脚，避免让人察觉。他描述自己是一只敏感的动物，有着不断抽动的大耳朵，总是留意着掠食者的动静。

虽然俊相家有温暖的毛衣、电气用品与毛毯，但他们却不比美兰家快乐。俊相的母亲在离开日本时还是个美丽而受欢迎的少女，但随着年华老去，她对于自己流逝的青春岁月伤感不已。在生了四个小孩之后，她的身体一直无法恢复往日的健康。夜晚，俊相的父亲独自坐着抽烟，忧郁地叹气。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担心隔墙有耳——独栋房子的好处就是能拥有一定程度的隐私——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他们不敢走出家门说他们想离开这个社会主义天堂，回到资本主义的日本。

无法说出口的心事萦绕着这个家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越来越觉得当初返回北韩是一件大错。他们知道回到日本已是不可能，为今之计，只能逆境求生。唯一能挽救这个家的方法就是参与体制并试着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这个希望全落在俊相身上。如果他能进入平壤大学就读，或许有机会获准加入劳动党，届时就能洗清他们家曾经身为日本资产阶级的罪愆。持续的压力使俊相变得神经

质而优柔寡断。他一直想着在电影院门口遇见的那名女孩，思索着该怎么接近她，但最后什么事也没做。

美國密蘇里號（Missouri）戰艦砲轟清津，一九五〇年十月



第三章

真正的信仰者

清津是一座恶名远播的城市，即使以北韩人的标准来看，这里也是一处不适人居的地方。这座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位于花岗岩隆起地带与日本海（韩国人成为东海）之间的曲折海岸地区。这里的海岸线与缅因州（Maine）的海岸一样充满蜿蜒之美，闪耀的海水既深且冷，出海捕鱼一定得搭乘坚固一点的船只，否则猛烈的波涛很可能让你丢了性命。狂风呼啸的山区难以种植作物，冬天的温度可以降到华氏零下四十度。只有低洼的海岸地区才能种植稻米，稻米是韩国人的主食，韩国文化也以稻米为中心而发展。韩国人在历史上总是以能否掌握权力来作为一个人成功的标准——这是历史悠久的亚洲传统，急欲摆脱农村进入朝廷。清津实际上已快超出韩国地图之外，它的位置靠近国土的北方，从这里前往俄国城市海参崴反而比到平壤来得近。即使到了今日，从清津开车到平壤虽然距离只有两百五十英里，却要花上三天的时间才能抵达，途中必须经过凹凸不平的山路与危险的 U 形弯道。

朝鲜王朝时代，韩国的首都（位于今日的首尔）离清津更远。触怒国王的大臣往往被流放到这个偏远的边陲地带。或许受到基因库中强烈不满现状的倾向影响，今日咸镜北道的居民向来以强悍不屈著称。

咸镜北道是极北的省份，以图门江与中国及俄国为界。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人口一直非常稀少，也稍有经济价值。该省人口在过去数百年间很可能数量远不及老虎，韩国有许多吓唬孩子的民间传说，里面的野兽多半取材于此地。然而今日野生动物的数量早已不如以往，日本拓展帝国版图的野心也改变了此地的命运。咸镜北道刚好位在日本入侵满洲的路线上，日本经由此地占领满洲，最后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也垂涎于茂山附近大量未开采的煤铁矿，他们也需要船舶将掠获的战利品从朝鲜半岛运向日本本土。清津（这个地名源自于中文，意思是清净河流的渡口）原本只是个小渔村，日本人将其改造成每年能吞吐三百万吨货物的港口。日本占领半岛期间（一九一零年到一九四五年），在清津港建立了大炼钢厂，并且在清津以南开发了罗南，这是一座计划城市，有着棋盘式街道与大型现代化建筑。日本帝国陆军第十九师团总部就设在罗南，日后这支部队将协助入侵中国东北。继续沿着海岸往南，日本在咸兴市建立了大规模的化学工厂，生产火药与肥料。

一九五〇年代，共产党掌权之后开始重建在历次战争遭到轰炸的工厂，并且宣称这些工厂是他们建立的。日本制铁位于清津的炼钢厂被改名为金策钢铁厂，它成为北韩境内最大的工厂。金日成表示，东北地区展现出来的工业力量，充分证明了他的经济成就。直到今日，清津居民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一无所知，事实上，清津这座城市似乎也没有太多过去可谈，因为北韩政权把日本人的建设完全一笔勾销。清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治下，声望与人口持续增长，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清津成为国内第二大城，拥有九十万人口。（一般相信清津的人口已滑落到五十万，排名被限行超越，成为第三大城。）

清津，有时又称“铁城”，这座钢铁产业兴盛的城市，经济与战略地位日渐重要。清津的工厂生产钟表、电视机、合成纤维、药物、机械工具、牵引机、犁、钢板与军火。捕获的螃蟹、乌贼与其他海产则专供出口。清津港转而作为造船之用。北韩人接收了清津南北海岸的日本军事设施，并且建造了飞弹基地，这些飞弹的目标对准了日本。临近的村落仍然像人口垃圾场一样，专门用来倾倒那些被流放的人士，例如敌对阶级与动摇阶级，美兰的父亲便属此类，他们全被迁到煤矿城镇居住。然而，这么重要的城市不能交给不可靠的人。政府还需要从核心阶层挑选出忠诚的干部，以确保清津能严守党的路线。清津拥有自己的统治菁英。这些菁英聚居于一处，他们与被放逐者的居住地点虽不相邻，却也极为接近。这两个分居北韩社会两端的阶级之间的互动，将使清津产生独特的动力。

金日成拥有许多真正的信仰者，宋熙锡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工厂工人，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北韩的模范公民。宋熙锡滔滔不绝地复咏金日成的语录，毫无任何怀疑。她是个对规则一板一眼的人。宋太太（她后来这么称呼自己，北韩妇女没有冠夫姓的习惯）热情拥戴北韩政权的程度，令人不禁怀疑她是不是曾担任过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在她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是有点象——她长的一副典型北韩妇女的样子。金正日的制片厂导演选角的时候应该会喜欢她这个类型的女子：宋太太的脸看起来象饺子一样丰满厚实，咋看之下以为她吃的很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她的嘴形微弓，看起来快乐无忧，不过内心却隐藏着悲伤。她的鼻子小而圆，眼神明亮而认真，看起来值得信赖而诚恳）事实上她确实如此。

即使情势已经相当明显，整个体制亏待了她，宋太太却坚信不疑。“我只为金日成元帅与祖国而活。别无他念”，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这么对我说。

宋太太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二战的最后一天。她成长于清津火车站附近，父亲是一名技师。韩战爆发，火车站成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主要轰炸的目标，企图瘫痪共产党在沿海的补给线与交通运输。美国密苏里号与其他战舰在日本海上不断往返，轮番对清津与其他沿海城市进行炮击。美国战机从头上呼啸而过，令孩子们感到惊恐。有时候飞机低空掠过，宋太太甚至看得到飞行员。白天，宋太太的母亲拉着六名子女到山上去，一面遭到轰炸。晚上，他们返家睡在邻居在屋外挖掘的防空洞里。宋太太总是躲在薄薄的毛毯下颤抖，依偎着母亲与其他兄弟姊妹寻求保护。有一天，她的母亲留下他们独自去找她们的父亲。在夜晚来临前，出现了猛烈的轰炸，铁路旁的工厂被夷为平地。母亲哭丧着脸回来，双膝一跪，把头埋在地上。“你们的父亲死了”，她把孩子们全叫来身边，嚎啕大哭。

父亲的死使宋太太获得“祖国解放战争殉难者”子女的血统。宋太太甚至还获颁一张证书。这为她的心灵印上不可磨灭的反美印记，这也是北韩意识形态的核心。在饱尝战乱之后，宋太太对劳动党的严格控管甘之如饴。而她的穷困当然使她有资格成为金日成口中受压迫下层阶级的一员。这样一名有着完美共产党血

统的女孩，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也是理所当然。经由劳动党官员介绍，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宋太太的未婚夫长博也是劳动党员——对她来说，嫁给非劳动党员是无法想象的。长博的父亲是北韩情报人员，建立了不少军功，他的弟弟已经加入北韩公安部。长博毕业于金日成大学，被安排从事新闻工作。在北韩，记者是一份声望很高的职业，因为记者是政府的喉舌。“依照党的指示写作才是英雄”，金正日表示。

长博是个魁梧的男子，与同世代的北韩人相比显得格外高大。宋太太身高仅达五尺（一百五十二公分），站在他的身旁宛如小鸟依人。这两个人是匹配的一对。这堆英俊美丽、政治正确的年轻夫妻照理可以轻易获得在平壤居住的资格。平壤是北韩唯一有外国人频繁造访的城市，所以政府强力要求当地居民要留给外人良好的印象，意识形态也必须健全。然而当局最后并没有让她们留在平壤，反而要他们成为清津忠贞份子的一员，于是他们移居清津，居住在当地最好的地段，享受各种特权。

北韩理论上推行平等主义，但实际上房地产却是根据阶级北京登记薄上的阶序原则加以分配。不宜人居的地区分布在清津南部接近煤矿与高岭土矿之处，工人们住在这里，他们的住宅是外表用石灰粉刷过的口琴式住房。越往北走，房屋盖得越是华丽。沿着主要道路行经罗南时，建筑物更是高耸，有的神志达到十八层，这是当时最现代的建筑。建筑师甚至留下了电梯井，不过他们却没有找时间装设电梯箱。这种针对战后公寓做的建筑设计出自东德建筑师的手笔，他们依照韩国的民情风俗做出一些调整。在各楼层之间预留空间，以便在地板下安装韩国传统的暖气设备。此外，每栋公寓的每个住房单位都装设扩音器，用来广播社区的注意事项。

清津远不如平壤现代，但却拥有自己的权力风格。清津作为咸镜北道首府，政府与劳动党办公的官署极为雄伟。这座官僚中心有着秩序井然的棋盘式街道。这里设有大学、冶金学院、矿业学院、农业学院、艺术学院、外语学院、医学院、三所师范学院、十二家戏院，与专门介绍金日成生平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位于东部港口对面的是专供外国游客休憩的天马山饭店，俄国领事馆也在附近。清津市中心的街道与广场采取了莫斯科与其他共产国家城市常有的国度宽阔的浮夸风格，以彰显政府的权力凌驾于个人至上。

贯穿全城的主要道路称为一号道路，这条道路非常宽阔，可以轻易容纳六线道的车辆，但前提是清津要有这么多的车子。在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棵巨大的悬铃木与金合欢，如同站岗的哨兵。树干的下半部都漆上白色，白漆的用途是什么，每个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防止病虫害，有人说是保护树木免于高温暴晒，也有人说是为了表示这是政府财产，不准砍来当柴火。路旁的边石也漆成白色。树与树之间竖立着常见的宣传标语，树木与牌子后面则是高耸的路灯，不过这些路灯却很少有亮起的时候。路旁的人行道跟香榭丽舍大道一样宽——原

本就是要设计成大道的样子，不过许多行人却选择走在马路上，反正没有几辆车。路上没有号志灯，只靠穿上制服的交通警察象做体操似的用手臂来回机械式的比划，指挥三三两两的车辆。沿着大道来到一处丁字路口，就到了咸镜北道戏剧院，这座雄伟的建筑物上面垂挂了一幅高十二英尺的金日成肖像。走到戏剧院后面，这座城市突然到了尽头，东北部的中岳再次拦住了去路。近年来，开始有人把这座山当成坟地，许多树木都被砍伐当成柴火，但仍不失为预约的休闲场所。事实上，即便到了今日，清津的闹区咋看之下似乎还不错，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地面满布着从建筑物掉落的混凝土块，路灯东倒西歪，看起来相当危险，路面电车的车壳则是千疮百孔。造访清津的少数游客往往浮光掠影地看过去，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破败的景象。

宋太太的住处位于八层楼的二楼，但这栋大楼没有电梯。她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屋内居然配有水管管线。一九六〇年代，北韩人普遍没有看过这么现代的东西。暖气设备跟传统韩国房屋一样是从地板下方加热，不同的是，这栋公寓是利用水力发电厂加热的水通过大楼内部的管线来温暖整栋房子。这对年轻夫妻家具并不多，他们拥有两房，一间他们住，另一间给数量逐渐增添的孩子们住。他们的长女玉熙于一九六六年出生，又过了两年，次女出生，然后是三女。当时，北韩的医疗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绝大多数城市妇女都在医院生产。宋太太虽然外表柔弱，身体却相当见状，她在没有产婆协助下，自行生下所有的孩子。其中有个孩子是在路边生的，当时宋太太正提着一篮洗好的衣服回家。她头一回生孩子，婆婆煮了一锅粘稠的海藻汤给她喝，这是传统的韩国偏方，能帮刚生孩子的母亲补充铁质。第二次，宋太太又生了个女儿，这回她的婆婆可就不高兴了，她直接把海藻交给宋太太，要她自己著。第三胎又生女的，她婆婆一气之下不跟她说话。

“你的肚子注定生不出儿子”，婆婆临走时撂下这句尖刻的话。

宋太太并不泄气，第四胎出生时，她刚好一个人在家。当天她因为肚子痛所以提早下班，但她先不下来，于是开始擦地板。突然一阵刺痛传遍全身，她赶紧冲向浴室。这回终于生了男孩。宋太太又成功挽救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而她的婆婆也亲手熬煮了海藻汤给她补身。

长博此时正在出差，第二天他听到孩子出生的消息，随机搭早班火车回家。中途还停下来买了一辆儿童脚踏车——送给新生儿的礼物。

宋太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而且要操持家务，但她还是到位于浦港的朝鲜制衣工厂附设日间托儿所担任一周六天的全职簿记。北韩需要妇女维持工厂运转，因为北韩长期缺乏男性——估计有两成的劳动人口在军中服役，北韩是世界上军队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宋太太通常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上前者一个或两个孩子去上班。她的子女基本上是由日托中心帮忙带大的。宋太太每天必须工作八个小时，中午有午餐与午睡时间。下班后，她必须再花几个小时在工厂礼堂接受意

识形态训练。课程内容可能是如何进行反美帝国主义斗争，也可能是金日成在二战时期的抗日伟业（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夸大的一面）。她必须写文章评论劳动党最近的宣言，或对《咸北日报》的社论进行分析。她回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半，还要整理家务与煮饭，然后在天亮时起床，为自己与家人做好一天的准备，然后在早上七点出门。宋太太很少睡超过五个小时。这样的生活在某些日子会特别辛苦。例如在每个星期三早上，她必须提早出门参加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朝会。星期五晚上，她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因此要更晚才能回家。在自我批评会议上，她所属的工作单位成员，也就是从事簿记的同仁们，必须要起立向全体人员坦承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这是共产党版的天主教告解。宋太太经常发自肺腑的说，她担心自己不够努力。

宋太太对于自己的话深信不疑。多年来的睡眠不足、意识形态训练与自我批评（与新奥和拷问如出一辙）早已将所有的反抗意志消磨殆尽。她已经被打造成金日成严重的改良人种。金日成的目标不只是建立一个新国家，他还想创造更优秀的民族与改造人性。为此，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主体思想。主体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与列宁提出的地主与佃农、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斗争观念。主体思想也认同马列提出的人类的命运是人类自己塑造的，而非上帝。但金日成反对传统共产主义的普世精神与国际主义。他是一名极端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他告诉韩国人，韩国人是独特的，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属于一个民族，那就是朝鲜民族，韩国人不需要仰赖中国、日本与俄国这些强邻。南韩人是民族的耻辱，因为他们事事依靠美国。“简单地说，建立‘主体’意味着我们才是革命与重建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要坚持独立地位，不依靠外人，要运用自己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力量，展现主体的革命精神”，金日成在许多文章中做了如此表示。对于一个字号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宣言无疑相当具吸引力，尤其这个民族的尊严已遭邻国践踏了数世纪之久。

金日成在从事抗日游击期间，开始发展他的主体观念，以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他教导北韩民众，人类的力量来自于能屈从个人的意志以符合集体的意志。所谓集体并不是杂乱无章地根据民主程序实践人民选择的方案。人们必须毫无异议地服从绝对最高领袖的领导。至于领袖是谁？毫无疑问就是金日成本人。

但广商这样还不够；金日成还需要爱。以显眼的海报色彩绘制成的壁画，画中的金日成被一群脸颊红彤彤，眼神充满孺慕之情的孩子所包围，而他对这些孩子投以慈爱的笑容，并且露出他那排珍贝般的牙齿。这幅画的背景杂乱放置着玩具与脚踏车——金日成不想成为约瑟夫.史达林，他想成为耶诞老人。他脸上的酒窝使他看起来比其他的独裁者更容易亲近。他被塑造成父亲的形象，在儒家传统中，父亲应该受到尊敬与爱戴。金日成想讨好每个北韩家庭，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种儒家色彩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预想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反倒与日本帝国文化更为接近，日本天皇有如太阳，所有的臣民都要匍匐在他面前。

某方面来说，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但金日成进一步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境界。金日成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独裁者肖像馆中脱颖而出，在于他掌握了信仰的力量。金日成了解宗教的力量。他的舅舅在共产党统治前的时代曾是一名新教牧师，当时的平壤有着极具活力的基督教社群，为平壤赢得“东方耶路撒冷”的称号。金日成掌权之后，关闭教堂、查禁圣经、将基督徒流放到内陆地区，并且挪用基督教的图像与教义作为自我提升的工具。

广播员宛如五旬节运动的传道者，总是以令人屏息的语气介绍金日成或金正日。北韩报纸报道了各种超自然现象。船员紧抓着载沉载浮的船只，唱歌赞颂金日成，狂风巨浪突然间平息了。金日成到非武装地区巡视时，一阵神秘气雾笼罩着他，使潜伏的南韩的狙击手无法下手。金日成让草木繁荣，让冰雪融化。如果金日成是上帝，那么金正日就是上帝的儿子。金正日的诞生与耶稣基督一样，天空出现明亮的星星与美丽的双虹预示他的降临。燕子从天而降高耸赞颂“未来将统治这个世界的将军”诞生了。

北韩招来世人的讪笑。我们嘲弄北韩宣传的夸大不实与北韩民众的愚昧易欺。但别忘了，北韩的洗脑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每天十四个小时待在日托中心；往后五十年，每一首歌、每一部电影、每一篇报纸文章与招牌告示都在神化金日成；这个国家被密封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人民无从怀疑金日成的神性。在这种状况下，谁有办法摆脱呢？

一九七二年，适逢金日成六十大寿，劳动党发型了金日成襟章。韩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不久，全国人口都必须将襟章别在左胸上，就在心脏正上方的位置。宋太太的家就跟其他人家一样，在一面完全空白的墙上挂着一幅裱框的金日成肖像。只要是挂着领袖肖像的那面墙，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包括自己血亲的照片。你唯一需要的家人就是金日成，至少到一九八〇年代是如此，当金正日当上劳动党总书记以后，他的肖像首次可以跟他的父亲挂在一起。之后又出现了第三张肖像，是金氏父子的合照。北韩报纸喜欢报导“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例如有英勇的民众为了拯救领袖肖像免于水火之灾，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劳动党免费发放的肖像还附有一块白布，这块白布可以收到肖像后面的木匣里。白布只能用来擦拭肖像。擦拭清洁的动作在雨季尤其重要，外框的锈斑很可能跑到玻璃内缘的角落。公共标准警察每月会来你家产茶一次，看你是否维持肖像的整洁。

宋太太不需要检察人员督促。即使在仓促忙乱的早晨，在收卷床席、准备午饭乃至于催促孩子出门之际，她仍然不忘时时拂拭肖像。许多妇女不喜欢佩戴金

日成襟章，因为它会让衣服产生破洞，而且铁锈也会弄脏衣服，但宋太太可不这么想。有一天，她仓促之间换了衣服，忘了把襟章别上便匆匆出门。结果在路上被一名少年给拦住了，从他的臂章可以看出他是社会秩序维护队的成员，这些人来自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负责在街上随机注意民众有没有佩戴襟章。初犯通常必须额外上几堂意识形态课程，而且会留下不良记录。但宋太太对于自己忘了襟章一事表现出极为惊恐的样子，这名少年于是只是稍微警告几句就让她走了。

宋太太谨守金日成的教诲过日子，她每晚在工厂礼堂研读，早将这些教导牢记于心。就连她的日常对话也充斥着这类格言。尤其在训诫顽劣的孩子时，她会说："忠诚与孝顺是革命份子应该奉行的最高道德。"孩子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一切全是国家领袖赐予的。与其他北韩孩子一样，宋太太的孩子们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庆祝金日成（四月十五日）与金正日（二月十六日）的生日。这两天是国定假日，而且通常只有这两天民众才能配给到肉品。能源危机发生以后，这两天就成为唯一有电的日子。在领袖生日的前几天，劳动党会分给每个小孩两磅以上的糖果。对孩子来说，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有各种饼干、果冻、巧克力与口香糖。这些小礼物必须等到领袖生日当天才能吃，不过有些母亲才不管这么多，至于宋太太当然是一且按照规矩来。当节日来临，所有的孩子在肖像前排成一列，表达对领袖的感谢。孩子们同时弯腰，深深地一鞠躬，而且充满感情。

"谢谢金日成元首父亲"，孩子们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一胖观看的母亲满意为止。

数年后，宋太太会议这段日子，充满了怀旧。她觉得自己很幸运。长博的确是个好丈夫。他在外头不沾花惹草。他从不对宋太太或孩子们动粗。他喜欢喝酒，但只到微醺为止。他治安要一笑，日渐肥胖的肚子也会跟着颤动起来，常常逗得全家大笑。这是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宋太太深爱她的三个女儿、儿子、丈夫，有时甚至还包括她的婆婆。当然，她也爱金日成。

宋太太少数珍贵的回忆全来自这几年。有一回，很难得的，星期日她与长博都不用上班，孩子们也不用上学，全家人好不容易可以聚在一起。在那些年，他们两次到海滩玩，其实海滩离他们家也不过几英里远。家里没有人会游泳，他们在沙滩上散步，捡拾蛤蜊回家蒸着吃。又一次，宋太太的儿子年满十一岁，她带他去逛清津的动物园。她以前在学校远足时曾来过这里。她记得自己曾看过老虎、大象、熊与狼，但现在只剩几只鸟。这是她最后一次旧地重游。

宋太太的子女进入青春期后，麻烦事就接二连三的到来。四个孩子中最棘手的是她的大女儿。玉熙于她的母亲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她长得滚圆结实，丰满而美丽。然而同样的两篇丰唇长在玉熙脸上却成了一副任性撅嘴的模样。她的个性充满尖锐的棱角。从她身上看不见母亲宽厚的性格，反而是易怒与处处感到愤愤不平。身为职业妇女的长女，母亲从早到晚都不在家，玉熙必须担负起绝大部分家务，对此她感到不悦。她不像母亲一样愿意自我牺牲。她不愿忍受微不足

道的蠢事把生活变得如此疲累。玉熙并不是因为懒散而变得不听话，她只是不愿做无意义的事。

玉熙抱怨“志工”的工作，但这是北韩青少年应尽的爱国职责。从十二岁开始，孩子们就被动员起来到农村种稻，他们要学着育苗、插秧与除草。玉熙一到春天就感到害怕，因为她必须提着篮子运土与喷洒杀虫剂，毒气刺痛了她的眼睛。当其他孩子一边快乐唱着《让我妈保卫社会主义》一边踏步前进时，她却抿着嘴巴怒目而视。

最让玉熙讨厌的就是收集公寓厕所的“堆肥”。北韩长期以来缺乏化学肥料，而且农村也缺乏牲畜，所以需要人的排泄物来制作堆肥。每户人家每个星期要提供一桶，送到数英里外的仓库存放。提供堆肥的家庭可以获得一张收据，证明你已尽到职责，而这张收据日后可以用来换取粮食。这项臭不可闻的杂物通常落到年纪最大的孩子身上，于是玉熙绞尽脑汁寻找最轻松的办法。事实上，要蒙骗并不困难。手机堆肥桶的仓库无人看管，谁会想到有人会来偷粪呢？玉熙灵机一动，她偷溜进去，抓了一桶堆肥，然后宣称是自己的再交给仓库，这样就能换取收据了。

玉熙回家以后，得意地吹嘘自己的伎俩。宋太太对于这种欺骗行为怒不可遏。她很早就知道玉熙是家中最聪明的孩子，她在三岁时就能认字，而且能背诵金日成的长篇文章，亲戚们对此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是堆肥这件事证实了宋太太的忧虑，玉熙是个缺乏集体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她要如何在一个众人以一致步伐前进的社会活下去？

玉熙读完高中之后，宋太太的丈夫运用自己的关系帮她在建设公司宣传部找到一份工作。

玉熙必须写文章赞扬工作团队的表现，例如建设进度超前与在铺设道路上获得重大进展。这家公司有一辆广播宣传车，实际上是一辆不堪使用的军用卡车，车的两侧涂上标语：“让我们依据主体思想来建立全体社会。”当卡车巡回于各个建筑业工地时，玉熙拿起麦克风朗诵她的报告，透过尖锐的扩音器广播公司的成就。这是一份愉快的工作，不需要提重物，而且跟所有宣传部门一样，这份工作由一定的地位。

宋太太与丈夫想进一步确保玉熙的未来，于是打算在劳动党内部帮她挑个丈夫。宋太太希望找个跟自己的丈夫差不多的人，于是她吩咐长博留意一下在他四周有没有跟他类似的人物。恰好，长博搭火车到茂山出差的时候，旁边坐着一名相当可爱的年轻男子。崔永秀来自罗津一个不错的家庭，罗津位于清津北方。踏实朝鲜人民军的民间雇员，是一名吹小号的音乐家。他在军中的地位高于一般兵，应该是可以加入劳动党。长博觉得这个年轻人颇有前途，于是邀请他来家里。

玉熙与永秀于一九八八年结婚，结婚的仪式遵照北朝鲜传统：站在金日成铜像前，由他代替神职人员象征性地主持婚礼。他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玉熙穿

上米黄色外套与黑色裤子，永秀穿上深色西装，僵硬地站在高大的铜像前拍照留念。他们留下一束花，相信他们的结合在精神上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他们回家享用宋太太摆下的宴席。根据传统是要吃两场宴席，一场是新娘家的，另一场是新郎家的，这当中带有一种彼此较劲炫耀家产的味道。这些宴席所费不赀，因为邻居与同事都在受邀之列，此外新娘家还必须附上嫁妆：装满被褥的柜橱、厨具、镜子与梳妆台，家境富裕的话，有时还送上缝纫机与电器用品。宋太太感到很不踏实；她知道永秀家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所以她倾尽全力要留给对方好印象。她在桌上摆满了菜——年糕、绿鳕、章鱼、油炸豆腐、毛蟹与三种鱿鱼干。这是宋太太家曾经吃过最丰盛的一餐，而这很可能是这场婚姻最圆满的一刻。

玉熙后来发现，永秀相当爱喝酒，尤其对自家酿的玉米酒情有独钟。几杯黄汤下肚，原本吸引人的音乐家魅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火爆易怒的脾气。永秀趾高气扬的态度原本让玉熙倾倒不已，现在缺让她感到极具威胁。这对年轻夫妇搬到火车站附近的公寓居住，但玉熙却经常跑回家。要不是眼窝青了一块，就是嘴唇被打裂了。婚后不到半年，永秀就因为与同事打架而被赶出军乐队。他被送到茂山的铁矿区工作。他已经失去加入劳动党的机会。你必须在二十几岁提出入党申请，并且通过党委书记的审查。少了党员身份，永秀的事业发展注定有限。已经怀孕的玉熙，不得不放弃工作，此时的她面临的风险更甚以往。

不久，宋太太的儿子也成了她烦恼的来源。与玉熙不同，儿子从小就相当乖巧。南玉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个体格健壮的孩子，不仅肌肉发达，身高也达到五尺九寸（一百七十五公分）。他很少大声说话或与人争吵。无论父母或姊姊们吩咐什么，他都会乖乖照做。玉熙对于同样的父母会生出性格完全不同的姊弟感到很惊讶。“他很安静，你甚至察觉不到他在那里”，玉熙这么描述自己的弟弟。南玉的学业成绩中等，但体育却很优秀。他可以反复不断对着公寓水泥墙踢球，而且自得其乐。十一岁时，一名教练测量他的前臂与腿的长度，然后推荐他到清津的特殊体育学校就读。这是共产党针对竞赛项目运动常有的做法，由政府（而非家庭）来决定哪些孩子不用接受一般教育而可以直接进入国家队接受训练。南玉的表现非常好，因此在十四岁时他被送到平壤接受拳击训练。

往后七年，南玉一年只允许返家两次，每次有十二天的假期。宋太太难得跟他加上一面。南玉从来不曾象姊姊一样向母亲诉苦，此时的他看起来似乎更像是陌生人。然后宋太太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闻。南玉在清津交了女朋友，而且女朋友的年纪比他大五岁。他从平壤回清津时都会待在她的住处。这算是一件丑闻，理由有二：第一，北韩男人通常不会跟比自己年长的女性交往；第二：婚前性行为是不被容许的。南玉很可能被学校开除，或者被逐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如此一来，未来他将没有机会加入劳动党。身为独子，南玉有责任找个好对象传承香火。宋太太与丈夫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但得到的只是令人难受的沉默。南玉与

家人越来越疏远，有时连放假也不回家。

接下来轮到长博惹祸上身。有天晚上，长博与太太还有几个邻居在家里收看电视新闻。在这栋大楼里，宋太太家是少数拥有电视的家庭。一九八九年时，电视的价格约合三个月薪水，大约是一百七十五美元，而且除非经工作单位特别批准，否则不许购买。政府通常为了表彰对国家的特殊贡献，才会以金日成的名义批准该项许可作为奖赏。长博之所以能拥有电视机，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在韩战时曾渗透到敌后进行谍报工作的缘故。这台电视机是日本日立公司制造，却标示着韩国的厂牌松木公司。北韩的电视机与收音机已经预先设定，只能接收政府的频道。此外，节目内容比较倾向娱乐性。除了固定的金日成演说外，平日晚上有体育、音乐会、电视剧以及金正日制片厂制作的电影可看。周末晚上，有时还会有俄国电影可看，算是一项特别节目。宋太太与丈夫对于自己家里的电视感到自豪。他们看电视时总会将家门打开，让邻居能随意进来跟他们一起观看，充分反映出当时的集体精神。

让长博惹上麻烦的节目，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内容主要是报导一家专门生产雨季雨鞋的工厂。镜头拍摄一群在生产线前面工作极有效率的工人，雨鞋就这样由数千名工人生产出来。旁白除了大力赞扬雨鞋的优良品质外，还提出重重数据佐证这家工厂的惊人产量。

“哼，如果有这么多雨鞋，为什么我的孩子一双都拿不到？”长博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他未加思索说出的话，竟为他招来祸事。

宋太太始终搞不清楚是哪个邻居告密。她的丈夫所说的话很快被呈报到人民班，而人民班又上报到公安部。这个名称让人觉得不祥的部门，其实就是北韩的政治警察。它拥有广大的线民网络。根据脱北者的说法，每五十人至少就有一人是线民，这个比例甚至比东德臭名远播的国家安全部还高，在两德统一后，这些情报档案都已被公开。

窥探自己的同胞似乎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有些窥探者来自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例如那位因为宋太太忘了带襟章而将她拦住的少年。这些人也监督服装仪容，例如不准穿牛仔裤或上头印有罗马字母的 T 恤（这代表你又资本主义倾向），头发也不许太长。劳动党正式发布一道命令，要求男性的头发不许超过五公分，但秃头的男子可以留到七公分。情节严重者将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另外还有“纠察队”，这是机动的警察单位，他们在结构随机寻找违法者，而且可以无预警下闯入民众家中。他们会找出超过用电额度的用户，例如超过四十瓦的灯泡、加热板或电锅。在一次突袭检查中，有个民众慌忙间将加热板藏在毛毯里，结果居然把房子给烧了。纠察队经常在午夜过后上门检查家中是否收留了未得到旅行许可的人。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就算是外地来的亲戚也不允许，更糟的是有时留宿的还可能是自己的情人。但是从事窥探不只是警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每个民众都应该艰巨破坏欲违法行为。由于北韩太贫困，电力供应不足以维持电子

监控，所以国家安全必须仰赖人力情报——告密。报纸偶尔会出现文情并茂的报导，描述勇敢的孩子纠举父母的违法行为。由此看来，因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长博的询问持续三天。情报人员对他大吼与咒骂，不过并没有殴打他，至少长博是这么对妻子说的。他说，他的口才使自己得以从囹圄脱身。他用无可质疑的陈述来为自己辩护。

“我没有辱骂任何人。我只是说我没有能力买那些雨鞋，我希望能买几双给我的家人”，长博愤慨的表示反对。

他的说法很有说服力。他的大肚皮以及严正的态度也使他颇具威势。此外，长博的姿态就象个劳动党官员。政治警察最后决定不再追究，将他无罪释放。

回家之后，长博被妻子痛骂一顿，凄惨的程度不下于政治警察的询问。那是他们婚后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对宋太太来说，这不只是丈夫对政府的不敬，也使她人生第一次感到强烈的恐惧。她的行为一直毫无缺点，她的信仰也绝对真诚，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很可能受到伤害。

“你为什么要在邻居面前讲这种鬼话？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可能让我们一无所有？”她责骂长博。

其实，夫妇俩很清楚自己有多幸运。要不是长博完美的阶级背景与党员身份，恐怕他无法轻易脱身。此外，宋太太曾经担任大楼人民班的班长，加上国家安全官员尊敬她，这些都对长博的无罪开释起了一定作用。如果长博在社区里地位不牢靠的话，那么他未加思索说出的话就足以让他被流放到山里的囚犯营。他们听过有人曾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结果被判了无期徒刑。宋太太的工厂也有一名妇女因为在日记上写了东西而被带走。当时她对那名妇女并无任何一点同情。“那个叛徒或许是罪有应得”，她心里想着。现在，她对于自己当初的想法感到羞愧。

时间似乎就此烟消云散。经过这次教训，长博在外人面前说话更谨慎，然而他的想法却也越来越不受羁绊。多年来，长博一直与心中的怀疑奋战，这股怀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上心头。现在，所有的怀疑都凝结成全然的不信任。身为记者，长博比一般民众更有机会接触各种资讯。在他服务的咸镜北道广播公司，他与同事聆听来自外国媒体未经检查的新闻报导。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新闻进行消毒，然后才能让国内民众聆听。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南韩的正面消息（例如南韩在一九八八年举办夏季奥运会）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北韩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导。

长博的工作是报导商业新闻。他巡回各地的集体农场、店铺与工厂，以笔记与录音的方式向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回到新闻室，他振笔疾书（没有打字机）描写各地的经济发展得又多好。他总是用正面的角度将事实串联起来，至少让文章阅读起来还有一点合理性。然而，稿子到了平壤的上司手里，连仅剩的一丁点真实也被删除了。长博比谁都清楚，北韩经济的成功完全是谎言。他当然有理由嘲

弄那雨鞋的报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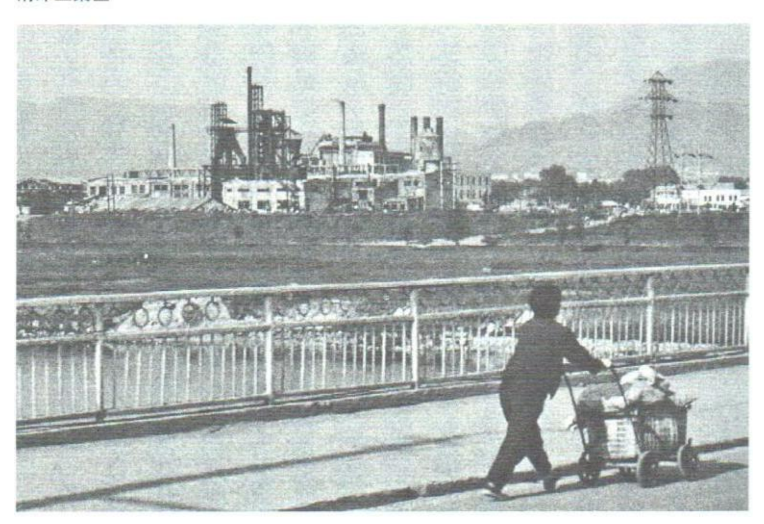
长博在广播公司有个可信任的好友，跟他一样越来越唾弃北韩政权。当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长博会开一瓶宋太太自酿的玉米酒，在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开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他们全是骗子。”

“儿子比父亲还坏。”

玉熙偷听到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她默不作声，只是颌首赞同。长博发现时，起初是嘘了她几声想打发她走。最后他放弃了。他要玉熙发誓不能说出去，而后才吐露他心中的秘密。长博告诉她，金日成并非他自己所宣称的抗日斗士，其实他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他告诉她，南韩现在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就连一般的工人都买得起汽车。他说，共产主义已经证明是个失败的经济体制。中国玉苏联现在都转而拥抱资本主义。父女俩一连谈上好几个小时，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放低音量，以免被邻居窃听。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们绝对会确定宋太太这位真正的信仰者不在屋内。

清津工業區



第四章

陷入黑暗之中

一九九〇年刚开年，原本高耸的柏林墙已化为一片瓦砾，许多纪念品小贩争相抢破砖碎瓦以为贩卖之用。而就在这一年，两德即将统一。此时的苏联也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毛泽东的脸孔成了到北京观光的美国游客购买的庸俗表盘图样。罗马尼亚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他与金日成有着亲密的私人友谊，这点并不令人意外——才刚再行刑队枪下伏法。列宁铜像从台座上被拉扯下来，砸个粉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午餐时打口咬着大麦克，喝着可口可乐。然而在北韩这个隐士之国，生活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北韩的新闻检查人员面对共产主义的崩解，他们的新闻处理手法仍然是加以淡化或歪曲。以《劳动新闻》来说，该报认为其他共产集团国家的问题起因于民族的先天缺陷。（北韩的新闻媒体总喜欢暗示韩国人在基因上的优越。）东欧人与中国人在本质上不够坚强或有纪律。他们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真实道路。如果他们能拥有象金日成一样杰出的天才来领导他们，他们的共产制度就能维持下去而且繁荣茁壮。为了遵循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北韩人必须无视其他国家的做法，坚持自己的路。

于是宋太太紧闭双眼，要自己对各种显而易见的错误视而不见。起初，迹象并不显著，几乎没有人留意。灯泡从一开始的闪个几秒钟、几分钟，变成几小时、然后几天。电力从一开始的时有时无，变成一天只有几个小时、一星期只有几晚有电。自来水也停了。宋太太随即想到，要趁水来的时候尽可能储水，接得几桶是几桶。但是这些睡仍然不够洗涤之用，而且大楼的抽水马达需要电力，往往电还没来，水已经停了。她必须收集塑料瓶，沿街走到公共抽水站。取水成了宋太太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在收拾完被褥草席与擦拭好金日成肖像之后，就到了该取水的时候了。虽然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但她必须比以往更早起床。宋太太都在一号道路搭乘路面电车上班，但电车的班次减少，等到电车来的时候上面早挤满了人，有些人只好吊挂在车后的阶梯上。宋太太不想跟车上的年轻男子争抢空位，所以她通常是步行上班。用这种方式上班需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清津的工厂紧挨着海岸线，从北边的浦港到南边的罗南，眼神达八英里。罗南过去曾是日军基地，现在则是朝鲜人民军第六军的驻扎地。最大的几家工厂是清津钢厂与金策钢铁厂、化学纺织、第二金属营造、五月十日煤矿机械以及麻田鹿公司，麻田鹿公司是一家鹿茸制药公司。宋太太在工业带北端的朝鲜制衣厂工作，这家工厂隶属于北韩最大的国营制衣公司。清津分公司雇佣了两千名员工，几乎全是女性，少数男性要不是上层管理人员，就是货车司机。北韩人终其一生几乎都穿制服，这家工厂大量生产的当然也离不开制服——无论是学生、店员、货车驾驶员、劳工乃至于工厂女工，全都有标准化的制服。这些衣服全以维那龙（vinalon）制成，它是北韩独有的拥有高强度与光泽的合成材料。维那龙由北韩科学家于一九三九年研发，北韩人很自豪地称之为主体纤维。这些材料绝大部分神单于沿着海岸往南一百七十五英里处的咸兴。

不过，从一九八八年起，布料的运送出现延迟的现象。宋太太与其他女工听说问题出在咸兴。要不是维那龙原料无烟煤用完了，就是工厂的电力不够——宋太太无法得到清楚的解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布料，工厂就无法开工。

女裁缝整天都在扫地擦亮机器，等待下一批布料送来。工厂静得很不寻常。原本缝纫机忙碌工作的声响传遍整座厂房，如今却只剩下沙沙的扫地声。

为了让工厂这些女工做点有产能的事，工厂的管理人员推动一项美其名为“特殊计划”的工作。事实上就是要她们寻找任何能卖钱或交换粮食的物品。有一天，女工们列队沿着铁道行进，她们拿着袋子与铲子沿路收集狗屎好用来制作肥料。其他的日子，她们也尽可能收集废五金。起初被派去的只有女裁缝，但不久宋太太与其他在日托中心工作的员工也得加入。她们用轮班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中心里一半的员工留守照顾孩子，另一半出去收集可以卖钱的物品。

“即使道路艰苦难行，我们也要保卫党”，管理人员为了激励大家的士气，要求她们一边收集一边唱歌。

有时候她们会到海滩收集废五金，炼钢厂就在附近，从管线排出的废水可能含有少量的金属。送该台不喜欢把脚弄湿，就算是在清津青年公园附近的海滩也一样，她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全家人还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捡蛤蜊。她那个时代的北韩人几乎都不会游泳，宋太太也不例外。即使水很浅，也会让她吓得发抖。她必须把裤管卷到膝盖，然后穿帆布鞋踏进海水，手里拿着竹篓子筛选金属，就像在淘金一样。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督导员会称一下大家收集的金属重量，看是否达到每个单位的责任额度。

所有的妇女都不断想办法逃离这种令人不快的收集工作。尽管她们几乎没有薪资，她们还是不敢不工作。在北韩，如果旷职的话，就拿不到可以换取粮食的粮票。如果你无故旷职一个星期，可能会被监禁起来。

有些妇女要不是谎称家中有急事，就是拿出医师开的凭证说她们无法来上班。其实只要使个眼色或点个头，凭证就下来了。宋太太做梦也不会让自己伪造凭证，这会让她感到良心不安。她跟以前一样准时上班。由于女裁缝没来工厂，所以日托中心也没有需照顾的孩子。主管试图排入更多的金日成思想课程来打发时间，但随着停电时间越来越长，工厂内也经常是一片黑暗。经过这么多年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生活，宋太太终于有机会好好休息。她趴在桌上，脸颊贴着木头桌面，睡了很长一段时间，心想，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

有一天，经理把宋太太与她的同事叫进办公室。宋太太相当尊敬这位经理，他是一名党员，也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她一样是个真正的信仰者。过去他总是再三向工人保证，布料随时都有可能从咸兴送来。现在他困窘地清一清喉咙，尴尬地说，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好转，大家（包括象宋太太这种仍然照常上班的死硬派）或许不用再抱什么期望。

经理说：“你们几位大婶（韩文通常用这个词来表示已婚妇女）可能要想别

的办法帮家里带点粮食。”

宋太太吓坏了，经理虽然没有说出卖淫两个字，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他建议她们到黑市找工作。

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北韩也有黑市。虽然技术上来说，私下买卖商品是违法的，但朝令夕改而且没有人放在心上。金日成允许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与贩卖蔬菜，于是宋太太住的公寓后方空地就成了临时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只是将防雨布铺在地上，卖的蔬菜也少得可怜，只有樱桃萝卜与白菜。有时看得到旧衣服、破损的碗盘与二手书。刚生产的新品不准在市场上买卖，只能在国营的商店贩售。谷物的贩售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被查获贩售稻米，就会被送进监狱。

宋太太觉得黑市充斥着一股低俗的气氛。小贩通常是老妇人或祖母辈的妇女。宋太太看到这些人蹲坐在肮脏的蔬菜上，以一种毫无尊严的方式向顾客兜售。有些妇女甚至抽着烟管，无视北韩对妇女抽烟的禁忌。宋太太鄙夷这些老太婆。在市场叫卖是令人反感的，这不是纯正共产党员该做的事！

事实上，纯正的共产党员也不购物。金日成在二十世纪创造出反消费主义的文化。亚洲其他地方的市场总是充满人潮和商品。北韩则非如此，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商店是平壤的两家百货公司——一号百货与二号百货，这是他们的名称——里面卖的商品也跟他们的名称一样令人惊奇。当我于二零零五年造访平壤时看到这些百货，我看到一楼陈列的中国制脚踏车，但我不知道这些商品是拿来贩售的，还是展示给外国人看的。一九九〇年代到平壤观光的人提到，百货公司有时会在橱窗摆上塑料水果与蔬菜给观光客看。

照理北韩人是不用购物的，因为理论上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都会以金日成的恩惠为名义由政府提供给民众。他们每年会分到两套衣服，夏衣和冬衣。新衣服由工作单位和学校发放，通常会在金日成生日那天，用来加强民众的印象：这些都是金日成的恩惠。所有的物品都已标准化。鞋子自由两种，乙烯基鞋或帆布鞋，皮鞋是奢侈品，只有有额外收入的人才负担得起。所有衣服全是由类似宋太太工作的制衣厂生产的。常用的布料是维那龙，这种布料不易染色，所以衣服的颜色很单一：工厂工人的制服是单调的靛蓝色，高级工人的制服是黑色或灰色。红色主要染在红领巾上，儿童直到十三岁为止要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这是少年先锋队规定的服装样式。

北韩不仅没有商业买卖，实际上也没有金钱。北韩的薪资非常微博，与其说是薪资，不如说更像是零用钱。宋太太每月的薪资是六十四朝鲜圆，以官方的汇率来说是二十八美元，但实际上这样的金额连买一件尼龙毛衣都不够。你只能用这笔钱支付杂项支出，例如电影票、理发、公车票与报纸。男人用这笔钱买香烟。女人则是购买化妆品，令人惊讶的是，她们在这方面得花费还不少。大红色的口红让北韩妇女看起来如同复古的四零年代电影明星，粉红色的腮红让寒冬里女性

枯黄的脸颊重新焕发健康光泽。清津每一个邻里都有自己的国营商店，而无论哪一个邻里的国营商店完全一模一样。北韩女性看重自己的外表：宋太太宁可不吃早餐，也不愿不化妆就上班。宋太太天生卷发，但与她同样年龄的北韩女性则必须到美容院烫发。这些美容院看起来象装配线一样，一整排的理发椅专供男性使用，女性使用的则在另一排。美发师全是国家雇员，在便利局底下工作。便利局也主管脚踏车与鞋子的修理。

这里有食品店、文具店与服饰店。与苏联不同的是，你在北韩很少看到大排长龙的景象。如果你想购买价格比较昂贵的物品，例如手表或录音机，你必须先在工作单位申请许可证明。有钱不一定买得到东西。

北韩最大的成就是粮食补助。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在选战时曾汗出家家有鸡吃的口号，与此类似，金日成也承诺要让北韩民众每日三餐都有米饭吃。稻米，尤其是白米，在北韩算是奢侈品。这样一个慷慨的承诺终究不可能实现，而真正能三餐吃米饭的也仅限于菁英份子。当然，公共配给制度的确让每个人拥有一定的谷物组合，其分量与种类则依据身份等级与工作内容来决定。从事重度劳动的煤矿工人每天可以获得九百公克的谷物，象宋太太这样的工厂工人则是七百公克。政府也针对韩国其他主要食品实施配给，例如酱油、食用油与一种名叫苦椒酱的深红色豆酱。到了国定假日，例如金氏父子的生日，可能会配给猪肉或鱼干。

最重要的部分是白菜。秋季，政府会配给白菜给民众制作泡菜。这种以辣酱腌渍的白菜是韩国的民族菜肴，也是韩国传统饮食在漫长冬季中唯一的蔬菜食品，它跟稻米构成了韩国文化的主要成分。北韩政权了解，少了泡菜，民众一定会很不高兴。家中的成人可以分到七十公斤的白菜，孩子可以分到五十公斤，以宋太太家来说，如果加上婆婆，合计是四百一十公斤。白菜以盐加以腌渍，加上大量的红辣椒，有时还加入豆酱或虾米。宋太太也会制作一些樱桃萝卜泡菜与芜菁泡菜。她会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制作，然后把泡菜储存在高口的陶罐里。长博会帮她把泡菜搬到地下室，大楼的每个住户在这里各拥有一个储存箱。传统上是要把泡菜罐埋在园圃的土里，这样泡菜就可以冷藏，而不会冻伤。现在既然放在地下室，宋太太只好临时在泡菜罐周围覆盖泥土。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关上箱子，锁上最大的挂锁。泡菜失窃在清津是常有的事，即使在北韩这种集体社会里，也没有人想与陌生人分享泡菜。

可以确定的是，北韩绝非宣传所说的劳动者天堂，但金日成的成就一不可小觑。在一九四五年半岛分裂后的前二十年，北韩要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南韩富有。事实上，一九六〇年代，当韩国学者提到“经济奇迹”一词时，他们指的是北韩。在一个有着长期饥荒历史的地区，能让这个地区的人民吃饱，足以算是一项成就，如果考虑到两韩分裂之后，比较肥沃的耕地多半在南韩而非北韩，这项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从一个几乎丧失所有基础建设与七成住房的悲惨国家，金日成创造

了一个看似可行（可说是斯巴达式）的经济模式。每个人都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有衣服可穿。一九四九年，北韩自称是亚洲第一个几乎已完全去除文盲的国家。一九六〇年代访问北韩的外国重要人士，他们通常搭火车从中国进入北韩，对于当地显然优越于南韩的生活水准啧啧称奇。事实上，中国境内有数千名朝鲜族为了躲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因而逃到了北韩。到了一九七〇年，北韩家家户户都已覆盖上屋瓦，每个村落都已接上电线，过着有电的生活。就连顽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海伦.路易斯.杭特——她在一九七〇年代所写的北韩报告，现在已经解密出版——也勉为其难地坦承，她对金日成的北韩感到印象深刻。

从各个共产国家发展模式来看，北韩似乎比较类似于南斯拉夫，而与安哥拉迥然不同。北韩是共产主义集团赖以自豪的亮点。人们以北韩的成就——特别是与南韩做比较——作为一项明证，显示共产主义“真的”管用。

然而果真是如此吗？所谓的北韩奇迹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幻觉，完全是以无法实现的宣传为根据。北韩政权从未公开经济统计数据（或者说它的数据没有任何一项是可信的）而且费尽心思欺骗外来的访问者，乃至于欺骗自己。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虽然北韩嘴巴上高傲的宣传它的主体思想与自给自足，但实际上它的生存却完全仰赖邻国施舍。北韩获得的补助包括石油、稻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与汽车。另外还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 X 光机与保温箱，与来自东德建筑师的协助。金日成善用中苏间的矛盾敌对从中取得援助。金日成就像过去的皇帝一样从邻国获取贡物：史达林个人送了一辆防弹的豪华礼车，毛泽东送了一节火车车厢。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金日成或金正日（后者逐渐接掌其父的职务）为了解决国家危机，开始进行所谓的“莅临指导”。金氏父子精通一切事物，无论是地质学还是农业都难不倒他们。朝鲜中央通讯社在金日成金正日参观清津附近的山羊养殖场之后表示：“金正日的莅临指导与循循善诱，大量增加了山羊繁殖与乳制品的产量。”今天他下令北韩应该从吃米饭改成吃马铃薯，明天他又决定饲养鸵鸟是解决北韩粮荒的方法。这个国家在各种轻率无当的方案之间跌跌撞撞。

北韩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挥霍在军队上。北韩国防预算吃掉百分之二十五的国民生产毛额，与此相比，工业国家的国防预算平均低于百分之五。虽然从一九五三年以后朝鲜半岛已无战事，但北韩仍维持一百万的武装部队，使这个面积小于美国宾州的小国拥有世界第四的军事力量。北韩宣传机器持续歇斯底里地高分贝报导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即将发动入侵。

金正日在被指名为继承人之后，在政治局内快速提升，并且于一九九一年被

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几年后，全国各地升起了宣传看板，数量仅次于主体纪念碑，这些看板上写着新的标语“先军”，宣示朝鲜人民军是所有决策的核心。金正日逐渐放弃他对电影的兴趣，把重心转移到更庞大的玩意儿上：核武与长程飞弹。

美国于二战末期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此后金日成便梦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核子强权，而自一九六〇年代苏联涉及的核设施在宁边设立后，研究亦随之展开。但北韩的核研究真正上轨道是金正日主政时期的事，显然是因为他认为核武可以提升北韩与他自己的地位，尤其当时北韩的国际声望不断衰退。北韩政府非但没有将攸关民生、已老旧不堪的厂房与基础设施更新重建，反而将资源投入到昂贵的秘密武器计划上，并且宣称国家有必要以“核威吓”对抗美国的威胁。到了一九八九年，北韩在宁边发展了核燃料再处理厂，开始从核子反应炉燃料棒提炼出武器等级的鈽，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中情局评估北韩已有能力制造一枚或两枚原子弹。二零零六年，我在首尔访谈来自平壤的高层脱北者金德弘，他表示：“金正日根本不在乎国内的赤贫，他认为飞弹与核武是保住政权的唯一方式。”

北韩对于时代的演变完全无知。金正日虽然了解冷战已经结束，但似乎没有看出他的共产党老靠山已将兴趣转移到赚钱上面，无心自主这么一位具有核子野心的过时独裁者。而北韩在经济上的最大对手南韩，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反败为胜；又过了十年，北韩已被远抛在后。中国与苏联完全不顾念共产国家情谊，它们只想与南韩的现代和三星这类公司打交道，而不愿与北韩未能准时付款的国营企业做生意。一九九〇年，苏联在崩解的前一年与南韩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北韩的世界地位造成严重打击。两年后，中国也与南韩建交。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俄两国对于北韩积欠一百亿美元贷款未还已感不耐。莫斯科当局决定北韩必须以当时世界商品一般的交易价格向苏联进口货物，而不是共产国家盟友的低廉“友谊”价。北韩有四分之三的燃料与三分之二的粮食从中国进口，过去中国常说它与北韩“唇齿相依”，现在则要求北韩预付现金。

不久，北韩陷入死亡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的燃油与原料，北韩无法让工厂维持运转，这意味着北韩没有货物可以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强势货币，没有强势货币，就无法进口燃料，没有燃料，就无法发电。煤矿没有电力无法开采，因为矿坑需要电力帮浦抽出坑内积水。煤的缺乏让电力缺乏更加恶化，而电力缺乏进一步使农业减产。就连集体农场也无法在停电的状况下正常生产。北韩贫瘠的土地要养活两千三百万人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所需的农业技术必须仰赖农业灌溉设施、化学肥料与除虫剂，但这些都需要电力，生产肥料与药剂的工厂缺电缺料根本无法开工。北韩开始缺粮，挨饿的民众没有力气工作，产出又进一步下降。北韩经济开始象自由落体般直线下降。

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几乎所有粮食都由集体农场生产的国家(至少到二零零九年本书写作时如此)。国家没收所有的收成，然后再将一部分返还给农民。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收成逐渐减少，挨饿的农民开始将收成的一部分隐藏起来——有些农村故事提到，农民在屋檐内的夹层存放粮食，结果重量太重压垮了屋顶。农民也不愿在集体农场尽力耕作，而是专注于自己住宅旁的家庭菜园或未开垦的陡峭山坡隙地。开车经过北韩乡野，你可以清楚看到死人菜园与集体农场的对比。前者种满蔬菜，高耸的豆架，垂下的藤蔓覆盖着南瓜；后者则是一排排杂乱无章发育不良的玉米，全是由所谓的爱国志工种植的。

损失最大的民众是城市居民，他们没有土地可以种植自己需要的粮食。

宋太太结婚之后，每十五天就会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到同一家粮食配给中心。这家中心就位在宋太太住处附近，刚好介于两栋大楼之间。但这座配给中心跟一般的超级市场不一样，你不能从货架上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一群妇女在一个金属大门敞开、毫无表示的店铺外排队等待。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指定的日子来领取——宋太太是每月三日与十八日——即使如此，队伍通常要排上好几个钟头。店里是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间，四周全是白色水泥墙，一名板着脸的女人坐在小桌后头，桌上堆满了账册。宋太太把配给薄、一小笔钱以及从制衣厂领来的粮票（证明她已完成分内工作）交给她。其他的职员计算她应领的份额：她与长博每天各可领到七百公克；她的婆婆已经退休，所以只能领四百公克；还住在家里的小孩可领到五百公克。如果家中有人外出，就必须扣除这个人不在家里的天数。算好之后，职员拿出官印，煞有介事地在印泥上重重压了一下，然后在一式三份的收据上盖章，她会将其中一张交给宋太太。在仓库后面放了一桶桶白米、玉米、大麦与面粉，另一名职员把分量秤好之后，再放到宋太太的购物袋里。

袋子里放了多少粮食总是令人心惊胆跳，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宋太太日后回忆时，已经记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一九八九年、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她的配给越来越少。当职员把袋子交还给她的时候，宋太太不用看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沮丧。袋子显然比以前轻了。他们受到有系统的欺骗。某个月她可能只拿到二十五天粮食，到了另一个月可能只剩下十天。尽管金日成曾承诺让人人有米饭吃，但白米对北韩人来说仍属奢侈品。现在比较常吃到的只有玉米与大麦。食用油过去总是时有时无，现在则绝不会出现袋子里。宋太太该不是会抱怨的人，即使心里有怨言，她也不会说出口。

“如果我抱怨的话，他们会直接过来把我带走”，她后来说道。

北韩政府提出各种解释，既有完全荒谬的说法，也有勉强说得通的理由。民众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政府正在储备粮食，准备在两韩统一那天发给挨饿的南韩人民。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对北韩进行粮食禁运。这不是实情，但显然可信。北韩与一九九三年初威胁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威胁要实施禁运。金日成正好趁这个时候转移焦点。他可以将问题都推给美国——北韩最喜欢找美国当代罪羔羊。“朝鲜人民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围堵与禁运”，《劳动新闻》表示。

北韩人民经常认为自己很强悍——事实上确是如此。宣传机器发动新的造势活动，它虚构了一则故事来唤起北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金日成领导了一小股抗日游击队“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与数千名敌军作战，他们应用地忍受大雪玉饥饿，让红旗继续飘扬在队伍之前。”他们口中所说的这场“苦难的行军”，后来成为北韩这场饥荒的隐喻。《劳动新闻》激励北韩人民以金日成的牺牲精神为鉴，努力对抗饥饿。

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朝鲜人民在“苦难的行军”革命精神下朝胜利迈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忍受饥饿成为一种爱国责任。平壤街头挂起了新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天吃两餐。”北韩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无论如何，粮食缺乏是暂时的——报纸引用农业官员的话表示，来年稻米酱油特大量的收成。

当国外媒体与一九九三年报导北韩出现粮荒时，北韩新闻媒体纷纷表示愤慨。

国家以低价提供粮食给人民，民众因此不清楚米价。这才是朝鲜北半部的实情。我国所有的民众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完全不用担心粮食不足的问题。

如果北韩人能静下心来想想，他们得到的讯息是如何前后不一与充满谎言，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极危险的状态。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国家、罢黜自己的领导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抗议。为了继续过日子，一般民众只能要求自己不要想太多。然后人性固有的求生本能会告诉他们要保持乐观。就像一九三〇年代初德国犹太人告诉自己事情不会更糟一样，北韩人也这么欺骗自己。他们认为粮荒是暂时的，情况总会好转。饥饿的胃不可能被蒙骗，但有时还是会自欺欺人。

除了进行新一波的宣传活动，北韩政府也加强了国内广大的监控网络。政府值得被抱怨的地方越多，就越要确保没有人抱怨。

宋太太从一九七〇年代初开始担任“人民班长”的职务。每年，左邻右舍必须选出一名领袖，通常是一名已婚的中年妇女。宋太太正好适合这个职位，因为她急公好义、有组织力、忠诚而且如韩国人所说的善于“察言观色”。她与么个人都处得不错。她必须拟定一份工作表，从她居住大楼的十五个家庭里分配由谁来打扫走道，谁来修剪大楼前面的花草，谁来收集与回收垃圾。宋太太还必须汇报任何可疑的活动。

宋太太被分派到国家安全部派来的一名情报员底下做事。康同志比宋太太年长几岁，她的先生据说是与平壤方面有联系的劳动党官员。每隔几个月，她们会

在区办公室见面，或者是康同志到宋太太住处喝杯自酿玉米酒，顺便收集邻里间的情报。宋太太一直没有什么情报可以上报。这栋大楼一直相安无事，除了长博曾对雨鞋有怨言外，没有人惹上麻烦。

但康同志相当坚持，随着粮食配给越来越吃紧，她想知道是否有人对政府有怨言。

“有人抱怨粮食吗？他们说了什么？”情报员问道。她预先在大楼前面等宋太太，然后在门口拦住了她。

“他们什么都没说”，宋太太驳斥她的说法。这倒是真的。事实上，宋太太已经注意到，每当她踏入公寓时，邻居的对话就会突然打住，她走进的房间经常会陷入诡异的静默。每个人都知道人民班长必须要向国家安全部汇报。

康同志还是不满意。

“你应该先抱怨。你要问为什么粮食不配给下来。然后看她们有什么反应”，她一面发出不满的嘘声，一面又左顾右盼，确定玄关没有人偷听到她说的话。

宋太太急着想脱身，只能无力地点点头。她其实不大想照她的话做。她知道这些邻居并没有涉入颠覆活动。他们不是国家的敌人。至于宋太太自己则是累得没有空去想意识形态的问题。

粮食的缺乏让宋太太失去了活力。她整天若有所思，虽然脑子里一直数东西，但总是得不出具体的数字。她一直想着要如何为家人获取粮食。一九九一年，制衣厂完全停摆，而在工厂的最后一年，宋太太一毛钱也没领到，只有拿到粮票，但粮票已经没有用处，因为公共配给中心已经没有粮食。宋太太的丈夫过去经常因为加班而获得一些额外的粮食，例如食用油、饼干、香烟或酒，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国营店铺的货架上完全空荡荡的。

制衣厂关了之后，宋太太在黑市购物的顾虑一扫而空，黑市的确有粮食，甚至有时还有白米，只是价格贵得吓人。在黑市，二十五朝鲜圆才能买到一公斤的白米，但在配给中心一朝鲜圆就能买到十公斤的白米。

不过宋太太仍然鄙夷到市场工作。她在那边能做什么？她没有土地，所以无菜可卖。她不知道该怎么叫卖，她唯一会的商业技能就是打算盘。宋太太家有四个孩子，加上大女儿结婚，过去这几年没省下钱来。她的脑子里开始盘点自己的财产。东方的山水画、电视、丈夫的书，也许缝纫机也可以卖钱？

就在宋太太左右盘算之际，另外有数千人在做相同的事。该卖掉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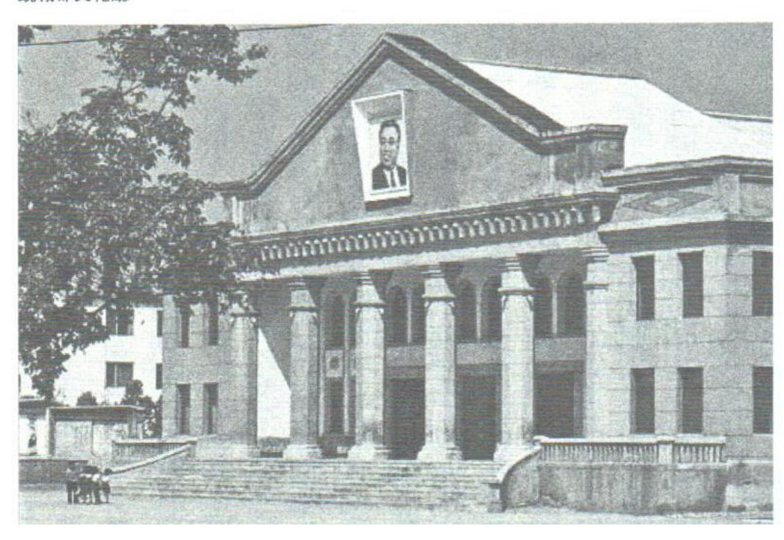
清津基本上是一座水泥丛林。只要不是陡峭的山坡地，就全盖满了房子。这里不是你可以到树林里猎捕鸟类与采集野果的地方。宋太太一家捡拾蛤蜊的海滩，可以采集的贝类极少，而且当地水深，不适合在岸边垂钓。清津唯一适合种植的地方是罗南小港口附近的小菜园与稻田。

人们开始到更远一点的郊外寻找食物。镜城郡的果园是人们趋之若骛的目标。每到周末，清津有许多家庭假装要外出踏青，其实他们的目标是这座果园，这片集体果园离清津市中心约三英里。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因为饥饿才这么做。这座由集体农场经营的果园出产一种特殊的朝鲜梨，通常会出口到日本以换取强势货币。朝鲜梨的大笑与形状类似葡萄柚，但外皮与西洋梨一样是黄褐色，咬起来有苹果的松脆口感。朝鲜梨的完美球形使它在结实自落之后，往往顺着地势滚到果园周围的栅栏之下，相当容易捡拾。来捡梨子的很多是孩子。由于学校午餐分量越来越少，甚至停止提供，所以孩子们宁可翘课去寻找食物。他们可以轻易从铁丝网底下钻过去。有个年轻人，他在一九九二年时是十岁，他带着些许自豪会议自己曾攀在公车的后保险杆上，在最后一站罗南下车，然后走一小时的路。他只是个孩子，又只身一人，没有人提防他。他的幼小身躯顺利穿过栅栏，然后尽可能将梨子装满整个袋子。“我尽可能地捡梨子，然后把这些梨子全分给我的朋友”，他说。

这个时期的其他回忆则是苦涩的。金智恩，当时刚从医学院毕业，担任住院医师的她，在某个周末与父母、妹妹、妹夫以及两个小孩一起前往果园。带着还在学步、不断央求的孩子，他们直到中午才抵达。但他们太晚了，在他们之前已有许多人过来捡拾。他们只在地上找到一颗有点烂掉的梨子。他们把梨子带回家煮，然后切成无份，分给两个孩子、父母与金智恩的妹夫。金智恩自己与妹妹什么也没吃。

那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金智恩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因为这是她出生以来第一次整天没吃东西。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么清楚。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在转瞬间产生的，它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人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观。

鏡城郡文化廳



第五章
维多利亚式的罗曼史

美兰读高中时，第一次看到清津市民大老远地走到乡间觅食。她骑着脚踏车前往清津途中，沿途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手持麻袋，沿着道路两旁走向果园，看起来就像沿街行乞的乞丐。有些人甚至一路走到美兰村子阴暗数英里的玉米田，几乎已经走到海边。这些城市居民有时还出现在美兰父亲工作的山区高岭土矿场捡拾柴火。美兰感到很惊讶，因为她一直觉得住在清津的人日子过得比住在镜城的人好得多。清津有大学、大戏院与餐厅，只有劳动党的党员们与他们的家人才能住在哪里，象她这种出身成分的人只能住在城外。

镜城其实是一群围绕着小商业区的村落。正中央的小商业区如同清津的缩影，有一条极宽阔的大街，与一座赞扬金日成于二战击败日本的大型石砌纪念碑。这里有两座处理高岭土（使用的高岭土来自于美兰父亲工作的矿坑）的陶器工厂，还有一座大型电子零件制造厂“六月五日工厂”，这是以金日成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那天来厂莅临指导而命名。美兰的存在确切来说并不算是农村，但与城区比起来拥有较多的可耕地。接近海岸的地区，地形平坦、多沙且比较肥沃。往内陆地区走，随着你往还把高的地方攀登，松树林越是茂密。口琴住宅之间的狭长地带，住户们费心栽植了红辣椒、樱桃萝卜、白菜，甚至还有烟草，因为自己卷烟要比买烟便宜多了，而且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抽烟。住户的屋子如果是平顶，住户会将一盆盆的土搬上去，这样可以种植更多蔬菜。这些似有农作面积是在小的可怜，不足以引起共产党当局的不满。至少在一开始，在粮荒恶化成饥荒之前，他们还能免于饥饿之苦。

当美兰的父亲从矿区带回来的薪水越来越少，到最后终于停止发薪时，她的母亲不得不开始从事违法的勾当。她不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但谈到赚钱，她的办法可就多了。她做过缝纫、只做过手工豆腐，还有一段时间养过猪，虽然最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养活这些猪而放弃。比较成功的是她想出一个风味类似于冰淇林的食谱。她买了一台名叫北极机器的二手制冰器。因为几乎不可能买到牛奶或鲜奶油，所以她利用制作豆腐剩下的水，加上红豆与糖增添风味。她把这个古怪的混合物导入制冰盒结冻。韩国人溺爱孩子，如果家里有剩余的食物，他们会塞给孩子当零嘴。有时候美兰的母亲会在朋友的卡车后面兜售货物。劳动党规定不许私自赚钱营生，但她把这些规定抛诸脑后。与其说她是个反抗者，不如说她是个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的实用主义者。她把贩售豆腐冰淇淋赚来的钱，用来在黑市购买玉米，有时候还会购买白米。

美兰神秘的仰慕者也与饥饿绝缘。俊相的祖父母几乎每年都会从日本搭渡轮来探望他们。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渡轮不再停靠清津，而是停靠元山——位于北韩东岸，只是比清津更靠南方。俊相家会到码头去接他们，见面时会仪式性地

又哭又抱，俊相的祖父会趁这个机会把厚厚的信封塞进他儿子的口袋里。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慎重谨慎，以免让官员看见会克扣一部分金额。信装的日圆有时候价值超过两千美元。在日朝鲜人很清楚，他们在北韩的亲人如果没有强势货币一定会挨饿。

俊相家也很幸运，他们拥有一个私人庭院。俊相的父亲是个国度讲究的园丁，他把这块四周有墙围绕的朴实园圃区隔成井井有条的菜园。弯着腰在菜园里耕作，他对菜苗的细心呵护更胜于对子女的关爱。他在小记事本上记录种下的种子、犁沟的深度、种子需要几天发芽，以及蔬菜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熟。俊相的母亲仍保有家人从日本运来的精美厨房设备。她用如剃刀般锐利的菜刀将红萝卜与樱桃萝卜切丝，然后在刚炊煮好的米饭上洒上新鲜的薄片蔬菜，再用晒干的海苔将米饭连同蔬菜卷起来。在邻里中，俊相家是唯一吃海苔卷的家庭，这种韩国菜演变自日本的卷寿司，在南韩颇为盛行，但北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菜。俊相家有自种的蔬菜，而且从黑市买白米，他们吃得几乎比劳动党最菁英的成员还好。

最让俊相家自豪的还是俊相本人。持续数年的单调苦读，熬夜到深夜一点，天亮即起，加上父亲无情的唠叨，以及实现家人期望的想法，这一切终于有了回报。俊相终于获准到平壤读大学。俊相的出身成分不高，无法进入金日成大学，但他就读的学校专门训练科学家，而且更看重学生实际课业表现而非出身成分。北韩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南韩与日本，若能找到科学人才，当然要好好珍惜。俊相自己比较倾向于研究文学或哲学，或者，如果有这门学科的话，他更新攻读电影，但父亲要求他朝科学发展，他知道一个出身成分不高的男孩想到平壤发展，唯一的机会就是研究科学。

一名咸镜北道的男孩能够进入相当于北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校就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俊相因此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他有机会可以提升整个家庭的出身成分，而且也有机会加入劳动党。尽管他对北韩的政党体制开始产生疑问——他感到困惑，如果共产主义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东德人民要拆掉柏林墙——但他知道只要能拥有党员身份并且在平壤受教育，他就有可能晋升为核心阶级。

俊相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他是个谦虚的孩子，总是小心翼翼不张扬他的聪明与金钱。但这些日子以来，每当他从平壤返家，总觉得自己是凯旋回乡的英雄。大学生就跟军人一样，无论校内校外都必须穿着制服。整套服装包括了绿色双排扣外套与裤子，白衬衫与领带。制服的绿色源自金日成，他说青年就像“青山”一样。在崭新自信的鼓舞下，俊相又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约美兰出来。从他第一次在电影院门口遇见她，已经过了五年，令他惊讶的是，自己还没有忘记她。平壤的大学里不乏聪明漂亮的女孩，但他中意的只有美兰。

俊相知道一点美兰的事，上高中时，他与她姊姊美淑是朋友。美淑比美兰大两岁，是个举止很像男孩的女孩。她是女子排球队的球员，经常出现在俊相朋友们练习的体育馆。俊相在拳击课上也有一名朋友，他家跟美兰家就在同一排口琴

式住宅。这让俊相又藉口在她家附近闲晃。

美兰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与宋太太一样，他们也采取分户开放政策。有一天，俊相趁着拜访同学的时候，跟着其他邻居一起溜进了美兰家。其他人都专著看着电视，只有俊相的眼睛在电视与美兰之间来回扫射。她已经长大成为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仔细看着她的五官秀发，想着是什么俘虏了自己。他琢磨着是否值得冒着名声受损的风险约她出去。他想了想，认为还是值得的。

俊相打算一九九一年春天从平壤返家时约美兰出来，当时他还是大一学生。俊相在镜城市中心闲逛，希望"巧遇可以让他有机会跟美兰说话。假期的最后一天，俊相在市场看见她，正打算过去跟她说话，发现美兰的母亲就站在她身后几步的距离。

不久，俊相把自己的苦恼告诉美兰的姊姊美淑，美淑同意帮他的忙。下次放假的时候，俊相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来到美兰家。美淑在家门口东张西望，一看到俊相就大声地叫唤美兰："小妹，快出来跟我的朋友说话。"

美兰把头伸出门外，一看到俊相，她羞涩地交了一声，随机躲闪回屋内。

"小妹，快过来，不然我要拉你出来啰"，美淑坚持地说。

美兰终于出来见他。第一次面对面跟她说话，俊相觉得自己的汗珠已经沾湿了刚熨好的制服衣领。他一开始说话，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计时器一样颤抖着。现在要回头已经太晚，所以他继续说下去。他没有办法长话短说，所以只能不断地说话。他把自己的前因后果全告诉她，从第一次在电影院前面看见她开始，最后，俊相问美兰愿不愿意当他的女朋友。

"我的功课，我应该认真念书才对，可是我一直想着你，所以我没办法专心"，他突然脱口而出。

美兰一句话也没说。她站在那里，不像巨响先前预料的避开他的视线，但也没有回应他的话。俊相觉得自己的头要爆炸了他又说了几句，希望美兰能跟他说话。

"这段时间你都没发现我一直在看你吗？"他问道。

"没有，真的，我完全不知道"，她说。

他希望她多说一点。

"嗯，不过也不像是我不喜欢你"，她用了复杂的双重否定，以韩文来说更是让人混淆不清。他不是很确定她的意思，但他怀疑这是一种防卫性的正面回应。她承诺会写信解释她的感觉。美兰虽然冷漠，内心其实很兴奋。她的追求者英俊、可爱而且坦白说相当吸引人。她只认识两名上大学的男孩，但他们不是在平壤念书。虽然美兰嘴里说她很惊讶，实际上她早已注意到俊相在她家附近闲晃，她甚至大胆地猜测他是不是为自己而来。绿色制服的确吸引了她的目光。善良的双排扣使他看起来像个海军军官。虽然美兰没有约会的经验，然而本能告诉她，她必

须表现矜持。她绞尽脑汁写了一封同意信，但语气绝不流露出急于接受的样子。最后她用嘴美丽的字迹写了一封正式而略嫌笨拙的信。

美兰在几个星期后写信给俊相，信上说：“为了避免让你因为不快乐而无法专心读书，我会暂时答应你的请求。”

至少在一开始，他们的关心带有十九世纪书信体的性质。他们唯一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一九九一年，当南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出口国时，北韩几乎没有几个人用过电话。民众必须到邮局才能打电话。但即使是写信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书写用纸相当少。民众只能在报纸旁的空白处写字。国营商店卖的纸是玉米壳做的，如果写得太用力，纸很容易碎。美兰必须向母亲要钱买几张进口纸。粗率地打草稿显然不可行，纸张太珍贵了。平壤与清津相距只有两百五十英里，写信却要一个月才会到。

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美兰正在读高三。她对于正在念大学的俊相所表现出来的世故感到吃惊。俊相在平壤可以买到适当的纸写信。他有一枝圆珠笔。他可以一口气写好几张信纸，不仅长篇而且条理分明。逐渐地，他们的书信内容开始从拘泥造作的形式转变成无所顾忌的浪漫。俊相从来没看过好莱坞的爱情电影，但他的热情足以让他想出现代爱情戏的制式桥段。他在信里想象了一幅场景，他与美兰在橘红色的天空下奔向彼此。他在信里引用了他在平壤读的小说的句子。他写了情诗。欣赏完全看不出过去他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俊相把信寄到美淑工作的地点，这样就可以避免被美兰的父母发现。美兰家只有她知道美兰交了男朋友。俊相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要保密，在北韩，性与阶级背景本来就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事实上，抱怨自己的出身成分就等于批评政府。尽管如此，美兰带有污点的血统，两人心知肚明。他们知道，如果两人结婚的话将会伤害俊相的事业，而他也将无法加入劳动党。当然如果俊相的父亲知道了，一定会反对他们交往。北韩社会强调门当户对。俊相知道父母希望他将来的对象也是来自于在日朝鲜人社群。无论如何，俊相的父亲不会同意他的儿子谈恋爱。

“先读完大学再说，不要浪费时间追女孩子”，他一定会这么说。

我在这里要稍微离题谈谈北韩的性：北韩没有约会文化。许多婚姻要不是出自父母之命，就是透过党委书记或长官介绍。情侣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过于亲昵，就连牵手也被认为是有伤风化。脱北者一致表示，在北韩没有婚前性行为，也咩有学生未婚怀孕的事。“这种事太可怕了，完全无法想象。我甚至没想过会有这种事”，这是一名北韩妇女告诉我的，她绝对不是在装正经——我访谈她的时候，她在首尔从事性工作。北韩不想南韩或日本一样有宾馆。没有旅行许可，你无法投宿一般的旅馆，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愿意接受未婚的情侣投宿。清津人告诉我，未婚情侣想发生性关系，要不是去荒郊野外，就是趁夜里去公园，但我从来

没听过有人承认自己已做过这种事。

传统韩国文化队性十分拘谨。当你身在首尔，看见女学生穿着只覆盖到大腿的格子裙时，很容易忘记一个世纪之前，一名值得尊敬的韩国妇女全身上下都会包得密不透风，几乎跟塔利班要求的服装一样。十九世纪英国旅行作家伊莎贝拉.柏德（Isabella Bird）曾经提到，一八九七年她在平壤北方的一处村落看见妇女戴着类似穆斯林罩袍的器具，她形容这种器具“是一顶庞大的帽子，如同我们用六条编成的花园岗哨，只是没有底部。这种特殊的覆盖物有七英尺长、五英尺宽与三英尺深，可以从头到脚把整个人覆盖起来。”中上层阶级的女性不许出门，除非再特别指定的节日，街上都没有男人时才行。柏德的阅历丰富，她曾到过伊斯兰世界，但她认为韩国妇女受到“严密隔离的程度，或许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女性都要来得严重。”

这类柳条篮子早已不复存在，但昔日的态度仍被流传下来。金日成掌权后，他结合韩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与共产主义压抑性欲的本能。他不仅关闭妓院，也禁绝“妓生房”，后者专为娱乐富人而存在，角色地位暧昧不明。色情文学作家遭到处决。尽管金氏父子自己在男女之事上毫无节制（金正日在年轻时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但党的官员只要被发现与人通奸就会遭到撤职查办。

金日成也反对早婚，他在一九七一年发布一项“特殊命令”：男性未满二十岁，女性未满二十八岁，不得结婚。北韩报纸表示：“祖国与民族希望并且相信，年轻人应该支持这项优良传统，每个人都应该在为国家与人民做出足够贡献之后才能结婚。这项规定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军人士气，这样他们才不会担心服兵役时女朋友会移情别恋。此外，这么做也可以降低出生率。虽然早婚禁令已在一九九〇年废除，不过北韩人对于年轻情侣扔投以不友善的目光，无论他们的关系有多么纯洁。

宣传活动劝导妇女留“传统发型，这样才能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以及时代品味一致。”中年妇女头发要剪短与烫边；未婚女性头发可以留长，丹药往后梳并且绑起来，或者是编成辫子。北韩妇女的裙子不许短于膝盖，也不许穿无袖衬衫。有趣的是，南韩在一九七〇年代军事独裁者朴正熙的统治下也曾对发型与服装有过类似规定。说明了北韩完全停留在过去，而南韩的改变又极为剧烈，两种文化的最大差异充分表现在性与服装上面。几年前，我到北韩一处孤立地区旅行，这里经常有南韩人来观光，我看到一名北韩旅馆的大门警卫好像快晕倒了，原来他看到一名年轻南韩女性穿着低腰牛仔裤，上衣还露出腹部。我访谈许多脱北者都曾告诉我，他们对南韩最感惊讶的是情侣会在公共场所接吻。

因此，灯光的熄灭对于恋情刚开始的俊相与美兰来说，刚好提供了方便之门。北韩夜晚的黑暗具有一种绝对性，这是生活在拥有电力、灯火通明世界里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只有看到发亮的香烟烟头时，你才知道有人正走在街上。

晚餐后，俊相会找个理由外出，尽管他已经是个大学生、二十岁而且高出父亲一个头，他还是对父亲感到畏惧。

“我去找朋友”，俊相大声说，并且随便提某个高中时代死党的名字。他答应会在九点回来，实际上却可能是午夜。他的父亲还来不及问他，他已经走出家门。

到美兰家步行约要三十分钟。俊相知道美兰在晚餐后还需要帮母亲收拾，在她完成家事之前，他可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如此，他还是加快脚步。俊相现在已经没有藉口在美兰家附近闲晃，因为他在拳击课上认识的朋友（也就是美兰的邻居）已经搬走了。于是他站在黑暗中，整个人静止不动，他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这个时期，他们原本可以约会的少数几个地点已经关闭：镜城郡文化厅停电，无法放映电影；几年前还在营业的几家餐厅也关门大吉。清津闹区的滨水地带，就在港口边有一座清津青年公园，公园的湖上有小船，另外还有年久失修的游乐设施.....，但是旅行法令极为严格，光是从郊区进入市区也需要通行证。他们也不敢到镜城火车站后方的公园，因为那里很可能会遇到认识的人。

散步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只有一条穿越市区通往山中的道路。他们可以轻松走着，不用做出躲躲藏藏的样子。当行经画着微笑金日成宣传看板时，他们沉默不语。看板上写着激励的标语，“凡是党决定的，我们必须遵行”以及“让我们用生命保护金正日”。在接到的另一端也是色彩鲜艳的巨幅宣传看板，上面画得是枪管上了刺刀的士兵们。走到这里，道路通过一道宽阔且彩绘着蓝色花朵的拱门。随着标语逐渐消失，他们也走出市区，在黑暗中，他们感到放松。俊相与美兰已经适应黑暗，不用睁大眼睛也能看清楚景物。道路两旁过度茂盛的树木，枝叶朝着路中央倾斜交叠，在他们头上纠缠成一道浓密的罩棚。在晴朗夜空下，繁星透过枝桠窥视着两人。过了几分钟，开始出现上坡路，路的一边是开敞的河谷，另一边是陡峭的山丘。陡坡上的松树紧攀着岩石，树林中，杂乱土堆上生长的紫色野花逐渐淹没了光秃秃的石块。

跨过沙岸小溪，山路随即左拐，从这里可以通往温堡温泉。据说这是韩国唯一一座碱性泉质的温泉，泉水从沙中涌出，温度可达华氏一百三十度（摄氏五十四度），可以治疗的疾病从消化不良到不孕，种类繁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去，可以到达金日成的别墅，不过途中有检查哨封住去路。金日成为了巡行游憩之便，在全国各风景名声建立了约三十处行馆，这里就是其中一处。庞大的军事标语警告民众不要误入这条似有道路。从这条道路也可以看见另一处专供劳动党官员使用的水疗地，当然这里也禁止民众进入。供民众使用的水疗地几乎已停止营业，因为经济危机的关系，这里只剩下荒废的石堆与水泥建筑物。这处休闲胜地开放于一九四六年，壁画里金日成的身旁围绕着一群医生，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然而现在看起来这个地方仿佛从启用后就未曾修缮。长满杂草的广大地面，在夜里

看起来更显得孤寂荒凉。这对小情侣对于这副景象不感兴趣。两人厮守的兴奋感足以让他们忘了在夜里行走数英里造成的双脚疼痛。

他们只有散步与说话。他们的对话生动而热切。当他们实际见面时，俊相完全没有信里那种虚张声势的浪漫。他待人有礼，懂的尊重，甚至要等到交往三年后才敢牵美兰的手。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博取她的喜爱。他描述自己的朋友与宿舍。他告诉她，当学生们在操场接受点名时，必须列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进，四肢都要用力摆动。俊相与美兰分享他在平壤的所见所闻，美兰只去过平壤一次，小学校外教学曾到那里参观纪念碑与纪念馆。平壤是现代世界的象征——宣传文章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座在建筑与科技达到世界巅峰的伟大城市。俊相跟她提到高丽饭店的双子星塔以及大楼顶层的旋转餐厅。他从未进去过，只是在外面瞠目结舌地望着大楼高耸的轮廓与天际线——另外还有一座高达一百零五层楼的金字塔正在兴建中，一旦完成应该会是亚洲最大的饭店。俊相提到了平壤地铁，它位于地下一百码（约九十五公尺），车站装饰着枝形吊灯与镀金的金日成镶嵌图案。

回到平壤，俊相到一家外币商店用日圆为美兰买了一只发夹，这只发夹的形状象只蝴蝶，上头装饰了一排排方形莱茵石。对美兰来说，这只发夹是如此精巧而充满异国风味，她这辈子从未拥有如此美丽的东西。她并未戴上它，因为不想让母亲起疑。美兰将发夹藏起来，收在内衣之中。

俊相在平壤的体验，使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她在聆听时很难不产生欣羡的念头。美兰在高中是最后一年，她担心自己受到的教育将到此为止。她看到自己的姊姊们因为父亲的背景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姊姊甚至需要教育局同意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在三个姊姊中，只有大姊继续上大学，即使如此，她仍不许选填表演艺术科系。最后她读的是体育系，而且中途就休学结婚。

美兰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一目了然。她看到自己往后的人生就像一条笔直单调的道路——在工厂工作、结婚（很有可能是嫁给工厂的同事）、生孩子、年老、死亡。当俊相聊着他的大学室友时，她越来越感到难过。俊相察觉到她的沮丧，于是小心地探问，直到最后她告诉他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找不到人生目标”，她说。

俊相若有所思地听着。他回到平壤的几个星期后，寄了封信给美兰。

“事情会改变的”，俊相写道：“如果你希望人生有所不同，那么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实现梦想。”

美兰日后提到，是俊相的鼓励改变她的一生。美兰曾经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到了高中她就放弃努力。如果她的路注定走不通，那么努力还有什么用呢？但现在俊相的企图心感染了她。美兰开始努力用功。她央求母亲让她少做一点家务，好让她多一点时间念书。她请求老师允许她参加大学资格考试。只要有机会考试，就算考不上，她也没有遗憾。

另美兰惊讶的是，她居然获准进入师范学院就读。金正淑师范学院——根据金正日母亲姓名命名——是清津三所师院中最好的一所。她的姊姊们都失败了，为什么唯独她如此幸运？美兰自己也感到不解，虽然她的功课不错，但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她想，一定有许多来自成分更好家庭的女学生，成绩至少跟她一样好，也抢着要几斤这所学院。

一九九一年秋天，她搬离原来的家住进大学宿舍。这所师院位于浦港区的闹区，对面是博物馆，位于公园之后，刚好面对着金日成铜像的背面。

美兰抵达的第一天，就对这所学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宿舍是现代建筑，四个女孩住一间寝室，每个人一张床，而不是象韩国的床席一样铺在加热的地板上——这种传统的夜间暖气设施反而能消耗较少的燃料。当清津的冬季气温下降到冰点时，美兰才恍然大悟学校为什么愿意让她入学。宿舍没有暖气。她每晚穿着外套、厚袜子与连指手套，头上包着毛巾睡觉。早上醒来，她呼吸的气息冻成了霜，固结在毛巾上。女学生在浴室清洗卫生布（当时没有人有卫生棉，家境比较富裕的女孩使用纱布绷带，穷困的女孩则使用便宜的合成布料），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卫生布洗完晾不到几分钟就结冻了。美兰讨厌早晨。与俊相的学校一样，这些师院女生早上六点被叫起来早点名，但她们不需要象骄傲的士兵一样踏步前进，而是一边发抖一边走进浴室，用冰水冲她们的脸，她们的上方则是挂着壮观的结冻卫生布。

学生餐厅的伙食更糟。北韩此时正推行所谓的“让我们一天吃两餐”运动，但学校则是更进一步，一天只供应一餐——用盐、水与干芜菁叶煮的清汤。餐厅有时会多加一匙白米与玉米，熬煮数小时好让谷物膨胀变大。师院的女生有人开始染病。美兰的一名室友因为营养不良，脸上出现脱皮。她决定休学，而其他人也逐渐跟进。

美兰这才意识到，过去她因为有个勤勉的母亲，所以才能免于受经济危机之苦。她摆脱母亲从家里寄一点粮食过来，但过了一年，她还是受不了。美兰不愿放弃辛苦争来的教育机会，于是她向学校请求准许她住在校外。她平常睡在学校附近亲戚家的地板上，周末时返回父母的住处。这种做法一般是不被允许的，不过校方对于能少一张嘴吃饭似乎感到落得轻松。

俊相在平壤的生活显然好很多。政府优先提供粮食与医疗给最菁英的学生，希望这些未来的科学家能让北韩脱离贫困。俊相还是一样，每日三餐跟着队伍踏步走向学生餐厅。他们的宿舍夜间提供暖气，电力也持续供应一边天黑之后他们能继续念书。

俊相只能在放假返家时才能与美兰见面，大学每年有暑假与寒假，此外还有让学生除草预备播种的春假。过去，平壤学生是在首都外围执行这项职责，但随着粮食短缺，当局决定让学生返乡，由他们的母亲来喂饱他们。俊相原本很不喜

欢下田当“志工”，现在他则计算着何时才能从学校返家。这种渴望对他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体验，因为从有记忆以来他只是专注于书本与研究。“我很想放下一切回家见她。我第一次体会到感情是什么”，日后他提到这段时期时说了这些话。

一九九三年秋天，俊相的妹妹结婚。虽然父母告诉他不要中断学业，但俊相认为这是个完美的藉口可以回家给美兰一个惊喜。他向学校请了三天假。在这个时期，北上火车由于缺电的缘故，班次不多。即使有人设法弄到车票，也很难有机会得到座位，除非乘客的身份是党的高阶官员。火车站总是挤满等待的旅客。他们会深夜露宿车站，蹲坐在地上抽烟，直到火车抵达为止。然后他们会一拥而上，不是从已破掉的车窗爬进去，就是让自己吊挂在两节车厢之间。

俊相买不到火车票，所以他只能在火车站等待搭顺风车的机会。一天后，他注意到北上铁道停了一列货车。他送货车司机一包香烟，探听到这班列车即将开往清津的消息。于是他爬上装煤的货车，用毛巾将自己的脸包起来保护双眼。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打上货运列车的便车。

清津的前一站是镜城，这里离美兰的村子不远。俊相跳下火车，直奔她家。这时是早上，正是艳阳高照的时刻，他们通常不会选在白天见面，但俊相可等不下去。他无法忍受还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她。当天是星期日，他想美兰一定已经从学校返家。这是秘密约会以来，俊相首次走到她家门口。

门一打开，美兰的母亲倒抽了一口气。

俊相的脸就跟他的衣服一样沾满黑色煤灰。美兰的母亲因为俊相好几次跟着邻居一起进来看电视，所以认识他，但现在她完全认不出眼前这个人是谁。无论如何，美兰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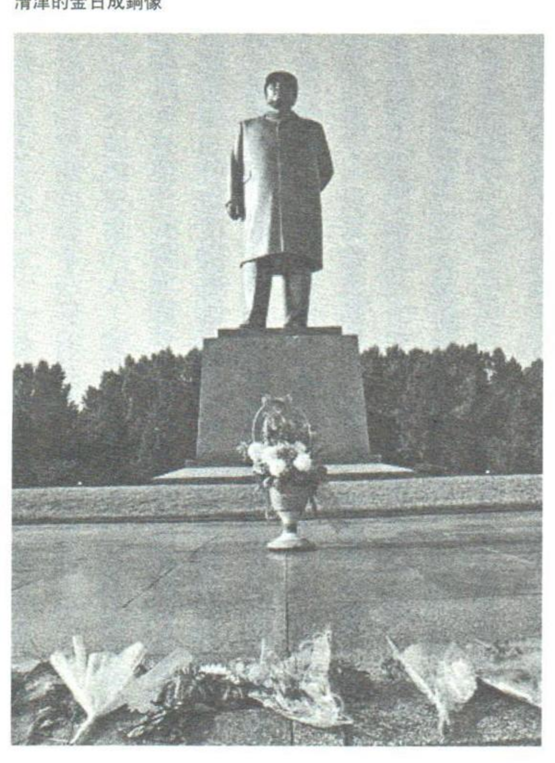
“有个怪人来找你”，美兰母亲后来这么跟她说：“你在哪里交的怪朋友。”

他们还有过几次惊险的时刻。俊相的父亲对于儿子特别为了妹妹的婚礼向学校请假很不高兴，而且怀疑他别有用心。俊相甚至大胆地利用美兰的母亲外出、父亲在矿场值夜班的时候到她家去。但美兰的父亲居然提早回来，俊相只好先躲起来等待恰当的时机。

后来，俊相与美兰想到这些事就可以连笑好几个钟头。显然他们对于欺骗父母这种事乐在其中。秘密不仅必要，而且有趣。它虽然带来违法的恐惧，却也让他们在这个毫无隐私的社会里拥有一块共同的心理空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处处受限的或的一项无害反叛。

他们有更多的欢笑，也有更多的话题。日后，当他们年纪渐长而且生活在比较舒适而安全的环境时，回首当时交往的岁月，反而觉得那是他们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们沉浸在两人的小世界里，浑然不知周遭起了什么变化。

清津的金日成銅像



第六章

上帝的黄昏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兰只差一次考试就能取得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在此之前，她已被分派到清津闹区的一所幼稚园担任实习老师。七月九日中午，孩子们都回家吃中饭了，美兰正在整理教室。当她准备到休息室和其他老师共进午餐时，突然听见走廊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走出教室，才发现有个小女孩跑回学校来。小女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头发扎成一束的马尾也汗湿了，只见她激动地兀自说着，老师们全听不懂她说了什么。

“他死了，他死了”，小女孩一边急促地喘气，一边大声地说。

“你说什么？”一名老师问。

“大元帅死了!”

只有金日成才会被称为大元帅。老师们都吓了一跳，无论是谁，哪怕是一个孩子，说出这样的话都令人感到吃惊。但在幼稚园，孩子早被教导不许开领袖的玩笑。老师们手扶着小女孩的肩膀，要她冷静下来。她显得有点换气过度了。

“这可是对共产主义不敬呦”，一名老师斥责说道。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在家里的电视看到的”，小女孩非常肯定地说。

老师们还是不相信她。她们很清楚五岁的孩子其实挺会编故事的。此外，电视新闻通常下午五点才开始。但她们还是感到焦虑，决定求证一下，即使可能因此耽误了午餐时间。学校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于是她们到园外看看。小女孩兴奋地领着老师们往她家走去，大概走了几个街区。她们沿着楼梯上去，看见一群人冲到电视机前面。美兰试着要挤进去。她听不见电视机的声音，只看见旁人的脸孔显得格外浮肿而苍白。人群里音乐传出呜咽的声音，而后逐渐扩大成有韵律的啜泣。打开窗户，街上尽是一片哀戚，昨夜的雷雨异常猛烈，路面到这个后都还是湿的。

美兰呆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她是个受训的学校老师，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她知道人是血肉之躯，终有一天将归于尘土。但她心想，金日成并非凡人。如果大元帅会死，那么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所有北韩民众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与正在做什么。数年来与北韩人的访谈经验，使我学到要提这样的问题：“当年这道这件事的时候，人在哪里？”这些受访者无论有多健忘或者多固执，只要听到这个问题，精神全为之一振。压抑着九十年代创伤以及的人，会突然极为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他们当天的作息。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强大的震撼把寻常的时间法则与意识全冻结住了。

金日成去世前一年，北韩正面临着韩战结束以来最混乱的一年。不仅经济沉疴难治，连中俄两国也与在首尔的敌人唱和。此时的北韩正急速成为国际眼中的流氓国家。在充满干劲的美国新任总统克林顿怂恿下，联合国要求北韩开放并且

接受核设施检查。一九九三年三月，北韩宣布，为了发展核武，它将推出《核不扩散条约》，此举掀起了冷战后的第一波核子恐慌。一九九四年，北韩开始从宁边（位于平壤北方四十五英里的核子园区）的核反应炉中提炼钸，美国五角大厦于是开始草拟先制攻击计划。北韩的回应则是警告“战争即将爆发”。平壤方面的谈判者甚至提出依据恶名昭彰的威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

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抵达平壤，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卡特得到金日成的首肯，愿意签订冻结核子计划的暂时性协议来换取能源援助。卡特也向南韩总统金泳三转达金日成的邀请，希望他能访问平壤。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韩领袖高峰会预订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举行。

七月六日，金日成前往平壤北方一处专门用来接待国外贵宾的别墅视察，他打算在这里招待他的南韩客人。他顺便到附近的集体农场“莅临指导”。这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将近华氏一百度（摄氏三十八度）。晚餐过后，金日成突然心脏病发，情况十分危急。几个小时过后，金日成去世了。而他的死讯延迟了三十四小时才对外宣布。虽然早在二十年前金正日已被指定为继承人，但平壤方面仍需要时间为共产世界首位世袭继承者做准备。

金日成享年八十二岁，这岁数远超过他那一代韩国人的预期寿命。他的脖子上长了一颗高尔夫球般大小显而易见的甲状腺肿瘤。除了北韩民众，谁都看得出来金日成来日无多，但从来没有人公开讨论他的健康退化情形。他不只是北韩人民的父亲，也是他们的华盛顿，他们的毛泽东，他是他们的上帝。

宋太太在家为自己与丈夫准备午餐。她的工厂已经关闭，长博也因为很少领到薪水而减少待在广播站的时间。他在客厅等待电视新闻开始。他们听说中午会有新闻快报，心想大概与正在进行的核武协商有关。上次的新闻快报是在一个月前，当时北韩宣布它将不再与国际原子能总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合作。长博身为新闻记者，对于这场外交争端的发展极为关心。相反地，宋太太则对核武谈判毫无兴趣。她只关心眼前的事，例如，怎么煮玉米粥才会更好吃。突然间，她听到她的丈夫弹指头的声音。

“出事！要出大事了！”，他大叫。

宋太太从厨房与客厅的送菜口探出头来。她马上瞧出事情不对劲。电视主播穿上丧服，一身黑色西装与黑色领带。她用毛巾擦干手，然后到客厅看电视。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会议与政务院以最深切的哀恸向全国人民报告，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于凌晨二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们敬如慈父的领袖，他毕生致力人民群众的独立，毫不懈怠精力充沛地献身祖国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持续为国家的再统一与世界的独立而奋斗，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我们最深切的哀恸下离开了我们。

宋太太脑子一片空白。她觉得有股电流窜流全身，仿佛行刑者刚办下了电门开关。这种感觉几年前也曾经发生过，那是她得知母亲去世之时，但母亲的死是预料中的事。宋太太从未听说金日成有什么疾病；只不过三个星期之前的事，他们还看见这位从各方面来看都相当硬朗的政治家与卡特会谈。这不是真的。她试着聚精会神聆听新闻主播的报导，他的嘴巴仍不断在动，但说出来的话却令人无法理解。着一定是骗人的，她开始放声大哭......

“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大元帅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她声音颤抖地说。

她的丈夫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坐着，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宋太太静不下来，她因为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而心跳加快。她冲下楼，跑到大楼的庭院。许多邻居也聚集在那里。她们跪下来，把头一股劲儿往地上猛磕。她们嚎哭的声音宛如汽笛声般划破了宁静的空气。

宋太太的大女儿玉熙在婚后便辞去了建设公司宣传部的工作，但她经常被叫去为街坊邻居从事“自愿性的”戏剧演出。她原本受的训练是广播员，透过宣传车上的扩音器激励工人完成她们的进度，而她清脆带有权威的声音也广受肯定。玉熙无法拒绝地方警察的要求，他们希望玉熙能朗读剧本来激励民众合作。她一本正经地朗读这些句子，例如，“让我们抓住更多匪谍来保卫祖国”与“犯罪就要承认”。

预演后，玉熙托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煮午饭。她注意到街上空荡荡的。她与丈夫（现在又回到清津）还有两名子女住在繁忙的清津火车站斜对角的公寓里。

玉熙走上楼，原本以为丈夫在家，意外地门却是锁上的。另一间住房传来电视声，她走近情情推开门往里头窥探。她的丈夫与他们的邻居跪坐在地上。他红了眼眶，但这一次他没有喝醉。

“嘿，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中午会播新闻？”玉熙问。

“闭嘴，你自己不会看”，她丈夫吼道。为了补触犯他的火爆脾气，玉熙只得乖乖听话。

房间里每个人都只流泪——每个人，也就是说，除了玉熙之外。她觉得内心一片空白，不是悲伤，也不是快乐，或许是有点烦躁。她什么也没法想，她只在乎自己正在哀嚎的肚子。“也许金日成是死了”，她心想。“但我还没死，我得吃点东西。”玉熙尽可能坐着不动，避免引起注意，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站起来准备离开。

“好了，我要回家准备午饭了”，她对丈夫说。

他对她投以嫌恶的眼光。虽然永秀因为酗酒与性格不佳而无法加入劳动党，

但他仍幻想自己已是资深官员，认为自己应该作为旁人的表率。他喜欢指导与训斥。在家里，永秀是唯一擦拭金氏父子肖像的人。玉熙不想管这种事。现在，妻子对于领袖的死无动于衷，他感到怒不可遏。当玉熙离开房间时，他恨恨的说：“你不是人。”

玉熙回家煮午饭，她扭开收音机，一边吃午饭一边听广播。播音员已经谈起继承的事。

只要我们亲爱的金正日同志，伟大领袖的唯一继承人，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的革命终将获得胜利。

当玉熙肚子坐在家里，金日成去世的巨大震撼逐渐消散的无影无踪；希望他的死能改变北韩政权的美梦，很快就破碎了。权力将移交给他的儿子。情况不会变得更好。玉熙的脑子里反复响起父亲所说的话：“儿子比父亲还坏。“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她自言自语地说。

只在这个时候，自怜的泪水才盈满她的眼眶。

金赫，那个在果园偷梨子的男孩，金日成去世时他十二岁。此时的金赫正就读清津马伦中学一年级。金日成死讯公布前的早晨，他正挣扎着要不要去上学。他有一堆理由让他不想上学，家里没有足够的粮食让他带便当上学是其中之一。金赫绝大多数时间一直看着窗外，心想如果自己能出去找东西吃就好了。他可以再去镜城郡的果园或玉米田，或者是去偷火车站附近小贩卖的食物。昨天他就已经逃课了，再前一天也是。金赫害怕回学校，因为老师一定会因为他连翘两天课而痛打他一顿。他已经迟到几个钟头，而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慢，想着是否该转身回家。

当金赫看到他的朋友们雀跃着走出校门时，他喜形于色。原来老师要他们回家收听中午的新闻快报。

“唔耶！不用上课!”，金赫一面欢呼，一面跟朋友跑离学校。

他们奔向市场，心想也许可以向店家央求或偷点食物。然而当他们抵达时，所有摊商店铺全都打烊了，整个市场冷冷清清。他们只看到零星几个人，这些人都头低低的哭丧着脸。刹时间，金赫完全失去了玩兴。

在平壤，俊相正享受一个慵懒的星期六早晨。他靠着床，书本放在膝盖上，在大学里坐着他最喜爱的消遣。如果是在家里，他的父亲绝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说这会损害他的视力。俊相只穿了一件 T 恤衫与短裤，在大清早，即使打开窗户还是让人感到闷热。这时一名室友进来打断了俊相，他通知所有学生中午要在操场集合，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宣布。

俊相不悦地起身，穿上裤子。跟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这则快报与核武危机有关。他必须承认他很紧张。尽管有卡特的来访，俊相仍深信他的祖国正与美国走向对峙的局面。几个月前，大学里所有学生被要求在自己的手指山割一道伤口，用自己的血在请愿书上签字，宣誓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加入朝鲜人民军。当然，所有的学生都要照做，只有少数几个女孩子对于割破自己的手指畏惧不前。现在俊相就算不用害怕回丧失生命，他也要担心自己的大学学业是否将因此而中断。

“错不了，我们肯定要打仗了”，俊相一边说着一边跟着队伍踏步走向操场。

操场上，将近三千米大学生与教职员根据学年、科系与宿舍列队站好。正午是太阳发威的时候，穿着短袖制服的学生们全汗流浃背。接着扩音器传来女性广播员颤抖而悲伤的嗓音，期间还夹杂着轰隆轰隆的声响。这些扩音器年度久远，播放过程的沙沙声让俊相无法听懂播放的内容。但他听到了几个字——“去世”与“疾病”——然后从周遭人群传来的低语明白了意思。惊愕与哀戚此起彼落。有个学生瘫软在地，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三千多名学生一个接一个地瘫坐在灼热的地上，把头埋进手里。

俊相也坐下了，出自之外，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把头放低，不让人看出他脸上的困惑，而他只是聆听旁人呜咽的韵律。俊相偷偷朝着极度悲伤的同学瞟了一眼。他对于自己是唯一未哭泣的人感到诧异。令他困窘的是，他经常在电影或小说的末尾流泪不止，因此成了他弟弟的笑柄，他的父亲也批评他，说他“象女孩一样软弱”。俊相揉揉自己的双眼，只想确认一下。他的眼睛是干的，他没有哭。他到底怎么了？金日成死了难道他一点也不难过吗？他不爱金日成吗？

俊相已是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他当然有理由怀疑一切权威，包括北韩政府。他对于自己的质疑能力感到自豪。但他不认为自己具有煽动性或者是国家的敌人。俊相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至少相信无论共产主义有什么缺点，都比资本主义来得平等与人道。他曾经想象自己最后会加入劳动党，而且毕生投入于改善祖国的工作。而人们对于最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是如此期望。

现在，被包围在一群啜泣的学生当中，俊相感到纳闷：如果其他人这么敬爱金日成而他不是，他要如何融入人群之中？他曾经超然的思索自己的反应（或者说毫无反应），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他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冷漠，使他完全孤立。俊相一直以为自己在大学交了几名好友，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他们。当然，他们也不了解他，要是真了解的话，他就有麻烦了。

俊相领悟这点之后，很快又得出另一项重大的结论：他的未来完全仰赖他有没有本事哭泣。这个只牵涉他的事业余入党，甚至还攸关他的性命安危。这是生死大事，俊相感到毛骨悚然。

起初，俊相低着头，以免别人看到他的眼睛。后来他发现如果一直忍着不闭眼，久而久之眼睛就会发疼，然后就会流泪。这仿佛是比赛谁最能坚持不眨眼。凝视。流泪。凝视。流泪。最后，流泪成了机械反应。身体比心灵先做出动作，

突然间，俊相真的哭了。他跪倒在地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后摇晃，就跟其他人一样痛哭呜咽。没有人比他更聪明了。

金日成的死讯宣布后数小时，北韩各地民众全聚集到金日成铜像前表达哀悼之意。根据最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北韩境内伟大领袖的铜像攻击有三万四千余座，每一座都有忠诚的民众悲伤哭倒在地。民众不想一个人独自悲伤。他们冲出家门，蜂拥到铜像前面，这里通常也是城市的精神中心。

清津大约有五十万居民，却只有一座位于浦港广场高二十五英尺（约七点六公尺）的金日成铜像。民众涌入广阔的广场，容纳不下的只好往铜像东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前方草坪走去。群众一直延伸到宽阔的一号道路，然后一路蔓延到咸镜北道戏剧院。他们朝临近街道不断延伸出去，宛如车轮的轮幅。如果高空俯瞰，民众看起来就像一列列川流不息的蚂蚁不断朝相同的目标前进。

歇斯底里与群众产生致命的结合。人们开始向前推挤，他们撞到了那些排队的民众，把哭道的哀悼者踩在脚下，连仔细修剪的树篱也被踏平。在几个街区之外，广场的噪杂声经由潮湿的空气传了过来，听起来宛如一场暴动。天气也阴晴不定，有时倾盆大雨，有时异常炎热。然而戴帽与打伞都不被允许。若热的阳光直接照射民众的头顶，潮湿的人行道让街道成了浑浊的蒸汽浴场。群众融化在泪水与汗水的海洋中。许多人晕倒。第一天过后，警方试图以绳索隔开群众来控制场面。

许多哀悼者是被工作单位与学校动员来的。每个团体必须带花，通常是菊花，这是亚洲传统用来服丧的花朵，如果买不起花，摘野花也行。他们排成行列，每个排面有十到二十五人，一排排地向前凭吊，仿佛一波波向前的海浪。有些人累到连身子都站不直，只好与旁边的人勾起手肘，彼此支撑着。等轮到他们的时候，边趋前到离开铜像数英尺的地方跪倒在地，不断地磕头，然后抬头以京味的眼神看着铜像。金日成的巨大身影耸立在他们面前，充塞了整个视野，他的头有三层楼高，挺立的松树也无法遮蔽他的脸孔，光是他的双腿就已超过一个人的身躯。这些跪倒在脚边的哀悼者直接对着铜像说话，仿佛金日成尚在人世。

“Abogi, Abogi”，一群老妇人哭喊着，这是韩文中的尊敬语，用来称呼父亲或上帝。

“你怎么能突然丢下我们不管？”另一群男人紧挨着嚎哭。

排队的民众不断跳脚，猛搥自己的头，夸张地瘫软在地上，撕扯自己的衣服，无望地挥舞拳头发泄怒气，无论男人或女人，全都痛哭流涕。

这场哭戏逐渐演变成一场竞赛。谁哭得最大声？谁悲伤到精神错乱？电视新闻更是助长了哀悼者的气势，媒体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民众痛哭的画面，满脸泪水的成年人一头撞向树干，船员用头敲着船桅，飞行员在机舱里哭泣等等。这些场景之间穿插着打雷闪电与狂风暴雨的镜头，宛如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的国家陷入朝鲜民族五千年来最深沉的悲痛之中”，平壤电视播报员以庄重而平缓的语调表示。

北韩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开始虚构一些怪力乱神的故事，甚至说金日成不是真的死了。金日成去世不久，北韩政府在全国各店力气了三千两百座方尖塔，称为“永生塔”。金日成将是共和国永远的主席。一出宣传影片甚至宣称，只要民众哭得够伤心，金日成就能复活。

大元帅去世那一刻，数千只祥鹤从天而降准备将他带走。然而这些鸟儿看到北韩人民披头散发、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的样子，又不忍心将他带走了。

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在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

美兰在十天国丧期间，每天要去铜像凭吊两次，一次是带着幼稚园孩子去，另一次是跟着老师们一起去。她开始对这份差事感到恐惧，她不只要表现悲伤，她还要保护这些脆弱得孩子不受践踏，而且不能让他们太歇斯底里。在她班上有一名五岁小女孩，她哭的十分用力，充分证明她的哀痛，美兰却担心她会体力不支。但之后美兰发现这名女孩偷偷把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脸上一抹。原来那不是真的泪水。

“我妈告诉我，如果我没哭，我就是个坏孩子”，女孩坦白的说。

清津一名著名的女演员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利的状况，无论她怎么努力，就是挤不出眼泪来。这不仅使她在政治上面临风险，职业上也是。“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眼泪必须随传随到”，几年后这名女演员金慧英在首尔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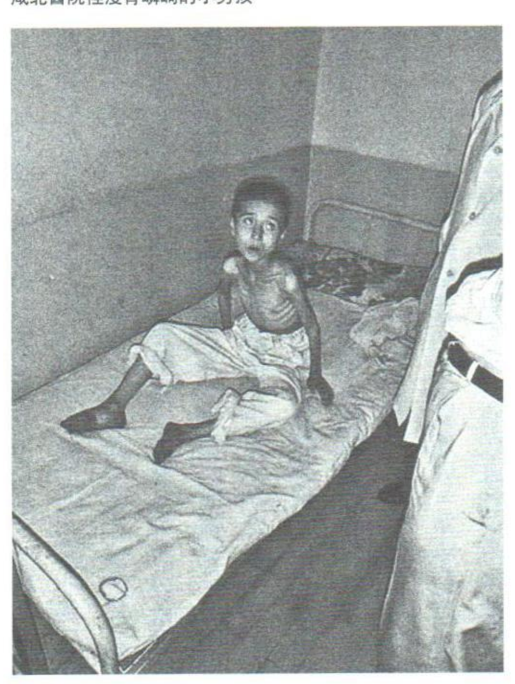
金赫与同学们经常跑到铜像前面，因为他们只要一鞠躬就能拿到黏呼呼的米糕。行礼致意之后，他们随即跑到队伍后面重新排队拿米糕。

数百万北韩人民参与了这场哀悼金日成的大戏，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装出来的？他们是为了伟大领袖而哭，还是为自己而哭？或者是因为别人哭了，所以自己也必须跟着哭？如果群众行为的学者曾告诉我们什么——从研究萨勒姆猎巫（Salem witch hunts）的历史学者，到《离奇的大众妄想与群众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部经典的作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那就是歇斯底里是会传染的。处于哭泣的群众之中，唯一自然的人性反应就是跟着哭泣。

许多民众的确对金日成的趋势深感哀痛，这一点不容置疑。无论是处于惊吓还是悲伤，许多北韩老人在这段国丧期间出现心脏病与中风症状，其数量之多，

甚至直接造成死亡率的急速增加。许多人以自杀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悲痛。这些人从屋顶一跃而下，这是北韩民众最常采取的自杀方式，因为当地缺乏安眠药，而枪支只有军方才能拥有。还有一些人是绝食而死。金智恩医师的父亲就是如此，而金医师当时是清津市立医院的小儿科医师。

咸北醫院裡瘦骨嶙峋的小男孩



第七章

酒瓶当点滴

金日成去世时，清津已经没有汽油提供寥寥无几的救护车使用，病患必须被人背着或是放在木头推车上送进医院。金智恩在一家小型的医院工作，因为这家医院离浦港广场最近，走路大约只要十五分钟，所以那些在铜像前的骚动中受伤或崩溃的人全都过来了，让这家原本就小的医院更是人满为患。每张金属病床上都躺了病人，五张床挤在一个小房间，还有更多人坐在木头长椅上或在昏暗的走廊就地躺下，等着轮到自己。白天院内几乎很少开灯，因为电力不分昼夜全被用来维持金日成铜像的照明。由于伤寒疫情爆发，这个夏天本来就忙碌异常，而伟大领袖的死又带来更多的心脏病发作与中风患者。在小儿科，父母带着瘫软无力的孩子前来，这些孩子都是在高温下啼哭而严重脱水，有些甚至出现痉挛现象。金医师的工作时间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八点，不过最近这些日子她几乎整天都待在医院，只有为了到金日成铜像前表达哀悼时，她才敢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如此，她从未抱怨工时过长。金医师相当严肃地看待自己行医的誓约。何况辛苦工作能让她暂时忘却人声即将崩解的警兆。

二十八岁的金医师是这家医院最年轻的医师，肯定也是个子最小的。她穿上高跟鞋不过四尺十一寸（一百五十公分），只比她的青少年病患高一点，体重也不到一百磅（四十五公斤）。金医师有着微弓略撅的红唇和心形脸蛋，给人纤细柔弱的错觉。或许是为了弥补这点，她总是摆出严肃的态度。而她的同事，尤其是男性同事，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她。他们虽然认为金医师很难相处，但都同意她是个好医师。她总是比其它医师更愿意承担不支薪的额外排班。下班后，金医师还要到劳动党秘书处工作。就跟北韩其它机构一样，医院也设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的工作是确保工作场所的意识形态健康，与挑选适当的工作同仁入党。虽然医院里每四名医师只有一名能获准入党，金医师却确信自己绝对会被选中。其中一个理由是女性比较容易获准入党，因为女性绝大多数不喝酒，而且一般来说比较守规矩。其次是金医师充满几率与不苟言笑的性格，未来也会是个尽心尽力的党员。她对北韩政府的奉献与热爱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她自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

在中韩交接的图门江和鸭绿江两岸，数十年来都有移民来回迁徙，使得东北三省里纯正的韩国人口众多。金医师的父亲出生于边界附近一个说韩语的村落。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还是年轻人的他为了逃离毛泽东可怕的“大跃进”（这场灾难造成数百万人死于饥荒）而移往北韩。金医师的父亲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真正的继承人补时毛泽东而是金日成，只有金日成能实现平等与正义的承诺，让像他这样的工人阶级抬起头来。金医师的父亲是一名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建筑工人，但他的才智努力在北韩受到肯定，因此得以加入朝鲜劳动党。他当过那个建筑小队里的党委书记，直到几年前的一场轻微中风迫使他提前退休。没有儿子的他，一生的抱负就是让女儿继续他对党的工作，为他全心拥戴的祖国奉献心力。

未来的金医师带着满腔热情接受了。她七岁时成为少年先锋队的成员，开信地在脖子上系上代表先锋队的亮红色领巾。十三岁，她今生成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并且骄傲地别上金日成襟章。获准加入青年联盟是每个北韩人成长必经的历程，但一个孩子在十三、十四或十五岁的时候获准假如，必须要有良好的行为与优秀的成绩。从小学上课第一天开始，金智恩就是个早熟的学生。她写的字工整漂亮，老是发问时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更是全校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学校上岛一半，她就被甄选到医学院念书。即使她曾梦想成为一名老师或记者，身为建筑工人的女儿能被选去当医师就算最大的荣耀。

金智恩就读清津大学医学院时才十六岁，比她的同学年轻两岁，这所学院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女性。当她完成七年学业，开始到咸镜北道二号人民医院实习时，还是一副少女模样。二号人民医院是清津大学医学院的分部，这所医院也是咸镜北道最具声望的医院。当地人称这所医院为“捷克医院”，因为在一九六〇年代，共产国家集团仍属于一个大家庭的时期，曾有一群接客斯洛伐克医师带着 X 光机与新生儿保温箱来到这家医院。金瓜捷克人已经离开，多数器材也被用胶带捆在一起，但民众仍认为二号人民医院拥有与欧洲同步的医疗水准。金智恩结束实习后，被分配到一家更小的医院担任全科医师，服务她区着的浦港区。

金医师早上七点半就必须去医院报到。医院规定她一天必须工作十二小时，诊疗至少三十二名病患。金医师通常早上待在医院，下午跟着一组团队外出。她穿着白袍，戴着一顶白帽盖住头发，看起来像是快餐店的厨子。她提着一口沉重的袋子，里头装了听诊器、针筒、绷带、肠胃药和抗生素。身为三位医生里的一员，她要拜访学校和住宅区，每个住宅都有各种的卫生所，这些大内与人民班密切合作。

“医师来了！医师来了!”叫声在公寓中回荡着。卫生所开始有人排队，并且让啼哭的婴孩优先看诊。他们已经准备好将等待了几个星期疼痛的双手或疹子给医生诊治。

北韩医师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 X 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捡漏的 X 光透视机，让病人暴露于高度辐射下：也因此使得不少老一辈的医师后来都得了白内障。医师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面积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患。金医师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集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韩医师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师还会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师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师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师去采集药草。这段时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没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称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几许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渺无人际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民众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

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也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治恶心。苍术属植物也算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无法取得抗生素的时候就靠它了。

多年来，北韩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辅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学业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源自中医，也就是用艾草针灸患部。由于缺乏麻醉药，对付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有效的时候很有效”，多年后，金医师这么跟我说。没效的时候呢？病人会被绑在手术台上，以免他们乱动。多数时候，北韩人在接受医疗时都很能忍痛。“他们才不像南韩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师说。

尽管有这么多缺点，北韩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给予民众远优于前共产士气的照顾。这种享受“全面性的免费医疗服务……改善劳动人民健康”的权利，实际上明文规定在北韩宪法上。金医师自豪于自己身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员，也对自己能提供病人医疗服务感到高兴。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北韩医疗体系的缺陷日益明显。许多医疗设备不是过时就是不堪使用，想换零件也没有办法，因为原本制造这些机器的共产集团国家的工厂都已私有化了。清津的药厂因为缺乏原料与电力而减产。北韩几乎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师巡回看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单，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共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取得药品。

一九九三年，金医师首次与医院管理单位发生严重冲突，令她极为灰心。当时她负责诊疗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这名男子犯了经济罪，也就是说他曾经从事私人买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三年后，从监狱转到了医院。这人被打的全身是伤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瘦得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还患有急性支气管炎。金医师想给他抗生素，却遭到长官驳回。

“他是罪犯，我们应该把抗生素留给其他人”，上级对金医师说。

金医师感到愤怒。“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来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可以救他。他没有抗生素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她严正的反驳。

她偏执的一面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金医师不能善罢甘休，她一连争论了数日。垂死的年轻人没有治疗就出院了。金医师每两天到他家一次，但这名病人的病情却日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他嚷着：“我不应该继续活下去。”不久就自杀了。金医师深信自己和医院要为他的死负责。她和上级之间的紧绷关系持续着，于是她主动申请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在此同时，金医师的私生活也一团糟。她的感情生活向来跟不上事业的成功，尤其是对工作的极度投入与完美主义使男人退避三舍。在她全职工作后一年，一个她从大学时期就心仪的对象抛弃了她，让她伤心欲绝。金医师要求朋友帮她介绍对象，并且在第二次约会时与他订婚。她的丈夫与她同年，都是二十六岁，但

他因为服兵役的缘故，仍在大学读一年级。由于金医师已经在工作，她想直到丈夫毕业为止，靠她的薪水应该足够两人生活。

“你会伤害他的自尊”，金医师的母亲警告她。女医师嫁给大学生？“男人不会喜欢女人赚的钱比他们多。”

结婚当晚，金医师就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她几乎立刻发觉有了身孕，因此无法离开。孩子出生后，她亲自为这个男婴哺乳了几个月，然后搬离丈夫住处，回到父母家。依照韩国传统，孩子必须待在婆家；一旦离婚，监护权也属于男方家人。

如果真是因为她的高薪破坏了这段婚姻，那么最终的屈辱则是薪水的停发。金医师原本一个月薪水是一百八十六朝鲜圆，根据官方汇率大约是八十美元，是一般劳动者的三倍。有了这笔钱，她可以支持她的丈夫与她已退休的父母，还可以帮忙已经结婚的妹妹。当薪水停发时，粮食配给也中断了。正是这段时期，她开始到集体果园偷梨，到乡野搜寻食物，有时也接受病患的馈赠——一袋面条或几穗玉蜀黍，但她纵使感到困窘而不自在。金医师知道有些医师会收取贿赂，实际上那些医疗应该是免费的；但她曾下定决心不要成为那样的人，但话说回来，她真的很饿。

金医师二十八岁时，早先人生的承诺已转变成失望。她离婚了，与父母同住。她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她比过去更努力工作，却比过去更得不到努力该有的回报。她又饿又累又穷，而且感情没有着落。

这些都是在金日成快过世的那年中，金医师所遇到的种种不幸。

与大多数北韩民众一样，金医师是从中午的特别广播得知金日成的死讯。当时她护送一名伤寒病人到一间特殊诊所，才刚回到医院。进入医院大厅，就看到医师、职员与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面哭泣。

金医师走了四十分钟回到位于市立体育场后面的自宅，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几乎看不清走在人行道上的双足。父亲在家睡觉。听到她的脚步声，于是坐直了身子。

“怎么了？你的病人过世了吗？”他惊慌地问。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对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深厚。

金医师倒在父亲怀里。她从来没有哭得这么伤心过，无论是男朋友抛弃了她，婚姻破裂与孩子被带走，还是她的父亲中风。这些全是人生可预期的挫折。即使金医师是一名医师，受过教育，了解人体的脆弱，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当他们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上彻夜工作时，会交换阴谋论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国军火贩子暗杀的，因为他们想破坏即将到来的两韩高峰会，届时金日成会跟南韩总统金泳三会面——北韩宣传政

策中反复出现的一点就是美国蓄意让朝鲜半岛分裂。

金日成刚去世那几天，金医师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由于处于震惊与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阵才发现，家里的危机已节节高升。她的父亲自从因病退休之后就陷入忧郁，伟大领袖的死对他更是个打击。他躺在床上，拒绝进食。

“如果金日成这么伟大的人都会死，那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他叫着。

金医师试着跟她的父亲讲道理。先是好言相劝，然后提高音量，最后连威胁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一起死好了。”她这么说。她的母亲也威胁要绝食。金医师还把医院的党委书记找来一起劝他。她也试着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让父亲维持体力。

金医师的父亲开始呓语。他先是赞美金日成，然后又辱骂他。一天他说自己是如此敬爱大元帅，没有大元帅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声说金日成的死证明北韩的体制完全失败。他要女儿从医院带纸回来，勉强撑起身子，潦草地写了张便条：

身为劳动党党员，我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我的长女继续我的工作。请指导她，让她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党员。

他把信交给金医师，要她转交给医院的党委书记。然后他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胡乱画了一个看似相当复杂的金字塔，每隔塔阶标示着姓名与数字，那个图怎么看都像是疯子的涂鸦。金医师以为父亲又神志不清了。

他示意金医师坐到他的身旁。他身体已经虚弱得只能轻声说话：“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你。”

那是一张族谱。金医师感到震惊。难不成父亲是在暗示她离开祖国，到中国去？这是逃离中国后处于对金日成的敬爱而亲自教导她读书的父亲会说的话吗？他会是叛徒吗？金医师第一个反应是撕毁它，但她无法毁掉父亲的遗言。于是她拿出一个收藏纪念品的小铁盒，上面有锁与钥匙，这是她少女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她把父亲的草图折好，锁进箱子里。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一体在做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所建立的共产党传统。北韩政府举办了为其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道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成的灵柩放在凯迪拉克车顶上巡回整座城市，后头跟着踢正步的士兵、军乐队、以及架有领袖肖像与花叶装饰的加长礼车车队。百辆车队行列从金日成广场出发，

行经金日成大学与市中心一百英尺（二十九点死公尺）高的金日成铜像（这是北韩最大的金日成铜像），最后停战革命门前，这个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只是更为巨大。次日有一场纪念仪式。正午十二时，全国各地警报声响起，车辆与船只鸣按喇叭，每个人立正默哀三分钟。国丧期终于结束。该是国家返回正轨的时候了。

金医师有许多机会藉由工作来忘记悲伤。她的父亲在金日成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去世，所以她晚上也不想回家，宁可长时间地工作。热浪尚未结束，始于下田的伤寒现在成了席卷各地的重大疫情。因为排水系统不佳，清津市很容易爆发疫情。排水系统是韩战后仓促重建而成，未处理过的粪便被冲入妇女用以洗衣的河川。随着电力断断续续，自来水也不太稳定。通常早上与下午会有一个小时的水电。民众在家里用大桶子储水（几乎没有人有浴缸），而这些水桶就成了细菌温床。没有人有肥皂。伤寒可以用抗生素轻易地加以治疗，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北韩几乎无法取得这种药品。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滞后，迎来了汉奸的寒冬，山区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五度（想到年关于摄氏负三十七度）。个年夏天出现暴雨，洪水淹没了农田。这让北韩政府有了不失面子的藉口，首次愿以公开承认国内粮食短缺。一九九五年下田，联合国赈灾小组获准进入北韩，他们得知水灾造成的损失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五百二十万灾民受害；九万六千三百四十八栋民宅被毁，五十万人无家可归；一百九十万吨的农作物损失。

在小儿科病房，金医师则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现奇怪的症状。在她治疗的孩子当中，凡是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出生的，体格都小的惊人，甚至比金医师自己读小学时的个子还小，她当时是班上最矮小的学生。这些孩子的上臂瘦到金医师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与大拇指就能轻易圈住。他们的肌肉软弱无力。这是肌肉耗损的症状，也就是身体在饥饿状态下会吃掉自身的肌肉组织。这些孩子因便秘而来看诊时，症状剧烈得让他们痛得大叫。

问题出在食物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塑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稻米成为主食，但人们不仅吃玉米，还吃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轴来充饥。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医院里，医师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给这些母亲一个烹饪上的建议。“如果你们要煮野草或树皮，就必须把这些东西磨得很细，然后煮久煮软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吃”，金医师告诉她们。

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与成人则是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新症状。病人的双手长出发亮的疹子，这些疹子要是长在锁骨附近，感觉就像戴了项链，要是长在眼睛周围，看起来如同戴了眼镜。这种症状有时被称为“眼镜病”。事实上这是糙皮症，主要是饮食中缺乏烟碱酸所引起，通常发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因为小感冒、咳嗽或腹泻而来看诊的孩子经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贫乏的

饮食降低了她们的抵抗力。就算医院有抗生素，她们的身体也虚弱得没办法服用。婴儿骨瘦如柴，他们的母亲自己也营养不良，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在这里，婴儿的配方奶根部不存在，连牛奶也很罕见。过去，奶水不够的母亲会用稀释的粥来喂孩子，现在她们连米也买不起。

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完全没有可诊断的症状，只显得有些抑郁。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或者有点发青，皮肤粗糙缺乏弹性。有时候肚子会鼓胀，但有时候又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么病，我就是无法让他们停止哭闹”，母亲们这名对金医师说。

她同情地点点头。她了解这个状况，却无法把话说出口。在没有粮食的状况下，你要如何告诉一名母亲，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点？

金医师会写下便笺，让这些孩子住院，虽然明知自己根本无法治疗他们。医院也没有食物。当她巡房时，经过小儿科病房，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即使当她转身时，她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眼睛盯着她的白袍，想着她是否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无能为力。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指责。即便是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点也帮不上”，多年后，金医师这么对我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

金医师成为一名医师的时间还不算长，她还没有在自己与病人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几年后，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些在她照护期间死亡的孩子时，她斩钉截铁的回答：“每个孩子我都记得。”

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步入熄灭的命运，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一旦自来水停止供应，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算一片阴暗，医师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弹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有能力制造静脉输液，但它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使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乐园”啤酒的空瓶。

“如果它们带一个空瓶，就可以吊一瓶点滴。带两个空瓶，就可以吊两瓶点滴”，金医师说。

“这种事很难堪，令人难以启齿，但我没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医院人去楼空。民众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韩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竞技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韩经济的缺乏效率。但北韩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好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因此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迹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韩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就是他的共产

主义美梦咽气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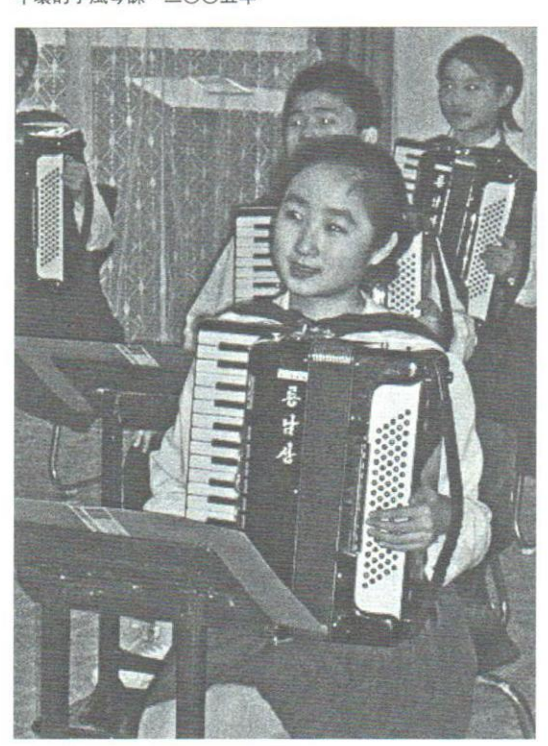
倒了一九九五年，北韩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一样静止如石。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韩的商品出口从二十亿美元掉到八亿美元。经济的崩溃具有一种有机性，仿佛一个生命体正缓慢丧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庞大工厂象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暖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次，两次，顶多三次——然后看着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扣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着空当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韩的多艘生锈渔船。宣告着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暗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韩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磺味已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料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烟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烟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平壤的手風琴課，二〇〇五年



第八章

手风琴与黑板

金日成的去世使美兰的毕业考顺延，她必须等到一九九四年秋天才能毕业。她的教师生涯开始的不是时候——或许在这种状况下，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如此。美兰急欲返家与父母同住，因为清津的粮食配给已经完全停止。她要求分发到离家近一点的学校工作，而她很幸运能被派到生气岭矿场附近的一所幼稚园，她的父亲就在这座矿场工作。这座往山丘内部挖掘的矿场，位于镜城通往清津的主要道路以北两英里处，整个矿区呈现出咖啡牛奶的颜色。父母对于美兰能够回家松了一口气，在家里，他们可以确保她不会挨饿受苦。在韩国，未婚子女（尤其是女孩）与父母同住是很普遍的事。美兰可以协助家务与陪伴父亲，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她的父亲几乎没去工作。他们的口琴式住宅空出了两个房间，她的两个姊姊已经嫁人，而她的弟弟正就读师范学院。

幼稚园离美兰家步行约四十五分钟，外表看起来几乎与她在清津实习的幼稚园一模一样。这家幼稚园位于一座单层水泥建筑物里，要不是外围的铁栏杆漆上色彩鲜艳的向日葵，否则整个园区让人感觉有点阴森。铁栏杆将整个幼稚园围绕起来，在入口处上方构成一道拱门，上面的标语写着："我们很幸福"。教室前方的操场上有木椅坏了的秋千、滑梯，以及攀爬架等几样老旧的游戏器材。每间教室里清一色的黑板上方挂起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肖像，低矮的双人座书桌是用木板制作而成的，边缘以铁架加以固定。教室另一边有个陈列了几本书的大书柜，但这些书几乎无法阅读，因为这都是在很久之前从原版书影印的，只能看到不同层次的灰色字影。这里的书本与纸张一直很稀少，积极的母亲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家也能念书，就必须亲手抄写教科书。

两家幼稚园的叉腰主要表现在学生身上。村子里的孩子一眼就可看出比城市的孩子穷。幼稚园生还不需要穿制服，所以这些孩子来学校时都穿着哥哥姊姊穿过的各种杂色旧衣。他们通常穿了好几层，因为学校几乎不提供暖气。美兰惊讶于这些孩子们衣物的破旧。她帮孩子们一件一件脱掉外套，知道看到他们的娇小身躯为止。她握住孩子们的手，他们的小瘦子攥起的拳头迷你的如同胡桃一般。这些孩子的年纪在五到六岁之间，但在美兰严重他们并不比三、四岁的小孩来得高大。她在清津实习时，学生大多是工厂工人或公务员的孩子，而这里全是矿工的孩子。美兰这才了解，虽然清津有粮食供应的问题，但矿工的粮食问题更是严重。过去，矿工有额外的粮食配给，一天九百公克的粮食多于一般工人的七百公克，用来奖励他们的辛苦劳动。现在，生气岭周遭的高岭土矿与煤矿整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关闭的，矿工的粮食配给也跟着取消。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学校主要是为了餐厅提供的免费午餐，但也只有加了盐与菜叶煮出来的清汤，就像她在大学宿舍吃的一样。

美兰对新工作仍充满了热情。当上教师，成为受过教育而有地位的阶级成员，对美兰这位矿工的女儿来说——更甭提她出身的家庭来自于社会最低的阶层—

—等于向上提升了一大步。每天早上，她迫不及待地起床，穿上清爽的白上衣，为了让衣服笔挺，她还刻意放在床席下压了一整夜。

学校从早上八点开始上课。美兰脸上堆起最自信的笑容，迎接排队依序走进教室的孩子。孩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定，美兰马上拿出她的手风琴。所有的老师都必须会弹手风琴，而手风琴也是美兰的毕业考科目。在北韩，手风琴被成为"人民的乐器"，因为无论是踏步走向建筑工地还是辛苦地在田里担任一日志工，手风琴都是便于随身携带的物品——没有任何乐器比得上用手风琴演奏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更能激励田里的农人或建筑工地的工人了。在教室里，老师经常演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这首歌的曲调平易，每个北韩孩子都会唱，就像《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

美兰在学生时代也曾唱过这首歌，而且歌词牢记于心：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

无庸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美兰没有姊姊美姬的音乐才能，即使是迷恋她的俊相，听到她的歌声也会退避三舍。然后她的小听众却没有那么挑剔。当美兰唱歌时，他们的小脸会朝向她，充满了生气与活力。孩子们喜爱美兰，她充满热情地教导他们，而孩子们也热情地予以回应。美兰与她的弟弟年纪相仿，所以姊弟的关系比较像是竞争者，而不是她可以教导使唤的对象，美兰对此总是感到缺憾。美兰喜爱这份工作，她对于教导的课程内容，从未停下来思索到底是对是错。她从未想过教育还有别的可能。

在一九七七年的《论社会主义教育》（Theses on Socialist Education）中，金日成写道："只有以健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为基础，人民的科学与科技教育以及体格锻炼才能成功。"由于美兰的学生还无法阅读伟大领袖的大量作品（金日成的姓名被冠在十余本著作上，金正日则是他父亲的两倍），所以她大声朗读摘录给孩子们听，并鼓励他们跟着她一起复诵关键词。可爱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童言童语地高声背诵金日成语录，总能引起打人轻声的或咧嘴的微笑。意识形态训练之后，接下来得课程是比较熟悉的科目，但亲爱的领袖从未离开孩子们的心灵。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以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上的几道题目为例：

"八名男孩与九名女孩唱歌赞美金日成。唱歌的孩子总共有多少人？"

"在反抗日本占领时期，一名女孩送信给我们的爱国部队。她把信放在装有

五颗苹果的篮子里，却在检查哨被日本士兵拦住。士兵偷了两颗苹果。请问还剩几颗苹果？”

“三名朝鲜人民军士兵杀死了三十名美军士兵。如果这三名士兵每人杀死的美军士兵数量一样，那么他们各杀了几名美军士兵？”

二零零三年出版的小学一年级初阶读本有一首诗，题为《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到了哪里？
我们到了森林。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翻过这座山岭。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要去杀日本兵。

音乐课教的一首歌曲是《射死美国杂碎》：

我们的敌人是美国杂碎
他们想占据我们的美丽祖国。
用我亲手制造的枪
我要射死他们。砰，砰，砰。

初阶读本故事里的孩子被毒打、被刺刀捅死、被泼强酸或被丢到井里，而迫害这些孩子的恶棍一定是基督教传教士、日本鬼子或美国帝国主义杂碎。在一本受欢迎的读本里，一名男孩因为拒绝帮美国士兵擦皮鞋而被活活踢死。插图里的美国士兵，鼻子被画成象啄木鸟一样，如果纳粹德国反犹卡通里的犹太人。

美兰听过许多韩战时美军的残暴恶行，但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的母亲还记得开车经过村子的美军士兵长得高大英挺。

“我们在后头追着他们”，母亲回忆说。

“在后头追着他们？你们不逃跑吗？”

“不，他们给我们口香糖”，母亲对她说。

“你是说，他们不想杀你们？”美兰听到母亲的故事时，感到不可思议。

上历史课时，老师带孩子们进行户外教学。规模较大的小学会另外腾出一个房间讲授伟大领袖的事迹，这个房间成为金日成研究室；矿区幼稚园的孩子们步行到镜城郡小学参观这件特别的房间。金日成研究室位于新建校舍的边间，房间干净、明亮而且乱起比学校其他地方更为充足，劳动党会定期抽查以确保校方维持此处的整洁。这件房间就像圣地一样，即使是幼稚园生也知道此处不许嬉笑、推挤或窃窃私语。他们安静地把脱下来的鞋子排列整齐，然后走近金日成的肖像，深深地三鞠躬，并且说：“父亲，谢谢你。”

房间中央摆着一个金日成的诞生地万景台的模型，外围用一个方形的玻璃罩

罩住。万景台是位于平壤郊区的一个村落。孩子们隔着玻璃看着迷你的茅草屋顶农舍，得知伟大领袖生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以及他来自一个爱国者与革命份子家庭。孩子们也被教导金日成在三一运动时曾高喊抗日口号——这场发生于一九一九的抗日暴动，当时金日成才七岁——还有他如何斥责富有的地主，小小年纪的他，在精神上已是一名共产党员。金日成十三岁时即离开家前去解放自己的国家，挂在房间墙面上的油画描绘出金日成抗日斗争的功绩。从北韩的角度来看，金日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将日本人击败。官方历史省略了他在苏联的时期以及史达林扶植他成为北韩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

要说这当中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金日成死后似乎变得比生前更伟大。平壤下令改变历法。北韩人不再使用以耶稣生卒年为准的西元纪年，而将现代的起始定于一九一二年，也就是金日成出生那年，以此推算，一九九六年要改成主体八十四年。金日成后来被成为“永远的主席”，虽然长眠于永生塔下设有空调设备的陵寝里，他的精神仍统治这个国家。金正日取得劳动党总书记与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后者是北韩最高职位。虽然无疑地金正日是国家元首，但他坚持不接受父亲留下的国家主席职位，充分显示他的孝心，而这也使他在父亲庇荫下（父亲比他来得更瘦尊敬也更受欢迎）能继续掌握权力。在一九九六年之前，金正日禁止竖立自己的铜像，反对挂上自己的肖像，而且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父亲死后，他的姿态似乎越来越高。就在金日成去世那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各级学校设立金正日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就跟他父亲的特殊房间一样，不同的是，房间中央的模型从万景台的小村落改成白头山，这座跨越中国玉北韩辩解的火山是金正日的诞生地，据说他出生时还出现双虹的吉兆。白头山是个好选择：韩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把这座山尊奉为神话人物檀君的出生地。檀君是天神与熊女之子，传说他于西元前二三三三年建立了第一个朝鲜王国。北韩无视苏联方面的记载，上面显示金正日其实出生于俄国远东的伯力附近，当时他的父亲正与红军一同作战。

要在北韩虚构历史与树立神话相当容易，要在一九九六年的北韩盖一栋建筑物反而困难。金正日研究室与他父亲的研究室相比必须毫不逊色，但在工厂停工的状况下，砖块、水泥、玻璃乃至于木材都供应缺乏，最难取得的原料是安装在窗户上的玻璃，因为清津的玻璃工厂已经关闭。这段期间如果窗户破了，只能用木板或塑料板来遮盖。唯一仍在制造玻璃的地方是一家位于南浦（一座濒临黄海的港口城市）的工厂，可是学校没有经费购买。镜城的学校想出了一个法子。学生和老师可以收集以镜城当地的高岭土制成著名陶器，然后带往南浦——此处以盐田著称，以永陶器换盐，然后卖盐获利，再用这笔收入购买玻璃。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计划，但没有人有更好的点子。他们接到指示，要以自身的资源进行这场全国性的金正日研究室兴建计划。校长希望老师与家长能参加这趟旅程。由于大家都认为美兰具有活力而且聪明，最重要得是她值得信赖，所以大家都希望由她来执行这项任务。

美兰从听到这趟旅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着手安排。她偷偷查阅了铁路线地图。如她所猜想的，南浦位于朝鲜半岛的另一边，在平壤的西南方。无论他们搭乘的是哪班列车，都会经过平壤，而且很可能在平壤郊区的总站点停靠，许多大学集中在这里。她将只离俊相的校园数英里远！

金日成死后，俊相与美兰的联络变得更不容易。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不自在却又愉快的尴尬阶段，现在可以轻松地于对方相处，而且满足于这段单纯的友谊。不过近年来原本需要几星期寄到的信件，却延长到几个月，甚至未能寄达。人们怀疑是铁道员工在寒冬中烧掉这些信件取暖。

俊相返乡间隔的时间越长。美兰痛恨自己只能在家守候，她希望听到敲门声响起，突如其来的造访，甚至是一封信等等任何可以显示他思念着她的证明都好。美兰不是个个性被动的人，她也想主动去找他，但是前往平壤的通行证出了名的难以取得。为了让平壤维持橱窗城市的外观，北韩政府对于进入平壤的民众加以限制。美兰知道有个邻居被迫从平壤搬来，因为他们有个儿子患有侏儒症。乡村居民要前往平壤只能以工作单位或学校为团体申请。美兰只去过首都一次，那是学校举办远足的时候。光凭她一个人要前往平壤是不可能拿到旅行许可证的。然而一旦她决定在火车站跳车，谁又能阻止得了呢？

同行者有五人——两名学生家长、校长、另一名老师和美兰。由于路况不佳，他们花了三天才到达南浦。当列车停止然后开动奔驰于铁道上时，美兰凝视窗外，陷入沉思，她要想个能单独行动的理由。她的同行者不久也察觉到了，为什么这名平常最有活力的老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

“喔，没什么，家里的问题”，美兰对他们说。这个小谎让她有个点子，然后一个谎言伴随另一个谎言。回程时，她先在平壤附近下车，亲戚会在火车站接她。她再自己搭下一班火车回清津。他们应该不会仔细询问，因为这是紧急而且私人得事情。

美兰的同伴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当她下火车时，他们尴尬地别过头去。他们认为美兰在平壤下车是为了向比较有钱的亲戚求助，可以理解。在清津，每个人都已一文不名，尤其是老师。他们已超过一年没领到薪水。

当火车在这返回清津的同时消失在铁轨的尽头时，美兰呆立在月台上。这是一座宛如洞穴般的车站，几乎没有照明，火车引擎排除的废气遮蔽了从屋顶透出的些许亮光。美兰从未独自旅行过，她几乎没有钱也没有适当文件，随身带的旅行文件清楚写明她只能在平壤转车。美兰看着成群下车的旅客排成狭长的行列穿过单一出口，旁边有警察监视。这里的检查比在清津严格得多，她先前的计划并没有考虑这点。如果被发现用不符资格的证件闯关的话，很有可能被捕，然后送到劳改营。就算是最好的状况，她也会失去教职——这将为已处于社会底层的家人添加一道黑色印记。

美兰缓慢沿着月台走着，想在烟雾中寻找另一个出口。她转头注意到一名穿

制服的男子正在看她。美兰继续往前走，然后再往后看了一眼。他还在看。美兰发现这个人一直跟着她。直到这个人走到她身边跟她说话，她才知道之所以一直盯着她，是因为受到她的吸引。而美兰发觉这个人身上穿的是铁路技师的制服而不是警察。他与美兰年龄相仿，有一张温和、值得信任的脸。她概略解释了自己的困境，但省略了男朋友的部分。

“我哥哥住在车站附近”，她脱口而出，虽然苦恼是真的，内容却是假的。“我想去找他，可是我忘了带文件。这里的检查很严格吗？”

这名铁路技师显然无法拒绝这名苦恼的女子。他护送美兰通过囤放货物的地方，从没有警察的货物出口出站，然后他问是否能再见到她。美兰潦草地写下假名与假地址。她感到良心不安。短短一天时间，她已经把一辈子的谎都说光了。

在大学前门，看守门口的学生以怀疑的眼神看着美兰，然后离开去找俊相。他要美兰在警卫室里坐着等候，虽然她有点不乐意。美兰感受到校内操场上有好奇的眼光正注视着她，她还是试着让自己镇定下来。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经过特意打扮，所以忍耐着不去整理自己的头发或上衣，因为炎热的关系，她的衣服似乎紧贴着皮肤。时值夏末，即使太阳已经隐没到校园建筑之后，天气还是相当闷热。她看着准备吃晚餐的年轻男子交错地从建筑物的阴影下走过。科学院名义上是男女合校，但女学生住在校园另一头，而且人数少到足以成为稀有动物。一名学生往警卫室里探头探脑，他取笑她：“所以他‘真’是你的哥哥？不是你的男朋友？”

这时天色几乎已经昏暗，她隐约看见俊相从操场走来，牵着一辆脚踏车，穿着 T 恤与运动裤——他显然没料到自己有访客。他的后方两者一盏操场安全灯，使他的脸孔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当他走近时，美兰只看到他颧骨的轮廓延伸成吃惊的笑容。俊相的手仍握着车把，他当然不可能上前拥抱美兰，但美兰一点也不怀疑他内心的激动。

俊相笑着说：“不不不，这不可能。”

美兰压抑着微笑说：“我只是刚好来这附近。”

美兰与俊相踩着同样谨慎的步伐走出校园，他们过去在清津外出散步返家时也是如此，刻意显示彼此生疏。美兰听见有些男生在背后窃窃私语与讪笑，但她和俊相毫不畏缩或回头；此事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才是上策。他们俩的事会在大学传开，而且可能辗转传到俊相父母耳里，最后可能连美兰的父母都会知道。俊相牵着的脚踏车摆在两人之间作为区隔，然而只要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美兰会挑上后置物架，端庄地侧坐着，让俊相骑车载她。当他们的车子消失在黑暗中时，美兰露初的上臂轻轻靠着俊相的背。这是他们交往以来最亲密的一次身体接触。

俊相惊讶于美兰的大胆，因为即使是他的亲人也未能取得旅行许可证来平壤

探望他。一个小时之前，有人告诉他，他的“妹妹”在前门等他时，俊相认为一定是搞错了。即便是最大胆的幻想，他也从来不敢想象美兰会来平壤。俊相过去一直想找出美兰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他，现在他懂了，因为她总是出人意表。一方面，她看起来就像少女一样天真，能力也不如他，但另一方面，她却有单子做出这种危险的事。他提醒自己绝不能小看她。那天晚上，当他们坐在树下的长椅，枝叶低垂，他伸出手臂搂着她的肩膀时，她并未拒绝。当晚第一次让人感受到些许秋意，俊相伸出手臂想让美兰暖和一些。他相信美兰一定会拨开他的手，当他们继续坐着，甜蜜地依偎在一起。

就这样，时间转眼过去。他们无所不谈，谈完了就起身散步，走累了就再找个地方坐着。即使在平壤，街灯也未开启，四周建筑物也没有灯光透出。就在像故乡一样，他们可以隐身于黑暗中。一旦眼睛适应了，你可以辨识身旁的人的轮廓，却看不见其他人，他们的存在只能靠与地面摩擦的脚步声与窸窸窣窣的说话声来确认。美兰与俊相包裹在一个蚕茧里，身旁川流不息的生命绝不会侵入他们的小世界。

午夜过后，美兰开始露初疲态，她在旅程中睡得不多。俊相摸摸口袋，看到自己剩下的零用钱能不能让她在火车站旁的旅社过夜。他跟美兰保证，如果他多付一点小费，旅社老板不会为难她没有旅行文件，她在返家之前可以睡个好觉。俊相没动过歪脑筋，完全纯真的他没想过在旅社房间可以做别的事。

“不，不，我必须回家”，美兰拒绝了。她已经违反太多规则与风俗，不想再犯下年轻女子睡在旅社的禁忌。

他们一起走到火车站，脚踏车再次摆在他们之间。虽然午夜已过，但车站附近仍然人声鼎沸。由于列车没有固定的班次，人们已经习惯彻夜守候列车到来。就在不远处，一名妇女摆上烧着木头的火炉，上面架着一大锅味噌锅（一种带有辣味的豆类汤汁），不断地来回搅拌着。他们并肩坐在低矮的长凳上吃东西，美兰收下俊相送她的小点心与一瓶水。火车出发时已是早上五点钟，还没来得及看见晨光，美兰就已进入梦乡。

美兰原本高亢的情绪伴随着这趟旅程的结束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冒险而分泌的肾上腺素耗尽后，美兰感到筋疲力尽与不安，往返平壤的困难让这段感情变得毫无希望。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见到俊相。他在平壤过着大学生活，自己则与家人住在清津。在北韩这样一个小国里，平壤怎么会象月亮一样遥不可及？

美兰在旅途中看到的景象也让她心烦意乱。这是多年来她第一次走出清津，而即使在她陷入沉思的时刻，她也不由得注意到一路上看到的破败景象。她看到跟自己的学生年龄相仿的孩子，穿着破烂衣服在火车站乞讨食物。

他们在南浦买到玻璃之后，最后一晚，她与同伴睡在火车站外面。因为他们没有钱住旅社，而天气又很暖和。车站前有个小公园，实际上比较像是路口圆环，

公园中央有一棵树，周围则是草地，人们在上面铺了厚纸板或塑料垫就地休息。美兰断断续续地睡着，翻来覆去寻找舒适一点的姿势，直到她发现有一群人站了起来。他们安静地交谈，并且指着字他们附近的某个人——他蜷曲着身体躺在树下，看起来睡得很沉。然而并非如此，那个人已经死了。

不久，拉来一辆牛车。站着的人分别抓着死者的手臂与脚踝，把尸体抬上车。就在尸体砰地一声落在木板上之前，美兰看了他一眼。死者看起来还很年轻，也许还是个青少年，这点可以从他下巴的光滑肌肤看得出来。当他的腿被抬起来的时候，身上的 T 恤也敞了开来，露初胸部的皮肤。嶙峋的肋骨在黑暗中露出阴冷的光芒。美兰从没见过这么瘦的人，然而话说回来，美兰也没看过死人。她感到一阵恐怖，但还是昏沉沉地睡去。

之后，美兰感到困惑，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饿死的？尽管这些日子以来大家都吃不饱，就连政府也承认去年夏天之后出现了粮荒，但她从未听过北韩有人饿死。这种事指挥发生在非洲或中国。事实上，当老一辈的人谈到一九五〇念叨与六〇年代中国人大量死亡的历史时，总是归咎毛泽东灾难的经济政策。"幸好我们有金日成"，他们这么说。

美兰后悔当初没有问俊相这件事，因为她不希望耽误两人短暂几小时的相处时间。她返回清津之后，开始关注自己先前未曾留意的现象。美兰发现，她刚来幼稚园时看到学生长得很瘦小，现在这些孩子的身形似乎又更小了，时光倒流就像电影影带倒转一样。每个孩子应该从家里带一捆柴火供学校地下室锅炉使用，但许多孩子的家中有困难。他们细瘦的脖子支撑着无力抬起的大头，突出于腰部上方的肋骨骨架小得可怜，美兰甚至用双手就可以环绕起来，甚至有些孩子的肚子开始胀大。美兰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记得曾看过一张索马里饥民的照片，每个人都挺着胀大的肚子；虽然她不知道这种状况可以用什么医学术语来称呼，但她在师范学院的营养学课程里学到，这是蛋白质严重缺乏所导致的。美兰也注意到孩子们的发色越来越淡，逐渐变成了红铜色。

学校餐厅因缺乏食物而关闭。学生被要求自己带便当来学校，不过他们多半空手而来。当只有一两名学生没带午餐时，美兰会让有带午餐的学生各分一匙给没带午餐的同学。但是不久，那些帮孩子带便当的父母就跑来抱怨。

"我们家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分给别人"，一名母亲抗议说道。

美兰听到传言，说学校可能从国外人道援助机构获得一些饼干与奶粉。一名代表来参观这地区的另一所学校，然而校方只让衣装得体的学生出来迎接外宾，通往学校的道路加以重修，建筑物与庭院也打扫得一尘不染。但是国外援助并没有送来。相反地，老师们各被分配了一小块位于学校附近的土地在上面种植玉米。收成之后，将玉米穗轴以外的部分全剥下来煮熟，让玉米粒膨胀得像爆米花一样大小。它可以作为让孩子止饿的零嘴，但无法提供填饱肚子所需要的热量。

老师不应该偏爱某些学生，但的确有一名学生特别受到美兰的注意。这名女

孩名叫惠玲，即使才六岁，她已经成了班花。美兰从没见过小孩子有这么长的睫毛，而她的睫毛围绕着一双晶莹明亮的眼睛。起初，惠玲是个活泼、专注的学生，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仿佛怕听漏了老师说的每一个字，因此获得了美兰的喜爱。但现在的她却变得有气无力，有时还上课时睡着。

“起来喽，别睡了”，美兰有一天叫惠玲起身，这名女孩趴在桌上，脸颊紧贴着木桌。

美兰用手托住她的下巴，扶起她的脸。之间惠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肿胀的眼皮沉重地紧闭着。她显得神志不清。她的头发散落在美兰手上，摸起来脆弱而粗糙。

几天过去了，女孩一直没来上学。美兰从邻居口中得知她的住处，她觉得自己应该登门拜访。但不知何故，美兰打了退堂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她其实很清楚惠玲发生了什么事，去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美兰的班上有许多学生出现相同的情况。他们在上课时突然见往桌上重重一趴，到了下课时间，当其他学生蹦蹦跳跳跑到操场玩耍时，他们仍然动也不动地趴在桌上睡觉，或是躺在午睡的床席上。

事情的发展总是循着相同的流程：首先，家中无法提供学校需要的柴火；然后没有办法带午餐；接着孩子们没有体力上课，连下课时间也在睡觉；然后，孩子因不明原因而不再来学校上课。就这样，三年来，幼稚园的学生从五十名减少到十五名。

这些孩子发生了什么事？美兰不想追问，怕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

美兰再见到俊相时已是冬天。这次轮到俊相给她一个惊喜。他在假期初从学校返乡。他没有冒着撞见美兰父母的风险直接跑去她家，而是前往幼稚园。这天，学校已经放学，但美兰仍在幼稚园里整理教室。

学校没有大人坐的椅子，所以美兰只能锁着身子塞坐在小椅子里。这张桌椅恰好是她最喜爱的学生的座位，她瘦小的身躯可以轻易坐进这张椅子。美兰向俊相提到她的学生们所发生的事，俊相试着安慰她。

“你能做什么呢？”俊相说：“就算是国王也无法帮这些人。不要把责任全揽在身上。”

这段对话是尴尬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件令人困窘的事实。俊相与美兰都不缺粮食。俊相的父亲无法在自家的庭院种植的东西，可以用日圆在黑市购买。更诡异的是，美兰现在吃的比过去几年更好，因为她已经搬离大学宿舍回到自己家里。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美兰家低下的阶级地位并未让他们受苦。美兰美丽的大姊意外嫁给条件非常好的对象，她的美貌显然击败了充满问题的家庭背景；她的丈夫在军中服务，他动用关系帮助美兰家度过难关。美兰的母亲则不断寻找赚钱的门路。电力中断之后，她无法使用制冰器来制作豆浆冰淇淋，但她另辟蹊径

——养猪、制作豆腐与磨玉米粉。

十年后，当美兰为人母，尝试从事有氧运动来减去产后多于的体重时，她生命的这段经历成了她良心的重担。她经常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不耻，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帮帮那些孩子。当孩子挨饿时，她怎么能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千人的死是统计数据，这话说得不错，对美兰来说也是如此。她还没有领悟到，自己的冷漠其实是环境养成的求生技能。一九九〇年代的北韩，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狠下心来不跟别人分享食物。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必须装作漠不关心。在那个时期，美兰必须学着在街上绕过尸体，假装没有看见。她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地看着五岁的孩子死去。如果连她最喜爱的学生都能不伸出援手，更何况是完全陌生的人。

苦難的行軍宣傳海報



第九章
好人不长命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共产国家成长的人无法独立谋生，因为他们总是期盼政府会照顾他们。但对于北韩饥荒的无数受害者来说，这种说法并非事实。北韩人民兵没有消极等死。当公共配给体系停止运作时，民众被迫各凭本事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利用桶子与绳子布置成陷阱捕捉田里的小动物，火烧在阳台上悬挂网子捕捉麻雀。他们靠自己学习各种植物的营养成分。他们回到集体记忆力饥饿的过去，重新找回祖先的生存技巧：剥掉松树带有甜味的内层树皮，研磨成细粉，用来取代面粉；把橡实捣成糊状物，放进模子里使其成行为立方体，这些方块放入口中会自然融化。

北韩人学会吞下自己的自尊与捏住自己的鼻子。他们从农村动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来未被消化的玉米粒。船厂工人发展处一种技术，原本储存粮食的货仓底部残留着腐臭黏腻的东西，他们将这些东西刮起了，放在地面晾干，从中可以拾取一点未烹煮过的稻米与其他可食用的谷物。

在海滩上，民众从沙里挖掘贝类，将海藻装满桶子。当局于一九九五年沿着海滩设立栅栏（表面上是为防范间谍，实际上更有可能是为了不让民众捕鱼，因为这些渔产是国营公司的禁脔），民众只能到海边未设栅栏的悬崖，将一把把的耙子首尾绑起来，伸到海里捞海藻。

没有人告诉民众该怎么做，北韩政府不愿公布粮荒的严重程度，于是大家只能自求多福。妇女们彼此交换烹饪心得。煮玉米时，玉米的壳、穗轴、叶子与茎不可丢弃，这些可以一起磨成粉。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但可以产生饱足感。煮面至少要煮一个钟头，让面条看起来大一点。在汤里加一点草叶，看起来就像加了蔬菜。把松树树皮磨成粉，可以做成糕饼。

民众投入一切心力在采集与生产粮食上。一大早就要起床寻觅早餐，早餐一吃完，紧接着就要思索晚餐的着落。原本吃午饭时间拿来睡觉，可以保留一点热量。

然而这么做终究还是不够。

制衣厂关门后，宋太太感到茫然，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她仍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对于任何带有资本主义腐臭的事物由衷感到厌恶。她敬爱的金日成大元帅不断耳提面命，社会主义者必须“防反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有毒思想”。她喜欢引用这段语录。

伟大的领袖去世后，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家中没有人领到薪水，就连在广播站工作地位崇高的丈夫也是如此，何况他还拥有党员身份。长博甚至连免费得酒与香烟这类记者的固定福利都领不到。宋太太知道她该放下身段赚钱的时候到了。但是该怎么做？

可想而知，宋太太不可能成为一名商人。五十岁的她除了打算盘，商业技能

一窍不通。然而当她与家人谈到这个困境时，家人提醒她在煮饭烧菜方面颇具天分。过去还能取得食材的时候，宋太太喜欢做菜，而长博喜欢吃。她会的彩色相当有限，因为北韩人没接触过外国菜，但对一个国名与饥荒二字同义的国家来说，北韩本身的菜肴算是相当丰富了。（事实上，南韩许多餐厅都是由北韩人掌厨。）北韩厨师别具创意，善于使用自然食材，如松茸与海藻。他们以当季新鲜的食材搭配米饭、大麦或玉米，以红豆沙或辣椒调味。招牌菜是平壤冷面，这是冷的荞麦面搭配加醋汤汁，再随地方不同放上白煮蛋、小黄瓜或梨子等各种配菜。工作忙碌时，宋太太会买现成的面条，不然她会亲手制作。在食材配给有限之下，宋太太有时会用油炸的方式让蔬菜吃起来酥脆可口。丈夫生日的时候，她会用米饭做出甜甜黏黏的糕点。她会酿制玉米酒。而女儿们都夸赞她做的泡菜是邻里间最好吃的。

宋太太的家人鼓励她以厨房作为生意的地点，而最好的产品应该是豆腐，它是困难时期的优良蛋白来源。豆腐在韩国菜得运用十分广泛，可以煮汤、焖炖、油炸或发酵。宋太太想用豆腐来代替鱼肉，只要用油与红椒将豆腐迅速煎过。为了筹钱买大豆，他们开始卖掉家中的物品。首先出清的是他们珍贵的电视机——这台日本制的电视机是长博父亲在韩战从事情报工作所得到的奖赏。

制作豆腐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却也耗时费力。必须先将大豆煮熟后磨碎，然后加入凝固剂，接下来就像起司一样放入布中拧干，最后剩下稀豆浆及豆渣。宋太太觉得养猪也是个好主意，可以用制作豆腐剩下来的残渣喂猪，两者相辅相成。在他们公寓后面有一排用来储藏物品的小屋，宋太太把宰市场买来的一窝小猪安置在其中一间，并锁上大锁。

几个月过去，生意进行的还算顺利。宋太太把她的小厨房变成了豆腐工厂，在公寓的温突上烹煮一大锅大豆。长博品尝她做的成品，觉得没有问题；而吃了豆渣与豆浆的小猪越长越肥，宋太太每天早晨还为它们准备草料。不过，制作豆腐需要的木材与煤炭等燃料变得越来越难取得，电力一个星期只供应几个小时，仅足够提供流失哇灯泡、电视机或收音机使用。

缺少煮大豆的燃料，宋太太没办法制作豆腐。没有豆腐，她没有办法喂饱饥饿的猪，得花几个小时捡拾足够的草料给猪当饲料。

“听着，我们可能也要吃草”，她半开玩笑地对长博说。然后，她想了一下又说：“如果猪吃草没事，那我们也可以吃草。”

于是它们开始尝试从未有过的严酷饮食，这对于这对自视为美食家的夫妻来说，如同自天堂坠入地狱。宋太太必须带着厨房用的刀具与篮子从市中心往北边或往西边走到没有道路可通的地方，采集可供使用的野生植物。走进山里，也许能找到象蒲公英或其他尝起来风味还不错的野草，就连在粮食充裕时人们也愿意吃这些植物。宋太太偶尔会发现农民丢弃的腐烂白菜叶。她会将当日采集到的植物与她能买到的食材搭配起来烹煮。通常是磨碎的玉米粉——将玉米壳与玉米穗

轴磨碎的廉价食物。如果连这都买不起，宋太太会买更便宜的松树皮内层粉末，有时还掺杂了一点木屑。

然而再怎么高明的厨艺也无法掩盖这股极恐怖的味道。宋太太必须不断地磨碎切碎这些野草与树皮，使它们成为软到可以消化的糊状物，例如面条或糕点。有一定形状或许还能自欺欺人，让人以为自己吃的是真的食物。宋太太只能将这些东西做成毫无风味口感的粥状物，而唯一能用来调味的只有盐。一点咖喱或红椒或许可以把味道盖过去，但这两样东西实在太贵了。食用油即便是有钱也买不到，油的缺乏使烹调变得十分困难。宋太太到姊姊的小姑家拜访时，她吃到了用豆茎与玉米茎熬煮而成的午餐。尽管很饿，但她还是吞不下去。茎又苦又干，就像鸟巢细枝般梗住了她的喉咙。她下意识地想把东西呕出，整张脸涨的通红，最终终于吐出来了。她感到很丢脸。

金日成去世后的一年间，宋太太唯一吃过的肉类是青蛙。她的几个兄弟在乡村抓了一些。宋太太的妯娌用酱油快炒，将其切成小块放在面条上，她觉得这道菜很好吃。蛙肉不是典型的韩国菜，宋太太过去从未吃过；遗憾的是，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尝蛙肉。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韩所有的青蛙都在过渡捕捉下消失无踪。

一九九五年中，宋太太与丈夫已将家中绝大多数值钱的东西变卖以换取粮食。在电视机之后，他们卖了家里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辆二手的日制脚踏车；接着是缝纫机，宋太太家的衣服都是用这台机器缝补的；长博的手表也卖了；就连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幅东方山水画，也拿去换了粮食。他们卖了绝大部分衣物，包含存放这些衣服的木头衣柜。这间两房公寓原本对他们来说相当拥挤，现在所有的杂乱全消失了，墙面几乎空了出来，只剩下金氏父子的肖像。唯一还没卖的就只剩这栋公寓。

这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在北韩，你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拥有住的权利。尽管如此，非法的不动产市场依然存在，民众不动声色地交换住房，收买官员让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宋太太在旁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一名妇女，她的丈夫过去曾被派至俄国的木材厂工作，手上攒了一些钱，让他们有能力换更好的公寓。

宋太太的公寓位于市中心的极佳位置，在路面电车停摆后，这个区位显得更加重要。宋太太与长博这里住了二十年，交到许多朋友；这都要归功于宋太太善良的个性，她主持人民班多年来却未得罪任何人。她与长博都觉得不需要住这么大的房子，现在家里只有他们俩与长博的母亲，女儿都已经嫁人了，儿子则是搬出去与女友同住。宋太太一直不愿意接受那名年纪比她儿子大的女子，她觉得儿子与人同居是一种耻辱，但至少家里少了一张嘴吃饭。

这间公寓卖了一万朝鲜圆，依照官方汇率相当于三千美元。他们搬到意见单人房。宋太太决定要用这笔钱从事另一笔生意：买卖白米。

米是韩国人的主食，事实上，韩文中的 bap，既可以指米，又可以指饭。一九九五年后，清津的居民只能从黑市（如果他们有现金的话）取得白米。咸镜北

道太寒冷而且多山，稻米产量极少。除了罗南附近小港湾的沼泽地，清津市所需的稻米都必须藉由火车与货车运送，而铁公路路况的不良又造成米价上扬。宋太太想，她可以在滨海地区以较便宜的价格购入白米，并且带上火车。以这种方式买进任何主食谷物是严重违法的（政府尚能容忍民众买卖蔬菜与肉类），然而既然每个人都这么做，宋太太也决定加入。她可以小赚一笔并且为自己与长博留下一批白米，光想到这点就令她垂涎三尺。从一九九四年起，他们就再也没吃过米饭了，因为玉米的价格只有白米的一半。

宋太太出发时把一万朝鲜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好几层的冬衣掩饰了胸前不自然的凸起。她搭火车到平安南道卖了两百公斤的白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太太启程返家，这趟旅程花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包包的米全塞进她的作为底下。长博动用新闻记者的关系让她坐上三等车厢的卧铺，一等与二等车厢仅供劳动党官员与军官使用。只有在这个时候，宋太太才感受到自己身份的不同。这列火车很长，行经弯道时，可以看到后头的车厢，那些无法动用关系的人只能站着。他们紧密地挤在一起，从远处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还有更多人攀在车顶上。送该台早上八点三十分趴下卧铺，与同车的其他乘客交谈——一名士兵、一名年轻妇女与一名祖母辈的女士，他们谈起了铁道路况不良的问题。火车在昨晚整夜走走停停，而现在则是倾斜得厉害，使她们无法吃早餐。他们说话的声音变得短促，颠簸持续中断他们对话，知道一次巨大的弹跳将宋太太从座位上抬了起来，然后重重摔在地上。她侧躺着，左脸靠着意见冰冷的东西，后来才发现那是车窗的金属框。火车出轨了。

宋太太听见后防传来痛苦的叫声。车厢成了扭曲变形的金属笼子，后防拥挤的车厢几乎已完全损毁，绝大多数乘客都丧生了，前方车厢的菁英份子大致幸免于难。这场意外发生在新浦附近，距离清津约一百五十英里的海岸边，最后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七百人。不过就跟北韩的其他灾害一样，这场意外绝不会被加以报导。

宋太太爬出残骸，她的脸颊流下一道长而深的伤口，大腿被扯下一层皮，北部扭伤。卧铺车厢里的东西全砸在她身上，然而这种封闭车厢或许是她得以活命的原因之一。意外发生后的第四天，宋太太走回清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在金日成的慈爱照顾下出生，并且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现在更加这么认为，因为她从火车灾难中生还。宋太太必须克服疼痛与恐惧再度达成火车回清津，然而当她在月台上见到丈夫与几个月没跟他说话的儿子时，她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即使这场意外让她损失了大部分的白米。

宋太太的伤势比她原先想的更为严重。一旦幸福感逐渐散去，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受了重伤。医师给她止痛药，嘱咐她三个月的时间不能下床。宋太太无视这些忠告，因为必须有人为这个家张罗食物。

在饥荒中，民众不一定会饿死。通常疾病会更早上门夺走他们的性命。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对身体的免疫力造成伤害，而饥饿也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结核病与伤寒。即使能取得抗生素，但饥饿的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代谢抗生素。原本可以治疗的病症往往在饥饿的状况下突然恶化而致命。身体化学作用的剧烈波动，可能导致中风与心脏病。人们因为吃了无法消化的替代食物而死亡。饥饿是个卑劣的杀手，它隐藏在攀升的儿童死亡率或降低的预期寿命这类平淡无味的统计数据后面。它只留下了“超额死亡率”这项间接证据——这项统计数据显示出来某个时期的死亡率高于正常死亡率。

饥饿这名杀手有一套自然程序。它会先找上最脆弱得人——五岁以下的孩子。这些孩子罹患感冒，然后感冒恶化成肺炎；腹泻恶化成痢疾。甚至父母还来不及招人帮忙，孩子就死了。接着杀手找上老人，先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下手，然后依次寻找六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接着就轮到壮年人。男性由于体脂肪较少，通常会比女性更容易死亡。强壮而结实的男性在面对饥饿时尤其脆弱，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往往会燃烧较多热量。

另一项更残酷的事实是，饥饿的目标往往是最无辜的人，也就是从不偷窃食物、不说谎、不欺骗、不犯法或不背叛朋友的人。这种现象正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雷维（Primo Levi）逃出奥斯维茨（Auschwitz）后所描述的，他写道，他与其他幸存者从没想过战后能再重逢，因为他们全做过让自己羞耻的事。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

在宋太太家，她的婆婆最早去世。长博的母亲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搬来跟他们同住，这是韩国的传统，长子有照顾父母的责任。当然，这些负担最后全落到媳妇身上，所以韩国妻子与婆婆的关系经常充满了怨恨。宋太太的婆婆在他们结婚之初经常无情地批评宋太太，特别是在她连续生下三个女儿之后。孙子出生之后，婆婆变得稍微和善一点，但宋太太仍然认真尽孝，努力讨好婆婆。

在韩国，春天是收成最少的季节，因为秋天的收成到了此时已经快吃完，而农田还在种植新的作物。这一年对宋太太来说特别困难，因为她正从六个月钱的火车事故中逐渐恢复。她的婆婆已经七十三岁，以北韩的预期寿命来说算是非常高寿，因此人们可以轻易认定她的死是“时候到了”，但宋太太深信这名强悍的老太太如果有适当的饮食，绝对能再多活几年。在无法工作或上山的状况下，宋太太只能把住家附近可以找到的植物和杂草全丢进汤里。她的婆婆如同一袋易碎的骨头，眼睛周围出现了糙皮症的症状。一九九六年五月，由于出现严重的胃痉挛与痢疾症状，没几天就过世了。

宋太太在最悲惨的状况下失去了她的家人。她对婆婆的死充满绝望，而这份绝望又因为童年秋天的宣传活动更行加强，政府敦促人民更努力工作以度难关。海报显示一名拿着扩音器的男子，激励民众“以苦难行军的必胜精神向新世纪冲

锋”，在他后头跟着一名戴钢盔的士兵、一名拿着鸭嘴锄的矿工、一名戴着眼镜手执蓝图的知识分子、一名带着头巾的农夫，与一名挥舞红旗的将军。就连官方媒体也报导金正日吃的只是简单的马铃薯。

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了，宋太太与长博决定再次搬家，搬到更小一点的地方。而新家比破木屋好不了多少，它的地板是未经加工的水泥地，枪毙的灰泥非常脆弱，宋太太连金氏父子的肖像都挂不上去。她小心翼翼地将肖像包起来，将它们摆在角落。他们几乎没有剩下任何财产。宋太太已经把长博的书全部卖掉，只留下金氏父子的作品，因为这些书是不准卖的。她卖掉自己相当珍贵的泡菜坛。他们现在只需要两双筷子、两支汤匙、几个碗与锅子。

长博离开道立广播站，另外在铁路单位找了一份广播工作。铁路单位付不起薪水，只能承诺下次配给给粮食时他能排在优先位置。但是失误从未送到。几个月后，宋太太与丈夫已经把卖掉上一栋公寓的钱花光。他们的大女儿玉熙偶尔会从家里偷偷带一袋玉米给他们，但她必须小心不被脾气暴躁的丈夫发现，他会因为她“偷粮食”而揍她。他家虽然有钱，却不愿意帮助亲友。

宋太太还是无法爬山，所以她只能更早起，先是早上六点，然后提早到五点，希望能找到过了一晚刚长出的嫩绿青草，这种草可能比较柔软而且容易消化。她会将野草与树皮煮软，加上一点盐煮成粥状物，然后在加上几匙玉米粉。

宋太太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累坏了。她吃完饭后，汤匙就从手中松脱，当啷一声掉在金属盘上。她瘫软在地，累得连换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一下子陷入深沉的睡眠中。直到求生的本能告诉她，虽然天色仍然昏暗，但她必须继续寻找食物。宋太太已经没有余力做别的事。她不再整理自己曾引以为傲的一头卷发，她也不急着洗衣服。她的体重不断下降，臀部几乎衬不起任何一件裤子。她觉得自己早就已经死了，只是灵魂还飘浮在自己的躯壳之上。

不过，与宋太太相比，长博的健康状况更是糟糕。他在壮年时拥有北韩人少有的巨大身躯，体重重达两百磅（相当于九十公斤）。由于他实在太重了，几年前居然有医师劝他用抽烟来减轻体重。现在，长博曾引以自豪的大肚腩——肥胖在北韩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同消了气的皮囊般。他的皮肤一片片地剥落，放佛罹患严重的湿疹。他的双下巴松垂，说话也含糊不清。宋太太带他到铁路管理局附属医院看病，被诊断出轻微中风。之后，长博发现自己工作出现困难。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抱怨视力模糊，甚至连自己管用的钢笔都拿不起来。

长博到床上躺着，说是床，其实只是铺在地上的被褥，这是他们仅剩唯一的物品。他的腿肿得跟气球一样，宋太太觉得这是水肿——饥饿造成的体液积聚。长博不断提到食物。他提到小时候母亲做的豆腐汤，以及新婚时宋太太为他煮的清蒸螃蟹加上蒜丝，那是一道极美味的佳肴。他回忆数十年前宋太太为他料理过的许多菜肴，相当不寻常地历数每一道菜得细节。当长博说道夫妻一同吃饭的情景时，他变得即甜蜜又伤感，甚至有点罗曼蒂克。他握着宋太太的手，眼睛湿润，

眼神被一层记忆的迷雾所笼罩。

“走吧，亲爱的，我们一起去吃好一点的馆子，点一瓶美酒”，有一天早晨，当他们从毛毯上醒来，长博对他的妻子说。他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宋太太看着丈夫，心里感到惊慌，担心他出现了幻觉。

宋太太冲出家门前往市场，她奔跑着，完全忘了背部的疼痛。她一定要为丈夫带回一点食物，不管是偷窃或乞讨，在所不惜。宋太太想到卖面得姊姊。她的姊姊吃得也不是很好，她的皮肤就像长博一样，因为营养不良的关系而一片片地剥落，所以宋太太过去从未向她求助。但现在她已无路可走，当然，她的姊姊无法拒绝她。

“我以后再付钱给你”，宋太太向她的姊姊再三保证，转身就往家里跑，肾上腺素使她还有力气狂奔。

长博盖着毛毯，侧躺着蜷曲的身子。宋太太叫他的名字，长博没有回应，她于是将他的身子反过来——现在这么做并不困难，因为他的体重已减轻很多，真正碍事的是他的腿与手臂变得十分僵硬。

宋太太不断捶打他的胸口，哭喊救命，尽管她知道已经太迟。

长博死后，他们的儿子南玉搬回来与宋太太同住。自从南玉与比他年长的女子交往以来，模子俩就形同陌路。事实上，从她儿子进入青春期开始，两人的相处就不太和睦。原因不在于南玉桀骜不驯，而是宋太太无法打破儿子的沉默。现在，家中遭逢如此悲剧，儿子与年长女子未婚同居似乎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需要。宋太太很孤单。而南玉女朋友的家人经济更不宽裕，他们在家里总是没东西吃。

南玉年轻时所接受的一切训练都是为了成为一名拳击手，但现在体育学校的状况实在过于恶劣，有一年冬天他的耳朵甚至因为冻伤而受创。南玉回到清津，透过家人的关系在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这层关系可以追溯到韩战时期，宋太太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美军轰炸下丧生的。跟长博一样，铁路管理局无法支付南玉薪水，他只能期望自己在配给体系恢复运作之后能优先拿到粮食。

宋太太的儿子是一名强壮而结实的年轻人，长相酷似他的父亲，但体格更像是一名运动员，肌肉也更发达；他的身高五尺九寸（一百七十五公分），也比他的父亲高。起初，当他的体脂肪逐渐消失时，外形看起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但最后当肌肉也被消耗殆尽时，他看起来却象具尸体。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的寒冷冬天，温度降到设施零度以下，南玉得了重感冒，最后演变成肺炎。即使南玉的体重变轻，宋太太还是抬不动他，无法带他去看医生——这时候已经没有救护车了——宋太太只能自己去医院向医师解释他的病情。医师写了一张盘尼西林的处方签给她，但当她到市场时，发现要价高达五十元，相当于一公斤的玉米。

宋太太选择了玉米。

一九九八年三月，就在宋太太在市场搜寻粮食时，南玉孤伶伶地在小屋里死去。他葬在清津附近山上，与他父亲的坟相邻，距离近到从家里就能遥望。铁路管理局比照长博的例子，捐了一口棺材给南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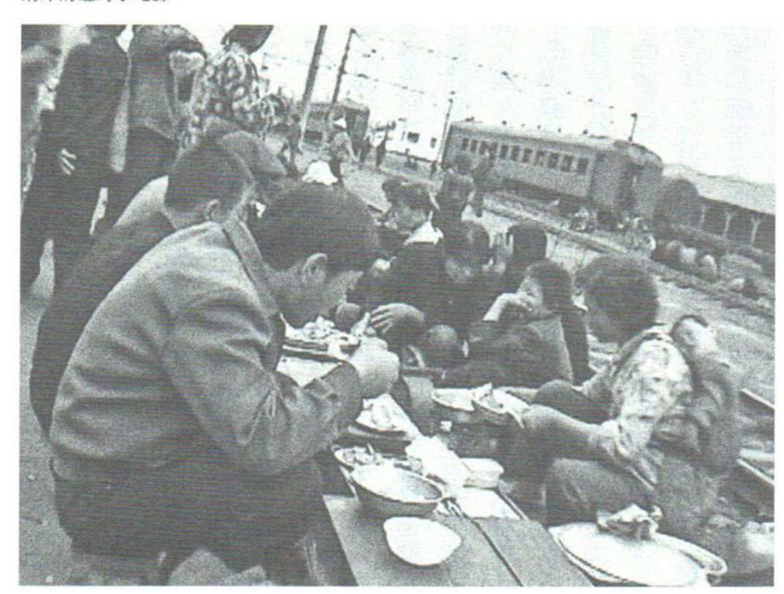
到了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六十万到两百万的北韩人死于这场饥荒，大约占了总人口的一成。清津的粮食供应比北韩其他地区更早中断，饿死的人占的比例很可能高达两成。确切的数字几乎不可能计算，因为北韩医院在报告中不会把饥饿列为死因。

一九九六到二零零五年，北韩获得价值二十四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美国。但北韩政权虽然愿意接受外援，却不许外人踏入北韩境内。愿意提供援助的机构起初只能抵达平壤与其他经过精心安排的地点。当援助人员获准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与旅馆时，衣衫褴褛的民众早已被驱离街上；参观学校与孤儿院时，只会看到衣食无缺的孩子。政府在要求更多援助的同时，却有隐匿了最需要帮助的部分。位于平壤的援助机构人员甚至不许学习韩文。

一九九七年，援助机构的少数官员获准进入清津，但受到比平壤更严格的限制。法国反饥饿行动组织（Action Against Hunger）一名员工在日记中写道，她不许离开天马山饭店（位于清津港附近），对方的理由是她可能会被车子撞到。该组织不久便撤离北韩，并表示他们无法证实援助确实到了需要的人手里。无国界医师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也撤离北韩。一九九八年，当大船载运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的捐赠谷物于清津港靠岸时，这些救援物资全北卸下来放到军方卡车上载走。有些粮食被送到孤儿院与幼稚园，但绝大多数最后成了军方储粮或在黑市上出售。联合国机构在北韩内部努力了十年，才顺利建立满意的监督机制。到了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不一定是因为情况改善，也可能如宋太太日后猜想的，是因为少了几张嘴吃饭。

“会死的全死光了。”

清津的臨時小吃攤



第十章

需要为发明之母

宋太太没有参加儿子的葬礼。悲伤、饥饿与多年来累积的压力使她身心俱疲。她无法回到儿子死去的那间小屋。“我扔下他，让他一个人孤伶伶地死去。是我遗弃了他……”，她不断地痛苦呻吟着。宋太太开始绝食，她精神恍惚地走在街上，直到不支倒地为止。

宋太太的女儿们到处找她，最后发现她倒卧在处于附近的草堆里。她发饥饿的呓语而且失温。当时是三月底，但叶间的温度很低，足以杀死一名严重营养不良的人。女儿们被母亲的外表吓坏了。宋太太过去引以为傲的一头浓密卷发，现在完全纠结成一团而且脏污不堪，身上的衣服沾满结成硬块的泥巴。她们将宋太太带到二女儿家，脱掉她的衣服，把她当成孩子似的帮她洗澡。事实上，五十二岁的宋太太非常憔悴，她的体重甚至比玉熙八岁的儿子还轻。女儿们一起出钱买了一包面条给她。经过十五天适度饮食之后，宋太太终于回过神来，她清楚地忆起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再次因丧失亲人的痛苦而陷入绝望。

连续三年死了三个亲人——她的婆婆死于一九九六年，丈夫死于一九九七年，儿子死于一九九八年。宋太太失去了一切，包括敬爱的大元帅，他的去世就像失去了丈夫与儿子一样，仍令她感到悲伤。

宋太太终于鼓起勇气回家，回到那间被她视为犯罪现场的小屋；她必须为家人的死负起全部责任。她一面走着，一面遥望光秃的山岭，她看到用来标记新坟的建议木桩；她的二女婿也是这样帮她的丈夫与儿子的坟墓立下标记。宋太太回到小屋时，发现家门微启。她在出门时已经把门钉牢，因为她没有门锁，不过显然有人把门撬开。她推开门，探头进去，确认没有人躲在里面。屋子是空的，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她用来煮粥的那个外表凹损的铝锅，用来盛吃的东西的脸颊铁碗、筷子，儿子死时裹在身上的毛毯——全都不翼而飞。小偷甚至连领袖肖像上的玻璃也拿走，只留下照片。

宋太太头也不回的离开家，顾不得们是否关妥。除了身上这条命，她已没有东西可被夺走，也不认为或者有什么意思。她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她打算就这样不断地走下去，直到体力不支倒在草堆里为止，然后躺着等死。但不知何故，她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她又开始做起生意。

饥荒带来诡异的副作用：就在灾害达到最高峰，死亡人数打倒数十万的时候，崭新的进取精神开始萌生。社会主义粮食配给体系的崩溃为私人企业提供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到山里采集叶子与莓类，刮削树皮；人们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购买食物，而且必须有人提供食物给他们。北韩人需要商贩，鱼贩、肉贩与面包师傅，这些人可以填补公共体系崩溃的空缺。这些私人买卖都属严重违法行为。金正日对于私人企业采取比他的父亲更严厉的反对立场。“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粮食问题也应该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市场与小贩只会让民众变得自私自利”，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场演说中表示。而这也是少数几次他公开承认北韩出

现粮荒的演说。除了在自家种植蔬菜，粮食不应该在市场上贩售，贩卖稻米或其它谷物必须严厉禁止。北韩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仅非法，而且不道德，它如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眼中钉。任何私人买卖行为都会被盖上"经济犯罪"的戳记，而它的刑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涉及贪污，甚至可能被处死。

然而另一方面，完全不从事私人买卖同样是必死无疑。人类想要存活，每天平均至少需要伍佰卡路里的热量，光是吃树林里的东西，不可能活过三个月。死亡的迫近促使宋太太在不得已之下，鼓起勇气成为一名资本主义者。

经历稻米买卖的失败，宋太太知道自己必须专注于最简易可行的生意，既不需要出远门，一开始也不需要庞大的投资金额。宋太太觉得最能赚钱，同时也是她唯一会的赚钱技能就是烧饭做菜。但随着薪柴供给量的缺乏，烧饭做菜变得越加困难。附近山区在大量砍伐后已经变成茶褐色了，林木生长线也往高处退缩而难以采集。

在几经考虑下，宋太太决定将自己的未来押在饼干上。饼干只需要再火炉里烤个十分钟，不需要很多柴火就能烘焙四、五轮。饼干比面包容易烘烤，而且也便于正在做事的饥饿民众食用。

宋太太的小女儿容熙也加入她的饼干生意，容熙最近才刚离婚——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因为她发现丈夫是个赌徒。容熙借钱买了废铁，并且找了一名炼钢厂的失业焊接工把废铁焊成火炉。这个路子基本上是个方形箱子，隔成两层，将木炭放在下层，饼干放在上层。工人也做了烤盘。宋太太和容熙走访清津各处市场，留意其他小贩的做法。许多妇女也想到烤饼干这个点子，而宋太太还曾到一家小贩工作观察学习。她从其他小贩哪儿带回了样本品尝比较。当她发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设法学习它的做法。

她们的试验品很不理想。首次完成的饼干不适合拿出来卖，恐怕连极度饥饿的北韩人都会兴趣缺缺。宋太太与女儿为了补浪费这些宝贵的食材，只好自己吃掉这些失败的作品。终于，宋太太发现她必须使用更多的酵母。她还加了牛奶。她把面团切成方形，让它看起来像是小面包，一种不太甜而且容易消化的零嘴。

宋太太早上五点起床烘焙饼干。摊贩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所以她必须尽可能提供新鲜的饼干。她没有用来叫卖饼干的推车，连竹篓都没有，她只能把饼干放在塑料瓶里，然后用布将喷绑在背上，就像背着婴儿。宋太太一早起来到来往行人众多的大街叫卖，此时竞争者还不多。她也到市场以及火车站前的大广场叫卖。由于她有背痛的毛病，所以只能盘坐在地，把饼干放在膝盖上，这样才能舒服些。

火车事故之后，宋太太的背痛一直未能治愈，此时的她只能拿出昔日担任人民班长的热情——当时的她嘱咐邻居，为了祖国，要做好垃圾分类以及收集堆肥——用力叫卖。

"Gwaja sassayo"，这句简单而带有韵律的韩文，意思是卖饼干。

宋太太是天生的生意人。顾客们喜爱她的热忱，虽然有几十间摊上，但总会

到她的摊位光顾。在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之后，她得到了价值约一百元的东西——五十钱（一元合一百钱——进了自己口袋，另外还有几袋物品，有时是红椒或几块煤炭，客人拿这些东西来换饼干。这些物品足够让她张罗晚餐与购买制作饼干所需的料。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累得倒头就睡，但几个小时候她必须醒来重新制作饼干。尽管疲惫不堪，不过现在的她至少不需要饿着肚子睡觉。

有数千名中年妇女从事与宋太太相同的活动。她们独立营业，没有厂房也没有店铺。她们不敢象进行经改的俄国一样到处设立卖报小亭。从小被灌输的一切使她们对商业一无所知——北韩人深信凡是私人买卖均属自私自利。然而在饥饿逼迫下，这些妇女靠着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要做到这点，她们首先必须“扬弃”被灌输了大半辈子的宣传教条。她们发展处以物易物的技巧，例如比较有体力的年轻人到宋太太到不了的深山收集薪柴，然后用这些柴火与宋太太交换饼干。如果你有梯子，你可以刮下电线杆上的电线的铜漆（不比担心有触电的危险），然后用这些铜屑来交换粮食。如果你有废弃工厂的钥匙，你可以拆卸当中的机器、窗户与地板，将它们移作他用。

无论是烤盘还是独轮手推车都必须亲手制作，因为现实上每一家工厂都已停工。妇女们剪下帆布，融化废弃不用的橡胶，切割出粗制的软底运动鞋；利用旧轮胎、木门与铁丝制作成推车，将商品从市场运回家中。

许多民众自行学习各项技能。举例来说，一名没受过教育的煤矿工人发现一本汉方书籍，他仔细研读并且到清津附近的山区辨识药草，对于药草的了解与医师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因为惯于劳动，使他比医师更能深入山区采集药草。

医师也找到其他赚钱管道。他们没有药物，但可以在医院或家里执行简单的医疗。最有利可图的是堕胎。技术上来说，如果没有得到特别允许，那么堕胎是违法的，然而却是普遍的控制生育方式。虽然饥饿降低了性欲与生育能力，但有些女性仍然怀孕，而家庭多半因无力抚养而选择堕胎。几年前，玉熙带她的朋友去堕胎，费用是四百元，相当于十七磅（八公斤）的白米价格，现在缺下跌到只值一篮煤炭。

金医师并未受过外科手术训练。她只能靠她的笔为需要在家休养的病人开立医师证明。在北韩，无辜旷职最高可以拘禁三十天，即使在无薪可领的状况下也是一样，但民众需要抽出时间寻找食物与燃料。拿到医师证明的人只要找到任何吃的东西，就会拿一点给金医师作为报酬。金医师虽然不愿开假证明——这么做等于违反自己对医疗业与国家的誓言——但她知道自己是在帮助病人，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美兰足智多谋的母亲偶然发现，在这个艰困的时局还有一项热门买卖可做。透过大女儿的人脉关系，她获得经营磨坊的许可。她先前经营的冰淇淋与豆腐生意因为没电而失败，但磨坊可不同，它是传统行业，主要靠双手操作。她的丈夫

原本在矿坑里建造横梁，现在则为磨坊盖了一间木造小屋。他们找来邻居一起建造屋顶。就连此时正好放假的俊相也跑来帮忙。磨坊建成之后，方圆数英里的民众都带着玉米前来。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宜的做法是购买完整的玉米，然后自行决定要将多少玉米磨成粉，包括玉米茎、玉米叶、玉米穗轴与玉米壳，或甚至掺入一点锯屑。这些东西除非磨得很细，否则不可能消化，因此磨坊是非常重要的行业。

如果你拿不出任何可卖的东西，那就出卖自己吧。

即使金日成关闭了所有妓生房，卖淫还是未曾绝迹，只不过是以最谨慎的方式，在个人安排下在民众家里进行。饥荒不只让卖淫重返街头，也早就新一批妓女阶级——通常是一些急欲为孩子寻找食物的年轻已婚妇女。她们要的不过是一袋面条或几颗甜马铃薯。她们的聚集点是清津火车站外面的广场。由于等待火车的时间十分漫长，所以广场上总是有数百人徘徊闲逛。这些妇女在人群中穿梭，仿佛置身于鸡尾酒会。她们的服装平淡朴素，因为凡是穿着过短的裙子，衬衫领口开得太低或衬衫太紧、牛仔裤或醒目首饰的妇女都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所以这些妓女会以挥舞口红或眼神示意的方式向路过的男性频送秋波。

玉熙住在火车站对面，她的丈夫就在火车站工作。每次她看到这些妇女，都会困窘地看着地面，按耐住想注视她们的冲动。然而当中有个女人一直试图与玉熙目光交接，有时似乎还对她投以微笑。与其他女子相比，她的衣着较佳，充满自信，举手投足带着一股职业的纯熟。

有一天，当玉熙离开公寓，发现这名女子就站在她的家门前几英尺的地方，一副专程等她的样子。

“妹子，跟你打个商量”，她故意与熟稔地对玉熙说。“我哥刚从外地来，我们想私下谈点事。你的房间给以借我们用一下吗？”

她用下巴指着她们身后手足无措的男子，他窘迫地回避玉熙的目光。玉熙虽然对性有些拘谨，但还不至于看不出这首歌好交易。她的丈夫正在工作，孩子也在学校。妓女付她五十元，使用她的房间一小时。此后这名女子成了常客，不只服了房前，还不时送糖果给玉熙的孩子。

当然，这是违法的，但话说回来，这种事在当时极为普遍。在北韩，无论提供性服务还是修理脚踏车，只要你收取报酬，就是犯罪。但是谁在乎呢？每个人都需要欺骗才能活下去。

绝大多数的买卖交易都出现在老农市场里。即使在共产主义的鼎盛期，金日成也不敢全面禁止民间买卖，只能限制人民仅可买卖自家种植的次要粮食。子女还小的时候，宋太太会到家附近的空地买鸡蛋（如果有钱的话），为全家的早餐加菜。随着时令不同，宋太太可以买到各种不同的蔬菜，如晒干的红辣椒、鱼干

或白菜。有时有人会摆上二手衣物、鞋子与盘子，不过新品是禁止贩卖的，那些东西只能在国营商店才买得到。

一九九〇年代，饥荒正逐渐勒紧清津民众的脖子，但奇怪的是，有越来越多粮食出现在清津的市场上，拿出来贩卖的蔬菜包括白菜、樱桃萝卜、莴笋、番茄、青葱与马铃薯。这些全来自山区的秘密菜园。农民发现，想活下去最好的做法就是开垦山坡地，包括那些过去认定太陡而无法开垦的地方。这些私人农地得到最好的照顾，成畦的菜园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整齐 ，竹桩与格子架上爬满豆苗与南瓜，与此相对，集体农场则是乏人问津。

市场上突然出现四十公斤装的粗麻袋白米，上头印了罗马字母（UN、WFP、EU）、象征联合国的橄榄枝以及美国国旗。每个北韩人都认得，因为到处的宣传海报都能看见滴着学或被刺刀刺穿的美国国旗。

为什么这些米袋印着北韩最恐惧的敌人旗帜？有人告诉宋太太，北韩军队俘获了美国军火贩子的白米。有一天，宋太太看到一批卡车驶离港口，上面载着类似的粗麻袋。虽然这些卡车挂着民间车辆牌照，但宋太太知道这些车子一定是军方的，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汽油。于是她才明白，这些是人道捐助白米，但军方却在市场卖出牟利。

无论是怎么来的，清津民众很高兴能看到白米，因为公共配给中心已经有好几年没有配给了。

每次去市场，宋太太都会感到惊讶。桃子、葡萄、香蕉。她不记得上次看到香蕉是什么时候——也许二十年前，长博那是带了一些香蕉回来给孩子吃。又一次，宋太太看到柳橙，真正的柳橙！她从未吃过柳橙，只有在照片上看过。另一次，她看到一种黄褐色斑驳想见的水果，顶端还长着绿穗。

“这是什么水果？”她问朋友，朋友告诉她这是凤梨。

这是第一次市场囤积了这么多便宜的家用商品，就连北韩人也买的起。邓小平一九七〇年代与一九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成果已经慢慢渗透到北韩境内。从中国运来了书写纸、原子笔与铅笔、芳香的洗发精、梳子、指甲刀、刮胡刀、电池、打火机、雨伞、玩具小汽车、袜子。北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生产这些物品，原本寻常可见的东西也能让北韩人感到吃惊。

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东西是衣服，完全没有见过的色彩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粉红色、黄色、橙色与蓝绿色——这些色彩就像热带水果一样鲜艳，这些出现在市场上的纺织品比北韩自行制造的更柔软也更光亮。偶尔你在市场看到品质不错但标签被撕掉的衣服。小贩私下说，这些都是来自于“下面的村子”。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指南韩。民众愿意花更多钱购买帝国商品。

每当宋太太来到市场，总觉得市场越变越大。老太太在地上铺层帆布蹲坐在上面的景象已不复见，数百名小贩把商品陈列在木架或推车上，他们摆出桌子，把商品放在箱里或撑伞避免日晒。

清津最大的市场出现在水南江边荒废的工业区里，这个地区从港口往内陆延伸，直到市中心。水南市场位于残破的黄雪纺织工厂后方，逐渐发展成北韩最大的市场。它看起来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市场很类似，分成几个区域，除了食品外，还有五金、锅碗瓢盆、化妆品、鞋子与衣服。直到二零零二年，金正日才慢吞吞地让市场合法化，但清津当局却早一步承认既有现实，制定了管理法规。市场管理单位向摊贩收取租金，一日七十元，相当于一公斤的白米。有些摊贩无力负担租金，就把摊位设在门外，造成市场日渐扩大，甚至溢出到岸边的斜坡上。宋太太的饼干生意从未扩大到足以设摊的地步，而她也不想付租金，不过还是加入了某个摊贩社群。他们位于松坪区某个市场旁边，松坪区在清津港的西边。宋太太赚了点钱，就搬到这个区。

市场像磁铁一样，吸引其他生意上门。出了水南市场，在爬满蜀葵的石灰墙边，停了一排捡漏的木头推车。车主经常睡在车上，等着需要送货的人前来叫车。清津没有计程车，连中国式的人力车或三轮车也没有（北韩政府认为这种行业贬低人的身份），但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有民众当起挑夫。美容师与理发师由国家便利局训练，这个机构理应提供各项服务，设立可以穿街走巷的理发摊子。这些理发师只需要剪子与镜子。他们在小吃摊附近工作，总是与其他摊贩处得不愉快，因为卖小吃的担心头发飞到他们的食物里面。理发师要眼明手快，既要当心不要剪掉客人耳朵，又要留意警察，要是被发现他们做私人买卖，手上的生财工具会被没收充公。理发是门赚钱生意。妇女就算肚子饿，也会把手上最后一分钱拿来理容烫发。

街道旁有个市场，人们在此设立临时小吃摊，两块砖块之间架块板子当桌子，篮子倒过来成了椅子。客人吃得很快，热腾腾的汤或面三两下就吃光，末了还用汤匙把残羹刮干净。厨子一边转着老式风箱煽火，一边冒汗在油漆罐大小的铁桶炉钱烹煮。经常可见妇女背着孩子蹲坐在火炉前煮食。

摊贩绝大多数都是女性。韩国人认为身份低下的人才会在市场卖东西，所以传统上市场行业都由女性从事。一九九〇年代，市场不断扩大，但人们对于市场依然存有偏见。男人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以维持北韩正常运作，至于妇女则无足轻重，她们有没有工作都无关紧要。朱成河是清津的脱北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正日默许妇女私下工作是为了舒解她们的家庭压力。“如果不让这些太太工作，可能会爆发革命”，朱成河说。

结果新经济的面貌越来越充满女性色彩。男人坚守着拿不到薪水的国家工作岗位，真正在赚钱的都是女人。“男人连看门狗都不如”，有些太太私底下这么说。女人赚得钱比男人多虽然不足以摇撼数千年的父权文化，但这笔钱却能让她们获得一定的自主地位。

表面看来，清津没什么变化。史达林时代的办公大楼灰蒙蒙的正面瞋睨着渺无人车的柏油大道，马路两旁仍竖立着褪色的红色宣传看板，颂扬金正日与劳动

党的成就。事实上，这个地方的时间好像静止了，仿佛全世界的历史停在一九七〇年。但宋太太看得清楚。她所生活的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上就是下，错就是对。女人赚钱而非男人赚钱。市场充满食物，比绝大多数北韩人一生能看见的食物还多，但人民仍然死于饥饿。劳动党的党员饿死，对党毫无贡献的人发了横财。

“钱串子”，宋太太低声咒骂着。

过去，宋太太知道自己与周遭认识的人一样穷，因此能安于贫困。现在，她却看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些人做的事情在十年前是经济犯罪，但这些人现在缺脚踩皮鞋身穿新衣洋洋得意地走着。反观那些全职工作的人却还是饿着肚子。通货膨胀已经失去控制。一九九八年底，黑市米价打倒一公斤两百元。即使薪水重新发放，一般的办公室员工或老师每个月也只能帮家里买到两三天粮食。孩子必须趴在地上捡拾从米袋细缝掉落的白米或玉米。

宋太太认识一名九岁男孩，这个男孩名叫成哲，他常跟父亲来市场。他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其他摊商都叫他“梨子大叔”，因为他以卖梨为生。但梨子的生意不好，梨子大叔很难让全家人吃饱饭。

“为什么你不跟其他孩子一样去抢点东西吃？”梨子大叔有一天在市场这么对儿子说。

成哲是个听话的孩子。他跑到打人喝酒吃螃蟹的地方。回到父亲身边后，他抱怨肚子痛，因为他从地上捡了坏掉的鱼内脏来吃。等到梨子大叔有钱雇挑夫带儿子上医院时，成哲已死于急性食物中毒。

宋太太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与快死的人。虽然她经历过与家人的生离死别，但仍无法习惯死亡的持续出现。有天晚上，她从市场返家前，特地绕到火车站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饼干卖出去，只见工人迅速走过车站广场，有两个人拉着一辆沉重的木头推车。宋太太注意他们运的东西。上面载着尸体大约有六具，这些人是在火车站过夜死去的，皮包骨的四肢悬在车外。当车子推倒路面时，有颗头缓慢抬起，宋太太仔细一看，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的眼神微弱无力，虽然还没死，却也到了该用推车送走的时候。

宋太太不禁想起挚爱的丈夫与儿子。她多么幸运啊，至少他们是死在自己家里，她还能给他们适当的葬礼。

北韓市場的男孩



第十一章

流浪的燕子

宋太太经常到清津火车站叫卖，有时会在路上看到一个男孩，他穿着靛蓝色的工厂制服，由于衣服的尺寸太大，裤裆部分几乎垂到他的膝盖。男孩蓬乱的头发爬满了虱子，脚上包着乙烯塑料袋充当鞋子。他的年龄不容易判断，也许是十四岁，但体格却跟美国八岁大的孩子差不多。

如果宋太太有剩下的饼干，她会给这孩子一块。如果饼干卖完，她就会直接走过，尽量不去看他。这个男孩跟在火车站前徘徊的数百名孩子没有两样。北韩人称这些孩子是“流浪的燕子”，他们的父母要不是死了，就是外出寻找食物。这些孩子被留下独自生活，他们像企鹅一样聚集起来，在火车站寻找食物碎屑。北韩过去从未听过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却出现这种奇异的迁徙景观。

金赫虽然个子娇小，却结实而机灵。如果你在车站买零嘴吃，他会趁你把东西塞进嘴里之前一把抢过来，然后一口吞下。小贩在装食物的篮子上紧紧裹了好几层网子，以防有人偷窃，但就在网子掀开的那一瞬间，金赫会一脚踢倒篮子让食物散落一地，拿了就跑。在食物缺乏下，他很小就学会这种技巧，随着年龄渐长，首发也越趋纯熟。如果不这样做，他恐怕活不了多久。

金赫成为火车站的游民，他的例子见证了北韩核心阶级的没落。金赫原是特权阶级子弟，一九八二年，他出生在一名忠贞共产党员的家里。他的父亲服役于菁英军事单位，负责渗透南韩。他后来获得劳动党党员身份，进入军方经营的公司上班，这间公司专门出口鱼类与松茸，藉此赚取外汇。金赫家住在水南区，就在化学纺织工厂附近，他的母亲也在这里工作。金赫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其他女工的子女也被送来这里。

金赫的人生开始变调，起因于母亲突然在他三岁时心脏病发过世。他对母亲的脸孔几乎没有印象，唯一的记忆只有葬礼时焚香的气味。金赫的父亲随即再婚。金赫与大他三岁的哥哥金哲经常为了食物与继母争执。

两兄弟都很淘气、顽皮，而且经常饿肚子。他们相信继母一定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同父异母妹妹比较多的东西吃，所以从厨房偷了玉米穗轴到市场换取煮熟的面吃。当继母把食物柜锁上时，他们就偷走她的毛毯去换食物。

金赫第一次偷陌生人的东西是在十岁的时候。他从一个小贩的推车上偷了一块包了红豆馅的米糕，然后逃跑。他的腿虽短但跑得飞快，小贩追不上他，照理说他应该不会被抓到。但他不应该再跑回去偷第二次，只因为那米糕实在太甜太好吃了。

金赫的父亲到警察局接他回家时，羞愧地抬不起头来，泪水不断从两眼涌出。回到家之后，他的父亲用皮带狠狠抽他一顿，他的小腿因此留下一道道红色的伤痕。

“我的孩子怎么会去当贼？”他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说：“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

金赫不这么认为。他继续偷窃，而且寻找食物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远。清津南

方的镜城郡有几座矿坑，过了矿坑就是果园。金赫与朋友经常攀着公车的后保险杆前往果园。一九九〇年代，他一直持续这种做法。梨子捡完了，他们就偷玉米。就算被抓，京味也会看他年纪小，口头警告一番就放他回去。金赫对于自己的偷窃行为毫无悔意。即使在金日成去世的国丧期间，他还是照偷不误，前往大铜像致意的民众可以分得的米糕，他多拿了好几个。

金赫的父亲对儿子的行径感到愤怒，却苦无吓阻良策。家里几乎没有粮食，金赫的继母也带女儿回娘家生活。他的父亲不断地换工作，后来成为精神疗养院的党委书记。他把儿子安置在看护原先居住的房间。金赫喜欢疗养院的生活，也喜欢跟病人说话；病人跟他一样寂寞，跟他说话时总把他当大人，而不把他当孩子。但疗养院也缺乏食物。虽然金赫的父亲是党委书记，我有的权力比院长还大，却未因此获得更多配给。他唯一能得到的好处是，动用关系让自己的儿子住进孤儿院。

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北韩的孤儿院并未严格限制资格，它们也收容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孤儿院如同寄宿学校，提供教育、房间与伙食。能进入孤儿院等于是一项特权。

东城二十四号孤儿院位于稳城郡，这个郡位于咸镜北道最北端，临近中国边境。九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带着两个儿子搭火车来到孤儿院，想赶在学年开始前登记入学。金赫此时十一岁，就读小学六年级；哥哥十四岁，就读国中。搭乘火车需要六小时的时间，在拥挤的列车上，父子三人都没有位子坐。它们就在阴郁的沉默中，一路站着抵达目的地。

“你们是兄弟，要彼此照顾，不要让别人骑到你们头上”，父亲签完交由孤儿院抚养的同意书后，再三叮嘱他们。

当父亲转身离去时，金赫这才惊觉父亲的衰老。曾经高大英挺的他，如今变得枯瘦憔悴，背脊微弯，发丝已渐花白。

至少一开始，孤儿院的餐厅还能让兄弟俩吃顿饱饭。当时正值秋天，是收成的季节，粮食相当充裕。两人很高兴每天都能吃到一碗白米饭，即使饭里还掺杂玉米、大麦与廉价的谷物，但这已是他们这几年来吃过最好的东西了。春天来临时，他们发现孤儿院的树林种有杏树，他们可以捡拾杏仁来填饱肚子。

但到了冬天，粮食停止配给，没有白米饭，孩子们吃的是上面漂着少许玉米面的加盐清汤。一九九六年的钱三个月，孤儿院死了二十七名院童。金赫与哥哥翘课到镇上找东西吃，他们发现镇上的情况不比孤儿院好。金赫遇见一名与他同龄的男孩，他还带着一个六岁妹妹，两人的父母已经死了。邻居会定期煮粥给他们吃，其余的时间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金赫与哥哥还有他们的新朋友，四人一起去寻找食物。金赫擅长爬树，他修长而强壮的手臂弥补了粗短的双腿。他可以爬上松树，用锐利的刀子剥掉外层树

皮，取得内层柔软的部分。黄色的树皮耐嚼且带有些许甜味，有时金赫一边爬树一边嚼了起来。其他人也会爬树，但金赫可以爬得更高，高出的树皮几乎是完好的。

“你是只小猴子”，他的朋友赞美他。

金赫成了一名猎人。他猎捕大老鼠、小老鼠，青蛙与蝌蚪。当清完被猎捕一空时，开始捕捉蚱蜢与蝉。小时候在清津，金赫常看到朋友字水南江边抓蝉来吃，他觉得很恶心。但现在没那么挑剔。他制作网子涉及陷阱捕捉麻雀，用线绑住玉米仁，左右晃荡作为诱饵，抓到之后拔去鸟毛，用铁叉固定烤熟下肚。金赫也尝试捕捉鸽子，他使用脸盆还有绳子，却发现鸽子比他想的聪明许多。

够就没那么聪明了。金赫发现一只友善的小流浪狗，摇着尾巴跟着他走进朋友家的院子。金赫关上门，跟朋友一起将狗抓起来丢进装满水的桶子里，然后盖上盖子。这只狗足足挣扎了十分钟才死。他们剥掉他的皮，烤来吃。狗肉是一道传统的韩国菜，虽然喜欢动物的金赫对吃狗肉并无好感，但他还咩有厌恶到从此不吃狗肉的地步——尽管到了一九九六年，狗已经非常稀少。

金赫继续偷窃，他跟哥哥翻墙到别人家的菜园里挖掘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直接从坛子里舀出泡菜，当场就吃进肚子里。

自始至终，金赫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

金赫想象自己与父亲的对话，他反驳说：“人死了还充什么英雄。”

金赫很怀念故乡。他想念父亲和金哲。当金哲满十六岁，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承诺年龄时，离开了孤儿院。金赫一直依靠哥哥做他的保镖，在他任性胡为时保护他。金哲遗传到父亲的提拔身材，没有他，金赫被打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天，金赫到野外砍柴时遇到了一群来自稳城的男孩，他们也来砍柴。镇里的孩子经常找孤儿院的孩子打架，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对方偷他们的粮食。起初金赫以为他们泼他一桶水，后来才发觉自己的脚上全是血，斧头砍中了他的大腿。金赫的伤一号，就决定偷偷搭乘火车返回清津。

金赫抵达清津时，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故乡。清津看起来就像座死城，破败腐朽毫无生气。店铺全停止营业，车站附近的路面电车也停驶了。他沿着与海岸平行的一号道路步行回家。当他经过水南江时，能清楚望见河岸那头排列整齐的烟囱，只是完全没有烟雾冒出。过了桥，他从大街拐弯，往化学纺织厂走去，这是他母亲过去工作的地方。工厂的大门深锁，建筑物却已遭到破坏，窃贼早将里头的机器拆卸一空。随着天色渐渐昏暗，金赫走到家附近时已无法分辨方向，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没有月亮的夜里站在农田中央。童年时存在的建筑物，在他离家期间似乎移了位置，隐没在黑暗之中。

金赫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他推开未锁的前门，在黑暗的楼梯井摸索拾级而上，数着楼层。公寓实在太安静了，感觉好像没人居住似的，除了随着他上楼而更加

响亮的婴儿啼哭声。金赫举得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的。他家在八楼，再往上就是顶楼。当他走上楼时，看到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也许是油灯，他重新燃起希望。

金赫敲敲门，来应门的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妇人，她怀里还抱着婴儿。她请金赫入内，向他解释大约在一年前，她和丈夫向金赫的父亲买下这间屋子。他没有留下地址，但留下明确的讯息："如果我的儿子回家，告诉他们来车站找我。"

清津车站，当人们一文不名无家可归时就会来此。人们并非完全放弃希望或只是倒在路边。火车的来去制造了一种目的的假象，让人产生能够对抗命运的希望。人们幻想火车进站带来吃的东西，或火车出战前往更好的地方，而你可以跳上车一同前往。清津是铁路网大站——南北线往海岸眼神与往西通往中国边境的铁路连接。民众来清津寻找食物，因为其他城市如咸兴、吉州、金策的情况更糟。人们不断地移动，他们未曾放弃。

清津车站是一座巨大高耸的花岗岩石建筑，有一排狭长的窗户，楼高两层。高处悬挂着巨幅金日成的肖像，与建筑物的大小成比例。肖像下方是时钟，钟面以石子打磨而成，但这座钟几乎从未准点。车站里弥漫着火车废气与香烟味。

人们蹲坐着等待火车，累了就躺在候车室地板上，昏暗的走道因此拍了一列人龙。金赫在人群中穿梭，寻找四肢修长的父亲躺卧的身影。他弯腰凝视每张脸孔，希望能看到认识的人。金赫有许多邻居生活在车站肮脏的角落，但没有人知道父亲与兄长的消息。金赫咩有地方可去，他看到收纳沉重铁门的小细缝，于是缩起胸部，钻到里头，蜷曲着身体，断断续续地睡去。隔天早晨，他发现一个有水可用的水龙头，他洗脸，但洗不掉头上的虱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韩，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北韩为了掌握人民行踪，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你必须根据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导配给——如果你离家出走，你就领不到粮食。民众不敢在没有旅行许可的状况下到临镇拜访亲人。外地来的客人就算只是过夜，也要向人民班报备，由人民班向警方通报客人的姓名、性别、登记号码、旅行许可证号码与来访目的。警察固定在午夜时分进行抽查，确保咩有人赶在未经授权下来往各地。民众必须随时携带"公民证"，这是一本厚十二页如护照大小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证件主人的完整资讯。这种公民证是仿效旧苏联身份证设计的。

然而饥荒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没有粮食配给，就没有理由待在固定的住址。如果枯坐只能等死，那么政府再怎么威胁，人民也不可能乖乖待在家里。这是第一次，北韩人民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国家到处游荡。

在无家可归的人口中，儿童与青少年占的比例极高。有些是父母离家寻找工作或食物。但有些理由十分奇怪。面对粮食短缺，许多北韩家庭做了残酷的决定——父母与祖父母绝食，让孩子活下去。这种做法造成大量的孤儿，因为孩子通

常是一个家庭最后死亡的成员。

流浪的燕子是火车站里最醒目的一群。与金赫一样，他们搀着打人的靛青色工作服，小小的身躯悬挂着大一号的衣物。已经关闭的工厂还有多余的工作服，当局于是面风奉送这些衣物，并且称之为“团体服”。孩子几乎都没有鞋穿。就算有，也会马上拿去换取食物，然后把塑料袋套在脚上。他们的脚因此经常冻伤。

粮荒刚开始的时候，火车站的孩子还能靠乞讨为生，但不久，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那么多人有食物分给他们。“吃饱了才有慈悲心”，北韩人常这么说；你不可能把食物分给别人的孩子吃，而让自己的孩子挨饿。

讨不到食物的时候，孩子就会将地上看起来可吃的东西捡起来吃。如果还是找不到食物，他们会捡起烟屁股，用纸屑将参与的烟草重新即卷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抽烟，这样可以让肚子不那么饿。

金赫曾经加入其他孩子组成的盗窃集团。清津因为街头帮派横行而名声败坏，但在艰困的环境下，帮派活动其实是一种求生方式。孩子依照年龄大小分工，年纪较大的孩子速度快体力好，而年纪较小的孩子一旦被抓，比较不容易被打或扭送警局。大孩子会冲到食物摊前把东西撞倒，等到食物散落一地，他们拔腿就跑让愤怒的小贩在后面追赶他们。此事小孩子就趁机把地上的食物捡走。

另一种做法是寻找载运谷物车速缓慢的火车或卡车，用削减的木棍刺破装谷物的麻袋。掉下来的谷物就成了孩子捡拾的目标。铁路公司于是雇佣武装警卫，下达格杀令以吓阻这类盗窃行为。

这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赫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在火车站后面，靠近铁道边，有些小贩在小火炉上煮汤煮面，据说浮在上面的灰色肉块就是人肉。

无论这是不是都市传说，吃人肉的传言传遍了哥哥市场。宋太太从一名爱聊是非的太太口中知道这件事。

“不要买来路不明的肉”，那么太太私下警告。她宣称自己认识吃过人肉的人，那个人还说味道不错。

“不知情的人，还一口咬定那是猪肉或牛肉”，她低声对宋太太说，宋太太吓坏了。

故事变得越来越恐怖。据说有一名父亲饿到精神错乱，把襁褓中的孩子给吃了。还听说市场有一名妇女因为用人骨熬汤而遭到逮捕。根据我访谈脱北者的说法，至少发生了两件案子，一件在清津，另一件在新义州，有人因为吃人肉而遭到逮捕处死。然而这种情况应该不普遍，更不可能严重到像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成都，那场灾难造成三千万人死亡。

即使当中并未出现人吃人或抢掠的事件，这些在街头生活的孩子也活不久。

年纪较小的通常只能或几个月。宋太太的长女玉熙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公寓二楼，每天回家都会看到这些孩子。

“他们撑不到明天早上”，玉熙心里这么想着，多少是为了让自己狠下心来不对他们伸出援手。

我遇到许多清津人都提到有相当多的尸体散布在火车站周围与火车上。一名女工告诉我，一九九七年她搭乘从吉州开往清津的火车，后来才发现坐在同车厢的一名男子已经死亡。他是一名退役军官，僵硬的手指还紧抓着劳动党党员身份文件。她说，其他乘客完全无视尸体的存在。她猜想，火车抵达清津车站后，尸体就会被抬走。

清津车站负责清扫的员工定期巡视公共区域，把尸体抬到木头推车上。他们巡视候车室与站前广场，留意那些躺在地上的蜷曲身体，有些从前一天开始就静止不动。金赫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从车站清运了三十具尸体。很难确认死者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证件连同比较好的衣服与鞋子通常会被偷走。这些死者的家人很可能已经死亡或分散各处，所以他们的遗体全葬在集体墓园里。这在儒家社会来说是很不名誉的，一般认为祖先坟茔的位置会左右后代子孙的繁荣。

南韩的佛教团体“好朋友”（Good Friends）与美国援助官员安德鲁.奈特修斯（Andrew S. Natsios）曾在中国边境附近目睹集体埋葬的过程。他看到一堆尸体被用白色塑料布包裹起来，放入墓园附近的大坑里。之后，工人站在坑旁低着头，似乎是默哀或进行某种葬礼仪式。

金赫相信，他的父亲很可能就埋在那几座集体坟墓里。几年后，金赫遇到一名认识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曾住在火车站，一九九五年住进医院。这名曾发誓绝不偷窃自视甚高的男子，很可能是最早死于这场饥荒的受害者。

从金赫放弃寻找父亲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没有理由待在清津。他想偷偷搭上火车。这很简单。火车沿着铁轨缓慢而颠簸地行进，经常不按预定时间停车。金赫追上一列火车，抓住车厢之间的扶手，用猴子般的长臂将自己拉了上去。车厢非常拥挤，警察无法穿过走道一一检查每个旅客的旅行许可证与车票。金赫不喜欢封闭空间，于是他爬上车顶。火车车顶略呈圆形，就像面包一样。他在车顶中央找到一处平坦地带，他躺平身子避免触碰到头上的电线。金赫以背包当枕头，面朝上的躺了几个小时。他的身体跟着火车一起晃动，眼睛凝视天空移动的云朵。

起初，金赫活动的区域不超过清津外围。他回到镜城，幼年时他曾在此地偷梨子与玉米。但这里现在比较难偷了，农地又武装警卫巡逻，金赫必须走得更远。他回到稳城的孤儿院。此事的稳城情况已跟清津差不多。记忆中孤儿院附近茂盛的树林现在同样被剥得精光。他知道，离孤儿院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从宿舍窗户看过去，低矮丘陵的另一边，有一条细长的灰色河流——图门江——流向远处

你看不见的地方。在河的对岸，树木仍有树皮，而玉米田无人荷枪把守。

那个地方叫中国。

中国与北韩的疆界沿着两条河流延伸八百五十英里，这两条河川发源于同一座休火山，韩国人称为白头山，中国人称为长白山。往南流的是鸭绿江，中国军队在韩战期间就是在这条著名河川击退美军部队。今日，中国与北韩官方往来几乎都在鸭绿江注入黄海的河口附近进行。与鸭绿江相比，图门江宛如涓涓细流，水浅且水流平缓。往北的图门江蜿蜒描绘出北韩的东北疆界，最后在海参崴的西南方入海。图门江江面狭窄，即使在雨季水位高涨的时候，人们也能够轻易泳渡。

孤儿院的孩子不许接近图门江边。整个河岸线总是封闭的军事区域。如果他们在直流有用时太靠近禁区，边防警察会将他们驱离。河岸是平坦沙地，低矮植物不足以提供掩蔽。但是只要往稳城南方走一两个小时，就会到达一处人烟稀少的地区，这里的河岸长满灌木与高耸野草。边防卫兵的位置相当分散，入夜后就可以偷偷穿越。两名卫兵轮流站哨，一名睡觉，另一面负责警戒，但过了凌晨一点，通常两人都会睡着。

金赫首次渡过图门江是在一九九七年底。那时是干季，河川水位低，国界两边的河岸沙地就像两个指尖一样伸向彼此。但是河水冰冷，当金赫走入水中时，差点受不了刺骨的寒冷。虽然河面并未高过他的胸部，但暗流仍不断扫过他的双足。河水将金赫带往下游，最后他只能以走对角线的方式渡河。当他终于在冷风中爬上对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结冻，硬的像盔甲一样。

金赫想来对中国不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只是另一个跟北韩一样穷得共产国家。表面上看来，两国没什么分别，但随着他从河岸往里头走去，看到绵延数英里等待收成的玉米田，潇潇的红砖房堆满高及屋瓦去壳玉米，格子架上爬满南瓜藤与豆类植物。他走到某个小镇，热闹的程度超乎他的想象，有计程车、速克达与人力三轮车。招牌既有中文也有韩文。令他高兴的是，当地有许多居民虽然是中国公民，却是韩裔，会说韩语。他们马上认出金赫是北韩人，不只是因为他的衣衫褴褛。十五岁的他只有四尺七寸（一百四十公分）高，相对于身体，他的头显得很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显著特征。当孩子长期营养不良时，他们的头会长到正常大小，但四肢却发育不良。

金赫在市场遇到一名男子，他专卖二手餐盘、首饰与小古董。这名男子问金赫能否从北韩带熨斗给他——这是一种放在煤炭上加热的旧式熨斗。几乎每个北韩家庭都有这种熨斗，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使用，因为大家身上穿的衣物多半是合成纤维。金赫不用花什么钱就在北韩买到这些熨斗，这些熨斗在中国一只可以卖到十美元。他这辈子从未看过这么多钱。有了这笔钱，金赫返回北韩买了更多东西。陶瓷器、珠宝首饰、绘画与玉器。他买了一条背巾，传统韩国妇女用这种布来背孩子，但他用这种布把商品绑在背上，这笔背包装的东西多。

金赫定期穿越边境。他寻找边防卫兵特别不注意、懒惰或腐化的地点。他发现过河前最好先脱下身上衣物。他越来越熟练，后来连身穿衣服渡河也不会重心不稳，他将商品高举过头（为了预防不慎跌倒，他还用塑料布将商品紧紧裹住）。他从不在中国久待，因为有人警告他，中国警察会将越境的北韩人抓起来交给北韩政府。

金赫不再偷窃。如果他想吃碗面，他会用自己的钱去买。他买了裤子、T 恤、蓝色雪衣与胶底运动鞋，让自己看起来不再像个难民。他试着回归正轨，掌控自己的人生。私下购买物品转卖获利是违法的，没有旅行许可证跨越国境更是罪加一等。十六岁的金赫在法律上已算是成人了，一旦被抓，他将遭受严厉的处分。

立正站好的北韓平壤衛兵



第十二章
人人自危

北韩人有很多表示监狱的词汇，正如伊努特人（Inuit）有很多形容雪的词汇。反了轻罪的人，例如旷职，可能被送到拘留所或劳动锻炼队。拘留所是人民警察署（基层警察单位）管理的拘禁机构。劳动锻炼队是劳改营，凡人会被判处一到两个月的重劳动，例如铺路。

最恶名昭彰的监狱是“管理所”，实际上就是劳改营，分布在北韩最北边的山中，绵延长达数英里。卫星情报显示，北韩的“管理所”拘禁的人数达二十万人。金日成取得政权后不久便仿效苏联古拉格设立了劳改营，以清除可能挑战他权威的人，例如敌对的政治人物、地主或通敌者的子孙、基督教教士。有些人因为阅读外国报纸北部。有个男人喝了太多酒，揶揄金正日的身高，“侮辱领袖权威”是最严重的“叛国罪”。宋太太工厂有一名女工因为在日记里写了政治不正确的东西而被带走。我认识的北韩人都提到，他们知道（或听说）有人在半夜被带走，从此再没回来。“管理所”的刑期是终身监禁。子女、父母与兄弟姊妹通常也会被一起带走，以免“有污点的血统”继续传承下去；配偶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幸免于难，但必须强制离婚。几乎没有人知道“管理所”内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现身说法。

另一种劳改营叫“教化所”，设立教化所的目标是让犯人改过变善。教化所针对的是非政治犯。凡是非法跨越国界、走私或单纯从事商业者均属此类。与关政治犯的管理所相比，教化所比较不可怕，因为理论上这里的犯人最终都会被释放，但前提是犯人必须努力活下去。

金赫刚过完十六岁生日就遭到逮捕。当时他待在稳城一名朋友的家，离孤儿院不远。在金赫心中，要说有什么东西与家最接近，那就是孤儿院，他总是忍不住回孤儿院探望。金赫去中国好几趟，此时的他才刚从中国回来——事实上，光是去一趟就已经够危险了，因为他的行动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

金赫等待八月白昼的暑热消退，好劈点柴火。下午四点左右，他走到后院，看见一名男子，而后又看见另一名，两人正看着他。他发现这两名男子没有穿制服，但两人的眼睛十分专注，显然是为他而来。金赫拿起斧头，绕过房子慢慢走到前面，心想自己要赶紧翻墙逃跑。但他发现有更多人站在门口，全部也许有八个人。于是他决定不轻举妄动，开始劈柴，仿佛劈柴的声响可以驱散内心的焦虑与急促的心跳。

便衣警察把金赫带到市中心的公署。这些人来自保卫部，负责调查政治犯罪。这比金赫想象的严重得多。他在中国时曾为一些想潜入北韩的中国商人绘制地图。根据北韩刑法第五十二条被判祖国罪的规定，他的行为等同于叛国：“共和国公民逃往外国或敌国，包括在外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或自主敌国机构或公民，担任旅行向导或口译，或提供精神或物质协助……应判处死刑。”

警察利用角材，屈打成招。他们殴打金赫的背、肩膀、腿、脚与手臂，几乎身上所有地方都打遍了，除了头部，他们希望他保持清醒。金赫为了闪避棍棒，象胎儿一样蜷曲着身体。这里没有监狱，只有办公室。警察把他所在房间里，房间小到让他无法躺下，瘀伤的身体一碰墙就令他疼痛难忍。他夜里无法入睡，到了白天，即使遭到殴打，他发现自己仍不知不觉睡着或失去意识。金赫不知道自己还能期待什么。虽然他的噩运连连，但在此之前也只被逮过一次，那是他十来岁偷米糕的时候。他是那种总能顺利摆脱困境的孩子。现在他长大成人，却被当成重罪犯。他感到一筹莫展、挫败、毫无尊严。询问时，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拷问者想知道什么，他就说什么，但他们只想找到中国商人，而金赫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几个月后，警察将金赫移交到普通的郡监狱，他在那里又被重新拷问一遍。

金赫未获审判，但国家安全警察却放弃对他的叛国指控，因为他们找不到中国商人，也不想因此受到追究。金赫被起诉的罪名改成非法跨越国境。这个罪也是重罪，他被判处三年劳改。

第十二号教化所位于会宁市郊，会宁也是边境城镇，大约位在文成南方四十英里处。金赫上了手铐，搭乘火车前往该地。他在车站看到其他被押送前来的犯人。他们被用粗绳绑在一块，整队齐步通过市区，然后入山前往劳改营。引擎隆隆作响，沉重的铁门缓慢开启迎接这群新抵达的犯人。门上方题着金日成的语录，但金赫害怕到不敢抬头去看上面写了什么。

金赫首先被带到诊所，他在这里量了身高体重。劳改营没有制服，犯人仍穿着自己的衣服。如果衬衫上有衣领，那么这些衣领会被剪掉，因为领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劳改营的犯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东西。明亮颜色的衣服会被拿走。金赫在中国买的蓝色夹克被警卫没收。另一名犯人则拿了他的胶底运动鞋。

这座劳改营容纳约一千五百名犯人，金赫看到的几乎全是年纪比他大的人。他是年纪最小的，但不是最瘦弱的。先前被拘禁在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反而吃的不错——局里只有几名犯人，所以警察会到市场买面给他们吃。当金赫在劳改营吃到第一顿晚饭时，他才了解为什么这里的犯人身上长满瘤而且身体虚弱，为什么他们的肩膀只剩皮包骨，象衣架一样从 T 恤里凸了出来。警卫发给犯人一人一粒米球，但实际上里面大部分是玉米、玉米穗轴、玉米壳与玉米叶。米球的大小约等于一颗网球，可以轻易放入金赫掌心。这就是晚餐，有时除了米球，还可以吃到一点豆子。

犯人从早上七点开始工作，直到日落为止。劳改营名副其实存在各种产业，包括木材厂、砖头工厂、矿场与农地。劳改营从家具到脚踏车，每件东西都能生产。金赫被分配到一个负责砍柴的工作班。因为他个子太矮，所以只负责登记其它人收集了多少木柴。他也要负责记录犯人的休息时间。金赫不认为自己得到这

份工作是运气好。他怎么管得动这些比他大十岁的犯人呢？

“他们受什么惩罚，你也要受什么惩罚”，卫兵分配工作给金赫时咆哮说：“如果有人想逃，他们会被枪毙，你也一样。”

虽然不是在金赫监督下发生的事，但的确有人试图逃走。这个人悄悄溜出工作班，躲进树林寻找逃亡路线。但是劳改营的围墙将近十英尺高，上面还缠绕着像剃刀般锋利的铁丝网。这名男子在树林里躲了一整夜，最后回到前门讨饶。事实上，他们的确饶他一命，并且宣称这是“父亲般的领袖施予的慷慨”。

唯一犯人允许停止工作时间是用餐、睡觉与意识形态课程。新年期间，犯人必须复诵金正日的新年讲话，直到每个字都能背诵为止。“全体人民必须在今年加快步伐，坚定支持政策，强化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科学与技术。”

晚上，犯人睡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五十个人一间房。他们只有几条毯子，所以只能挤成一团彼此取暖。有时十个人睡一条毯子，头对着脚交错着睡。夜里，大家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但她们会彼此搔背或按摩对方的脚，然后放松入睡。为了让更多人盖到毯子，他们经常头对着脚交错着睡，这么做也能按摩彼此的脚。

金赫刚进劳改营时，惧怕其他犯人就像惧怕卫兵一样。他原以为这关着残忍的杀人犯、令人恐惧的暴力犯与强奸犯。事实上，饥饿的附带效果是生理欲望的减少。劳改营里几乎没有性活动，也很少有斗殴事件。除了有人偷了金赫的鞋子，这里的犯人凶恶程度甚至不及他在火车站遇见的孩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犯”，因为在边境或市场做生意才惹上牢狱之灾。这些人当中，真正算得上小偷的其实偷的也不过是粮食。有一名四十岁的牧场主人，过去曾在饲养牛群的集体农场工作。他的罪名是未通报产下的一头死牛，反而将这头死产的小牛带回家给妻子与两名子女吃。金赫遇见这个人的时候，十年刑期他已经服完五年。金赫经常跟他睡同一条毯子，他的头枕在那名男子的手臂上。这名牧场主人个性温和言语轻柔，但是某个资深卫兵非常讨厌他。他的妻子与子女探望过他两次，都不得其门而入，也不许送吃的给他，卫兵只将这种特权给予他比较喜欢的犯人。

这名牧场主人最后是饿死的，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他睡着，但没有醒来。人们在夜里死去，这种情况很常见，通常只有睡在旁边的人才会发现，因为快死的人会尿失禁，唇边会出现微小的泡沫，宛如液体渗出体外。通常人们会等到早晨才挪动遗体。

“嗷，某个人死了”，有人会先平淡地陈述这项事实，然后在告知卫兵这件事。

犯人的遗体会在他们平日砍伐的山上火化。家人要等到探亲那天才会得知亲人的死讯。光是金赫睡的那间房间，每星期就会有两道三人死亡。

“没有人想到自己即将死亡。他们都会以为自己会活下去，可以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但事情就是发生了”，几年后，在首尔生活的金赫这名对我说。他才刚从华沙举行的人权会议回来，他到那里是为了作证。开完会之后，他去了一趟

奥斯维茨，发现当中有许多地方跟他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在劳改营里，没有人被送入毒气室，如果有人身体太虚弱而无法工作，就会被送到另一座监狱。虽然诱人被处决或殴打，但最主要的惩戒方式还是克扣粮食。北韩政权最喜欢以饥饿来除去敌人。

金赫对于第十二号教化所的生活所做的描述是否真是，我们难以证实，但也无法反驳他的说法。他叙述的细节，许多都与其他脱北者（无论是之前的犯人还是卫兵）的证词相符。

金赫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从第十二号教化所获释。金赫被判三年徒刑，如果加上他被警察羁押的时间，其实一共只服刑了二十个月。狱方告诉他，他获得赦免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劳动党建党周年纪念。但金赫相信，狱方释放他是为了腾出空间容纳如洪水般涌入的犯人。北韩政权还有比金赫来得重要的敌人。

“粮食问他正创造出一种无政府状态”，金正日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金日成大学演说时抱怨。他警告，私人市场买卖的出现，将导致劳动党“土崩瓦解……就像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与世界其他强人一样，金正日深知这句老话的重要，那就是绝对专制的政权需要绝对的权力。生活中一切好的事物都必须由政府掌控与给予。他不能容忍人民自行外出寻找食物或用自己的钱购买粮食。“告诉人民自行解决粮食问他，只会增加农民市场与小贩的数量。而且造成民众的利己心态，党的阶级基础可能动摇。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明证。”

随着粮食短缺问题逐渐稳定，金正日觉得自己在危机期间过度放任，因而决定反转这股自由化风潮。监狱挤满被安上新罪名的罪犯，小贩、商人、走私者，以及曾在苏联或东欧接受训练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这些过去曾信奉年国产主义的国家如今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北韩政权开始对可能威胁旧秩序的人士进行反击。

在此同时，金正日加强巡逻中国与北韩之间长达八百五十英里的边界。他加强图门江水浅地带的驻警数量，金赫先前就是从这些地方跨越国界。北韩人也要求中国政府追捕与遣返脱北者。中国便衣警察开始巡逻脱北者可能搜寻食物的地点，例如市场。中方允许北韩派遣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境内，这些警察有时会乔装成脱北者。

如果越界者只是为了寻找食物，那么只会被关几个月，但如果是为了跨界买卖或与南韩人或传教士接触，则会被送到劳改营。

就连无家可归的孩子也不能免于制裁。金正日知道，如果纵容民众（无论他们几岁）在没有旅行许可证明下搭乘火车与渡河前往中国，他的政权将会垮台。他建立了所谓的九二七中心，以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命名，他在这天下令为无家可归者设立庇护所。这些中心没有暖气，食物与卫生设施也很少。无家可归者马上看出这些中心其实是监狱，于是尽一切努力避免被警察抓住。

清津是这道命令的第一个受害者。清津是咸镜北道首府，从朝鲜王朝时代开始，这里就是流亡者、异议人士与非主流人士的聚集地，此时它又再次与政治中心龃龉。咸镜北道比北韩其他地区更早失去粮食供应。有些人认为，金正日是故意切断对咸北的粮食供应，因为他相信这里是较不忠诚的地区。除了咸兴，清津营养不良的比例大概是全国最高的，而这也造成清津的地下经济提早发展。

“为什么政府不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市场的妇女满腹牢骚。

“没有人理会政府”，几年前一名清津的年轻人对我说。

清津其实跟北韩其他城市一样，都偏离了党的路线。到了二零零五年，清津的水南市场已经成为北韩最大的市场，拥有的商品种类远超过平壤。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凤梨、奇异果、柳橙、香蕉、德国啤酒与俄国伏特加，甚至能买到盗版的好莱坞电影 DVD，不过一般的小贩不会公开贩卖这些东西。上面印着人道援助的成袋白米与玉米公然在市场上贩售。性的买卖也坦然无隐。在清津火车站拉客的妓女，大喇喇地从事卖淫工作。相对于过分拘谨的平壤，清津就像昔日的美国蛮荒西部。

金正日不可能让北韩第三大城市偏离劳动党坚持的路线。虽然清津的钢铁厂、化学纺织厂与机械工业因缺乏燃料而停工，但它仍是北韩工业引擎的核心。金正日希望让这些厂房重新恢复运转。从军事角度来看，清津由于地近日本而显得重要。日本是北韩仅次于美国的头号敌人，清津南方海岸地带的军事设施全是针对日本而来，其中包括舞水端里飞弹基地。一九九八年，北韩曾在此试射远距飞弹。

金正日在父亲去世的隔年，开始对驻扎在清津的第六军进行整肃。北韩拥有二十个军、数量达一百万人的地面部队，第六军是其中之一。第六军司令部设在罗南，这是清津市南部的一个区，位于煤矿区的北方。一天夜里，民众听到数十辆卡车与坦克震耳欲聋的引擎声，空气中充满车辆排放的刺鼻废气。整个军，包括三千名士兵、坦克、卡车与装甲车，全撤离了罗南。车队先在罗南车站周围集结，然后缓慢沿着颠簸的路面移动，发出巨大可怕的声响。居民感到恐惧，但谁也不敢起身从门缝偷窥。

《劳动新闻》与广播新闻对于这件事只字未提。要获得第一手资讯是不可能的，因为朝鲜人民军的士兵要服役十年，在这段期间他们远离家乡，无法与家人联系。

在没有确切消息下，谣言纷起。军队终于要与美国杂碎开战？南韩人发动攻击？政变？最普遍的说法是，第六军的军官图谋控制清津港口与军事设施，而他们在平壤的同伙也准备暗杀金正日，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在医院，金医师听病人说，这场政变是由中国富商资助的。（靠！要我有钱我真资助）

在幼稚园，老师们聚集在餐厅里专心聆听厨师的说法，厨师表示自己从亲戚那里获得第一手资讯，因为他的亲戚也参与了这场阴谋。他说，整件事是南韩总

统金泳三策动的。

一名学校老师宣称，她看到邻居——与阴谋者有亲戚关系——连同三个月大的婴儿一起被带走，因为他们的血统已带有污点。深夜时分，卡车过来带走他们。

"他们把婴儿丢到卡车后面，就象扔家具一样"，这名老师低声地说。婴儿在卡车后面翻滚的想象画面触动了美兰的恐怖神经，往后数年，无论清醒还是睡梦中，这幅可怕的场景不断纠缠着她。

最后，整个第六军都被解散，改由元山第九军的部队取代第六军驻防罗南。这段换防的过程拖延了好几个月。直到今天，确切的理由依旧成谜。

情报分析家驳斥政变的说法。多年来，北韩不断传出暴动、叛乱与暗杀的消息，但没有一件遭到证实。关于第六军，最合理的解释是金正日想加强控制军方的商业活动，因而解散了第六军。北韩军方设立各种贸易公司，出口各种物品，从松茸、鱿鱼干，到安非他命、海洛因——毒品称为北韩政权获取强势货币的主要途径。可能是第六军内部出现严重腐败，军官中饱私囊，所以这些人就像黑手党的小头目一样遭到老大的惩罚。一名军官于一九九八年叛逃到南韩，他向调查员表示，第六军的军官在清津郊区的集体农场种植鸦片罂粟出售牟利。

整肃军队后不久，清津出现了一连串怪事。平壤派了特别检察官来清津严办工厂贪污。她们锁定的目标是金策钢铁厂，它是北韩嘴大的炼钢厂，在一九九〇年代几乎完全处于停工状态；十根烟囱只有两根还在运转。有些管理人员将雇员组织起来，要他们收集废铁，然后越过中国边境去换取食物。当这么做还是不够时，他们就自行拆卸机器，然后运到边境贩售。卖掉设备得到的现金，至少有一部分是用来为工厂员工购买食物。

之后，检察官开释注意比较小的目标。他们处决的犯人包括从电线杆投去铜线换取食物的人、偷羊贼、玉米贼、偷牛贼与黑市的白米交易者。一九九七年，清津与其他城市纷纷贴出布告，警告民众，偷窃、囤积或甚至贩卖谷物是"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将予以处决。

北韩刑法把死刑限制在预谋杀人、叛国、恐怖主义、"反国家活动"与"反人民活动"上，但这些定义太宽松，凡是可能冒犯劳动党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南韩的脱北者提到，一九九〇年代，通奸、卖淫、拒捕、妨碍社会秩序都会被处死。在稳城，金赫待的孤儿院就位于这座边境城市，据传有四名学生因为喝醉裸奔而被处死。

北韩过去是个有秩序、质朴与凡事按规矩来的地方。如果有人被杀，通常是帮派斗殴或争风吃醋的结果。偷窃少之又少，因为大家都一样穷。民众知道规则，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限制这些规则全成了装饰品，生活变得混乱而令人恐惧。

位於平壤的人民大學習堂是北韓最大的圖書館，圖為正在研讀的學生



第十三章
井底之蛙

有一年夏天，俊相返乡过暑假，目睹了公开处决的过程。广播车连续几天都在宣传处决的时间与地点，人民班长也挨家挨户拜访。提醒民众前去观看。俊相对于这种场面完全不感兴趣。他讨厌看到血，也不忍心看到人或动物受苦。俊相十二岁时，父亲曾强迫他杀鸡。当他抓住鸡脖子时，手禁不住颤抖。“你连这个都做不好，还怎么当男人？”父亲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俊相最后还是乖乖地落下手中的斧头，与没头的鸡相比，父亲的取笑更让他害怕，但这段体验也让他晚上食不下咽。观看人类死亡，对他而言更是难以想像。他发誓绝不去看。然而到了行刑那天，当所有邻居都外出观看时，他发现自己也亦步亦趋随群众前往。

行刑地点设在溪边沙地上，离俊相与美兰夜间散步的温泉区不远。大约有三百名群众已聚集在当地，孩子们挤到最前面的位置，打算在公开处决后争抢留下的空弹匣。俊相穿过人群，挤到一个视野较佳的位置。

国家安全局将溪边空地布置成一个临时法庭，为检察官准备了几张桌子，也摆了两具巨大的扩音器与整套音响设备。犯人被指控爬上电线杆，剪下铜线之后拿去贩卖。

“这项盗窃行为对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害，故意破坏我们的社会制度。这是自主社会主义国家敌人的叛国行经”，检察官朗读判决文，他的声音透过沙哑的扩音器咆哮着。然后，一名看似被告辩护律师的男人说话了，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辩护：“我认为检察官说的千真万确。”

“因此，被告应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第三个人宣布判决。

这名被宣判有罪的男子被固定在木桩上，眼睛、胸部与双腿三个部位各被绑上绳子。行刑队依次射断三条绳子，每个位置三发子弹，从上到下总共九发。首先，市区生命征象的头部会垂下来，结着整个身体会由上到下慢慢坍倒在木桩下。干净利落。受刑人最后看起来如同在鞠躬时死亡，仿佛在道歉似的。

群众窃窃私语。不只是俊相，许多人都认为这么一件轻微的盗窃案件，判处死刑实在太重。

“真可怜，他还有个妹妹”，俊相听到有人这名说。

“两个妹妹”，另一个人说。

俊相心想，这个人的父母大概已经死了。显然他不认识什么权贵可以帮他疏通案子。他也许出身下层阶级，是矿工的儿子，就像美兰教的那些学生一样。

当俊相思索各种可能时，枪声响起。

头。胸。腿。

男子的头象水球一样爆了开来，鲜血喷溅在泥土上，差点洒到群众的脚。俊相觉得自己快吐了。他转身拨开人群，头也不回地朝家里走去。

对俊相来说，每次回到清津总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大学里，俊相完全隔绝于极度贫穷的生活之外。他可以吃饱，而且晚上有电可用。平壤顶尖大学的学生是特权城市里的特权公民。然而，一旦他离开学术的保护圈，现实就会

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俊相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都已关门——他幼年上的馆子，他首次遇见美兰的电影院。清津完全没有电力，除了少数国定假日，例如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生日。

晚上，家中是一片黑暗，俊相只能听父母不断抱怨。他在东京的祖父母虽然富裕，但已经过世，其它亲戚不像他们那么慷慨，愿意寄钱给穷亲戚。俊相母亲的风湿症十分严重，她无法走路到市场或使用她从日本带来的珍贵缝纫机。

每天晚上总是同样的戏码。俊相的父亲坐着抽烟，在黑暗中，香烟的余烬成了发亮的红点。只要他吞云吐雾，大声叹气，接下来大概就是要宣布什么坏消息。

“你知道谁死了妈？你记得......”

父亲提起俊相高中时几位老师的名字。他的数学老师。他的文学老师。文学老师是个电影迷，他曾经借了几本《电影文学》杂志给俊相，里面谈到东欧电影与电影的反帝国主义角色。这些老师全是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学校停止支薪后，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谋杀技能。俊相过去从平壤回来时，曾顺道拜访他的高中老师；老师们看到他总是很高兴，因为他表现得非常杰出。现在俊相却不想见到高中时代认识的人。他不想知道谁死了。

死去的不只是老人。俊相的母亲告诉他哪些同学死于饥荒，哪些人没考上大学而必须服兵役。俊相与 已失去联系，令他安心的是，就算时局如此艰困，当兵的同学也应该不会有事，因为军人总能优先取得粮食。毕竟金正日主张“先军政治”，一切以军事为优先。宁可牺牲学童，让强大的军队保护他们免于美国杂碎的轰炸。

但现在俊相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正确。清津附近的士兵看起来就像贫民一样，他们瘦弱的身躯撑不起原先穿的制服，职能勒紧裤带。士兵因为营养不良，整张脸呈现蜡黄色，而且许多人的身高只有五尺（一百五十二公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北韩军队被迫降低原本五尺三寸（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要求，因为年轻一辈普遍有发育不良的问题。）晚上，这些士兵不好好站岗，反而翻墙到老百姓的菜园里偷挖泡菜坛与偷拔青菜。

俊相的邻居绝大多数都将住家四周的围墙加高，无视于法令规定围墙高度只能达到五尺，好让警察能够探进围墙内。此外，俊相家的菜园曾经三次遭过小偷，他们拔走了大蒜、马铃薯与大白菜。俊相的父亲在菜园日志里详细记录了自己使用的种子种类与发芽时间。

“他们为什么不等这些菜完全长成再拔呢？”他痛苦地说。

俊相的母亲因为家中有只狗被偷而悲伤不已。俊相还小的时候，她养了几只珍岛狗的幼犬。她疼爱这些狗，狗的食物都是她亲自煮的。当她写信给在平壤念书的俊相时，信里提的都是狗的事。她不敢想象被偷走的狗儿可能被人吃了。

其实，他们应该感到庆幸，这回杀的只是一只狗。每个人都知道从日本回来

的家庭有的是钱，这些人往往成为窃贼的目标。他们村里有一户人家，因为小偷闯入而全家遭到杀害。俊相一家必须比以前更小心。他们在自家高墙的掩蔽下快速吃完晚餐，他们不想让邻居知道他们还能吃顿饱饭。

从此以后，俊相无法真心哀悼金日成的死，他发现自己对北韩体制感到幻灭。他所看到、听到或读到的每件事，都让他日渐远离政治正确的思考。他的大学经验也改变了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新的观念。

俊相小时候什么书都读，小说、哲学、科学、历史，甚至包括金日成的演说。清津书局卖的短篇小说，描写的多半是残忍的美国人、畏缩而胆怯的南韩人，与英雄般的北韩人；偶尔会有俄国小说，比如托尔斯泰或高尔基的作品。高中书籍通常由教材供应局提供。由于俊相的父亲收藏了丰富的希腊与罗马史书籍，所以俊相喜欢阅读古代战士的故事，如汉尼拔（Hannibal）与罗马帝国奋战，最后宁可饮鸩自杀也不愿沦为败军之将。

等到俊相来到平壤念书时，他已准备好接受更现代的观念。在大学图书馆员的书桌后面，有一小柜被翻成韩文的西方书籍。一般大众不许阅读这些作品，只有最顶尖的学生才能接触。北韩有些政府高层认为，国家需要的思想菁英必须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学知识。这些书的书名页没有标示出版社，但俊相听说这些书是由人民大学习堂所出版——人民大学习堂位于金日成广场，是北韩的国家图书馆，也是橱窗建筑之一。这套藏书甚至收录了美国的作品。

俊相最喜欢的作品是《飘》（G one with the Wind）。这本书的通俗剧风格与韩国小说差异不大。俊相对于美国南北战争与韩战之间的类似感到吃惊，他也惊讶于民族内部的斗争会如此邪恶——显然美国人也与韩国人一样勇于内斗。他认为美国人比韩国人好一点，在于他们最终成为一个国家，不像韩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俊相欣赏女主角郝思嘉（Scarlett O’ Hara）的勇气。她让俊相约略想起北韩的电影女主角，总是满身尘土，为祖国而战，但郝思嘉强烈的个人主义不是北韩文学欣赏的特质。而且北韩女主角绝不会有不伦之恋。

从北韩的标准来看，《飘》的内容几近猥亵，但俊相希望阅读更多的西方作品。他把所有找得到的书籍全借出来，从席尼.薛尔顿（Sidney Sheldon 大陆译作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之怒》（Rage of Angels 大陆译作《天使的愤怒》）到买西亚.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大陆译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Solitude）。他甚至读了《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这是一九三〇年代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自助经典。俊相第一次接触西方的商业观念，令他感到震撼。他不敢相信卡内基居然给予读者这样的忠告。

“学习喜爱、尊重与欣赏其他人。”

美国资本主义作品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俊相问自己，资本主义敌人不

都是依据丛林法则行事吗？不是杀人，就算被杀。

俊相也跟同学借书。在顶尖大学里，许多学生的亲戚握有权力，她们出国旅行洽谈生意并且带回书籍与杂志。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找到许多韩文书籍。俊相透过同学拿到一本中国教育单位出版的性教育书籍，他再次开了眼界！俊相发现自己与其他二十几岁的未婚朋友对性的了解还不如一般的中国学童。想了解女性月经是怎么回事，这本书解释得很详细。（哈哈，怀疑北朝鲜大学生晚上躺床上也讲荤段子）

俊相同样感到惊讶的是，他读到一篇在中国共产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里面针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他想，总有一天，劳动党也会对金日成提出批评。

有一天，一名很少与俊相交流书籍的同学跑来找他。这名学生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塞勒一本书给俊相。

“这是一本好书”，他低声说道。“也许你会有兴趣。”

这是俄国政府发行的一本谈论经济改革的小册子。男孩的父亲在俄国驻平壤大使馆举办的书展中买了这本书。作品似乎完成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正是俄国尝试建立新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俊相突然察觉自己手里拿着一件危险品——北韩民众必须将发现的任何外国书籍交给警察处理。他、男孩与男孩的父亲可能因为这本书招来危险与麻烦，俊相随机将这本书藏在柜子衣物的底层。他的宿舍寝室有两张双层床，四名学生一间寝室，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他只能躲在棉被里偷偷用手电筒照着才能读这本书。

他读到一段文字：

资本主义初期以无人性的竞争方式生产财富。当时没有将财富或福利公平分配给一般工人的概念，而经济的发展亦无秩序可言……但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获得高度发展，而且更正了先前的错误。举例来说，反托拉斯法确保生产竟然有序，但这不表示生产是由国家掌控。

这本书接着谈到年金制度与保险和福利的概念，并且提到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缺乏效率。俊相越往下读，越觉得这本书说得有道理。

一九九六年，俊相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他不打算回清津，决定继续留在大学，在研究单位任职。他在这个时候，从官方的定义来说，已经算是成年人了，可以搬到校外住宿。俊相搬出宿舍，找了一间单人房。这是一间破旧、肮脏、几乎没有家具的房间，但他喜欢房东，他们是一对老夫妻，两人都重听且视力不良，完全符合俊相的需要。

俊相有了自己的房间后，就用祖父余下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台索尼牌电视机。

根据北韩法律，他必须向电波检查局登记这台电视机。北韩已经停产电视机，进口的电视机必须把频道固定在政府的电视台上，并且要去除选台功能——这是北韩版的功能限制品，用来防止电视机接收任何外界资讯。北韩人开玩笑说自己是“井底之蛙”。对他们而言，头上那块圆形光景就是全世界。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早已想出破解之道。如果是收音机，要破解很容易——拆掉收音机的外壳，切断粘在选台钮上的传送带，改用橡皮筋套上，这样你就可以任意选台。至于电视机则需要专门知识。

电波检查局（朝鲜 tm 有多少局啊!）在电视机的按钮上贴了一张封条，证明这台电视机已经设定只能接收当局准许的电视台节目。为了在不破坏封条下碰到按钮，俊相找了一根长而细的缝衣针，用这根针来推这些按钮。他的房间有道后门通往源自，他在那里安装了天线。俊相利用夜里大家入睡时试验，他不断调整天线，直到接收到自己想要的讯号为止：南韩电视台。

俊相只在深夜聆听电视。从九十英里外穿越非军事区传来的讯号在这个时间是最清楚的。他会先等房东上床睡觉后才打开电视——屋子的墙壁很薄，他可以听到他们的鼾声。电视机没有耳机插孔（索尼哪个年代生产的电视啊!），所以他只能把音量调高到刚好可以听见的程度。俊相蹲在电视机旁，耳朵紧贴着喇叭，他一直维持这个动作，知道腿与脖子受不了为止（还不如买台收音机呢！怕干扰？）。他听电视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多。而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他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因为电波检查局是出了名的总在令人意外的时刻进行突击检查。离俊相房间几户的距离，有个邻居养了狗；俊相在夜里只要一听到狗叫声，就立即扭回中央广播频道，并且冲出屋外拆掉天线。

电视检查员确实来了。其中一名眼尖的检查员注意到封条上帖子一块透明胶带。这块透明胶带是俊相用来遮掩缝衣针留下的记号用的。

“这块交待是做什么用的？”检查员问。

俊相的心跳加速。他曾听过一整个家庭被送进古拉格，只因为其中一名成员看了南韩的电视节目。他有一个朋友只是被怀疑停了南韩广播节目，就被询问了一整年，在这段期间，他一直关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当他获释时，整个人是惨白的，而且神经受损。

“喔，我怕封条掉了，所以贴胶带固定住”，他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检查员皱了一下眉头，这事就不了了之。

好不容易通过这道关卡，俊相应该更谨慎小心才是，但他还是掩不住内心的好奇。他对资讯有着无法满足的胃口，他需要即时的最新讯息。电视带给俊相的不只是外在世界的新闻，还有更多他从未听闻的外界对他的国家的看法。

俊相得知一些令他震惊的事，这些都是他过去曾经怀疑但无法证实的猜测。他听到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已经提供燃料石油与能源援助，但北韩坚持要发展核子武器与飞弹。他发现美国已经人道援助北韩数十万吨的白米。

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的饥荒已经造成两百万人死亡。人权组织估计，有二十万人北拘谨在监狱集中营里，而且北韩有着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

二零零零年，南韩电视报导该国总统金大中将前往平壤与金正日举行历史性的高峰会。在开会期间，南韩电视播出金正日与南韩总统交谈时的说话声。俊相从未听过亲爱的领袖的声音；在北韩的广播与电视上，金正日的演说都说透过专业播音员发生，这些人以颤抖、敬畏的声调来朗读领袖的文稿。这么做保留了神秘面貌。“这些历史名胜，您觉得如何？”俊相听到亲爱的领导者的声音，听起来苍老、平凡，与常人无异。

“听起来就像一般人”，俊相自言自语地说。

聆听南韩点是就像平生第一次照镜子，发现自己乏善可陈。北韩人总是宣称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国家，但世界其它国家却认为北韩是个悲惨而破产的政权。俊相知道人们在挨饿。他知道有人被送进劳改营；但他从不知道具体数字。南韩的新闻报导是否夸大其词，就像北韩的宣传一样？

俊相搭乘火车返乡时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仿佛描写的人间地狱。车厢非常拥挤，你不可能起身去上厕所。民众职能朝着窗外尿尿或等列车停止时到田里舒解，有时两项都行不通，只好尿在车内。流浪的孩子在缓慢移动的车厢旁一边跑一边乞讨，有时还哭着要东西吃，他们试图将手伸进破掉的窗户。火车误点的时间很长，行经平壤北方山区，火车经常在攀登陡坡时故障。俊相曾在仲冬季节在故障的火车上受困两天，车厢窗户没有玻璃，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当时他照顾了几名乘客——有一名妇女，她怀里的婴儿才出生二十天，还有一名婚礼迟到的年轻新郎官。他们一起偷了一个铁通，然后在里面生火，列车长要他们把火熄灭，但他们充耳不闻。要不是这把火，他们恐怕早就失温而死。

一九九八年，北韩经济跌倒了谷底，俊相搭火车返乡时，被困在咸镜南道的一处小镇，他通常会在这里换车，由东行列车改搭北上列车。铁轨被洪水淹没，寒冷的骤雨将等候的旅客淋成落汤鸡。俊相在月台上勉强找到一处避雨的地方。当他等待的时候，目光被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流浪的燕子）所吸引，他们正在表演才艺，藉此赚钱买点粮食。有些孩子表演魔术，有些孩子跳舞；一名年约七、八岁的男孩唱歌。他娇小的身躯完全被成人尺寸的工厂制服所掩盖，但他的声音却相当成熟。他眯着眼睛，投入所有的情感，用力将歌声传遍整个月台。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

无庸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俊相从小记得这首歌曲，不过歌词有一点变动。“我们的父亲金日成”，孩子把名字改成了金正日(快点改成金正恩吧!)。这个小孩唱这首歌实在没什么道理，这是一首赞颂父亲保护他的歌曲，但现实上这名父亲显然辜负了他。孩子站在月台上，全身湿透、污秽、显然饿坏了。

俊相把手伸进口袋，给了男孩十元，对一名街头艺人来说，这笔消费给的相当慷慨。与其说是善心，不如说是感谢这个孩子给他的启示。

俊相日后提到，这个男孩让他感到觉悟。他终于确定自己不相信这个政府;这是个自我领悟的关键时刻，就像决定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一样。但这也让他感到孤单——他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突然自我觉醒，开始担负从自己身上挖掘出来的秘密。

起初，俊相以为自己的人生将因新的领悟而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他的生活跟过去还是一样。他跟别人一样，表现出忠诚顺服的样子。每个星期六早上，他准时参加大学的精神讲话。劳动党党委书记在台上用单调低沉的声音陈述金日成的遗产，听起来就像一部自动朗读机。冬天，演讲厅没有暖气，讲者总想尽快结束演说。俊相经常偷看其他的听众，大约有五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上面的人在演说，下面的人要不是脚动来动去，就是把手垫在屁股下取暖;但他们的脸上还是平静毫无表情，就像百货公司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样。

俊相突然明白自己的脸上也同样空虚茫然。事实上，大家对于演说的内容或许跟俊相的感受完全相同。

“他们知道！他们全知道!”俊相非常确定，只差没叫出声来。这些人是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凡是脑袋正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事情不对劲。”

俊相知道他不是演讲厅里唯一的不信者。他甚至相信自己可以看出某种不言而喻的沟通方式，其微妙程度甚至比眨眼或点头都来得隐晦。有一名年轻女大学生获得嘉奖，因为她在日记里颂扬亲爱的领袖（这种女人太 tm 恶毒了，她日记怎么让上面看到的？）。《劳动新闻》有一篇文章提到她，而她也因她的忠诚而获得奖赏。大学生无情地取笑她。他们认为她是个怪胎，但嘴上不能说，只能揶揄她。

“哪个幸运儿能娶到‘你’呢？”，他们问她。但他们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北韩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共产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没有布拉格之春或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抗议者的反政权活动招致的是恐怖的后果，不只是抗议者自己，连他的近亲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无法幸免。北韩体制对于有污点的血统进行压迫，株连三代，惩

罚延伸到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侄甥、堂表兄弟姊妹。“许多人觉得，反正只是一条命，不如豁出去逃离这个恐怖政权，但受惩罚的不只是你，你的家人都会跟着下地狱”，一名脱北者跟我说。

人们不可能从事读书会或政治讨论。观念的自由交流一定会触及禁地。三到四人组成的团体，当中一定有人为情报机构工作。俊相怀疑他的高中好友就是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这名男孩曾是高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甚至比俊相还优秀，但因为童年时染上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因而无法进入平壤的大学就读。俊相从平壤返乡，他的朋友会大声埋怨政府，并且煽动俊相回应。他的声调大胆而刻意，俊相担心这是陷阱。之后他再也不跟这名朋友见面。

俊相提醒自己，只要身在北韩，绝不要谈政治。无论是你的好朋友、老师或父母，当然也包括你的女朋友，都不是你讨论政治的对象。俊相从未跟美兰提到他对北韩政权的感受，还有他会看南韩的电视节目与阅读资本主义小书。他当然不会告诉她，自己已经开始妄想逃离北韩。

從中國境內看去的圖們江



第十四章
河流

俊相与美兰彼此能够吐露的秘密越少，两人的关系就越紧绷。過去，俊相与美蘭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他们的同学、同事与家人。当他们在黑暗中散步时，俊相说着自己看过的电影情节与自己读过的书。他朗诵诗歌。他喜爱美兰自然的好奇心，她不会因为俊相说了什么她不知道得事儿感到困窘，她与那些努力认真的大学同事完全不同。俊相阅读的乐趣，大部分来自他渴望日后能向美兰诉说。在长达几个月分离的日子里，俊相会储存最好的材料，在心里不断预演，相像她的眼睛闪烁着快乐，她会放声地笑，不会娇羞地遮住自己的嘴。但现在他秘而不宣，即使他的脑子充满了各种想法，却无法分享。

俊相不是不相信她——除了近亲外，他最亲近的人就是美兰。当朋友一个个消失时，美兰在他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可是告诉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她知道俊相知道的事，岂不是让她跟俊相一样不快乐？如果她知道南韩人有多富有，她要怎么继续教导饥饿的孩子唱歌赞颂金正日？她有什么必要知道中国或俄国的经济改革？俊相担心美兰。美兰的阶级背景下，她必须比别人更留意自己的行为。一旦说溜了嘴，就足以让她被送进劳改营。当他们提到美兰挨饿的学生时，他们会委婉地说这个“状况”与“苦难的行军”。说的太清楚，可能让他们接着思考谁该为此事负责而陷入危险。

还有一些是难以启齿的私事。俊相一九九七年毕业之后，选择继续留在研究机构，他怀疑自己的决定伤害了美兰，而可悲的返乡列车与同样悲惨的邮政体系也不让两人的关系难以维持。就算俊相返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都没有电话，也无法留言给对方家人。为了预订计划，俊相必须设法在美兰出门或在学校上课时找到她。又一次，暴风雪来袭，俊相跋涉了数小时，在难辨方向的雪地里利用铁轨作为指引找到前往学校的路。等到他抵达的时候，他的手指冻得发疼，却发现美兰当天请假。

他们一年见面两次——暑假与寒假。长时间的分离，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克服彼此的陌生。美兰变了，美兰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留的醒目短发早已消失。现在的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般的韩国女性，长发及肩，而且用发夹别在后面。俊相惊讶地发现美兰已经开始化妆。

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成年——俊相二十七岁，美兰二十五岁。他们的未来该怎么走，显然找不到答案。

这个问题再俊相某此返乡时意外浮上台面。美兰当天稍早参加了同学的结婚喜宴。晚餐后，她与俊相在她家后面碰头，然后走到山里的温泉区。那是个晴朗的夜晚，温泉区阒无人声。他们在树林里走了一圈，经过人造瀑布与平静无波的池塘。他们坐在最喜欢的长椅上，看着山上的明月。

美兰描述婚礼与朋友的新婚丈夫给俊相听，想让他开心。

“我不懂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俊相突然插话。他最近读了一些古典韩诗，从脑子里记诵的大量诗词，他找出一首形容年轻新妇哀怨的诗句。

如果山中的老虎朝我们跑来，它会比
婆婆更吓人吗？
最凛冽的冰霜，会比你的公公更冷淡吗？
即使你踩在豆荚上，爆出来的豆子恐怕也比不上
小叔们粗鲁直视的眼神。
不，即使是最辛辣的胡椒，那滋味也好过
媳妇的生活。

俊相觉得这首诗很逗趣。美兰笑了，但带着一点迟疑；俊相心想，美兰是不是把这首诗当成带有警告意味的讯息。

事实上，俊相对婚姻从未多想，或者至少是不愿去想。一方面，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娶美兰以外的女子，即使去了她可能会粉碎他假如劳动党的机会。没有党员身份，他几乎不可能再平壤的大学取得终身职。不过这是就目前的政权来说。如果他离开北韩呢？也许跟美兰一起？如果北韩政权崩溃呢？俊相从深夜电视节目得知，也许除了古巴之外，北韩已是世界仅存的共产国家。正如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促成了两德同意，或许两韩也有这么一天。每次她走在街上，看到聚满苍蝇的尸体或看见又一个身上污秽濒死的孩子时，他就有一股末日将至的感受。他们仿佛或在战时，杯具不断从四面八方轰炸他们。在这种状况下，俊相无法计划下星期，更甭说是考虑结婚。

俊相突然充满伤感，一方面为自己，另一方面也为美兰，还有他们深陷其中的悲惨生活。他从未想过要用这首诗来反驳她。为了安慰美兰，俊相做了一件先前从未做过的事：他倾身向前，亲吻了她。

这或许算是一种亲吻。其实俊相只不过用嘴唇轻轻拂过美兰的脸颊，完全未碰触她的嘴，但这已比他们先前的身体接触更为亲密。他们已经认识十三年，约会了九年，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牵手。

美兰似乎吓坏了，但没有生气，只是有点紧张。她突然从长椅起身，然后示意俊相也站起来。

“走吧”，美兰说：“我们继续散步。”

美兰惊讶于俊相的举动。虽然她对性只有非常粗浅的认识，但她知道亲吻可能导致她不想要的结果。她听说女孩与男人睡觉，然后惹上可怕的麻烦。当时没有避孕工具，只有昂贵而危险的堕胎手术。

美兰与充满梦想的俊相不同，她不断思索结婚的事。她的三个姊姊已有两个结婚而且生了孩子，高中时代的朋友也订了婚。她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而她也不认为俊相会娶她。

可以确定的是，美兰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五十年前韩

战时为地方效力的士兵及他们的家属，已经不是金正日最大的敌人。如同幼年的伤疤被老年的皱纹掩盖消失，美兰家的阶级污名也逐渐消退。即使是北韩法律，也规定经三代之后，有污点的血统将逐渐淡化。美兰与弟弟获准进入师范学院就读。大姊的美貌打破了低下的阶级背景，嫁给了家世不错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军方的民间雇员，他们住在封闭的军事基地里，一处少数森林尚未被砍伐的地区。她持续提供松茸给家人，这是可以换取粮食的珍贵商品。

此外，美兰也受到一些限制。举例来说，她怀疑自己或家人获准在平壤定居的可能；还有如果她与俊相结婚，他们顶多只能住在清津，那么她必须为俊相的牺牲负责。当美兰看着俊相苍白的脸孔加上小时候念书得到的近视眼，她担心俊相回到清津可能无法存活。他的下场很可能跟他的老师一样，那些挨饿的知识分子虽然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倒背如流，却无法喂饱自己。

然后是俊相的父母。她从未见过他们，但对他们的事却知之甚稔。如果俊相要娶她，他们一定会大发雷霆。他的父亲可能威胁要自杀，母亲大概会装病。俊相是个有责任感的儿子，他不可能不听从父母的话。

从日本回来的人，通常只与北京相同的家庭嫁娶。俊相的父母会帮他选额一名在日本有财产的女孩，或者是他自己在大学里遇见一名聪明而心思细腻的女孩。美兰的这位浪漫而雅好吟诗的男友，终究跟她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面对现实吧，美兰对自己说道。

美兰试着相像，少了俊相，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平凡，没有诗词；与工厂工人或旷工（跟她父亲一样）结婚，生孩子；一辈子住在煤矿村，或顶多住在清津。她觉得自己被高墙围住，墙越靠越近，令她喘不过气来。

美兰的教学工作俨然成为一种不幸。她的班机从最初的五十名学生，减少到只剩十五名。每天早上美兰都要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到这栋破旧的大楼，死去的同学已让这所学校蒙上悲伤的阴影。没有人能专心在书本上——学生如此，老师亦然，自从金日成去世后，老师们就再也没领导薪水。当美兰问校长，薪水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发放时，校长低声笑着。

“或许等到我们跟南韩统一的时候”，她语带嘲讽地说。

美兰考虑再找另外一份工作。或许她可以到市场或纺织厂工作。她当初这么努力考进大学，成为一名老师，挤进主流社会。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是。

美兰还有一件操心的事，那就是她的父亲。现在他已六十五岁，在美兰眼里，他似乎缩小不少。太佑强健的身体随着年纪增长而日渐弯曲，似乎越来越憔悴枯瘦。这让美兰的母亲感到困窘，因为她向来对于自己能让全家吃饱感到自豪。太佑整天都在家里闲晃，有时开始做一件事，如修修桌子或柜子，然后做到一半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他过去非常沉默，现在却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会滔滔不绝的说话。将近半个世纪未提起的事，他却一股脑儿地说出。太佑回忆他在忠清南道

的童年，以及他美丽的妹妹。他夸赞自己的父亲，以及某个曾位列“两班”（贵族）的祖先。在随意漫谈间，他那出现粘稠分泌物的双眼开始流泪。美兰的二姊结婚时，太佑做了一件全家从没见过的事：他喝醉了。

美兰父亲与其同年纪的北韩男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滴酒不沾。事实上，这大概是一种防卫机制。一九六〇年代，太佑曾看到几名朋友——他们就像太佑一样是南韩战俘——因为酒后妄言而惹上麻烦。但到了现在，太佑觉得自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婚礼在太佑家举行，南方家长向美兰母亲敬了一杯自酿的玉米酒，太佑则是喝了三杯烈酒。到了宾客离去之时，他开始唱起童年伤感的南韩歌曲，完全忘了有人可能会听到。

我总欠着母亲的手。
然后我松手去拿蛋糕与水果。
噢，我怎么会忘了抓紧母亲的手。

美兰父亲死于一九九七年，享年六十八岁。美兰当时不在家，她的弟弟陪在旁边。他向姊姊们提到父亲临终说的最后一个字是“母亲”。

太佑死前几个月，开始详细提起自己的家族。他坚持他的独子必须牢记家谱记载的祖先姓名。太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必须跟他一样将香火传承下去。

太佑留下一项难以实现的遗愿：希望能将死讯传达给南韩的亲戚知道。这项要求听起来像是一种幻觉。尽管韩战已经结束快五十年，但南北韩之间及不不通邮，也不同电话，红十字会也未获准传递讯息。（直到二零零零年，两韩才在特别安排下让两边的家人团聚，但仅限那些因韩战分离的家庭。）美兰和她的姊弟都认为在南韩的祖父应该已经过世，只是不知道姑姑们人在何处，想与南韩亲戚联系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美兰父亲去世后的隔年某天，美兰的姊姊昭熙匆忙地跑回家里。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她刚刚才跟一名经常往返中国的朋友说话，那个人在当地有朋友，可以帮她们与父亲的家人联系。他向美兰的姊姊保证，只要你人到了中国，只需要拿起话筒就能打电话到南韩。

也许她们想试试？

美兰与昭熙起初抱着怀疑的态度。你不可以信任外人，秘密警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陷人于罪。在经过几天长考之后，她们认为这个朋友是诚心的。他在中国有亲戚，也有广大的人际网络可以帮忙。他认识某人可以开卡车载她们到边境，有一名边防警察知道哪里可以渡河，也可以贿赂其他警察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名表亲，他家就在国境旁边，到了那边她们就安全了。美兰与昭熙计划

一起去个几天。这件事他们只让新婚的姊姊知道，而她也发誓守秘。然而，这么大的秘密毕竟是守不住的。她告诉母亲，母亲当然反对。

“未婚女孩不许一个人去中国”，她下了禁令。已经有传言说北韩妇女被强暴或被绑架去卖淫，或者是杀死之后器官被挖走。美兰的母亲不给她们商量余地。

最后全家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做。美兰的弟弟认为自己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当然应该由他去。但母亲还是反对，他只有二十二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她唯一的儿子。

最有决定由美兰、昭熙、她们的弟弟，连同她们的母亲，四人一起前往。这是一趟家族旅行。刚结婚的女儿不想去，而她们不敢让大女儿知道，她跟丈夫、子女住在营区里，绝对不可能同意这件事。

美兰家原本就不是最忠党爱国分子——美兰的母亲甚至瞧不起每天擦拭领袖肖像的妇女——但她们从未主动与政府唱反调。事实上，美兰家最大胆的是弟弟锡柱，他瞒着家人在夜里戴耳机偷听南韩的广播。其他人对时事没什么兴趣，她们忙着工作，根本没有闲工夫思考外面的世界。

与其他北韩人相比，美兰家是新经济中繁荣的一群。美兰的母亲仍在经营磨坊，她们未曾挨饿，也没有遭遇法律上的麻烦，并没有急迫的理由离开北韩。但是机会摆在眼前，一旦抓住机会，时期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计划获得了往前运转的力量，等到想回头时已经太迟了。父亲临终的遗言成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命令，催促着她们前往边界。

她们将前往中国与她们的南韩亲戚联系。她们不知道这些亲戚住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些亲戚听到她们的消息是否会觉得开心，更没想过实际“前往”南韩。

计划的一切细节都在几星期内就绪。在口琴式住宅里，隔着象纸一样薄的墙壁那头是爱管闲事的邻居，她们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绝对不能泄露内心的焦虑。她们的外表必须保持平静，绝不能有任何事情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她们不能把家中的财务卖掉筹措旅费，也不能钉牢门窗防止窃贼闯入。

在准备离开之前，美兰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办。在出发的前一晚，她从衣橱拿出一件被妥善收藏的包裹，里面装着俊相写给她的每一封信。这几年来，她一直保留着这些信以及俊相送的所有礼物；她最珍惜的就是那只蝴蝶形上面镶着方形莱茵石的发夹，她必须将它留下，而所有的信件必须摧毁。美兰不希望有人得知她与俊相这十年来彼此思念的内容。他们之间的事，除了她的弟弟与两个姊姊之外没有人知道。现在，她又更重要的理由让这段恋情成为永远的秘密。

美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趟短程旅行，目的是打电话联络亲戚，但她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很可能不会回来——无论在南韩的亲戚接纳她们与否。她们离开之后，一定会被说成叛徒。“在党的恩惠下接受教育，却背叛祖国”，她几乎可以听到党委书记如此宣布她们的罪状。美兰不希望自己的罪名拖累俊相。她希望自己离开

之后，俊相的人生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他可以为自己找个合适的伴侣，加入劳动党，他往后的人生将是在平壤从事科学研究。

俊相会原谅我的，他会了解的，美兰这么对自己说。这么做对他最好。

他们静静地坐在卡车后头往茂山前进，美兰的父亲在韩战结束后曾被送到这座煤矿城镇做囚工。现在，这里成了一座鬼城，它的矿坑与工厂早已关闭。不过在毫无生气的外表下，此处其实聚集了许多走私客。茂山位于图门江的狭窄处，与会宁、稳城一样，逐渐发展成非法出境到中国的集结点。非法出境是一项成长中的产业，或许是北韩唯一一项成长的产业。这名卡车司机专门载运没有护照或旅行许可的民众前往边境。搭乘火车不可行，因为火车的文件检查比较严格。

无论谁看到这一家人，都不会怀疑她们要逃离北韩。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外面罩着日常的衣服，希望在抵达中国后不会让人一眼看出她们是悲惨的北韩人。她们的服装也能支持她们虚构的故事——要去茂山参加亲人的婚宴。她们带着的行李看起来就像短暂的周末旅行。里头装的是几张家人的照片与晒干的海鲜、鱼、鱿鱼与螃蟹，典型的清津美食。这些食物不是留着自己吃的，而是要用来贿赂。往茂山的五十英里路上有两处岗哨。如果再早个几年，谁也不敢在没有许可下前往茂山，但现在是一九九八年，你可以用食物购买任何东西。

渡河的时间必须谨慎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而且是边防卫兵最可能睡着的时间。渡河的地点选在茂山郊外，这里离最近的岗哨有两百公尺。渡河的时间与地点已经于对岸的向导协调好了，他会在午夜之后来这里“收货”。

美兰独自渡河。依照安排，她的母亲、弟弟与姊姊先走。家人分开渡河是比较好的做法。如果自己一个人被抓，还可以宣称自己是因为饥饿才四处游荡；运气好的话，会得到比较轻得刑罚，也许是劳改一年。如果全家被捕，会被认定是预谋叛逃，那么惩罚会非常、非常重。这正是美兰不知道得部分，她从未见过任何逃亡者。她努力想摆脱可能失败的想法。

一名向导护送美兰出了茂山，沿着与河流平行的泥土路走去。泥土路走到尽头是一处玉米田，向导送她到这里。他示意美兰穿过玉米田，朝河的方向一直走去。

“只要直走，一直往前走”，向导告诉美兰。

这时，美兰不寻常的冷静突然消失无踪，她的身体因恐惧与寒冷而颤抖。十月的白昼如同印度夏日一样温暖，但到了夜里，温度就下降到足以让人感受到秋日的寒意。仅剩的几片叶子仍顽固地抓着树枝，几乎光秃秃的树林使美兰完全没有遮蔽之处。最好是趁现在赶快走过玉米田。她行走的时候努力想放低音量，但枯干的玉米茎却在她的脚边窸窣作响。美兰觉得有人在看她，而且就快揪住她的脖子。

没有指引的灯光，很难照着指示直走。哪一条路才是直？河到底在哪里？她是不是早该到了？美兰怀疑自己是否一直在玉米田转圈圈。

然后美兰撞到一道墙。这道墙直接挡住她的去路，高耸的墙面笼罩着她的头顶，往两旁延伸，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是一道白色的混凝土墙，就像监狱或营区的围墙一样。她是否掉进陷阱了？美兰现在确定自己走错路。她必须离开这里，而且要快。

美兰沿着白墙走。她一边用手摸索着，一边前进，而墙也越来越低，直到她可以翻越过去。美兰懂了，这是河堤护岸。她从护岸爬下来，走向水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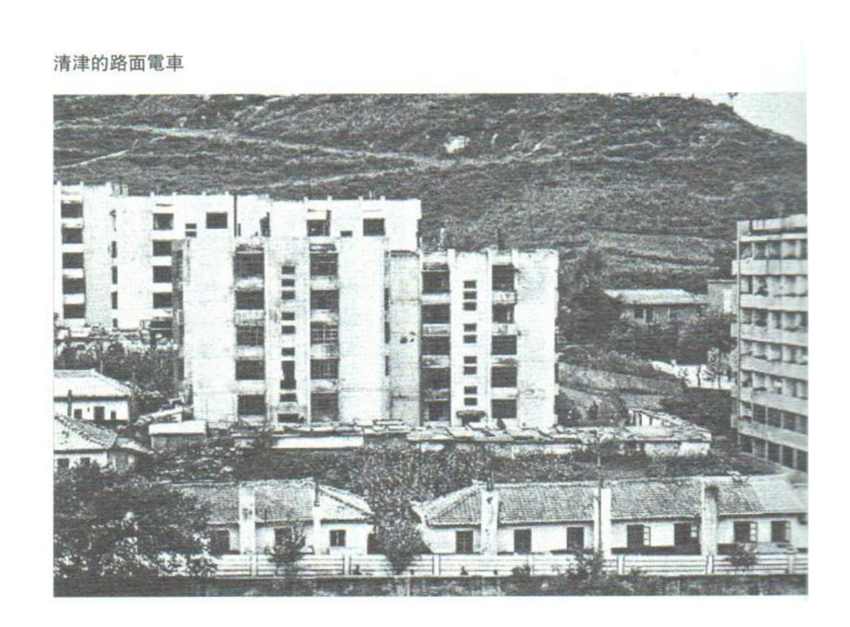
韩国的秋天是干季，河流的水位特别低，只到美兰的膝盖，但水温很冷，她的脚开始感到麻木。美兰的鞋子吸饱了水，双腿也像铅块一样沉重。她忘了听从指示预先卷起裤管。她的腿陷进泥里。美兰先抬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一步接着一步，一寸寸地往前走，努力不让自己跌进水里。“一直往前走”，她告诉自己，不断地重复向导的话。

突然间，美兰发觉水退到自己的脚踝边。她爬上河岸，全身湿透；环顾四周，她已到了中国，但她没看到任何人。没有人在这里。她一个人置身在黑暗中，喉咙干涩紧绷，就算她有力气呼叫，她也不敢。

此时美兰感到真正的恐惧。她回头望向北韩。她看到对岸那堵曾令她大感困惑的白墙。越过白墙，就算临近路边的玉米田，向导带着她走到那里。如果她能找到那条路，她就能走回茂山。从茂山她可以搭火车回清津，第二天她就到家了。她可以重新回去教书。俊相不会知道她差一点逃走。一切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正当美兰沉思之际，她听到一阵沙沙声从树林里传出。然后是男人的声音。

美兰的弟弟在叫唤她，美兰握住了他的手，从此离开北韩。



清津的路面電車

第十五章

顿悟

俊相待在平壤的大学，他完全仰赖不稳定的邮务体系与家乡的朋友和家人联系。除了美兰，他还有几个固定的通信对象。母亲总在信里提到家中狗儿的近况。父亲则是激励他更努力用功。“为了金正日与劳动党，他们给了你这么多”，他认定检查人员会拆信检查，所以在信末写下这句话以讨好他们。在严寒的冬季期间，据说铁路局员工会烧信取暖，俊相有时会有好几个月收不到信。因此虽然他写给美兰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他也不担心。十月、十一月过去，到了十二月还是没有美兰的信，俊相开始着急了。

到了寒假，俊相一抵达清津，就准备以平淡的语气问他的弟弟，最近有没有看到美兰。但俊相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弟弟反而先开口：“她离开了！”

“离开了？去哪里？”俊相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话。美兰从未暗示计划要去旅行的事。她总会明白告诉自己，她做什么，不是吗？虽然俊相觉得美兰夏天时写给他的信似乎有点冷漠，或许当时她正担忧自己为什么不愿结婚，但他无法相信美兰会不告而别。于是他向弟弟追问详情。

“她们全离开了。有传言说她们去了南韩。”俊相的弟弟只知道这么多。

俊相到美兰家附近调查。首先他在附近绕圈子，仿佛是在进行监视；他无法让自己更进一步。俊相的胃紧揪着，他感觉到自己脖子的脉搏激素跳动。几天后，他再度前来。他站在墙的后面，也就是过去几年他等待美兰过来跟他秘密约会的地方。俊相亲眼看到，住在她家的是另一户人家。

寒假期间与日后几次返乡，俊相都会回到那栋屋子查看。与其说是打听消息——其实大家知道的内容跟传言差不多，不如说是去忏悔。他真是个大傻瓜！俊相憎恨自己；他不折不扣是个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凡事思前想后，到最后错失先机。他花了太久时间考虑向美兰求婚，结果她离开了。事实上，俊相曾经想问她愿不愿意一起逃到南韩，但却没有勇气。在两人的关系中，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导的一方。他是男人，他年长两岁，他有大学学历。他从平壤带回诗文给她，告诉她她从未听过的书籍与电影。但最后真正有勇气的人是美兰，而他只是个懦夫。虽然没人肯定，但俊相心里感觉到，美兰就在南韩。

“该死，她比我先去了南韩”，俊相对自己说。

事实上，美兰几乎比任何人都早到南韩。

从韩战结束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美兰逃出北韩为止，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九百二十三名北韩人逃到南韩。如果考虑每年平均有两万一千名东德人爬过柏林墙逃往西德，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数字的微小。

绝大多数叛逃的北韩人是驻外的外交人员或官员。黄长烨是北韩重要的学者与官员，曾是金正日的教授，他利用公务结束返家时，走进了南韩驻北京大使馆。偶尔会有北韩士兵不计任何代价冒险穿越非军事区叛逃。有些渔民则是驾船逃到南韩。

北韩政权采取不寻常的措施来封锁人民。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清津与其他滨海城市的海滩竖起了栅栏，以防民众驾船逃往日本，北韩人因公出国时，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以确保他们回国。脱北者知道自己想获得自由，必须以牺牲自己亲人的自由为代价，他们的亲人很可能余生都要在劳改营度过。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情况出现变化。饥荒与中国经济改革让北韩人产生逃亡的动机。北韩人从边境可以看到闪亮的新车行驶在图门江畔的码头边，他们亲眼看见中国人过着不错的生活。

曾经协助美兰渡河的网络扩展得相当迅速。他们重新绘制跨越图门江的路线图，标出距离最短的渡口，并且贿赂边防卫兵。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可以付钱请人背你过去。脱北者的数量呈指数成长。到了二〇〇一年，估计有十万名北韩人偷渡到中国，其中一小部分最后逃往南韩。

交通的流动是双向的。北韩人涌入中国，中国商品涌入北韩——不只是粮食与衣物，还有书籍、收音机、杂志，甚至还包括圣经这种违禁品。中国盗版工厂身缠的 DVD 既小又便宜。一名走私客可以将上千片 DVD 塞进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面铺一层香烟，用来贿赂边防卫兵。中国也生产 DVD 放映机，价格只有二十美元，对于新经济下的北韩人，这个价钱是负担得起的。销路很好的影片如《铁达尼号》（Titanic）、《空中监狱》（Con Air）与《证人》（Witness）。更受欢迎的是南韩电影、通俗剧与伤感的肥皂剧。南韩的情景喜剧原本描绘的是工人阶级生活，但北韩观众特别感兴趣的却是厨房设备与主角的服装。这是北韩民众第一次看到没有金日成或金正日口号的韩语戏剧。他们也看到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些戏剧都经过理想化与商业化）。

北韩政府指控美国与南韩以书籍与 DVD 作为幌子，企图颠覆北韩政权。DVD 的贩卖者被捕，有时还因叛国罪而被处死。劳动党的党员发表演说，提醒民众抗拒危险的外国文化：

我们的敌人可以制作这些内容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与散布他们腐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受到这些不寻常的内容影响，我们的革命心态与阶级意识将会麻痹，我们对“金日成”大元帅的崇敬将会消失。

然而，北韩境内的资讯传布并不是靠书籍、报纸或电影，而是仰赖口耳相传。没有 DVD 放映机无法观看外国影片的民众，多半是从人的口中得知讯息。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在民众之间流传着，内容不外乎夸耀邻国财富与科技发展。据说南韩人发展了一种精巧的汽车，只要驾驶人对着测酒器吹气，证明他没有喝酒，车子就会发动（这是假的）。又说对岸一般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富足，他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白米（这是真的）。

一名北韩士兵日后回忆自己的同胞得到一只美国制的指甲刀，他拿出来向朋友炫耀。这名士兵剪了几根指甲后，赞赏刀锋的锐利与干净，同时对于这件小东

西的力学原理惊异不已。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北韩连这名精美的指甲刀都做不出来，还要怎么跟美国的武器对抗？

一名北韩学生则是从官方媒体的照片中看出端倪。照片显示有一名南韩人站在罢工的警戒线上。北韩官方原想用这张照片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是如何遭受剥削，但这名学生却发现这位“受压迫的”工人穿着有拉链的夹克，口袋里还插着一枝原子笔，两者在北韩都是奢侈品。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一名北韩海上官员乘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这是无线电意外接收到南韩广播。这个节目是一出情景喜剧，描述两名年轻女子为了争抢大楼停车位而大打出手。他不理解车子多到没地方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虽然他已年近四十而且官阶不低，但他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人拥有私家车——年轻女子就更不用说。他觉得这出广播局只是个讽刺剧，但想了几天之后，他认为没错，南韩一定又这么多车子。

几年后，这名官员叛逃了，那名看到指甲刀的士兵以及那名看到罢工者照片的学生也一样。

金医师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在中国的悲惨生活，以及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逃来北韩的事。金医师觉得自己很幸运能生在北韩，而且非常感激政府愿意让身为卑微建筑工人女儿的她免费就读医学院。她觉得自己的教育与人生都是国家给予的，因此她最大的野心就是加入劳动党报效国家。

“如果党需要的话，我愿意掏心剖肺。我就是这么爱国”，金医师日后说道。

然而，金医师在加班从事志工工作时（担任党委书记助理），却发现党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她。

金日成去世那年冬天，金医师的志工工作从早七点三十分开始，比医院其他资深职员都要早，因此她可以慢慢整理党委书记凌乱的办公室。医院党委书记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医师，她的专科是肝炎，大家都叫她郑同志书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是个很小的房间，里面除了必要的金日成与金正日肖像，墙边还摆放着档案柜。陈旧的木制书桌，抽屉没有关紧，文件掉了出来，散落一地。然而，报纸却小心翼翼地收妥放在书桌上。这些报纸不应该扔在地上，可能会有人踩到金日成或金正日的照片。郑同志书记不常阅读，也不常写东西；她完全仰赖金医师帮她阅读《劳动新闻》与当地的《咸北新闻》的社论，以及为她准备讲稿。金医师相信，郑同志书记一定会推荐她入党作为回报。她甚至大胆想象，有一天她可能追随导师的脚步，成为党委书记。

金医师整理文件时，注意到木制档案柜的门是开着的。她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一只大信封突出于档案夹外。她打开信封，看见里面有张人名清单，她认得这些人全是医院员工，他们受到特别监视。每个名字旁边附了评论，说明怀疑他们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阶级背景有关——父母或祖父母勤跑教堂，前地主的子

女，回归北韩的在日朝鲜家庭，在中国有亲戚的人。

金医师的名字也在清单上。

她感到不可思议。她整个人生，她的行为都没有瑕疵。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事要求完全合于标准。念书的时候，她的成绩非常完美。她总是第一个自愿从事额外的工作，并且参加额外的精神讲话。她的父亲来自中国，而且在当地仍有亲戚，但金医师从未见过他们也从未跟他们联络。

一定是弄错了，金医师对自己说。

最后，她明白了。郑同志书记一直在欺骗她，利用她的勤奋与才能，却完全不打算让她入党。更糟的是，金医师开始怀疑自己的确遭到监视。她发现医院的党部官员总是充满兴趣地看着她。

两年后，金医师的怀疑获得证实，有一名国家安全探员突然来医院找她。这名男子为保卫部工作，这是负责调查政治犯罪的警察单位。起初，金医师以为他是来打听某个病人或同事，但他只针对她、她的家人与她的工作提出问题，最后他终于进入主题。这个人造访的目的是要调查金医师是否计划逃离北韩。

“离开北韩？”金医师感到愤慨。她从来没想过这种事。当然，她曾听过有人离开的传言，但她瞧不起无法忍受苦难行军的人与背叛祖国的人。

“为什么我要离开？”她反问。

探员举出几个理由。她在中国有亲戚。她的婚姻破裂。医院停止支薪。

“你听好！我们在监视你。你休想逃!”他临走前恶狠狠地丢下这句话。

事后，金医师心里回想这整段对话。她越想越觉得保卫部的人说的有道理。他在她心里种下这个念头，而她发现自己无法动摇它。

金医师在北韩的生活是悲惨的。她的前夫在他们离婚后随即再婚，六岁的儿子跟她以前的婆家住在一起，这是韩国人离婚的典型安排。根据法律与传统，孩子的监护权属于父亲所有，登记在父亲户口下。金医师只能偶尔周末去看孩子，看到瘦成皮包骨的他，金医师只能感到心痛。她的前夫与婆家的粮食并不充裕。

但金医师自己吃得也没多好。其他医师藉由卖药或动手术（特别是堕胎）来补贴家用。金医师没有受过手术训练，也不想干这种勾当。她仅靠病人送的粮食过活，但不久病人也没有粮食可以给她。

一九九七年，金医师离开小儿科，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孩子们挨饿的眼神。她转到研究单位，不想再接触垂死的病人，但当时的状况根本无法研究。早餐后，医师们开始操心晚餐的事;晚餐后，又要担心明天的早餐。金医师开始提早下班，到山上寻找可吃的野草。有时她会砍点儿木柴卖钱。她的体重降到八十磅（三十六公斤）以下，胸部萎缩，月经也停止了。从远处看金医师，三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就像是十二岁的孩子。在连续几天没吃东西的情况下，最初几天，金医师实在饿的受不了，一度想偷婴儿的食物吃。但四天后，饥饿的感觉消失，却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身体不再是自己的；她一下子被举到空中，然后又掉下来。

她已经累坏了，早上没有力气起床。一九九八年初，金医师辞去党秘书处的志工职位，完全停止工作。她尝试各种赚钱管道——在市场卖酒或煤炭。医学院的训练无法派上用场，金医师并不感到难过。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能够活下来已经足够。

有一回，金医师到市场闲晃，偶然遇见一个老朋友。她们是高中同学，两人都曾是受人欢迎的聪明女孩，大家都认为她们“最有希望出人头地”。金医师的朋友还当过级长。两人先是礼貌性的问候对方，虽然两人的脸色蜡黄模样憔悴，但还是表示对方的气色不错。然后金医师问起同学的家人。“我丈夫和两岁的儿子刚在三天前过世”，同学平淡地说。

金医师试着安慰她。

“喔，我已经好多了。少了两张嘴吃饭”，她对金医师说。

金医师不知道她的朋友是无情还是疯了，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继续待在北韩，可能会变得跟她的朋友一样，或是饿死。

金医师的父亲临终前，曾写了一张住在中国的亲戚姓名与住址的纸条给她。那是一张自杀纸条——她的父亲因绝食而陷入精神恍惚，他用颤抖的手潦草地写下这些讯息。当时，金医师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但并未扔掉纸条。她挖出保存纸条的小箱子，小心地展开它，看着那些名字。

“他们会帮助你的”，父亲曾这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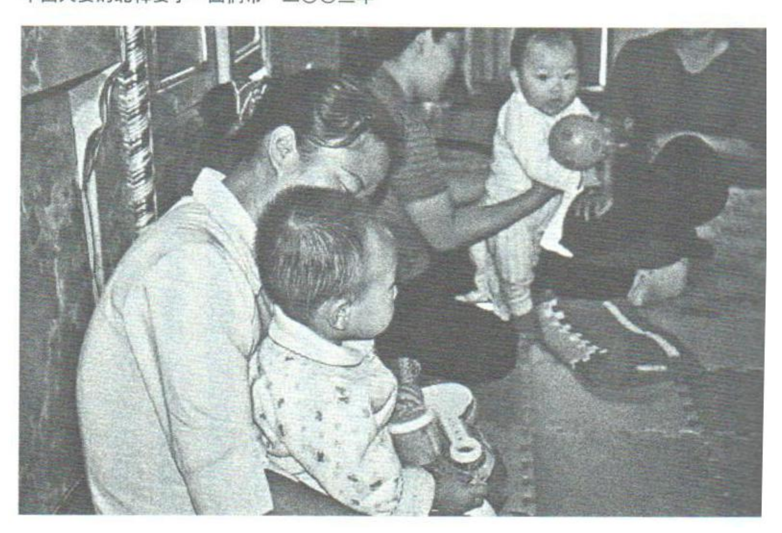
金医师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她没有钱雇佣向导或贿赂边防卫兵，只能仰赖自己的机智与本能。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边境城镇已有许多人准备离开，你可以轻易打听到哪些地方最容易渡河。初春的地貌从哭喊的严冬解冻，但图门江还有几个地点仍处于结冻状态。金医师来到一个地方，听说这里的冰还能步行穿越。没走几英尺，她就将沉重的石头往前丢，测试冰块坚硬的程度。至少北韩这边的河面相当坚硬。金医师缓缓滑动一步，再踏出第二步，轻柔地像个芭蕾舞者。当她扔出去的石头消失在对岸半融的雪地时，她的出逃行动也即将成功。金医师直接朝安上走去，河水淹到她的腰部。她用手拨开河水，宛如破冰似的清出一条路。

金医师蹒跚爬上河岸。她的双腿被结冻的裤管包裹着，冻得发麻。她穿过树林，直到黎明第一道曙光照亮临近的小村落。金医师不想坐下休息，担心身体会失温，但她知道自己的体力支撑不了多久，她必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好心的当地居民。

金医师看到一条通往农舍的泥土路，大多数的农舍外侧都围着墙与铁门。她走到一间农舍前面，发现铁门没锁。她推开门，谨慎地扫视院内。金医师看到地上放着一个装了食物的小铁碗。再仔细一看——那是米饭，不仅是白米饭，里面还拌着肉片。金医师已经不记得上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米饭会摆在这里，而且居然放在地上？当金医师听到狗叫声时，一下子全明白了。

就在前一刻，金医师还有点希望中国跟北韩一样穷。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她一辈子珍视的新年也能得到证明。但现在她无法否认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中国的狗吃得比北韩的医师好。

中國人娶的北韓妻子。圖們市，二〇〇三年



第十六章

买来的老婆

没有惊讶玉熙会在第一个机会出现离开北韩。宋太太的长女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已经无法像全国民众一样对金日成充满偶像崇拜：只要放学一回家，玉熙马上扯掉少年先锋队的红色领巾。一九九四年金日成去世时，她连假哭都不愿意。

这几年来，随着家中食物日渐缺乏，玉熙的火气也越来越大。她责怪政府的经济措施不当，还认为政府该为父亲与弟弟的死负责。北韩电视不断地播放歌曲《同志们行军》(“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缺粮也不缺衣。让我们挺起胸膛，自豪地面对世界”）与旗帜飞扬的爱国影片，玉熙觉得这很荒谬。

“什么都不缺？”她语带轻蔑地关掉电视。

事实上，玉熙开始产生逃离北韩的念头，不仅与逃离这个体制有关，也跟她的婚姻状况离不了关系。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团混乱。与其他夫妻一样，玉熙与永秀为了性与金钱而争吵，随着时局越来越艰困，他们开始为食物与政治争吵。永秀总是赢。如果吵不过玉熙，永秀会重重赏她一巴掌，让她踉跄跌坐在房间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尽管贪杯，永秀仍然仰仗家人的影响力保住了列车长的工作以及他住的公寓。列车长这份工作在铁路局是人人争取的肥缺。在通往边境的铁路线上工作，永秀可以携带一些物品卖给中国商人来补贴收入。工人从停工的工厂收集铜线与废铁，永秀用五元向他们收购这些物品，然后以二十五元转卖出去。玉熙一开始有点惊讶，因为过去丈夫一直幻觉自己是党的官员（即使他已被拒绝入党），而且喜欢在妻子与愿意听他说话的人面前大谈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邪恶。他还谴责妻子对金正日的轻率陈述。现在，他却毫无愧色。

“谁照着党的话做，谁就是笨蛋。有钱才能使鬼推磨”，永秀对玉熙说。

永秀的废铁生意使他成为恶劣时局下的富人。他到边境一趟，回来就带着一大袋的米与好几瓶酱油；有一段时间，他们家里还放了成堆的玉米。然而，只要玉熙提议分一点粮食给她挨饿的父母与弟弟，永秀就勃然大怒。

“在这种时候，你还分量是给别人？”他大叫说。

永秀不相信玉熙不会拿粮食给她的家人，所以即使他的工作需要离家数日而且火车时刻表又经常变动，他离家时仍旧只留下仅能糊口的粮食与金钱。一九九八年，他离家一星期，却没有留下任何粮食给玉熙与他们的儿子与女儿（分别是八岁与六岁）。六月五日儿童节，他们的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小朋友要自己带便当去，但家里完全没有粮食。玉熙跑遍全市，向亲戚们乞讨粮食，但没有人有多余的东西给她。最后她在市场看到妹妹正在卖饼干，于是拿了一些。她在午餐时间跑到学校，发现儿子噙满泪水站在操场上等着。

“对不起，我的心肝宝贝”，玉熙对他说，然后把一小袋饼干交给他。

永秀曾经是音乐家，他有着美妙的嗓音与吸引女性的外表举止。现在他的口袋有了点钱，于是开始与朋友到处寻欢作乐，饮酒狂欢。有天夜里，玉熙与孩子

都已入睡，她听到喝醉的永秀跌跌撞撞进到公寓的声音以及女人的笑声。玉熙不知道那是女朋友还是妓女，但她不打算下床问个明白。

此后，玉熙开始认真考虑逃离北韩。诉请离婚当然可能成功，但她将失去一切。虽然劳动党嘴上表示要将女性从传统封建社会的卑下地位解放出来，但北韩的制度实际上对女性极为不利。离婚以后，丈夫可以保留房子与孩子——就算丈夫施暴或外遇也一样。玉熙的情况尤其不利，因为她的家庭阶级地位较低，而且没有父亲能为她从中协调。玉熙心想，如果自己能到中国赚钱，事情才有希望。如果她能够拥有自己的公寓，她就能迫使永秀放弃孩子的监护权。

有天夜里，永秀喝得醉醺醺回来，脾气特别不好。他揍了玉熙，将她打倒在地，然后用力踢她，玉熙觉得自己好像听到肋骨裂开的声音。突然间有人敲门——有一名旅人来问路，因为玉熙家离火车站很近，所以这种事很常见。当她的丈夫去应门时，玉熙从地上爬起来，退到厨房里。她从后门溜出去，跑下楼，身上只穿着睡衣。

火车站的时钟显示是晚上十点。此事是八月底，夜晚温暖宜人。玉熙走了一段距离确定她的丈夫没有跟来，于是站着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通常在争吵后，她会跑去找母亲，母亲会用温暖的绷带包扎她裂开的嘴唇与淤青的眼圈。第二天早晨，永秀清醒以后，他会哭着抱歉，求她回家，而她总是照做。十年来他们一直这样相处。如果她想改变，现在就是时候。

玉熙不敢进到清津火车站里面，她丈夫的同事很可能会认出她来。于是她沿着轨道往北走，在温暖的夏夜里，她走出了市中心，直到市郊第一个车站轮城。由于无家可归的人到处可见，所以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一个只穿睡衣的女人。

玉熙在车站待了两天。她的肋骨隐隐作痛。饥饿与脱水令她头晕目眩，晕得站不起来。玉熙看到车站挤满了人，每个人似乎都很兴奋。此时一列火车正要开往边境城市茂山。她使劲站起来，用力挤进人群里，跟着大家一起涌向车门与窗户。群众先是争抢座位，然后是走道，或者是站在厕所与车厢之间的通道。有些人挂在窗户外面，甚至还有人攀在车厢下方。火车如此拥挤，列车长无法走过来检查车票或旅行许可。一天后，玉熙抵达茂山。她没有文件、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衣服。

玉熙唯一拥有的就是健康的三十二岁身体。玉熙不是大美人。母亲说她很聪明，至于排行老二的妹妹大家都说看起来象电影明星，但玉熙在饥荒中过得比许多人都好。她跟母亲一样个子娇小而丰满，她的体格让人以为她很肥胖。她的小鼻子让她显得年轻，而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虽然玉熙有如此本钱，但她的年纪当妓女似乎太老，而她也不可能考虑干这档事。然而，北韩妇女还有另一种贩卖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似乎比较能让人接受。

越过图门江，可以看到延伸数英里的玉米墙。这几个村落盛产粮食，却缺少女性。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加上一胎化政策，造成不对称的出生比例，男比女大

约是十三比十。许多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性移往城市，在中国景气繁荣的工厂里工作，那里的薪资比在农村高得多。农村的单身汉，特别是那些年过三十五岁，没有钱或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很难找到老婆。他们转而求助婚姻中介帮他们寻找另一半，一次要价约三百美元，如果他们希望年轻漂亮一点的女性，那么价钱还要更高。不过，漂亮与年轻不是必要条件；六十岁的健康女性也可以为更年长的鳏夫煮饭和料理家务。

对中国人来说，北韩女性带有一种神秘感。尽管饥荒损害了北韩女性的身体与肤色，单门仍认为她们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南韩男性提到“北女南男”，宣称这是最理想的基因组合；中国的男性则认为北韩女性比中国女性来得朴实而顺从。

玉熙知道中国婚姻市场的事。在清津，如果有妇女神秘失踪，就会有人低声说：“那个妓女大概把自己卖给中国人了。”

茂山火车站是中介买卖的第一站。女性只要独自一人在那里徘徊，就会有人过来接洽。这名引诱玉熙的男子，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玉熙丈夫的老朋友。他提供给玉熙的交易是：向导会帮她找个体面的男子，她会成为他的妻子，不过双方当事人都知道这桩婚姻不被中国法律所承认。至于玉熙这边则要同意与为她选择的这名男子一起生活，而她会得到应得的钱，分毫不少。

玉熙接受了，不过她有一项条件。她坚持对方不会说韩语。大多数北韩女性希望对象是朝鲜族，这样才能沟通，但玉熙却不这么想。

“不要朝鲜族”，他对掮客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没有认识我的新世界。”

为玉熙选择的男性是一名三十五岁的农夫。他非常矮小，大约五尺一寸（一百五十五公分），跟玉熙一样。他的外表看起来有点迟钝，玉熙不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些轻微智障。此外他非常害羞，一直不敢与她四目相对。她心想，难怪他结不了婚。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一家小餐馆经介绍认识。与玉熙通行的北韩女子被卖给一名比较高大而活泼的男子；他微笑着，与其他一同前来的男子谈笑风生。玉熙有些羡慕，但她提醒自己，这是她的选择——她希望跟一个她永远不会爱上的男子生活。

数万名北韩妇女被卖给了中国男人。根据估计，大约有十万名北韩难民在中国生活，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有一半以上的女性是以买卖婚姻的方式嫁给中国男人。北韩女性被毒打、强暴、戴上锁链或被当成奴隶的故事多不胜数。玉熙非常幸运。她的男人名叫敏园，他也许不像永秀那么有魅力，但他的个性温柔，有着世间少有的纯真。他们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敏园搂着她，用装着温水的脸盆帮她洗脚。他还特地为她做饭，不让她洗碗，他的父母也同样疼爱玉熙。

玉熙与敏园生活了两年多。她学了中文，于是两人可以沟通。她阅读儿童的地理书籍，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玉熙住的地方——位于她跨越国界之处的西南方，约六百英里以上的距离——是山东，这是位于青岛西方的一个肥沃而盛产棉

花与小麦的省份。她牢记前往青岛的客运路线，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计划逃跑。

玉熙怀孕两次，但两次都堕了胎。虽然敏园很想有个孩子，但玉熙告诉他，孩子省下来的命运会非常坎坷。中国政府不承认与北韩妇女的婚姻，所以夫妻俩的孩子将无法取得公民身份，也无法上学。

“我在北韩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总有一天我要回去找他们”，玉熙对敏园说，敏园只是难过的点头。

玉熙决定离开时，敏园带她到客运站，给了她一百美元。他哭了。玉熙原本期望他挽留她，但他没有。敏园不像玉熙最初所想象的那么迟钝，他只对她说一句：“路上小心。”

事实上，玉熙的旅程非常危险。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国已受够了脱北者。他们的人数太多，中国政府担心这些人会抢走中国人民的工作与破坏中国东北的种族平衡。人权团体认为中国在道德与法律上对这些脱北者负有责任，他们进入中国是为了得到食物与安全，但中国政府坚持这些渡河入境的北韩人是非法的“经济移民”，无法依据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Status of Refugees）给予保护——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约国。中国指出，一九八六年，中国与北韩国家安全部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要求两国共同打击非法越境者。

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起拘捕脱北者的行动。他们在边境设立路障，随机检查身份证件。北韩人在中国待了几个月以后，除了把自己养胖，也会买几件新衣服，此事他们的外表已与中国人没什么不同。于是中国政府允许北韩警察入境搜捕这些北韩人。有些脱北者被雇佣担任间谍，他们渗透到其他脱北者藏身的地方。中国政府悬赏四十美元，鼓励人民告发与中国男人一起生活的北韩妇女。这些妇女会被强制带离她们的家、她们事实上的丈夫与她们的子女。至于这些购买北韩妇女的中国男人则必须缴付罚金，但他们可以留下孩子。在二〇〇〇年三月的大搜捕中，至少有八千名妇女被逮捕。（直到二〇〇八年，对脱北者的搜捕行动仍在进行中。）

如果是在中国丈夫的村落生活，那么玉熙会很安全，因为山东离北韩边境非常远，不在搜捕的范围之内。但为了赚钱，她必须回到边境地区，那里有说韩语的人，赚钱的机会比较多。玉熙急于赚钱，这是她唯一能获得独立争取孩子监护权的机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她觉得自己可以在餐厅或工厂工作，之后也许还能自己做生意。她搭乘客运北上，但不是回到当初渡河的地方，而是前往丹东，中朝边境的最大城市。

丹东是一座繁荣的城市。鸭绿江畔闪烁着新办公大楼的玻璃外观，一栋栋公寓大楼节比鳞次地从纠结的起重机之间耸立起来。丹东的欣欣向荣凸显出对岸北韩的荒凉。然而玉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从北京通往平壤的主要铁路经过这座城市，两国的官方往来也经由鸭绿江上的中超友谊桥进行。北韩

的国有贸易公司在丹东设有据点。这座城市钱付了许多秘密安全探员。

玉熙于二〇〇一年一月被捕，然后被移送到对岸的新义州市警局。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她对祖国的情况感到震惊。隆冬时节，警局居然没有暖气，警员与犯人不约而同地打起哆嗦。一名警员把玉熙的罪名写在木片上，因为无纸可用。不过，她的运气很好。由于金正日的生日即将到来，所以颁布了特赦令；数千名轻罪犯人都获得释放。玉熙在被捕两个星期后就重获自由。玉熙一出狱，马上再次渡河进入中国。

玉熙在被捕前，原本是在一家砖头工厂做事，接着是在一家餐厅。她一天赚一到两块美元，听起来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清津一个月的工资——但在中国却相当微薄。这一次，玉熙需要一份薪水更多的工作，即使它的风险更大。她决定为一名掮客工作，就像那名为她与农民配对的掮客。玉熙第一项任务是潜回北韩寻找一名落单的孩子，然后带他渡过图门江与家人团聚，她接下这份工作。

他们相信这名孩子住在茂山，玉熙最初就是从这里逃离北韩。她很了解这座城市而且会说当地方言，她认为自己可以在当地游荡数日，应该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她错了。她第一天到茂山，就被警察从群众里抓了出来。

“嘿，就是你”，警察对着玉熙大叫。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玉熙变得比较白也比较胖。她使用有香味的洗发精与肥皂，她的外表与味道都与其他人不同。此外，她还带了在中国购买的电晶体收音机，可以听南韩节目。警察没收了收音机而且（他先要玉熙告诉他南韩广播的频率与要求她交出耳机）把她交给保卫部。

玉熙与其他一百多名被捕的犯人一起关在拘留室里。他们被要求跪下与保持静止不动。警卫穿梭于行列之间，任何人想调整姿势让膝盖舒服一点，都会遭到殴打。玉熙被打了一次之后，只让自己的眼睛四处张望。她自己打量这些犯人，马上就能辨识出谁去过中国；他们就像她一样，皮肤比较白，穿的衣服比较好，看起来也比较健康。其他人则是面黄肌瘦，通常没有穿鞋子，或许是在准备渡河之前被抓。

玉熙觉得两群人混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她生还的最佳机会要看当局是否知道她为掮客工作。她也希望那名将她的收音机没收的警察能留着那台收音机，不要往上呈报。叛逃罪名的轻重，取决于阶级背景与脱北者前往中国的行为与动机，渡河寻找食物的脱北者可以得到比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一段时间的脱北者较轻的刑罚。至于被控中介妇女、贩卖 DVD、与南韩人接触，或在中国上教堂，很可能背上“背叛祖国”的罪名，要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古拉格。

最后，警卫以家乡为标准来对拘留所的犯人进行分类。结果发现，许多是清津人。警卫没有手铐，只好三个人一组，用塑料鞋带将他们的大拇指绑在一起。鞋带绑得很紧，学业循环不流通，犯人的大拇指开始发紫。犯人被送上专门列车，原本两人的座位，现在要挤三个人。玉熙看到走到对面一名男子努力往口袋里掏，

原来他想够着他的打火机。这名男子将鞋带烧融之后，警卫还来不及反应，三名男子已经跳窗逃逸。妇女不敢移动，除非当中有人必须去上厕所；此时三个人都要一起前往，她们的大拇指仍被牢牢地绑着。

当火车在尖锐的声音下停止，玉熙发现已到了清津车站。此时是二〇〇一年九月，离他身穿睡衣逃走的日子已快三年。现在，她在丢尽颜面的状况下返乡，被人绑着的大拇指隐隐作痛，就像上了手铐脚镣的犯人。

“弯腰，弯腰”——犯人下了火车，警卫对他们咆哮。

不用警卫下令，玉熙自己也想低头。要是她的丈夫或丈夫的同时看到她怎么办？犯人穿过车站候车室以及她母亲卖饼干的站前广场，然后经过她住的公寓窗户底下。过去，她自己曾透过窗户看着这幅景象，留意这群犯人，是否当中有认识的人。

犯人被引领者沿清津大街行进，穿过好奇的围观群众，过了两座桥，经过工业区与沼泽低地，后者是清津唯一的稻米田。他们拐弯朝海边走去，进到围绕着混凝土墙与有刺铁丝网的地方。这地方成为农圃拘禁所，建立于日据时代，用来囚禁朝鲜抗日分子。农圃这个名字已足以令人生惧，现在它则收入大批企图叛逃的人。

女性犯人塞满了三间大囚室，里面非常拥挤，大家必须并排睡在地上。挤不进去的就必须睡在厕所旁边。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犯人进来，通常一次月一百名。警卫对于新到的犯人进行脱衣搜身，区隔出显然已经怀孕的犯人，无论她们怀孕了几个月，一律送去堕胎。狱方认定这些胎儿的父亲是中国人。

在农圃，女性与男性犯人的数量是二比一，反映出叛逃者的性别差异。随着玉熙逐渐认识其他的女性，她惊讶的发现彼此的故事十分类似。许多人离开丈夫与孩子，理由是自己会带钱与食物回家。玉熙嫌恶这些女人，也嫌恶自己。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扔下孩子。

我们居然成了如此卑贱的女人，是饥饿让我们沦落到这种地步，玉熙想着。

在监狱营利，玉虚有许多时间思考。长时间的奴役劳动，接续着每晚长时间的自我批评与精神讲话。犯人的饮食匮乏，有时遭受野蛮对待。以监狱营来说，农圃或许还比其他地方好一点。每个星期六下午，妇女可以到院子的水晶汲水洗澡。她们会互相抓头虱。玉熙被囚禁的这段时间，她只看过一名妇女遭到毒打。这名女子在盛怒下攀爬营墙。那只是气急败坏的举动，而非认真想逃跑，因为她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警卫还是把她拉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打得半昏迷。

在玉熙看来，农圃的女犯人与其说是饱受惊吓，不如说是充满愤怒。当她们从事强迫劳动时——制造砖头，除草——脸上总是不变的憎恨申请。“我们一辈子听到的全是谎言。我们的人生是谎言。整个制度是谎言”，玉熙想着，她相信其他女人也这么想。

就连监狱营的官员也放弃对犯人进行再教育。她们只是例行公事，毫无热情

地阅读劳动党交给他们的讲稿。每个人似乎都很清楚这全是谎言。

有一天，当妇女们正在收玉米时，典狱长来玉米田发表一场即席演说。说的还是陈腔滥调他鼓励大家以金日成思想武装自己，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报效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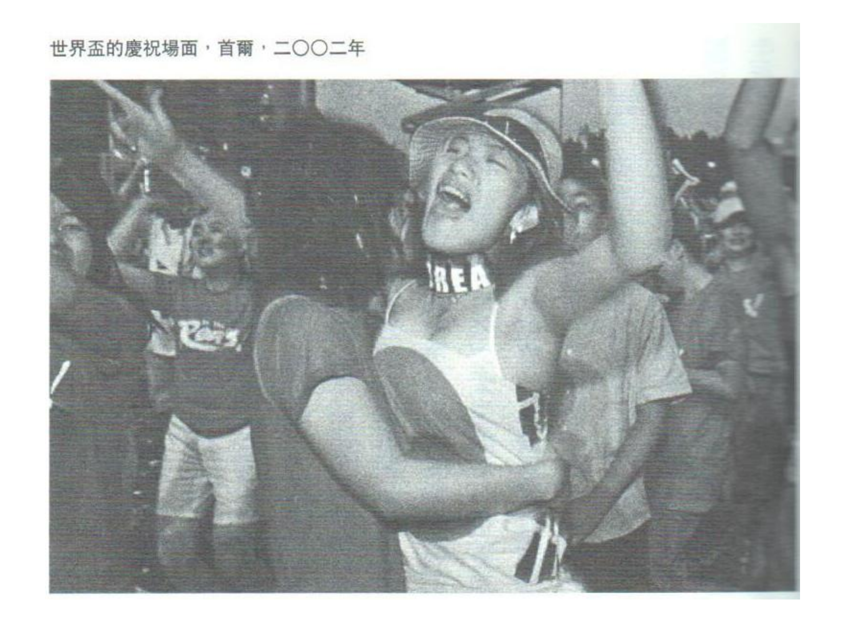
然后典狱长要求大家举手：谁愿意保证以后不会再去中国？大家蹲坐着默不作声。玉熙看看四周，没人举手。

在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典狱长说："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去中国，下回不要再被抓到。"

事实上，玉熙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步。有一天，她被派到营区混凝土墙外的菜园除草，但外围还有一圈有刺的铁丝网。玉熙看到铁丝网外有一名老妇人正在照料羊群。她环顾四周，确定守卫不在附近，于是隔着铁丝网对那名妇人说话。玉熙想跟她打个商量：如果她能告诉玉熙的母亲她在这里，那么玉熙就把身上穿的内衣给她。内衣在北韩很稀少，而且玉熙的内衣还是新的，是她最近在中国买的。这名老妇人答应了。

玉熙蹲下来脱下内衣。她把内衣卷成球装，里面包着一张写着母亲地址的纸条，然后扔出铁丝网外。

世界盃的慶祝場面，首爾，二〇〇二年



第十七章

多看少说

听到玉熙被关起来，宋太太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一直认为她的女儿被送进监狱是迟早的事。自从三年前玉熙逃家之后，宋太太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但她相信，她的女儿就跟其他的娼妓与叛徒一样去了中国。如果她背叛祖国，那么她坐牢是罪有应得。但女儿毕竟是女儿，宋太太无法坐视自己的长女在清津最恶名昭彰的拘禁所受苦。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求生，宋太太对于许多事已毫无顾忌，而且也培养出了不少生存技巧。她很早就了解，贿赂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难题。只要你不被人发现曾经诅咒金正日，那么有钱就能让你免于死刑。于是宋太太到黑市，花了五百元买了十条香烟。然后到处问人，直到找到主管农圃拘禁所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为止，从头到尾她一直低声抱怨她这名任性的女儿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收入。

几天后，玉熙出现在母亲的家门前，倒在她的怀里。

当宋太太看到玉熙时，惊讶地叫出声来。当时是十月，天气已冷，而玉熙却近乎赤裸并光着脚。农圃的安全警察认为她可能在鞋底藏钱，所以将她的鞋子剪开。她把衬衫的袖子撕下作为生理期用的卫生布；由于内衣已经送人，剩下的衣服成了一堆碎片，头发还爬满虱子。但当宋太太让她洗了澡之后，仍看的出来玉熙比离开北韩前健康许多。即使这几个星期她只吃西周与在野外捡拾的生玉米粒，玉熙的身体仍相当结实。她的肤色红润而有光泽。

玉熙喋喋不休地说着。精力旺盛的她，谈起中国的一切——他们三餐吃白米、市场、流行时尚。她说的话既象旅行见闻，又象政治的长篇大论。宋太太与两个妹妹围着她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南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们问。

玉熙没有实际看过，但她在中国看了许多南韩的电视节目。

“南韩是个富有的国家，就连中国也无法想象南韩的富有”，玉熙对她们说：“我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去南韩。”

两个妹妹盘腿坐在地上，玉熙就这样高谈阔论起来。有时，她们深受吸引；有时，她们受到惊吓。排行老二的妹妹嫁给铁路局的安全警卫，她是姊妹中最拘谨的。玉熙不断说着，她的大眼睛也越睁越大。虽然有点犹豫，因为她总是被玉熙恐吓，但她还是打断玉熙的话。

“但是我们的将军为我们这么努力.....”她指着母亲早上才擦过的金日成与金正日肖像。

“你还看不出来吗？你们的将军已经把大家变成了傻子”，玉熙生气地说。

最小的妹妹容熙已经离婚，现在跟母亲一起住，她比较赞同玉熙的想法，但她担心大姊的口无遮拦。这个家已经经过太多的悲剧；她们不想再惹上麻烦。虽然宋太太的屋子是独栋，但是外面有可能有人在徘徊偷听。

“要小心，我们要小心说话，好吗？”她提醒玉熙。

玉熙向母亲与妹妹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转而跟其他人说。住在附近的太太

不悦地咂舌，却又好奇地听着。她们下午过来拜访，欢迎玉熙回来，并且聚集起来听她说话。

“睁开你们的眼睛，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是一座监狱。我们很可怜，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

每当金正日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玉熙火气就上来了。“说谎的家伙！骗子！贼！”她会对着电视机大吼大叫。

宋太太终于发火了。玉熙的妄议会让整个家陷入危险——这可是叛国行经。如果说这话的不是自己的女儿，宋太太早就基于“人民班”的义务向上呈报。尽管发生这么多事，宋太太仍对金氏父子深信不疑。

“闭嘴，你这个叛徒”，宋太太对着玉熙大吼。

玉熙吓了一跳，她的母亲很少这么大声说话，但她并不打算闭嘴，反而责怪母亲。

“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恐怖的国家？”玉熙大声说：“你到底比较爱谁？金正日，还是我？”

母女两争吵不断。在母亲家住了四十天之后，玉熙终于从监狱的虐待中完全康复。她对母亲与妹妹说，他从过去的错误学到教训，她要再次到中国赚钱，只不过这次不会被抓到。宋太太勉为其难地借钱给玉熙，虽然担心，但女儿的离开也让她松了一口气。

八个月过去，完全没有玉熙的消息。然后到了六月，有个女人跑来敲宋太太的门，说是有她女儿的消息。宋太太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玉熙一定又入狱了，她必须再去保释她。但事情却跟她想的不一样，这名女子说，玉熙现在在临近边境的地方工作，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她想还钱给母亲，而且想送一些衣服与礼物给家人，但她担心自己回到清津可能会被逮捕。是否可以换个方式，请宋太太去找她呢？

宋太太感到犹豫，而且也不认识这个女人。自从一九九五年的意外事故之后——这场意外开启了家中一连串不幸——她就未曾到外地旅行。她不是那么需要钱，她的饼干生意很不错。松坪市场现在提供摊位给摊贩，还设有屋顶；宋太太服了租金而且拥有执照，她觉得自己是如假包换的生意人。此外就某个意义来说，她已经再婚。这比较像是一种协议，一名年老的鳏夫需要有人帮他料理家务，这个男人心地仁慈而且相对富裕。宋太太现在过得比以前舒服得多。她没有理由冒险前往中国边境，不过她也对五百元的保释金耿耿于怀。这名来路不明的女子向宋太太保证，她不用搭火车——玉熙已经安排了一辆私家车。宋太太感到惊讶——她答应了。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个炎热的雨天，宋太太启程前往茂山。她只带了一个小旅行袋，打算过一晚明早就回家。但她们抵达时并没有看到玉熙。这名女子只告诉

宋太太玉熙在边境附近工作，却没有说是边界的哪一边，但现在她明确告诉她：玉熙现在在中国。

“你必须到中国去拿钱与衣服。你的女儿正在等你”，女子说道。她向宋太太介绍一名男子，说是她丈夫。“不用担心，他会带你过去。”

宋太太既然已经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她还会回去吗？他们搭乘另一辆车，开上通往会宁的道路，这是另一座边境城镇。然后他们要等待天黑。

他们抵达河边时已是晚上十点，天空仍下着雨，河水涨了上来，拍打河岸，河滨成了一滩滑溜的烂泥。宋太太几乎无法分辨陆地与河流的分界。此时两名身穿北韩边防卫兵制服的男子过来协助他们。宋太太就像孩子一样被其中一人举到背上，另一个人则抓着第一个人的手臂以保持平衡，于是他们开始摇晃着过河。他们绊了几次，差点无法立定脚跟。宋太太觉得自己一定会掉到水里被激流重走，她就跟她那个年纪的北韩人一样不会游泳。宋太太很想大声对他们说，“带我回去，带我回家”，就在她忍不住心中的恐惧想把话说出口的时候，他们登上了对岸。向导给了边防卫兵一点钱，于是他们再度消失在水中，渡河返回北韩。向导与宋太太花了整夜时间爬过小山，到了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走进一个村落。

接着他们搭乘计程车，这是宋太太从未有过的经验。汽车、卡车、速可达与货车汇聚在通往市场的狭窄街道上，喇叭声此起彼落。此时是早上八点，店主正要开张。橱窗的安全门冉冉升起，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吱呀声。点盘老板打开音响，店门口的大扩音器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宋太太想，真是嘈杂而可怕的音乐。她想用手指捂住自己的耳朵。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并不喜欢。太吵了，玉熙怎么会住在这么可怕的地方？

宋太太的向导买了鸡蛋、香肠与猪脚当早餐。他们除了小镇，驶进一条泥土路，最后到了由几间屋子构成的小村庄。他们走进其中一间屋子。向导向宋太太介绍屋主与他年纪月十几岁的女儿。他们是中国的朝鲜族，讲的方言跟宋太太一样。屋主带宋太太到处参观。这栋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红砖墙、屋瓦、自行围起的栅栏，以及栅栏围成的前院——但屋内却塞满各种电器用品：立体音响、滤水器、彩色电视机、冰箱。屋主不断开着冰箱门，从厘米那拿出各种吃的喝的东西。啤酒、水果、泡菜。当这些东西连同向导带来的食物摆在桌上时，除了结婚喜宴，宋太太从没看过这么丰盛的饭菜。她想要的东西几乎全到齐了，除了玉熙。

“我女儿在哪？”宋太太问道。

屋主看着她，娜娜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宋太太又问了一次，这回她的语气更严厉了。

“她去找工作”，他回答。宋太太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屋主很客气，或许应该说太客气了：宋太太觉得他们有事瞒着她，但她实在太累，没有力气追问。她断断续续地睡着。醒来之后，还是不见玉熙的踪影，一阵恐怖的怀疑袭上心头：

我被绑架了。

宋太太不知道是否该找机会逃走。她能去哪儿？她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带她过来的向导已经走了。她应该直接质问屋主吗？她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屋主与他的女儿再三向宋太太保证，玉熙有事耽搁了，但很快就会回来。第二天，玉熙终于打电话过来。电话里的杂音很大，玉熙听起来似乎在很远的地方。她向宋太太保证自己一切安好，她很快就会跟她见面，并且要宋太太好好休息。

“你到底在哪里？”宋太太仍然半信半疑。

“在 Hanguk”，玉熙回答。

宋太太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

“在哪儿？在沈阳附近吗？”宋太太想起中国东北的第一大城市，距离她待的地方约三百英里。

“还要更远一点。我明天回打电话给你，到时候再跟你解释。”

北韩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朝鲜”（Chosun），称他们疏远的邻邦为“南朝鲜”（Nam Chosun），也就是南韩。南韩人则用完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国家，这个名字叫 Hanguk，也就是韩国。

在下一个电话里，玉熙明白表示她其实人在南韩。宋太太简直不敢相信，她气得全身发抖，玉熙还一度以为她心脏病发作。玉熙这辈子干过不少坏事，从小时候的恶作剧到口出恶言，以及在监狱营里做苦工，但这回她犯的错实在太离谱。她居然投靠敌国，甚至还付钱给这些人骗自己的母亲叛逃。宋太太这辈子从没这么生气过。

“你这个叛徒！我没有你这种女儿”，她对着话筒大吼，然后重重挂上电话。

往后三天，玉熙不断打电话。宋太太拒绝接听。最后她还是心软了。

玉熙在电话那头啜泣着。

“妈，我爱你。我希望你过来跟我一起生活。”玉熙简单提到自己目前的状况。她又一份工作。当她抵达南韩时，南韩政府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安定下来。

“如果首尔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要哭？”宋太太问。

宋太太认为南韩是美帝国主义杂碎的傀儡，南韩人用钱收买了她的女儿。一旦他们从玉熙身上获取足够的资讯，他们就会折磨并且杀了她。这是宋太太曾经听过的南韩对待脱北者的方式。她没有理由不相信。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妈”玉熙反驳她。“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想你，我希望你能来这里。”

宋太太不想再听下去。她告诉玉熙，只要她的体力从舟车劳顿中恢复，她就要返回北韩。她会在此地休息几天，把身体养好。

宋太太懒洋洋地躺在屋里，打盹、吃东西与看电视。这件屋子装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南韩的电视节目。南韩的肥皂剧非常受欢迎，宋太太

很快就成为连续剧《玻璃鞋》的忠实观众，这出戏描述的是一对从小沦为孤儿分隔两地的姊妹。连续剧以外的时间，宋太太随意转换频道，看哪一台正在转播足球。

二〇〇二年世界杯足球赛由南韩与日本共同主办。这是一九八八年南韩举办奥运会以来，首尔第二次成为世界镁光灯的焦点。宋太太对足球并不是那么有兴趣，她想看的是背景画面中短暂出现的南韩。她不得不注意到汽车、高楼大厦与商店。广告的时候，宋太太还看到手机与其他从未听过的东西。

当南韩队击败波兰、逼和美国，然后又先后淘汰葡萄牙、意大利与西班牙进入准决赛时——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做到这一点——数百万人涌上街头热烈庆祝。他们穿上红色 T 恤，头上戴着发出红光的触角，来表现他们对国家队“红魔鬼”的支持。镜头前的这些人，显然跟宋太太一样都是韩国人，说着相同的语言，但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美丽、快乐，而且如此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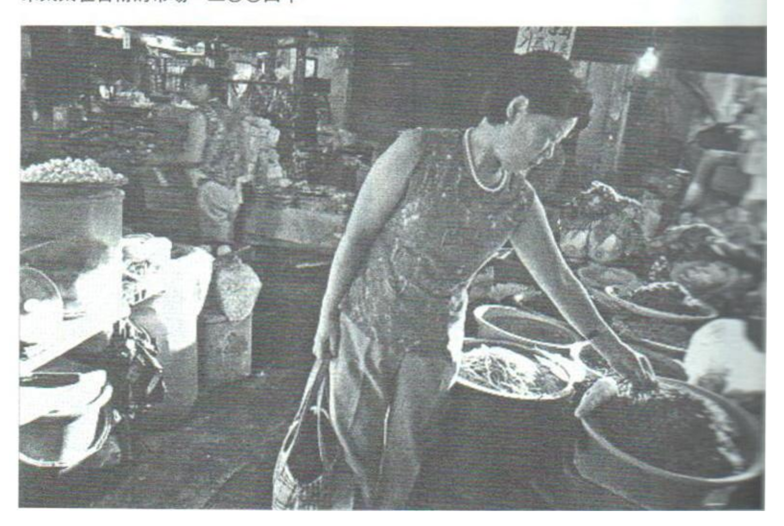
要宋太太相信她从电视看到的影像并不容易。她这辈子在北韩生活（更甭说其中二十五年的时间还是新闻记者的太太），她很清楚影像可以操纵。劳动党的演讲警告她，外国电视节目时时想破坏金日成与金正日的教诲。“南韩傀儡在美国中情局的控制下，阴谋使用这些刻意制作的影像 ，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有一场演说是这么说的。宋太太怀疑（这点倒是没错），那位慷慨大方的主人是玉熙付钱派来洗脑的，想骗她去南韩。

但是这些影像不可能全是假的。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也无法反驳——丰富的粮食、汽车与家电用品。

宋太太的屋主有一台电锅，上面有感应器，饭煮好的时候会自动断电。他们家有许多电器用品让她感到困惑，但只有电锅让她产生无穷的想象。很久以前宋太太也有一台捡漏的电锅，跟屋主这台完全不能比。她的电锅后来被警察没收，因为民众不应该使用电力烹饪。

每天早上当宋太太听到电锅的哗哗声，通知早饭已经煮好时，她总是对这种科技感到惊异。她想，北韩确实落后中国好几年，甚至是数十年。那么谁知道北韩落后南韩多少年？虽然她从抵达这间屋子以来还没出过门，但她觉得自己光是进厨房与打开电视就已像是做了一场巨大的探险。她很想与丈夫分享自己看到的一切。宋太太吃饭时特别容易想起长博。那个男人真爱吃啊！他一定爱死香肠。每次想到这里，她就流泪不止。然后宋太太又想到儿子。她的回忆充满歉疚与悔恨，她甚至无法跟儿子好好说话。他是如此强壮，如此英挺——这是一场悲剧，二十五岁的他就这样过世。他错了多少人生！他们全家人又错过多少，包括她自己，她的女儿，全被姥姥锁在北韩，一直到死亡为止。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依照党的指示去做，我们要为将军而死，我们最幸福，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她因为相信这些而虚掷人生。或者，也许还有转圜的机会——她的人生还没结束。她五十七岁，身体还很健康。

有天早晨，当微弱的曙光照进宋太太房里，这些念头在她脑子里回荡。当她意识逐渐清醒，听见电锅的啁啾声。宋太太坐起身子，她知道这是唤醒她的铃声。她已准备出发。



宋太太在首爾的市場，二〇〇四年

第十八章
应许之地

二〇〇二年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早晨，宋太太坐在韩亚航空班机的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准备从大连飞往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这趟旅程她使用了假名与假护照。飞机上她只是一个人——这名年轻人的位置离她只有几排座位。早上六点钟，他来到宋太太住的旅馆房间，把护照交给她。这本护照是从一名与宋太太年龄相仿的南韩妇女身上偷来的，原本照片用剃刀取下，换帅宋太太的照片。如果遭到询问，她会说自己是南韩游客，来大连度周末。大连是个海滨度假胜地，与韩国隔黄海相望。为了让宋太太的说词听起来可信，她必须换上新的衣服。北韩人会举得这种衣服充满异国风味——七分牛仔裤与亮白色运动鞋。宋太太背着轻便的背包。她的指导者为她穿耳洞——北韩妇女不会做这种事——让她把头发剪短且烫成南韩同年龄女性喜爱的发型。宋太太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在屋主照顾下，她变得丰腴圆润完全不像个难民。唯一可能露出马脚的地方是她那一口带着浓厚喉音的北韩腔。指导者建议她不要与人闲聊，为了避免与南韩旅客交谈，持续八十分钟的飞航时间她最好一直待在座位上。

宋太太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她不像一般人所想的在这种状况下会感到紧张，她深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平静，对于自己叛逃的决定了然于心。那天早晨，当宋太太在农舍里被电锅唤醒时，心中的阴霾突然一扫而空。她决定接受玉熙的邀请前往南韩，亲眼见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她的女儿和外孙还有机会，因为北韩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她的来日不多。她要把握机会。但再此之前，她想先回清津好好地跟另两个女儿告别。宋太太想跟她们解释自己的决定，然后把玉熙在中国留给她的钱交给她们——大约一千美元。“我不能让你的妹妹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对玉熙说。玉熙反对，她担心母亲回去之后心生胆怯或两个妹妹会让她打退堂鼓，但宋太太心意已决。

由于图门江秋季的水位暴涨，所以宋太太在清津待了一个月，虽然如此，她的想法完全没有动摇。宋太太抱持的新年使她顺利通过叛逃最危险的时刻。玉熙雇来的带她到南韩的偷渡客，对于这名娇小可爱的祖母感到惊讶，她手持假护照登上国际班机，却一点也不紧张。

在中国出境登机是这趟旅程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国出入境官员发现宋太太拿的是假护照，那么它会遭到逮捕并被遣返回北韩关进监狱营。飞机降落南韩之后，他们只剩一道关卡。宋太太的护照不可能骗过南韩人，他们很快就会从例行检查发现这是偷来的护照。事实上，同机的年轻人在降落前就收回那本护照，并且一降落就消失在人群中。

“假装你不认识我”，他对宋太太说。她必须在女厕等候，直到那人顺利离开机场为止。然后她走向入境柜台，将事情合盘托出。

她是宋熙锡，五十七岁，来自清津。她在饥荒中失去了半个家庭，现在要在南韩与她的女儿一同追求新的人生。宋太太把该说的都说了。

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南韩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合法政府，这意味着半岛上所

有居民，包括北韩人，都是南韩公民。一九九六年，南韩最高法院判决北韩人有去的南韩公民身份的权利。然而，实际的状况较为复杂。为了行使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北韩人必须自行前往南韩。北韩人无法在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或驻中国人和一处领事馆主张权利。中国基于对共产盟友残存的一点情谊以及避免数百万北韩人跨越国界，不让这些寻求庇护者出现在这些外交单位。中国很清楚，一九八九年东德民众经由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造成了柏林墙倒塌与东德政府崩溃。

南韩政府也乐见难民数量降低到可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北韩人有钱或有管道，他们可以拿到假护照飞到南韩。或者，他们可以从中国取道蒙古或越南，当地的南韩使馆人员在接受脱北者上没有那么大的限制。还有极少数人进入欧洲各国或联合国驻中国的外交单位寻求庇护。

中国境内十万多名北韩人，只有极少数能成功抵达南韩。一九九八年，只有七十一名北韩人要求取得南韩公民身份；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四十八人；二〇〇〇年，有三百一十二名脱北者；而二〇〇一年有五百八十三名。二〇〇二年，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北韩人获得南韩公民身份。此后，每年抵达南韩的人数大约介于一千到三千人之间。

宋太太抵达时，南韩官员已习惯北韩人在未知会的状况下出现在机场。她抵达仁川引起了一阵忙乱，但没有人感到惊慌。

宋太太下机的那一刻失去了方向。她只到过机场一次——当天早上在中国登机就是她的初体验——两相比较，仁川机场截然不同。这座耗资五十五亿美元兴建的机场在一年前刚落成启用，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在一九五〇年登陆的浅滩就离此地不远，因此远比大连机场更加壮观。仁川机场宛如一座玻璃与钢铁构成的巨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阳光穿透玻璃板，流泻到漫长的抵达通道上。人们从登机门走上电动走道，毫不费力地往前滑行。宋太太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能跟在其他旅客后面，并与护送她的那名男子保持一段距离。当其他旅客在入境柜台前排队等候时，宋太太躲进女厕，这里也跟机场其他地方一样让她感到困惑。她搞不清楚怎么冲马桶箱。水槽上的水龙头会自动开启与关闭，完全不用触碰。她从女厕探出头，看看那名男子是否已经离开，但她看见他还在队伍后面，她还要在等一会儿。她整理自己新烫的发型，补补妆，当她望向镜子，发现当中有张陌生的脸庞正直视着她。

下一次宋太太探头出去的时候，男子已经离开。她鼓起勇气走出女厕，开始寻找安全官员。事实上，宋太太撞见一名非常高大的男子，他的会长与附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刚好与宋太太的眼睛同一高度。她深深一鞠躬，就像一般人恳求官员时所做的，然后说出排练好的台词。

“我来自北韩，我想在这里寻求庇护”，她说。

这名男子是一名警卫。他看起来吓了一跳，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脱北者都是集体行动。宋太太告诉他她独自一人。警卫引领着她到入境柜台旁边的办公室。他打了几通电话，几分钟之内，国家情报院（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探员抵达。

宋太太的讯问持续近一个月。她从机场被移送到情报院专为刚抵达的脱北者设立的宿舍。宋太太不许离开这间宿舍，但玉熙可以过来看她。情报院的首要任务是确认宋太太既不是间谍也不是骗子，过去几年曾有北韩的秘密探员被捕，这些人潜伏南韩是为了监控脱北者。情报院也要晒检出那些说韩语的中国人，他们假冒北韩人取得南韩公民并领取金额达两万美元以上的安居给付。宋太太每天早上要进行两小时的供述，结束后她必须把讨论那部分写下来。她被要求详细描述清津重要地标的位置——劳动党办公室、安全局办公室、“区”与“洞”（韩国的城市分区）的分界。宋太太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供述：这让她有机会回顾自己的人生。下午，她会小睡片刻与看电视。此外，有一种小巧的饮料总能让宋太太心情愉快——冰箱里放满免费得盒装果汁，每一盒都附有一根吸管。

宋太太日后回忆时表示，她在国家情报院的日子是她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度假。之后，辛苦的工作才要开始。

对于每月赚不到一美元的人来说，要融入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南韩人人均所的大约是两万美元，是北韩的十四到十五倍。（相较之下，柏林墙倒塌时，西德人的人均所得是东德的二到三倍）

非军事区两边都进行大量宣传，宣称北韩人与南韩人有多么相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再六十年的分隔后，两国人民出现巨大差异。南韩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的北韩人不知道什么事互联网，与此相对，南韩家户拥有宽频的比例甚至高于美国、日本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北韩的文化与经济被冻结了五十年。南北韩所讲的不再是相同的语言；南韩使用的韩语有很多是从英语借用的词汇。南北韩人民的体格也产生差异。南韩十七岁男性吃的是奶昔与汉堡，他们的平均身高比北韩同年龄的男性高了五英寸（约十三公分）。一九六〇年代，当时北韩人的语言与饮食跟南韩人是一样的。

一九九〇年代，随着脱北者数量逐渐增加，南韩政府也越来越关切如何让这些人能顺利融入南韩社会。南韩智库找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与教育人士，共同组成团队商议对策。虽然脱北者的数量很少（直到二〇〇八年下半年，南韩四千四百万人口当中，有一万五千零五十七名脱北者），但如果有一天两韩统一，那么数量可能膨胀到数百万。从事相关研究的南韩社会学家尹麟镇表示：“如果数量这么少的脱北者都无法适应，那么统一的前景将非常暗淡；弱他们能在南韩展开新生活，我们就有了整合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协助脱北者，从中学习、改正错误。”

南韩人研究各种历史模式。他们到以色列考察为来自前苏联与北非的犹太人

而设的学校，这些犹太人虽然行使回归到犹太人国家居住的权利，但对于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却所知不多。他们也研究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的生活适应问题。

一九九九年，南韩在首尔南方五十英里的一处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开始了“统一院”。这座中心结合商业学校与过渡之家的功能，教导北韩人如何在南韩自力更生。他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提款机与支付电子账单。他们学习罗马字母以阅读广告上使用的一些英语。北韩人还要“扬弃”他们过去学习的事物，如韩战与美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角色。脱北者要接受人权课程与学习民主的运作方式。

在教室里，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然而一旦走出校园，却让宋太太感到困惑。课程安排他们实际去买衣服与理发。他们也上美食街，每个人分到一笔钱自己去买午餐。他们买的全是面食，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其他的食物是什么。

宋太太离开校园时，有时会因为兴奋而感到晕眩。校园外有这么嘈杂的声音与这么多的灯光，使他无法专注。她的目光快速掠过建筑物外墙的巨大荧幕（约有二十英尺高）与广告看板。她看不懂绝大多数的广告内容。HDTV、MTV、MP3、MP4、XP、TGIF、BBQ——看起来像是无法破解的密码。但宋太太觉得最神秘的还是南韩人。虽然知道他们全是韩国人，但他们看起来却像是另一个种族。女孩穿着非常短的裙子与真皮长筒靴。许多人染发——男孩与女孩把头发染成红色与黄色，看起来就像外国人。他们把小小的塑料插头塞在耳朵里，插头上还有一条电线垂到口袋。最令宋太太震惊的是，她看到男孩与女孩在大街上挽臂而行，甚至接吻。她敢接看看四周，但似乎没有人在意。有一天，她到首尔的地铁站，看到人们成群地达成电扶梯，快速地走过通道，在不同的地铁线之间转车。她很惊讶这些人怎么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宋太太在统一院学习了三个月。学期最后有一场毕业典礼。宋太太得到一笔两万美元的津贴让她开启新生活。接下来，她必须自食其力。

二〇〇四年，当我首次与宋太太见面时，她已离开北韩两年。当时我正为《洛杉矶时报》访问那些来自清津的北韩人。我们约好在报社驻首尔办公室见面。开门时，我看到一位服装一尘不染的娇小女性，举止间流露出自信。她戴着玉质大耳环，粉红色的 polo 衫整齐地掖在平整的浅褐色裤子里。从充满朝气的淡妆到干净利落的发型，显示她已能充分掌控自己的生活。

宋太太离开统一院以后，找了一份管家的工作。她在北韩已习惯整天工作，她觉得自己在南韩如果过得太闲，可能会闷出病来。她决定不跟玉熙一起住，而是自己找了间公寓。宋太太在水原租了一间高层住宅的小房间，水原位于首尔南方二十英里，这里的租金比较便宜。靠着节俭生活与持续工作，她很快就能负担旅行的费用——这件事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参加专为老年妇女举办的旅行团，足迹踏遍南韩每个角落。她甚至还回到中国——这一次是以观光客的身份。宋太

太跟一群脱北者到了波兰，参加当地举办的人权会议。她交了许多朋友，甚至还约会。。她喜欢到市场尝试新的食物——芒果、奇异果、木瓜。她喜欢外食，她不喜欢披萨或汉堡，但喜欢南韩烹调牛肉与猪肉的方式，以及在餐桌上烧烤。

我大概每半年会跟宋太太吃一次饭。当我撰写与北韩相关的文章时，我觉得宋太太是一名非常可靠的评论者。她不会一味替北韩政权辩护——“那个腐败的杂碎！”她曾这么骂过金正日，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她骂脏话——也不像我遇见的绝大多数脱北者那样激愤。北韩仍有许多令她怀念的事：邻居之间的同志情谊；还没崩溃之前的免费医疗体系。她仍怀念自己身为年轻已婚女性的生活。当她提到死去的丈夫时，她的眼睛开始湿润，圆圆的脸庞也变得柔和。

“当我看到这么丰盛的菜市，都忍不住流泪”，那天晚上宋太太向我致歉，当时我们正围坐在热气腾腾的涮涮锅旁，薄切的肉片在汤汁里涮几下，蘸点芝麻酱就可以吃了。“我忍不住想起他临终前的话：‘我们去上好一点的馆子，开一瓶美酒来喝。’”

但那已成过去，宋太太决定不再多想那段时光。她享受自由，决心珍惜剩余的岁月。宋太太充满好奇心。她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年轻许多，连胆子也变大了。”当我问她北韩的事时，她也反问我美国以及我到过的其他地方。宋太太每次与我见面总是充满活力与热情，总是打扮得赏心悦目。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为人牺牲，现在他总算懂的照顾自己。当宋太太发现自己的小腹越来越大时，她吓了一跳，这是她过去挨饿未曾有过的经验，因此开始节食。她出门总是化妆。又一次，我搭火车到水原与宋太太见面，我们在拥挤的候车室里看到彼此。当我们走近到可以听到对方声音的距离时，她难掩兴奋地大声说道：“你看，我去割了双眼皮！”

宋太太做了整形手术，为自己的眼皮增加褶皱，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象白种人。这是南韩经验的极致，而宋太太终于体验到了。

虽然玉熙叛逃的渴望极为强烈，但在南韩的她并不像她母亲那么快乐。玉熙是个很容易陷入苦恼的人，她很容易对自己与他人挑毛病。当这对母女一同出现时，总让人感到吃惊：她们同样有着心形脸蛋与结实的身材，但两人个性却截然不同。玉熙全身上下都是黑的——黑色牛仔裤，亮黑色上衣，黑色高筒靴子；棱角分明的丝边眼镜与扬起的眉毛，予人鲜明的印象。宋太太与女儿感情深厚，她们抹着彼此的头发与彼此拥抱，仿佛两人才刚团聚，但她们对于政治的看法却南辕北辙。午餐时，我的一位在援助机构工作的朋友问她们，人道援助有没有可能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玉熙认为援助物资只会被军方与党干部拿走，最终反而是加强了金正日对北韩的统治。

“即使如此，还可以让一些人活命……”，宋太太说。

玉熙不等她把话说完，就插嘴说：“你这样等于是支持邪恶政权。”

宋太太的双唇紧闭成一直线，接下来这顿饭她变得不太说话。

玉熙经常给人一种苦涩的印象。她从抵达南韩的那天起，就面临金钱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她离开中国前就已经出现。玉熙跟一群中国与韩国罪犯一起厮混，她们生活在见不得人的世界里，干着伪造、走私与放高利贷的勾当。不过，他们最常做的还是买卖人口的生意。他们渡河将北韩妇女运到中国，而且提供偷来的护照让一些人进入南韩。玉熙最后一次离开北韩时，她没有钱让自己从中国前往南韩。一名偷渡客同意给她护照与机票，但条件是她必须从南韩政府获得的津贴里拿出一万四千美元给他作为费用。双方用盖指印的方式签下合约，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

玉熙离开统一院后的那个星期，跟她签约的偷渡客打她的手机。她才刚买的手机——脱北者买的第一件物品清一色是手机——她搞不懂那个人怎么找到她或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对方坚持要她马上付款。

“我在首尔，我在你的公寓前面跟你碰头”他对玉熙说。

玉熙感到恐慌。安顿生活的钱比她预期的少了很多。二十、三十岁的脱北者拿到的津贴比年长者少得多，因为政府认为他们有能力工作。公寓的定金已经花了玉熙三千美元。她同意与这名偷渡客在京剧前面碰面。在冗长的协商之后，玉熙说服他接受比较低的费用，八千美元，大概是她仅剩的全部财产。

之后，玉熙在殡仪馆找到工作，她希望让自己的财务能步入正轨。玉熙其实很可能做到这点，但她心里却存在着难以抗拒的渴望。

玉熙想念母亲。在抵达南韩之前，她一直想着要如何把母亲接来，在抵达之后，这种想法更是挥之不去。她惊讶地发现老人在南韩受到很好的照顾。

玉熙知道要说服母亲离开北韩不是件容易得事，于是她求助同一批偷渡客。他们一起想了一个计划，引诱宋太太跨越国界到中国境内。玉熙担心如果一有闪失，她的母亲可能会被送进监狱营，因此他希望能走最安全也最不令人害怕的路线。他们把叛逃安排得象旅行套餐一样，而宋太太走的是“头等舱”的路线。她的旅行套餐包括私家车载她从清津前往边境地区，贿赂北韩边防卫兵背她过河，以及偷来的南韩护照。“我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做法”，玉熙解释说：“但我希望她的绿城能像个 VIP。”

玉熙深陷债务之中。她与殡仪馆签约值更多的班，但加班仍不足以支付她的支出。她不断思考其他的赚钱方式。她是一名三十八岁的女子，唯一的专业经验是激励民众为金日成努力工作——这在南韩几乎没有任何市场价值。

玉熙把脑筋动到卡拉 OK 上。“唱歌房”——卡拉 OK 在南韩的名称——是客人（通常是男性）唱歌放松的地方。这些俱乐部提供包厢、音响设备、麦克风、伴唱带、饮料与点心。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坐台小姐，她们陪客人一起唱歌、跳舞、帮客人倒酒并且卖弄风骚——或者更进一步。玉熙在这个行业的任务是招募年轻小姐、接送她们往返各俱乐部之间，以及确保她们不会跟客人惹上麻烦。

她的地盘是整个水原市临近地区。卡拉 OK 酒店的客人绝大多数是建筑工人，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晚上无事可做。玉熙旗下约有二十名女孩，她们全是北韩人，绝大多数才二十出头。她们从统一院毕业后就直接投身这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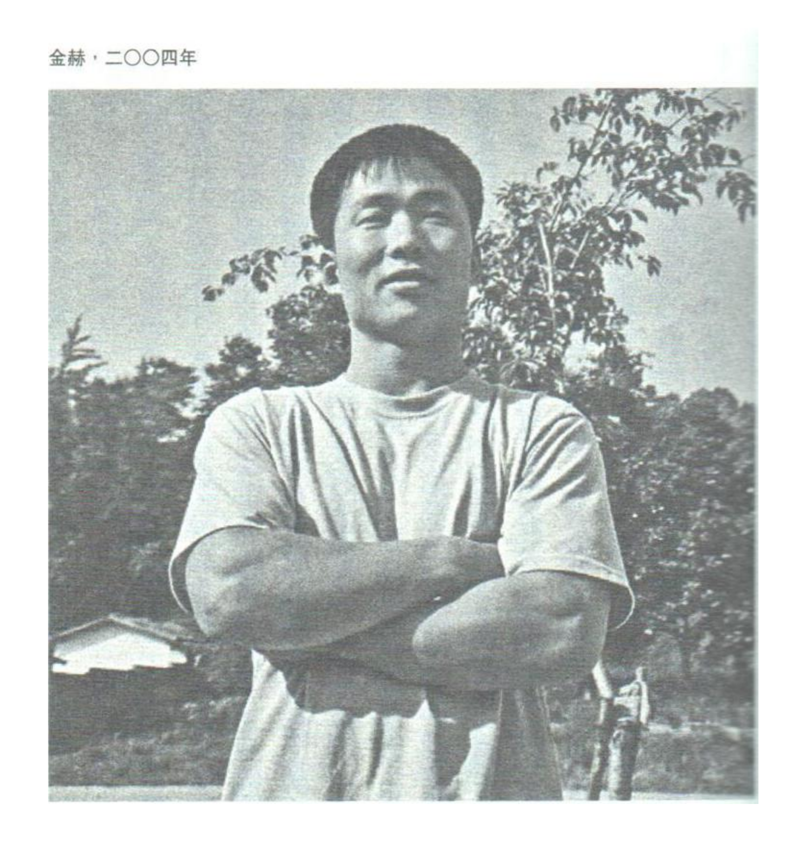
“她们来到南韩，没有一技之长”，玉熙解释说：“她们很快发现，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一个月赚九百美元；在这里，她们一晚就能赚一百美元。”有天晚上，我陪着玉熙到处接送女孩，她一边向我解释。她开着一辆现代箱型车，车内到处都是捏皱的烟盒与圣歌的录音带。傍晚五点，玉熙刚开始工作。她随着尖峰时间的车阵慢慢驶出水原，然后下高速公路开到一条两线道的道路上，路的两旁全是农田与温室。玉熙在沿路经过的小镇搭载女孩，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穿着细高跟鞋玩起扮装有戏的女学生。虽然玉熙的工作被警方认定是非法，但她坚持称她的女孩不是妓女。“我没有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我告诉她们，‘你们要做的就是唱歌跳舞，从客人身上诈取金钱。’”这个行里在这里要比大城市容易。“她们在首尔要做的可比这里多。在首尔，西装革履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期待从女孩身上得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犷，却很天真。”

这份工作收入让玉熙有能力以数万美元的代价将两个妹妹带到南韩——她的小妹与五岁女儿，大妹连同丈夫与两个儿子。玉熙的两个妹妹现在也在卡拉 OK 工作。

玉熙唯一无法带到南韩的亲人是她最深爱的孩子。对于这点她感到十分痛苦。“我为了救自己而牺牲自己的孩子”，她责怪自己。我最后一次见到玉熙是在二〇〇七年夏天；他的儿子十八岁，女儿十六岁。自从一九九八年的夜晚她穿着睡衣逃离清津开始，她就未曾再见到他们。然而，玉熙定期透过在中国的掮客（他们拿了佣金并且找了走私客将钱带过边界）寄钱给孩子。就在他离开北韩后不久，临近边境的北韩城镇开始出现非法的电话服务，可以接收中国手机的讯号。玉熙因此得以每隔几个月跟已无瓜葛的丈夫通电话。他会到茂山用走私的中国电话与玉熙同化，但不让她跟孩子说话。他也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南韩去，因为他怀疑一旦孩子到了南韩，玉熙就不会再寄钱给他（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梦见我的孩子”，玉熙对我说：“我手里牵着儿子，背上背着女儿。我不断奔跑，想逃离北韩。有一名穿着铁路列车长制服的高达男子走到我们前面。我不确定，但我想他是我的丈夫，他想组织我们。”玉熙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金赫，二〇〇四年



第十九章
祖国的外人

南韩最重视的几项特质：身高、白皙的皮肤、富裕、显赫的学历、设计师的服装、英语流利，这些正是新到的脱北者所缺乏的，而这也解释了北韩人在南韩为什么总是自尊心低落，玉熙就是一个例子。南韩人在五十年前还没有这么富裕，但北韩人让他们想起已经遗忘的过去。脱北者也预示令人害怕的未来，这并非空穴来风——南韩人担心金正日政权的崩溃将使南韩被两千万百万需要食物与住所的难民所淹没。虽然政治正确要求所有韩国人要找回失散的亲人（“统一是我们的愿望，即使在梦里也念念不忘”，南韩的学童都要唱这么一首歌），但有些人对于这样的前景感到忧心。首尔的智库定期提出报告，估计统一需要的费用，其金额数字从三千亿美元到一兆八千亿美元不等。在韩战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生的年轻人，对于韩国失落的另一半很少带有伤感。对于这个贫困而拥有核武并且对他们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他们宁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结束繁忙的工作之后——南韩是发达国家中工时最长的——他们尽情玩乐，开着他们的现代汽车高速奔驰，大声聆听他们的 iPod，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忘记北韩的存在。

虽然政府提供脱北者一切的协助，但他们可以感觉到南韩人看着他们的时候眼神带着怜悯、恐惧、罪恶感与困窘。这种五味杂陈的迎接方式，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外人。

金医师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叛逃到南韩。当她在一九九九年渡过图门江时，她唯一的目的是中国。她的计划是根据父亲临终前草草写下的亲戚姓名与最后所知的地址来找寻亲戚下落。她想，亲戚或多或少会帮她找份工作。她可以吃饱喝足恢复体力，然后存够钱之后再把儿子接来。金医师最希望的还是回到清津，重拾医院工作。尽管曾经遭受痛苦的饥饿以及与劳动党出现龃龉，她仍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亏欠，因为国家曾资助自己受教育。

然而，金医师进入中国还不到几个小时，她的决心就动摇了，因为她看到喂狗的碗里放了米饭与肉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金医师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加深了她的愤怒，她惊觉自己过去被灌输的全是谎言。她知道的事情每一件都促使她离祖国以及她曾坚守的信念越来越远，直到不可能回头为止。

当金医师轻轻推开农舍大门，狗儿开始狂吠，惊醒了农舍主人。他们是朝鲜族，屋里住着老妇人与她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从金医师结冻的衣服与憔悴的身形看出她是刚越境的难民，于是请她入内，让她换上干净衣物与吃上热腾腾的一餐。这两个陌生日如果把她卖去当新娘，很可能得到数百美元——金医师三十四岁，而且相当吸引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收留她两个星期，还帮她寻找亲戚。而在亲戚那里，金医师也获得极为慷慨的招待。素昧平生的亲戚马上把她当成亲人一样看待。

起初，金医师可以毫无困难地融入当地的朝鲜族。她学了一点中文。她在餐厅里找了一份为工人准备便当的工作。但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国警方开始加强逮捕脱北者。金医师被抓了三次，每次都靠亲戚贿赂才能让她获释。最后一次被逮

捕之后，金医师认为待在中国东北太危险，于是搭火车到北京找工作。她冒充是来自延边自治州的朝鲜族，前去应征一个需要会说韩语的保姆工作。

金医师的雇主是一名职业妇女，她是南韩教授，带着五岁孩子来中国度过为期一年的带薪学术休假。金医师喜欢这名教授，她抓住机会在舒适的公寓里生活与协助照顾孩子。她证明自己是一名极为能干的保姆与管家。随着学年即将结束，教授提议当她们回南韩的时候，金医师也跟她们一起回去。许多富裕的南韩家庭都会雇用中国朝鲜族当他们的保姆。

金医师无可奈何，只好说出实情。她一口气交代完自己的故事——离婚与丧失儿子的监护权，父亲在金日成死后自杀，数年来的半饥饿状态，医院里垂死的孩子。

“喔我的天啊！你是医师！”教授说道。两名女子彼此拥抱哭泣。“如果我知道你是医师，绝不会这样对你。”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能为你工作。而我需要这份工作。”

金医师说出实情之后，她的保姆工作也随之告终，但这名教授履行了诺言。她承诺无论如何都会带金医师回南韩。在她返国后几个月，她让金医师与一名掮客接触。

二〇〇二年三月，金医师抵达仁川机场，对于未来的崭新生活充满幸福的期待。但这种感受并没有持续很久。金医师在教堂认识了一名男子说服她，把两万美元的安居基金投入于直销，她要向认识的人兜售肥皂与化妆品。金医师在职前介绍的那个月里无法看出其中有诈，整个行销过程逐渐演变成老鼠会的形式，她手上的政府津贴几乎虚掷一空。接着她又遭遇另一项挫折——南韩不承认她的医疗训练。如果金医师想走医疗这个行业，她必须从头开始，申请医学院，然后自付学费；因为她的年纪太大，无法申请政府的奖学金。金医师感到更加苦涩，七年的医学院与八年的执业完全是一场空。她既怜悯自己，又憎恨自己；她对于离开北韩仍有些许的罪恶感，也幻想过自杀。

当我于金医师在二〇〇四年见面时，我问她是否后悔来南韩。

“如果我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就不会来这里”金医师回答。我见过不少脱北者，她是唯一这么说的，不过我怀疑其他脱北者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也发现金医师看起来仍然像个北韩人。她的头发往后梳，用黑色天鹅绒缎带将头发绑住，她的嘴唇涂着红色系的口红，看上去仿佛一九六〇年代特艺彩色电影的人物。她也让我想起我在平壤街头看到的劳动党员。

几年后，我与金医师再度见面，她已完全变了一个人。二〇〇七年夏天，这名女子走进首尔一家新开的日本料理店时，我几乎认不出她来。金医师的长发披肩，穿着牛仔裤，耳朵带着珠状耳环。

“我对寒酸的北韩造型感到厌倦”，她对我说。

金医师看起来变年轻了，就像学生一样；事实上，她的确是个学生。经过数

年与南韩医学委员会争取后，她咬紧牙关并且于四十岁那年开始了她的四年医学院课程。她现在住在学生宿舍里，她的室友年纪比她小了二十岁。金医师告诉我，她的课业相当繁重，不只是因为北韩的医学教育训练不足，也因为南韩的医学院使用的是英文术语，而她对英文完全陌生。俄文是她唯一学过的外文。尽管如此，这个经验看起来让她恢复了朝气。毕业之后，她计划继续她的医疗事业，这一次她将以老人医学科作为她的专业。她的母亲因阿兹海姆症而去世。金医师梦想开一家疗养院，或许甚至是连锁的疗养院。她希望有一天，当北韩政权崩溃时，她也许能带着老人照护的观念返回清津。这或许是个空想，但它能让金医师连结过去与现在，而且能减轻她对自己抛弃一切的罪恶感。

脱北者通常是一群生活有困难的人，这是一项悲惨的事实。许多人被迫离开北韩，不只是因为挨饿，也因为他们在国内格格不入。通常他们的问题会继续跟着他们，即使他们已越过国境。

金赫尤其如此。他十九师抵达南韩时，他跟过去一样：贫穷、矮小、无家可归，没有家族或人脉做他的靠山。

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金赫从第十二教化所被释放。他因为营养不良而极度虚弱，每走一百公尺就要停下来休息。他暂住朋友家，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起初，金赫打算重操旧业，他原本认为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被抓到，但劳改营的经验粉碎了他的自信。才十八岁，金赫就已失去一半青少年特有的无畏精神，他已不敢面对任何危险。他不想再次被捕，也不想遭到毒打。他厌倦逃跑。对金赫而言，北韩已无任何眷恋的地方，但他听传言说，南韩传教士会协助他这样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因此，当他最后一次渡过图门江时——那一天是二〇〇〇年的耶诞夜——他打算前往的地方是教堂。

在亚洲，基督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除了菲律宾外就是南韩，后者派遣了传教士到亚洲、非洲与中东各地传递福音与进行人道援助。不同于绝大多数南韩人对脱北者模棱两可的态度，传教士对于北韩人的苦况深表同情。数千名南韩传教士——有时还加上韩裔美国人——群集于中国东北，他们行为低调，避免触怒中国官方。这些传教士通常以民宅作为小型而未经登记的教堂。

夜晚，这些教堂的红色霓虹十字架在阴暗的乡野中发出奇异的光芒。其他专供北韩人躲藏的安全住所则完全只靠口耳相传。由于联合国难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与主流的非政府组织不能公然违反中国禁止庇护北韩人的法律，因此传教士就成了弥补此一缺口的重要环节，由他们负责提供食物与庇护所给这些难民。

金赫在中国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找到一间教堂。这间教堂由一名南韩商人维持运作，此人拥有一间家具工厂，而且坊间谣传他拥有人脉与金钱可以安排难民安全前往南韩。

“我想学习基督教”，金赫假意说道。

金赫遵照教会的日常作息。他与其他脱北者早上五点起来祈祷，然后是早餐、运动、圣经研读、晚餐，然后在晚上九点就寝前腰做更久的祈祷。他们每日如此，除了周末，偶尔在这个时间可以踢踢足球。金赫与同年纪北韩人一样，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清津的教堂早在他出生前就已关闭；老一辈的基督徒仍然举行仪式，只是必须私底下进行。他所知道的微薄基督教知识完全来自于学校的初级读本，这些读本把传教士说成是典型的恶棍，既狡猾又残忍。金赫仍对基督教抱持嘲讽的态度。他觉得南韩教会逼迫他吞下他们的宣传，以换取食物与庇护。但他也对自己假冒信徒欺骗教会感到良心不安。逐渐地，他的态度开始软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她低声诵念祈祷文的字句，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慰，这是他从小诵读赞颂金日成的诗歌未曾有过的感受，而他也首次感觉到某种超越他的事物值得信仰。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金赫口中说的“我们的父亲”才成了上帝而非金日成，他口中的儿子才成了耶稣而非金正日。

在教会待了五个月之后，领导人对金赫说，他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教会一直受到中国警察的监视，他们担心此地的难民会遭受危险。领导人给了金赫一千人民币（大约一百二十五美元），要他带着一群难民到蒙古边境。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方法前往南韩。

如果说宋太太以伪造的南韩护照搭飞机前往南韩算是头等舱的旅程，那么蒙古路线就金丝于三等舱的旅程。但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蒙古路线却是最佳选择。蒙古不同于中国，该国允许南韩驻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大使馆收容脱北者。事实上，如果北韩人试图穿过中国边界进入蒙古，那么他们将会被蒙古边防警察逮捕，然后遣送出国——前往南韩。因此，在蒙古被逮捕实际上等于获得一张前往首尔的免费机票。结果使得蒙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转运站，由北韩开出的地下列车经由此地开往南韩。

金赫与其他难民搭火车前往二连浩特，这是进入蒙古境内前的最后一座中国城市。二连浩特其实是一处沙漠前哨战，在这里，骆驼与羊的数量远多于人。他们总共有六名北韩人，包括三岁与十岁的孩子各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到了南韩。他们的计划是先到一处安全地点与另一群北韩人汇合，后者从大连搭乘另一班列车前来。另一群人里面有人了解当地地形，可以带领大家穿过边境。

但是计划从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金赫在火车上接到了一通惊慌的电话，通知他另一群人已经遭到逮捕。他的队伍没有机会——现在要折回已经太晚了。他们不能前往安全的处所，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已经遭到监视。他们必须丢掉手机，因为可能会被警察追踪到发话地点。金赫与其他成年人商议，他们之前已经约略知道路线而且有一张手绘地图。于是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前往蒙古。

他们躲在二连浩特车站附近直到晚上九点，他们等待漫长的夏日白昼结束，好利用夜色昏暗时越过边界。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沿着往北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行进，利用铁道作为指引，但必须于铁轨保持距离才不会被发现。一旦他们抵达荒凉的边境地带，他们可以从七英尺高的铁丝网底下穿过去，进入分隔中蒙两国的无人地带。

从二连浩特车站到第一道边境铁丝网只有五英里，从这道铁丝网到第一座蒙古瞭望塔只有一英里，他们会在那里向蒙古当局投诚。照理他们应该可以在天亮之前步行到达，但夜里的沙漠难以辨识方向——只有天上的星星能指引他们，此外全是景色单调的蓟、岩石与沙土，而且清一色是土咖啡色。大人们争论着该往哪边走。

他们应该沿着铁路的东边还是西边走？他们选东边，结果证明是个大错。边界朝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然后急转向北；他们走的方向与边界平行，因此一直走不到跨越边界的地方。直到天亮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戈壁沙漠的温度飙升到华氏九十几度。等到他们改变方向，发现标定边界的铁丝网并且钻过去时，已是傍晚时分。金赫与其他人轮流抱起三岁孩子，当当那名十岁孩子开始走不动时，他们只能拖着他继续前进。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处废弃小屋，旁边有个小池塘。当金赫跑去取水时，一名女子陪着男孩。当他接近池塘时，他听到女人的叫声，孩子死了。

蒙古边防警察在晚间发现这群北韩人。男孩的死使他们的案件在处理上变得极为复杂。法医需要确认这名男孩确实死于脱水，而非遭到谋杀。长达十个星期时间，询问一直持续，金赫与其他成年人因此被关在蒙古的监狱里。这对金赫在自由世界的人生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开端。

二〇〇一年九月四日，金赫与其他十二名脱北者从乌兰巴托搭机抵达南韩。当仁川机场的入境官员在蒙古国发给金赫的临时护照上盖章，并且对他说“欢迎来到大韩民国”时，金赫几乎快崩溃了。

不过，跟许多脱北者一样，金赫兴高采烈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他曾经待过监狱营，因此遭受的询问特别严厉。南韩政府很担心脱北者中夹带着罪犯。之后，正当他以为自己已经自由的时候，他又被送到统一院营区一个月，而且一直受到南韩当局的怀疑。这种持续监禁的状态令金赫无法忍受。

金赫的个性在北韩是个障碍，到了南韩也是一样。他很易怒，容易对权威愤愤不平。他静不下来。金赫的体格也让他在充满身高迷思的社会里受到不利的待遇。他的双腿发育不良，他的头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大——这是在发育期未能得到充分营养的人的典型体格。当营养不足时，身体会将养分有限送到头部与躯干，而牺牲四肢。在饥荒的文献中，这种症状称为“发育不良”。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二〇〇三年的研究指出，北韩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儿童身体因发育不良而受损。

我跟金赫第一次见面是在二〇〇四年，当时他住在扶余，那是一个距离首尔约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小镇。金赫说他的精神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喧嚣与拥挤，在身边没有其他的脱北者，没有人能帮他适应环境。金赫身上一名不文，他一拿到两万美元的安居基金就马上花掉。他将这笔钱给了一名掮客，对方宣称能找到他的哥哥。经过一年多的推脱敷衍，金赫认为他的哥哥大概是死了。“我哥的身高将近六英尺（一百八十二公分）。他不可能活下来)，他对我说。矮个子的好处就是你只需要一点点食物就能活下去。

金赫一直在换工作。他曾经当过冰淇淋的外送员，但后来发现同公司的南韩雇员拿的薪水比他多，于是一气之下辞掉工作；他曾上过汽车技师的训练课程，并且当了几个月的实习生，但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去。之后，他认为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但当他前往首尔的拳击训练场时，却因各自太矮而遭到拒绝。这伤了金赫的自尊心，而且让他担心自己永远也找不到女朋友。

金赫感到很寂寞，他很难交到新的朋友；如果南韩人同情他，他会觉得对方自以为是。即使他憎恨北韩政权，但当南韩人批评北韩时，他发现自己总是为北韩说话。这是每个脱北者共同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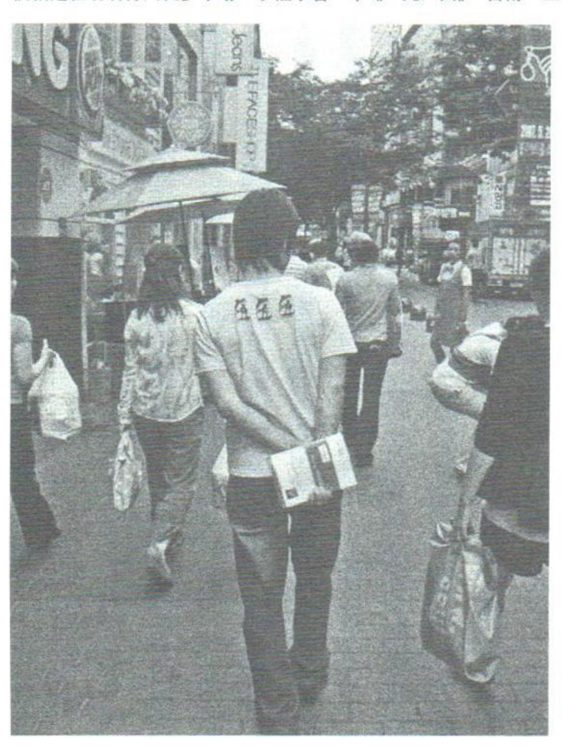
金赫不了解南韩的基本礼节。因为北韩人没有随意与陌生人交谈的习惯，所以每当有人对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惊吓。金赫每次离开公寓，总会被迎面打招呼的邻居吓一跳。他要不是避开对方的眼神，就是反过来怒目而视。

“我不知道有人跟你说话时，你应该回应对方。我不了解那是与邻居建立友谊的方式，也不了解这些人可以帮你的忙。“金赫回想自己刚到南韩时再人际关系上犯的愚蠢错误，不禁笑了起来。

二〇〇八年，当我再次见到金赫时，他已经搬到首尔而且在大学念书，他想攻读历史与企业管理两个学位。金赫二十六岁。虽然他对自己还没交到女朋友感到难过，但他的身边已有许多朋友，包括一名刚从茂山叛逃过来的表亲。金赫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来的脱北者，这么做也使他的自信提升不少。他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一个人，他在大学附近开了一所英语学校。他们是在街上攀谈认识的。金赫这次没有跑开，相反地，他告诉对方自己是脱北者，而对方也邀请金赫免费到他的学校上学。

此时的金赫，才算真正抵达了南韩。

俊相走在明洞行人徒步市場，手裡拿著一本《一九八四》，首爾，二〇〇七年



第二十章
团聚

美兰身上的血统污点，使她在北韩注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一旦跨越国界，血统反而成为她最大的资产。与南韩亲戚的纽带关系最终证明是无价的。其他脱北者必须孤独在陌生的新世界里重新生活，但美兰与他们不同，她的亲戚正等待她的加入。

表面上，南韩过着明快有效率的现代生活；实际上，儒家传统仍然主导着民众生活。美兰的父亲身为独子，富有传承家族香火的责任，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子女就必须赓续这项责任。

当美兰家于一九九八年渡过图门江进入中国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到忠清南道瑞山市市政府，也就是美兰父亲出生的地方。早在几十年前，当地村民都已搬出村子，大举迁移到各个城市。由于兴建水库的关系，因此村子绝大部分已淹没在水中。然而在韩国，所谓的家指的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不管哪个地方是否还有人住。市政府有太佑两个妹妹的地址，她们仍然活着而且住在首尔附近。市政府表示会将信转寄给她们。美兰二十三岁的弟弟虽然是家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却是唯一的男性，因此由他来写这封信。他语气正式地写着："我是姑姑的兄长唯一的儿子，我要通知姑姑，父亲已于去年在咸镜北道镜城郡去世。"他在信封里附上她们在中国延吉市的地址与电话，延吉市是临近边境的小城，美兰家暂时住在这里。

过了几个星期，美兰家街道其中一名姑姑的电话。对方半信半疑。半个世纪过去了，不要说一通电话，连一封信，甚至她们的哥哥在韩战中幸存的传言也没有听过。一九六一年，也就是韩战结束后八年，南韩国防部认定太佑已于一九五三年阵亡。从太佑家人的角度来看，太佑是在二十一岁那年死亡，并未留下子嗣。而他的姓名也被刻在国家公墓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太佑的妹妹怎能不怀疑这是个骗局，用意只是为了骗取金钱？美兰的姊姊拿起话筒，告诉姑姑她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哪怕是片段的家族小故事、生日与绰号。南韩的亲戚要求做 DNA 鉴定，美兰和她的姊姊与弟弟都同意了。

家族的团聚持续了两星期。两个姑姑都来了中国，连同其他亲戚，总共有十人前来。双方一见面，当下大家心里就明白，DNA 鉴定要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一直看着对方。我们惊讶地看着彼此的后脑勺、手的形状，我们也惊讶于彼此说话与走路的方式"，美兰说。

"姑姑原本以为家中的香火就此断绝，因为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美兰的弟弟回忆说。"当姑姑来到中国时，我看到她们，全身开始发抖，她们是女的，但与父亲像是同一个模子引出来的。"

已经不能回头了。美兰的母亲原本想回清津，与还在北韩的两个女儿与外孙一起生活，但他们担心北韩政府可能发现他们在中国与来自敌国的亲戚见面，这

会让他们被处以死刑。除了南韩，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美兰的姑姑前往位于沈阳的南韩领事馆，要求他们让这几个北韩亲戚飞回首尔——至少他们应该为长久沦为战俘的南韩老兵家属做一点事，但南韩领事却不愿回应这项要求。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就任南韩总统的金大中，日后他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于此时推动所谓的"阳光政策"，以缓和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南韩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敏感。官员担心将美兰家送回南韩将恶化两国的外交关系。

美兰的亲戚刚好有管道可以让他们自行处理此事。姑姑开了一家小旅馆，而儿子在首尔近郊开了一间澡堂。他来回往返中国与南韩，凑齐了北韩亲戚使用的伪造文件。他向与美兰同年纪的表妹拿了护照。将表妹的照片拿掉，换上美兰的照片。姑姑则"遗失"自己的护照让美兰的母亲使用。这些都是违法行为，事实上，还有一名表亲因为伪造护照而被判一个月的徒刑，但这些做法显然管用。美兰、她的姊姊、弟弟与母亲，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平安抵达南韩。

有了接纳她的家庭，美兰因此没有被当成外人看待，而是被当成人生的前二十五年在国外生活的南韩人。她是北韩人的事实足以让身旁的南韩人产生好奇，但又不至于吓跑他们。美兰的身高五尺三寸（一百六十公分），对北韩的女性来说是相当高挑的，即使就南韩的标准来看，也是属于身材较高的女性。她仍然像俊相在电影院看到她的时候一样，有着高耸的颧骨与如同罗马雕像般醒目的鼻子。她拥有南韩男人眼中北韩女人特有的神秘气质。美丽的外表、家族关系、泰然自若，与天生的机智，使她看起来与众不同。美兰很快就被录取进入教育硕士班就读。她的口齿清晰，能以清楚的叙事方式讲述故事，而且经常受访谈论北韩的教育制度。

就在美兰即将三十岁之际，有人介绍她与一名高大的年轻人认识。这名男子的浑厚脸颊堆满笑容，圆形的眼镜透露着温暖。他是军方的民间雇员。在双方家长的鼓励下，两人结婚了。二〇〇四年下半年，美兰生了儿子。他们依照韩国传统习俗为孩子庆祝周岁，奖金一百名亲朋好友到场庆贺。东首尔一家宴客厅的二楼装饰着蓝色与白色气球。美兰、她的丈夫与孩子身穿色彩鲜艳的传统韩服。美兰的衣服是用闪亮的象牙色丝绸做的，领口围绕着红色与黑色的袖带。她看起来容光焕发、美丽大方，是个亲切的女主人。美兰实现了韩国女人的梦想，实际上也是我认识的许多女性的梦想——英俊的丈夫，生下男婴、即将到手的硕士学历。

从美兰的言谈举止来看，无法区别她与南韩人之间的差异。美兰已经没有北韩人说话惯有的喉音。她与丈夫在水原买了一栋公寓，这座卫星城市是许多向上流动的家庭在无法负担首尔百万美元房价之下的首要选择。美兰住的是社区大楼，这些大楼就像混凝土积木堆垒而成的森林，每一栋都长得一模一样。只能以外墙的编号来做区分。从大楼本身看，这个地方并不坏。建筑物新颖干净，表面是怡人的乳脂色。阳光穿过单片玻璃窗，照进美兰二楼公寓的客厅里。公寓内部明亮宽敞，孩子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居家办公室，书桌上摆了一台三星电脑，还有开

放式的处方与现代的家用电器设备。

我前去拜访时，美兰正在煮午餐，而她的儿子——现在正是圆圆胖胖走路跌跌撞撞的年纪——正在客厅看卡通。

“如果我是在北韩生下他，我就必须用米汤加点糖来喂他，而且我还必须买得起这些东西”，美兰说。

我们聊起美兰过去的人生转折。现在的她巧妙地应付研究所课业与家庭两方面的需要。她的婆家希望她能当个传统韩国妻子。照顾孩子是很昂贵的，她发现要同时兼顾自己的工作相当困难。美兰也参加了有氧运动课程，以减去怀孕时增加的体重。她的皮肤经常因压力而张疹子。现在她面临的问题似乎与其他我认识的职业妇女没什么两样。

然而在骨子里，美兰还是那个处于北韩社会最底层、贫穷而带有污点血统的女性。她受过彻底的灌输与背叛的痛苦；她有好几年时间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话，只能将想法隐藏起来。她冷酷地做过尸体，毫不犹豫地跨过饿殍。她总是将午餐吃得一粒不剩，完全不管她的学生即将饿死的现实。罪恶感折磨着她。罪恶感与羞耻感是脱北者共有的特质；许多人怨恨自己不得不这么做让自己活下去。

以美兰来说，这种罪恶感并非凭空想象，至少在我认识她两年之后，她告诉我两个姊姊在北韩发生的事，我才知道她的罪恶感其来有自。一九九九年夏天，大约在美兰家抵达南韩的半年之后，国家安全警察几乎同时将她的两个姊姊从家里带走。美兰的大姊美姬是家中的美女，她嫁给一名军方官员，总是在饥荒时慷慨提供食物给家里，另一个姊姊美淑则过着毫无瑕疵的生活；她们忠于自己的父母、丈夫与孩子，也忠于金正日。她们是半夜被带走的——与美兰不断出现的恶梦一样，除了孩子留给丈夫，丈夫也被迫与她们离婚。两个姊姊很可能被带往某个劳改营长期监禁。从一九九九年粮食严重缺乏的情况来看，她们很可能已经死了。

两个姊姊的命运深深影响了这个家，让每个快乐的时刻蒙上阴影。就连美兰产下健康的男婴，以及弟弟锡柱成功申请到澳洲的大学，都无法让全家人高兴，反而让人感到特别不公平。比美兰家晚几年来到南韩的脱北者可以寄钱回去，他们在家乡的亲戚可以免于抱负，又能过得比一般北韩人好。两个姊姊受到特别严苛的对待可能是因为美兰家是最早叛逃的，一集她们来自于敌对阶级。美兰的母亲是一名有着钢铁意志的女性，她带领全家渡过了饥荒，然而当她抵达南韩之后，整个人却崩溃了。虽然只有六十二岁，她的健康与精神却开始衰退。美兰的母亲请了一名巫师，也就是传统的算命仙，他告诉她，她的女儿还活着，但这只是让她更为心焦。

美兰的母亲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她还是清津的一名小女孩，当时她就已经开始上教堂，现在她重新找回童年的信仰。她不断祈祷，为自己背叛女儿的行为乞求宽恕。

美兰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无法从宗教得到慰藉。她的罪恶感不仅使她失眠，也促使她将她的行程表排得满满的好没时间多想。她的姊姊付出终极的代价，所以她才能开着现代汽车。

美兰也想到自己在北韩的男朋友。她感谢他鼓励自己抗拒出身卑微的命运，让自己成为一名有自信的女人与老师。他从来未曾在美兰面前批评过北韩政权，但他告诉她要为自己思考，这句话终于使她的心灵得以开放于澄澈。

我们见面时，美兰经常提到俊相。我想，她应该很高兴能回想自己的初恋——这种事她既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更不能让自己的丈夫知道。当她回忆俊相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她的情景，以及他们在黑暗中整夜散步，她讲话的神情就像女学生兴奋地跟朋友聊起别人的是非。

“你能相像吗？交往三年才牵手，六年才亲吻？甚至连亲吻都不算，只是在脸颊上啄了一下。”

我们开玩笑说，这种没有结局、或者以美兰的例子来说是没有性爱的爱情，才是永远的爱情。美兰回味的，与其说是她的男朋友，不如说是自己早年那段纯真的岁月。

我问美兰是否知道俊相的消息。

“我猜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美兰的声音逐渐变小，她耸耸肩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她对我说，对于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她不感到遗憾，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唯一感到可惜的是自己离开北韩没有机会向他道别。美兰还记得最后一天在清津的情景，当时她觉得自己看到对街的那个人就是俊相，但她不敢靠近他，怕不小心泄露了计划。

“你知道，他跟我，我们有特殊的缘分。我想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这段对话发生在二〇〇五年十月中旬，就在美兰儿子周岁派对后不久。三个星期之后，美兰打电话告诉我，从话筒就能感受到她的兴奋。她大声地说：

“他在这里！”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首尔的一家星巴克碰面，离我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

美兰描述军饷的方式，使我想象他是一名高大英俊、让人印象深刻的男子。然而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名穿着牛仔裤戴着眼镜的瘦弱青年。尽管如此，他的确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他的牙齿像电影明星一样整齐洁白。他平坦的脸颊与外张的鼻孔使他有一张充满异国风情的鞑靼人相貌，令我想起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当我们的卡布奇诺好了，他起身到柜台拿过来。他的身形柔软，整个人颇为自在。相反地，美兰看起来相当紧张。她穿了牛仔短裙，脸上的妆似乎比平日更浓。

我正打算说，对于一个刚从没有咖啡厅的国家来到此地的人而言，他似乎颇为得心应手，着点令我有点差异时，我才知道原来俊相已经在南韩待了一年。当

俊相得知美兰已经结婚——他在向国家情报院探员报告各项资讯时，探员告诉他这件事——他认为如果自己无法联络到美兰，那么这对彼此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俊相这么想并不是因为他对美兰已无感情。事实上，美兰的出走对他打击很大，甚至远超过美兰的想象。美兰的叛逃对俊相造成巨大的信心危机，使他对两人关系的荒谬感到苦恼。为什么要彼此隐瞒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两个人都存有叛逃的念头，却不跟对方说？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懦夫，因为先叛逃的居然不是自己。俊相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不是因为美兰离开他，而是因为她证明自己比俊相更勇敢。

“我一直以为我的想法跑在美兰面，但我错了”，俊相坦承。美兰突然插话，想让他好过一点。“我在当时也对政府有着怀疑与不信任，但俊相比我更清楚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对俊相微笑着，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美兰离开之后，俊相埋首于研究的工作，不仅获得终身职，也有机会加入劳动党。他的父母与弟妹都鼓励他尽力争取。在北韩，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俊相在平壤的生活十分舒适。他租的房间有暖气，而他也有足够的粮食可吃，但他不愿安定下来。大学的女孩是适当的伴侣，但俊相不跟这些女孩约会。聆听更多的演说刻意提高入党的可能，但他也对此敬谢不敏。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俊相回到家里，拉上窗帘，然后开始观看南韩的电视节目。

二〇〇一年，俊相请求允许辞去研究所工作。他向长官与同事解释，因为父母的健康状况不好，身为长子，他必须回去照顾他们，这是个看似合理的理由。事实上，他回清津的真正原因是，在清津他的活动会比较不受监视，而且清津比较接近中国边境。俊相打零工，而且在疗养院工作短暂一段时间，这座疗养院离他过去与美兰夜里散步的地方不远。俊相不浪费金钱，他晚上都待在家里跟父母一起，虽然这意味着他必须忍受父亲无言的责难，后者对于原本可能前程似锦的儿子失望透顶，于是索性撒手不管。

然而，尽管经过审慎思考与计划，俊相的叛逃并不像美兰那么顺利。

俊相花了三年时间存钱准备逃亡。他是个有计划的人，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造成的影响都加以衡量。他仔细计划每个环节，甚至在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都考虑到了——有一件上面印有泡泡团的昂贵衬衫，是他的叔叔从日本寄来的。这件衣服在清津穿上可能太显眼，但在中国穿上也许就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北韩难民。他把最昂贵的日制裤子与背包塞在塑料袋里。渡河的时间定在六月，是河水最高涨的时节。俊相选择水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卫兵较少。护送他过河的掮客带了一些空塑料瓶，刻意当成浮筒。俊相与另一名脱北者，一名四十岁的女子，脱到只剩下内衣，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仍礼貌性地别过头去。俊相把衣服卷好塞到塑料袋里，以免被水弄湿。

河水涨到俊相的脸颊，水流比他预想的来的湍急。另一名脱北者的头已经被

河水淹没；她不会游泳。俊相紧紧抓住她的手，奋力抵抗激流。突然间，俊相赤裸的双足踩到了沙地，他全身湿淋淋地爬上岸，女子也随后跟上。他已经到了中国。俊相回头望向对岸，在清晨曙光下，微亮的天空隐约透出北韩嶙峋的山影。他感到一阵悲伤，却不能在此久留。他穿上衣服，尽管包在塑料袋里，衣服还是湿了。他跟着掮客走入山中，远离河流，直到完全看不见北韩为止。

俊相完全不晓得六月可以这么冷。他的脚在浸湿的鞋子里不断摩擦，终于红肿到生出水泡。当他们终于抵达计划中可以休息饮食的村落时，碰巧几天前有北韩人在此偷窃被捕，因此当地村民对脱北者极为敌视。俊相一行人担心可能有村民会通报警察，于是赶紧离开当地。与俊相同行的女子建议他们一起前往她要去的村子，她曾与当地一名中国农夫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路上，她告诉俊相自己的故事。她与这名农夫生活了好几年，两人生了一个一岁大的孩子。七个月前，她遭到逮捕，并且被送到北韩的劳改营。现在，她想回去与丈夫、儿子团聚。她向俊相保证，她的丈夫会收留他，直到他准备好能够动身为止。

农舍显然也不是可以避难的地方。当他们抵达时，农夫对着女子又踢又打，还用锄头攻击俊相，一边挥舞还一边愤怒地叫嚷，他显然以为俊相是女子的情夫。

俊相只剩下一个人，而且又迷失方向，于是他只能在乡野间到处游荡。终于，他看得一辆人力车，他跳了上去，复返念着掮客教他的一句中文——“市场”。他在某个小露天市场下车，看到一名女子正在卖泡菜。他想这个人一定是朝鲜族，于是问她知不知道有谁能雇他做事。女子看看他的眼镜，又看看他身上鲜艳的日本衬衫。

“你这个年轻人好像没干过粗活”，她对俊相这么说，意思是要拒绝。然而在俊相再三恳求下，女子把他介绍给一名开砖厂的朝鲜族商人，他给了俊相一份工作。

俊相每天搬运砖块，砖窑很热，如果站得太近，眉毛可能会被烧掉。晚上在员工宿舍，俊相会在买来的笔记本上记事。这事他写日记的开始，在北韩，在纸上吐露内心的想法非常危险。俊相写下自己的大学时光，他也写诗。在结束工厂里令人麻木的工作之后，日记能提醒自己当初离开北韩的理由。

俊相在砖厂待了两个月，为前往南韩努力存钱。他搭乘客运前往青岛，当地有广大的南韩企业社群，也有领事馆。

南韩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戒备森严，主要是为了防范像俊相这样的人，但俊相人为如果他能适当打扮，进去不是问题。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西服与新眼镜。充满自信的他出现在领事馆，他直接从楼下的安全警卫面前走进电梯，并且按下七楼的按钮，也就是领事馆所在的楼层。但是七楼与八楼的电梯扭必须有钥匙才能启动。俊相在六楼下了电梯，发现那里还有一名安全警卫，于是他退回到电梯里。最后，他从九楼出了电梯，然后沿着楼梯冲下楼。当他跑出领事馆时，他还能听见警卫以紧急的语气使用无线对讲机。

俊相很庆幸能全身而退。

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而且也没有法子可想。他考虑返回北韩——如果他没有发现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已经回去了。

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栽培出来的菁英，但他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他的大学拥有配置良好的电脑，装有奔腾四处理器的 IBM 主机——而他也使用过北韩的“内部网络”，这是只能由学院人士使用的封闭系统，用来浏览学术论文与北韩购买的已经通过检查的百科全书，但北韩依然是互联网的黑洞，是世界少数几个未连上互联网的地区。在清津的电脑社，孩子可以玩电脑游戏，但也仅止于此。

俊相在北韩时曾听过互联网，一旦到了中国，他对网络的好奇也随之增加。他甚至隐约觉得网络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要怎么上网呢？在青岛客运站，俊相到处闲晃，仔细聆听有没有人讲韩语，接过他找上一名年轻人。这个人是南韩交换生。“没问题，我会教你怎么上网，这很简单”，他对俊相说，并且带他到网吧。

网络对俊相来说宛如一项天启。只要点一下，新的世界就在他面前开启。他首次肯定自己逃来中国是对的。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北韩，他算是最懂电脑的人，但他对网络的认识与孩子无异。他在南韩搜寻引擎上键入“北韩人权”与“ 脱北者”。

往后几个星期，俊相都在网吧待到很晚，他一边吃泡面一边阅读。他发现其他脱北者也在前往南韩时遇到类似的问他，他开始研究这些人使用的策略，哪些做法成功，而哪些失败。他自学了南韩针对北韩人制定的法律，也了解造成南韩无法在驻中国大使馆与领事馆收容脱北者的复杂外交处境。他研究了中国地图、飞机与火车时刻表，然后思索自己该用什么方法离开这里。

然后有一天，他读到仁川一名富有怜悯心的牧师写的文章，里面提到一跳地下线路，刻意让脱北者经由蒙古前往南韩。俊相在那名南韩学生的协助下设立了电子邮件信箱，他很兴奋地写下这段讯息:“我在青岛，您能不能帮我前往南韩？”

俊相的路线与金赫一样。这回有数百名北韩人沿着这条路线逃亡，跨越边境的地点与安全处所也绘制得一清二楚。俊相需要两千五百美元才能启程，他在日本的叔叔电汇这笔钱给他。他先搭火车到二连浩特，然后穿过边境的沙漠地带进入蒙古，该国的边防警察将他交给南韩大使馆。二〇〇四年十月，俊相抵达南韩，之后便被移动到国家情报院进行询问。

询问之后，轮到俊相踢出问题。这不是他第一个问题，但至少是前几个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跟美兰联络？俊相确定美兰在南韩，因为他在青岛的网吧搜寻过她的名字，而且读过她的访谈文章。国家情报院与脱北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当然会有她的消息。

情报院探员感到犹豫。根据规定，脱北者不能知道其他脱北者的资讯，怕当

中有人是北韩间谍。

“对不起，我们不能透露，除非你是她的近亲。”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初恋情人”，俊相恳求地说。

探员被打动了，于是答应帮他去做调查。第二天，探员对俊相说，他会告诉美兰的电话号码，但他认为俊相应该先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美兰已经结婚。

俊相感到震惊。后来他在回想时承认，自己认为美兰依然单身的确是相当荒谬的想法，而且他还自以为是的认定美兰可能在等她。美兰此时已经三十一岁。他们已经有六年以上的时间断了联系。

“当时，说句实话，我的确从没想过她可能已经结婚”，俊相会议时说道。

俊相试着安慰自己。他记得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桑多尔.佩托菲（Sandor Petofi）的诗句，他曾在渡过图门江时诵念这首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俊相在平壤读到这首诗时，心里很感动，于是他记下诗句。俊相牺牲了对美兰的爱而留在平壤。他从未把美兰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因此，当他为了追求自由来到南韩时，就算孑然一身也不为过。

往后几个月，俊相经历了其他脱北者同样经历的过程。他离开统一院以后，找了一间公寓，买了手机，然后充满困惑地在街头与市场闲晃，努力不让自己被眼前的世界吓倒。他只有几个朋友，有时会后悔自己不知道如何找到美兰。当他知道美兰结婚之后，他对探员说，自己不想知道她的电话号码。

“还是别去打扰她比较好。她已经结婚了”，他对自己说。

有天晚上，俊相前往他在统一院认识的朋友家中。这是个非正式的脱北者聚会，大家偶尔聚在一起喝喝啤酒。当中有一名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俊相马上认出他是美兰的弟弟。俊相以前为了讨好他，经常塞糖果给他。当时锡柱只是个孩子，现在他已认不出俊相。

当晚，他们一起聊天，随后的几次聚会，他们又聊了几次。过了一段时间，锡柱也起疑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我们家的事？”锡柱问道。俊相还来不及回答，锡柱拍了一下膝盖，然后自己回答：“我想起来了，你说常跟在我姊身边的那个男孩…….”

几个星期之后，俊相在人行道上踱步，眼前是一栋栋外表看起来完全相同的高层公寓大楼。他与美兰约好在东首尔的一个地铁站碰面。当锡柱认出他是谁时，俊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打电话给美兰。当美兰认出电话那头是俊相时，他可以

听到对方语气中的不悦。“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美兰说：“我可以帮你。”

俊相觉得自己很蠢。他在南韩已经快一年了，这段时间他不断挥动双臂，不仅感到无助，而且空虚孤独。他可以求助朋友，特别是了解他、知道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俊相心里觉得受伤，觉得自己在完全不知情下遭到遗弃，但最后他还是向美兰道歉。

现在，俊相不断看着自己的手机确认时间——他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戴表。他怀疑自己是否搭错地铁，或者等错出口。这些地铁站一个比一个大，伴随着不断延伸的瓷砖走道与数目繁多的出口，每个地方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座地铁站位于新建的住宅区，美兰说她的母亲就住在这里。俊相自己看着人行道，留意人群中是否有人朝他走来。今天是晴朗的一天，刚好处于夏季与冬季这两个潮湿的季节之间，是一段短暂而美好的过渡期。人行道人潮汹涌，绝大多数是女性，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绝大多数南韩妇女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停止工作。俊相看到穿着紧身牛仔裤的女子，拿着手机喋喋不休地说着，手机上的绒毛吊饰也跟着不断晃动。有些妇女推着精美的婴儿车，看起来价格应该跟一辆自行车差不多。北韩几乎没听过婴儿车这种东西——不会走路的孩子往往直接用长被褥绑在母亲背上。俊相想着美兰是否就像这些骄纵的年轻母亲一样。突然间，俊相感到惊慌，他怀疑美兰是否从他面前走过，而他并未认出来。然后俊相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转头一看，吓了一跳。

“你等了很久吗？”美兰摇下车窗对俊相说。

俊相仍然惦记着好莱坞的电影场景。几年来他一直期盼两任能够重逢，他当然不会错过在烟雾弥漫的火车月台上，两人奔向彼此的情景。俊相相像了各种状况，就是没想到汽车——当然更没想到美兰会坐在驾驶座上。

美兰停在公车专用道上，她侧身打开乘客座位那一侧的车门，示意俊相上车。美兰像连珠炮一样地说着，先是为自己的迟到道歉，然后提到交通，最后说自己一直找不到停车位。美兰一直看着前方路面，而俊相则短暂看了她几眼。她的外表还是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认为可能认不出她来。不过，美兰似乎不像记忆中那么容光焕发，或许长年的渴望使自己过度渲染了她的美。她的脸庞透露出照顾一岁孩子的沉重压力；脸颊上少许的面皱几乎无法用化妆遮掩。俊相可以看出美兰已经带有韩国典型太太的味道。她穿着杏色带荷叶边的裙子，宽松的短袖上衣。服装看起来很复杂，就像她的人生一样：少女时期的简单早已消逝无踪。

“你看起来好冷静”，俊相打破沉默。

“不，不，我其实心里面很紧张”，美兰回道。

他们开到首尔市郊一间安静的餐厅。两人一开始先是礼貌性地问候对方家人，然而不管怎么问都不免令人伤感。俊相不敢问起美兰的姊姊，他听说她们被带走了；而美兰不敢问起俊相的父母，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他们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提到美兰突然离去的事。

这个话题一开启，俊相就感到火冒三丈。

“你应该给我一点线索”，俊相对美兰说。

美兰反驳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叛逃，他们原本只是想到中国与亲戚见面而已。即使俊相并不相信她的说法，但听见她这么说，心里还是觉得好过一点。

美兰得知一九九八年十月她离开时，俊相其实人不在清津。她以为自己看到对街的那个人是俊相，其实只是自己的相像。

“如果你想来南韩，为什么不早点来？”美兰问。

俊相顿时语塞。谈到这里，美兰眼泪直流，她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她已经结婚，而且生了孩子。一切都太迟了。

几个月后，俊相与美兰之间的新鲜感消失了。当我跟他们见面时，他们似乎经常被对方激怒。俊相很不高兴地抱怨美兰没有以前漂亮，美兰答应要介绍他跟几个女孩子认识，但从来没有做到。两人联络时，经常是用电子邮件或短信。现代通讯的方便快捷，反而扼杀了彼此间的神秘感。俊相与美兰的关系在北韩的逆境中成长茁壮，只有在他们用珍贵的纸片写信给对方，或藉由缺乏燃料的缓慢火车传达情意时，两任的情感才可能产生深刻的意涵。

“现在我随时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我反而变得不是很想跟他联络”，美兰坦承。“我先在也搞不懂，当初自己为什么会迷恋这家伙这么多年。”

两任社会地位的反转也没有任何帮助。在北韩，俊相拥有比较好的阶级背景、金钱、高级的日本毛衣与平壤的教育。现在，他是刚到南韩的脱北者，没有金钱，也没有人脉。他在北韩受的教育在南韩一点用处也没有，所学的科学与科技已经陈旧过时。俊相不可能马上得到好的工作，因此只能持续打零工，例如骑摩托车外送食物。有一回俊相骑车外送时，被一辆计程车撞倒。他在人行道旁边休息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受伤，车子也没有损坏，于是就骑车走了。当他回到餐厅，提到自己发生的事时，老板听了哈哈大笑。如果俊相补时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新移民的话，他早就向计程车司机要一笔和解金了。

俊相一笑置之。他不会让南韩人的小小揶揄影响自己的心情。他的自信隐藏在深处，存放在自己的内心。俊相从未自怨自艾，也从未后悔叛逃，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再见到父母。新生活中享有的一丁点自由，都能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喜欢穿牛仔裤，只是因为他在北韩不能穿。他把短发留到肩膀。“我一直梦想要让自己长发披肩。我想我必须在四十岁前这么做，这样我才不会看起来像个失败者”，他对我说。俊相酷爱阅读，在北韩，他一直努力寻找人文方面的书籍，但总是有所不足。我常拿书给他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是《一九八四》。他很惊讶乔治.欧威尔居然会这么了解北韩式的极权主义。

我最后一次见到俊相，两人约定在乐天世界（Lotte World）碰头，这是位于首尔南部一处巨大的购物与娱乐中心。那时星期日的下午，即将要过新年，整个

购物中心人山人海。我们穿过人群，找寻一处谈话地点，最后我们走进了回转寿司店，这种店最近在南韩颇为流行。从传送带上拿起我们喜欢的寿司，俊相告诉我，他已经重新回到学校，目标是取得药师执照。寒暑假期间，他会到市郊的建筑工地装设通风系统。以他这种背景的人，这种选择的确有点奇怪。我怀疑下次我跟俊相见面时，他做的事可能又会有所不同。

脱北者静场发现自己难以安定下来。对于逃离极权统治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算那么容易得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自己选择的人来说，决定住在哪里、做什么、甚至于早上要穿哪件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更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脱北者也经常受困于自身处境的多变。有许多脱北者（即使不能说绝大多数，但数量绝对不少）想返回北韩。其中绝大多数原本是相信金正日政权即将崩溃，他们可以在几年内返回北韩，让北韩重获自由，因此才叛逃到南韩来。他们的假定其实相当合理的。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外交政策研究机构产生一种共识，认为北韩的终结已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照的人，都对于北韩能够存活到二十一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的北韩旅游广告。

北韩的存续让世界各国感到好奇，但北韩的存续对北韩人民来说却是一场悲剧，甚至对那些已经逃出北韩的人亦是如此。俊相几乎不可能再见到父母，除非北韩政权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崩溃。美兰只能祈求她的两个姊姊能活到劳改营大门开启的那天，届时所有的长期政治犯都能重获自由。

我的故事将停笔于此。北韩亦然是这个世界上纯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宋太太才刚退休，玉熙在水原经营她的卡拉OK事业，金医师正就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俊相正就读药学系的第一个学年。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美兰生了第二胎，这次是个女儿。对于自己无法完成这些故事，我只能表示歉意，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像北韩一样，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清津大街的公車站，二〇〇八年

尾声
等待

我在首尔为《洛杉矶时报》从事报导工作的这五年来，参加了无数晚宴，与会者包括了记者同业、外援人员与学术人士。每次晚宴对话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韩，而与会者莫不猜错金正日政权何时可能崩溃。

事实上，北韩政权的长命对许多专业北韩观察家来说是个谜。一九九〇年代，北韩即将崩溃几乎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北韩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North Korea”是一九九〇年六月刊登在与社论相对版面的文章标题，作者是研究北韩的著名学者尼可拉斯.艾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一反众人的预期，北韩撑过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市场改革、金日成去世、一九九〇年代饥荒，与小布什总统的两任任期。小布什曾著名地将北韩，连同伊朗与伊拉克统称为“邪恶轴心”，并且暗示要让金正日跟萨达姆.侯赛因一样卷铺盖走路。

但到了二〇〇九年，小布什卸任，金正日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却仍掌握权力。他是二十世纪仅存的独裁者，一个仍生存在这个世上的过时人物。金正日掌控国家的方式，仿佛正处于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不断地退出浮夸的宣传文宣，禁止外国人造访，以核子武器与飞弹来威胁真实或想象的敌人。五月二十五日，北韩进行第二次核试爆，在咸镜北道的地核试验场（位于清津西南方五十英里处）引爆炸弹，没过情报单位估计其威力大约等于数千吨黄色炸药。直到本书写作为止，十六年来美国历任政府的外交努力均未能与北韩达成协议，即使美方提出外交承认与永久结束韩战为条件，也无法使其放弃核武计划。北韩政权目中无人的态度充分显示在几星期后对两名美国记者的严厉求刑上（十二年重劳动），她们因为报导时太靠近图门江边界而遭到逮捕。

六十七岁的金正日头发花白、形容憔悴。二〇〇八年夏天，有报导指出他罹患中风，而最近的照片也显示他有一只手臂瘫软无力，好像有一部分已经麻痹。

尽管金正日的健康状况不佳，但这不必然表示北韩政权将就此走入历史或甚至金正日的死将导致政权崩溃。在人民大会上，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被指定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这项任命被广泛解读为张成泽将在金正日死后成为北韩名义上的领袖，但他或许只是暂时的掌权者，等到金正日喜爱的幼子二十六岁的金正恩年级渐长，张成泽将把权力移交给他。

北韩观察家花了许多时间辩论北韩内部的状况将会改善或是恶化或是将出现任何转变。我跟其他只造访平壤几次的人一样，不愿仅以个人的观察对北韩的情况妄加评论，因为外国人只能看到北韩政府愿意让他们看见的部分，而北韩当局的确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二〇〇八年，我前往北韩两次，二〇〇九年初，我到了边境两次，这几次旅行让我留下混杂的印相。在平壤，我惊讶地发现这座首都正在兴建六座崭新的建筑物，而其他建筑物则未上鹰架正在进行整修。到处都是链锯与手钻机的声音。与其他日新月异的亚洲首都相比，这种现象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平壤这座发展停滞，宛如深陷一九六〇年代时间胶囊的城市来说，这

种现象却值得注意。几十年来，除了新建了几座领袖纪念碑外，平壤实际上并未增添人和新建筑。北韩导游告诉我，限制平壤正在兴建的住房单位有十万个，目标是在二〇一二年金日成百年诞辰庆典之前完成。北韩观察家相信，这些建设资金有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平壤最大而无当的建筑物是那栋楼高一百零五层，外表像是座金字塔的柳京饭店。这栋饭店目前也在整修，这项工程是北韩与埃及电信集团 Orascom 四亿美元合约的一部分，而 Orascom 现在也正为北韩铺设移动电话网络。北韩对移动电话的短暂兴趣在二〇〇四年火车爆炸案后中止，有些人相信这起事件是以电话引爆，目的是炸死金正日。移动电话要将北韩带进二十一世纪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平壤还有什么进步之处？乐园百货公司的顾客主要是外国使馆人员与本国菁英，它的地下有一间商品琳琅满目的 ，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冷冻的澳洲牛肉与美国早餐谷物。跟前几次造访相比，平壤街头的民众看起来生活得更好，穿着也更鲜艳。我最近一次前往平壤是在九月，那个星期相当温暖，我看到一些女子脚踩着造型优美的高跟鞋。我也第一次看到体格稍微丰满（其实远不及美国的肥胖标准）的中年妇女，这在平壤是很稀罕的事，我赶紧掏出相机，趁他还没拐过街角之前拍了一张照片。

平壤经常被说成是波腾金村（Potemkin village），是一个专为外国人设计的精美骗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总会看见盛壮打扮的可疑人物在各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举例来说，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脸颊抹上胭脂，坐在金日成铜像前的水泥长椅上假装看书。你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发现哪里不太对劲。我最后一次参观平壤时，看见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军人走到金日成铜像前献花。当他们深深一鞠躬向领袖致敬时，他们的裤管上提的高度刚好让人看见他们没穿袜子。袜子在军中一直处于短缺状态。

当纽约爱乐去年前往平壤时，整座城市灯火通明，仿佛正值耶诞节——金日成广场沐浴在探照灯下，白色小灯编成的花圈覆盖了每一条大街。三百多人的代表团（包括音乐家与记者）住进羊角岛饭店（由于它位于河中小岛，妨碍观光客四处游走观看，所以经常有人取出号叫“恶魔岛”）。饭店提供宽频网络设备让记者传送音乐会相关的新闻报导。当我们入住这家饭店时，发现房间的暖气太强，许多人脱到身上只剩一件 T 恤。每一餐都让人吃撑了肚子。晚餐是好几道大餐，有鲑鱼、乳酪口蘑烤蟹肉、羔羊肉、薄切雉肉，与维也纳巧克力蛋糕。Women 的早餐自助餐餐桌装饰着冰雕、缕空的哈密瓜，并且慷慨地摆满各种食物。此外，这也是个大型展示会。我们之中即便最爱冷嘲热讽的记者，也留下北韩正在提升的印象，它似乎正从一九九〇年代的苦难行军中逐渐恢复。

当然，我们都被骗了。这只是垒打荧幕上的小亮点，是北韩这个严酷、功能失调的国家短暂出现的一段有光的换幕时间。互联网的连接消失了，灯光熄灭了，音乐会结束后的那个星期，我打电话给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当时驻平壤的代表

尚-皮耶.德.玛杰里（Jean-Pierre de Margerie），他告诉我："你们一离开，这里又变得黑漆漆的。"

在派驻北韩的各个援助机构中，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规模是最大的，该署对于北韩竞技处境的评估相当悲观。二○○八年夏天针对两百五十个北韩家庭所做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以在乡野采集野草来补充粮食，大多数成年人因为缺乏食物而不吃午餐。根据德.玛杰里的说法，当被问到下一餐在哪儿时，受访者要不是说不知道，就是模糊的回应，例如"我希望住在集体农场的亲戚今晚能送点马铃薯过来"。有些受访者一被问起这些问题，眼泪就流了下来。

联合国机构不认为会发生像一九九○年代那样的饥荒；不过机构也描述北韩民众长达数年营养不良的情形。去年夏天美国援助机构在另一篇报告中表示："老师提到孩子无精打采，他们的社交与认知能力也发展迟缓。工人无法上全天班，工作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完成。"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援助机构，他们发现消化不良的病例增加了两成到四成，主要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

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北韩就映入眼帘，尽管你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辆车窗才能看见。就连派驻平壤的援助官员也不许在无人陪同下前往乡村。二○○八年九月，我到南浦一游（美兰第一次亲眼目睹尸体就是在这座西岸城市），看到无家可归的民众睡在马路旁的草丛里。在一般工作日的早上十点，我看到不少人蹲坐在路旁，他们垂着头，一副无事可做的样子。一名年约九岁的孩子赤足走在人行道上，他穿着一件沾满泥土、下摆垂到膝盖以下的大人制服。这事第一次我亲眼看见恶名昭彰的流浪燕子。

平壤与南浦相距约二十五英里，在连接两座城市的道路上，刻意看到凡是四肢健全的北韩人全投入到了粮食生产的行列。中年办公室女职员来到乡村，她们带着提袋，肩上扛着铲子；在道路的一侧，老年人四肢着地筛选可吃的野草。乡村弥漫着一股堆肥的恶臭，当地仍然使用粪便而非化肥。去年，从南韩进口的化肥因为两国关系紧张而大幅减少。田里只有几台机动车辆；冒着烟的卡车看起来好像是燃烧木材与玉米穗获取动力而非汽油。人们背着巨大的袋子，弓着背走在显然多年未使用的生锈铁轨上。

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北韩也只能满足国内六成的粮食需求，目前的北韩根本没有能力进口剩下的四成。离平壤越远，粮食缺乏的情况越严重。去年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共同进行的评估再度点名咸镜北道是最容易出现粮荒的省份。

北韩经济持续萎缩。设于首尔的韩国银行估计，北韩经济再二○○六年萎缩了百分之一点四，二○○七年是百分之二点三。（直到本书写作为止，二○○八年的数字还没有公布，但预期应该也是萎缩。）

自从保守派李明博于二○○七年十二月当选总统之后，南韩对北韩的投资就

开始缩减。南韩游客前往非军事区以北的金刚山景点（北韩获取强势货币的最大来源）观光，也因为去年夏天一名游客遭北韩士兵误杀而告中止。两韩关系的紧张也威胁到国境线以北一项富有前景的计划，此即开城工业园区，南韩工厂在此雇用了三万八千名以上的北韩工人。

平壤的好战情绪与经济上的强硬路线合流。共产世界向资本主义屈服了已经二十几年，但金正日仍企图以他父亲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做法管理经济。要说金正日有什么作为，我们只能说他让整个北韩的经济大幅后退，将过去十年的市场改革一笔勾销。市场让北韩获得了进口水果与鲜艳的 T 恤，但劳动党却持续打压市场，有人因此担心市场可能很快就会完全关闭。北韩市场的交易时间被限制在下午两点到六点。政府只允许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从事小贩业；所有男性与年轻女性都必须到国有企业从事官方指定的工作。对于买卖的商品，限制也越来越多。除了稻米与玉米外，大豆也禁止在市场交易，以避免流入中国并转售给敌国南韩。特别警察在市场巡查，没收禁止贩卖的物品。

“我们的将军想走社会主义老路”，一位名叫金泳哲（他自己告诉我的）的商人说。他是我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在边境附近访谈的几位咸镜北道民众之一。金泳哲表示，北韩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反“中国制”商品的运动，而且实际上已经让整个市场的化妆品、糖果、点心与药品完全消失。

“我们应该购买北韩产品而非中国产品，但北韩根本没有生产任何东西，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东西可买”，他说。

李明熙，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抱怨这些限制已经扼杀了经济的活力。

“如果他们不给我们粮食与衣服，又不许我们购买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活下去？”她质问。李明熙是吉州人，而吉州是最靠近核子试验场的城市。她在核试验前五天离开北韩。她对很多事情感到忧心——辐射外泄，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制裁，经济状况。斗大的泪珠沿着瘦削的双颊滑落，她问：“人民正在挨饿，把钱花在核子武器上不是一种浪费吗？”

虽然中国仍然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图门江两岸的贸易却已减缓。在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始之前，中国在江边设置了有刺的铁丝网与监视摄影机。北韩边防卫兵的碉堡变得更密集以防止叛逃与非法贸易。一名在清津拥有工厂的中国商人告诉我，北韩政府最近禁止出口钢板到中国，理由是重要资源不应运往国外。

清津可能是北韩最富企业进取心的城市，但它一直受到中央权威的打压，后者担心清津可能会摆脱它的掌控。该市过去十年的命运与边境贸易息息相关，而与平壤的指挥渐行渐远，居民乃至地方官员都变得较不顺从。二〇〇八年三月，当不满五十岁的妇女不准在市场工作的命令首次施行时，民众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女性摊商罕见地在清津水南市场的管理办公室前公开发起抗议，她们高喊：“给我们食物，否则就让我们做买卖。”

市场当局被迫让步，哦今年他们又想重申这项禁令。我遇到不少清津人，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什么政府不滚远一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这种事情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二〇〇四年，我在中国遇见一名清津煤矿工人，他告诉我："民众不是笨蛋。每个人都认为政府应该为这场恐怖的浩劫负责。我们都知道自己这么想，也知道别人的想法跟我们一样。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

本书提到的人物，他们偶尔还能透过茂山、会宁及其他可以收到中国信号的边境城镇，用非法电话与家人联系。二〇〇九年三月，宋太太与她的兄弟通过电话之后告诉我："情况就是这样，打架都过得很辛苦。市场没有太多粮食，物价也高得吓人。他们只能量入为出。"她说她的兄弟过得比大多数人好，因为还能靠她经由中国寄钱接济他们，但大多数都被官员没收了。

"脱北者的家庭在邻里间算是最有钱的"，玉熙对我说："我丈夫说，安全探员总是到家里来要东西；他们甚至跑来刮胡子，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唯一有刮胡刀的人。"

贫富悬殊也导致犯罪率攀升。宋太太二女儿的丈夫在铁路局担任安全警卫，直到二〇〇六年，他才在玉熙的邀请下与妻子一起来到南韩。他叛逃的时候，货仓已经开始出现许多粮食窃案，京味配发枪支与实弹，而且下达格杀令。同样的命令也适用于铁道两旁狭窄隙地种植的玉米，这些是铁路局员工的粮食。请进也有严重的毒品问题，这里很容易取得甲基安非他命，又称"冰毒"。这些毒品通常在小工厂里制造，贩售到城内或中国边境。它的价格低廉，刻意减轻饥饿感，很符合北韩的生活需要。

我在平壤看到的景气小幅回升，例如一些新的建筑工地。但这种现象似乎未曾在清津出现。除了主要大街旁的一两座加油站，过去几年来这座城市并未出现什么重要建设。最新的建筑物是一座外表经过装饰的粉红色建筑，这是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兴建的，是金正日花的长期展示场地。一号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正面，以鹿蹄草的清淡色调或以桃色重新粉刷，但是外墙的檐口却开始崩解掉落，对来往的行人持续构成危险。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新的海报，大力宣传政府最新的重建经济口号：经济前线。

过去几年，清津出现了几家民营餐厅，他们利用国营餐厅或国营公司倒闭后留下的空大楼来营业，此外也出现了几家唱歌房，也就是卡拉 OK。然而，这些生意绝大多数都维持不久。

"我看不到任何进展的迹象。事实上，请进像是一座时光倒退的城市，每一件东西都年久失修，而且似乎只有越来越糟的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地区主任安东尼.班伯利（Anthony Banbury）于二〇〇八年八月造访清津后表示。"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已停工。八根烟囱顶多只有一根在冒烟。"

德国地理学家艾卡特.德格慷慨提供许多照片给本书。二〇〇八年九月，他

获准参观清津与镜城，镜城就是美兰成长的地方；他也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只看到一大群平民在通往镜城的路上，完全以人力重新修筑公路。“好几千人在山上铲土，把土运下山，然后倒在地上形成好几座小土堆，仿佛在建筑金字塔似的”，德格说。在清津市内，他注意到数量多得不寻常的民众蹲坐着，这个姿势几乎已成为北韩的象征，他们弯曲着膝盖顶着自己的胸部，仅靠双足维持全身的平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总是在做着某件事，但这里的人们只是蹲做着。”

这是许多人眼中的北韩景象。由于缺少椅子或长凳，民众往往直接往地上一坐，一等几个小时，不管在路旁、公园、还是市场，都是如此。他们两眼直视前方，仿佛在等待什么——他们等待的是路面电车？也许。还是经过的车辆？朋友，或是亲人？也许他们并没有明确等待的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改变。

——芭芭拉.德米克

二〇〇九年九月